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43

# 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

THE LOST WORLD OF BRITISH COMMUNISM

〔英〕拉斐尔·塞缪尔/著  
(Raphael Samuel)

陈志刚 李晓江/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Voice Of Marxism-Leninism  
Group Of EBOOK*

制作

## 序 言

这本书里，拉斐尔·塞缪尔提供的脚注十分引人注目。首先，这些脚注收录了一些可以在任何描绘英国共产党历史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的材料，也就是说，这是其他不同派别的历史学家、学者、评论员，以及政论撰稿人和新闻工作者的参考材料。和这些材料混杂在一起的，还有大量引自其他地方的、并不引人注目的出版物上的材料：政党和劳工出版社的论文、摘录；政党大会和分会的会议记录；世界大会或各地会议的报告；从共产党总部到共产国际广泛传阅的语录。其次，这些脚注收录了共产党的“文件”——用于招募和培训用的手册和指南、小册子和期刊，以及增收了更多简短材料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如从档案和个人收集的资料中挖掘出来的模板性的新闻稿、传单、布告和海报。另外，这些脚注收录了党的领袖的通信和工作文件，还收录了不少党员、党的鼓动者和组织者，党的同情者和同路人，“背叛者”和叛徒，还包括工会会员和自学成才者出版的自传和回忆录的选段，以及那些左翼人士写的小说和诗歌。此外，这些脚注还增加了大量的当面访谈和电话访谈的材料，这些访谈对象包括老革命以及其他一些人员，如来自英伦东部的利兹市服装厂的激进裁缝，伦敦北部的信仰共产主义的工程师，居住在斯劳的一位女性“进步追随者”（progress chaser），这些人都极力声援那些支持列宁、帕姆·杜德<sup>①</sup>（Palme Dutt）或毛泽东的人。除这些书面或口头证据外，还有不同种类的历史观察：这些共

---

<sup>①</sup> 帕姆·杜德（Rajani Palme Dutt，1896～1974年），英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共产国际活动家，著名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他1896年6月19日（转下页注）

产主义者在电影院所唱所见，他们的穿着打扮（颈部开口的衬衫，男人在胸部口袋的显眼位置插着一支钢笔或签字笔，女人则穿着休闲的上衣、宽松的裤子和“舒适的鞋”）；这些党员怎样使自己适合于公共场合（他们不得不衣冠楚楚）；他们去度假时——如果需要他们度假的话——也喜欢在寒冷的天气中精神抖擞地迈着步伐；他们家里的布置，通常让人感觉很不舒适：有一小柜书，花园里满目荒凉。而布置者告诉我们，这样的布置是由于缺少“个人时间”（personal time）的缘故。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是由总体性的政治文化引起的，这种政治文化不但通过公开的资料和官方文献，而且通过引人注目的日常生活——他们的习俗和目标——被描绘出来，就像《工人日报》发行的足球年鉴，每年都让年轻的拉斐尔·塞缪尔们翘首以盼。不是幽灵的世界，而是有着梦想、欲望以及可以认知的人类本身，才是观念存在的地方。

资料的翔实和多样性让拉斐尔·塞缪尔作出了丰富多彩的描述，而这又成了他的历史著作的标志。这种方法对于其主要著作——《记忆的剧场》（*Theatres of Memory*, 1994年）——也是至关重要的，这部著作极力赞同把“非官方的知识”材料当做同一时代不断扩展

---

（接上页注①）生于剑桥的一个英籍印度人家庭；学生时代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1914年加入英国独立工党；1915年因反对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判处一年徒刑；1916年入牛津大学进修历史和哲学，后因组织社会主义者集会活动而被大学除名；1919~1922年担任工人调查局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21年英国共产党《劳动月刊》创刊后一直任主编；1922年创办英国共产党另一机关刊物《工人周报》，同年起为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3年后为政治局委员；1935年出席共产国际七大，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36~1938年，负责编辑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曾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和英国共产党的发言人在印度从事革命活动，同印度共产主义运动有密切联系；1943~1965年，担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兼国际部部长；1962年获莫斯科大学历史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后，因病未再进入英国共产党执委会。其主要著作有《两个国际》、《近代印度》、《社会主义和赖以生存的工资》、《列宁》、《世界政治（1918~1936年）》、《共产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原理》、《法西斯主义和社会革命》、《英国和英帝国危机》、《当代史的几个问题》等。——译者注



的历史文化的证据。在拉斐尔·塞缪尔后来所写的文章中，这种方法发挥了极为不同的作用。在本书中，拉斐尔的目的是为了“重构一种政治精神”，并从“下层”的视角来勾画英国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官方的叙述与外在的结构，以及与那些他称之为“真正的信徒”的内在世界能够联结起来。这就是说，在探索过程中，一方面，他严格地分析历史、语言、组织和政党的公众形象；另一方面，这种方法又驱使他和他的家庭成员尤其是他的母亲和姨妈们开展访谈活动，她们曾经是共产党员。而且，通常在这个时候，他也把自己以及记忆中的东西当成历史材料了。他坚持认为，英国共产主义是“一个极具道德的体系”。颇有挑衅意味的是，他希望“对道德力量和自我感觉的心理活动——包括自我欺骗——的秘密源泉说三道四的，都可以闭嘴了。这种力量和心理是政治活动的基础，无论哪种政治活动都是如此”。

在脚注中，也有作者和读者的许多友好的、与主题无关的话。在每篇文章的结尾，作者都要强调其研究结论只是暂时性的，还有待继续探讨：他渴望读者多多批评并提供更多的材料。他解释说，“由于篇幅的原因”，他不能够让本书囊括更多的材料。在这种特殊情形下，至少有两章多（或者三章）还需要补充和丰富。这并不是故作姿态或矫揉造作。通过不断修正和请教，拉斐尔使其著作不断完善，这种“没完没了的警惕”可能要归功于其共产主义的素养。在日常生活中，他对绝对权威观念的反抗或许也归功于此<sup>①</sup>。这里再版的三篇文章最初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拉斐尔50岁出头，也恰好在那时我和他相遇相爱并结婚了。正如拉斐尔所明确指出的那样，那些文章是政治冲动的直接产物，其中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是1984~1985年的矿工罢工。本书的第一篇文章，曾于1985年冬天发表于《新左翼评论》杂志，那时他正与别人合作写一本书，那本书是根据第一手证据——

---

① 要更多地了解塞缪尔的工作方法，请参见“Biographical Note on the Text” in *Island Stories: Unravelling Britain* (London: Verso 1998)。

“日记、信件、录音和事后的回忆”——写成的，随后，就遇上了罢工的意义问题<sup>①</sup>。他内心有一股强烈的冲动，认为集体在当代英国政治生活中迅速消失了，这股冲动促使他完成了《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一书的最雄辩有力的段落，这本书是为了满足描写罢工工人故事的需要，这也是因为拉斐尔对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如下状态感到苦恼和失望：他们似乎被剥夺了过去，要么否认过去，要么对过去简直就是极度无知。尽管如此，除了满足当前的迫切需要外，在五年前《新左翼评论》发表的一篇文章——《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篇长达75页的力作，似乎只有“第一部分”）中，他认为，写一部反映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思想以及他们的政治文化的历史是他的夙愿。这个夙愿在1981年卷和1982年卷的《历史研讨会》中已经提出来了<sup>②</sup>，也散见于他一生所写的那些文章。比如说，关于19世纪社会主义广教派（broad church of socialisms）、关于罗伯特·特雷塞尔（Robert Tressell）和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文章，以及后来在对自己曾经作为其中一分子的“老派”新左翼阵营的反思中，或者是在莫顿（A. L. Morton）、伊万·麦考（Ewan MacColl）<sup>③</sup>和其他一些他称之为“空想家、理想主义者、知其不可而为之者”的讣告中处处显露了出

---

① *The Enemy Within: Pit Villages and the Miners' Strike of 1984 - 1985*, eds Raphael Samuel, Barbara Bloomfield and Guy Boana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6).

②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1); *Culture, Ideology and Politics*, with Gareth Stedman Jone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2).

③ 伊万·麦考，原名詹姆士·米勒（James Miller），1915年出生于苏格兰的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工人歌手家庭，被称为英国民歌之父。父母都是唱传统苏格兰民歌的好手。受父母的影响，麦考小时候就喜欢唱歌，并有极高的创作天赋，十几岁时就为工会写过不少好歌。后来他加入了共产党，积极投身到同资本家的斗争中，用民歌宣传他的激进政治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音乐的影响越来越大。因为不满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他立志保护传统民谣，在英国各地四处游唱民歌。这段时期他写的最有名的一首歌是为“曼彻斯特郊游者”运动所写的同名歌曲。麦考后来因为喜爱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而迷上了实验戏剧，在英国成立了第一个戏剧工作室，推广现代戏，（转下页）

来。对工人剧院运动的进一步讨论，可以参考他在1985年出版的另一本合著《左翼剧场》(*Theatres of the Left*)，该书是《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的姊妹篇<sup>①</sup>。

当这些文章初次发表时，一些读者写信，也是根据拉斐尔的请求，进一步提供了信息，纠正了一些谬误，或介绍了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故事。其他一些人则满怀怨恨，并试图挥起大棒攻击作者<sup>②</sup>。不止一个回信者坚持认为，拉斐尔所描述的世界是斯大林主义的世界，而不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虽然在文章的几个关键段落中，拉斐尔不辞辛劳地指出许多斯大林式的诫命在听说过斯大林之前很早就有了。有一封信则抱怨这不是“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而是“拉斐尔·塞缪尔的失落”，这个批评表明了老共产主义者讨论那些仅仅被视为“个人”的材料是多么的勉强<sup>③</sup>。然而，这也明确表明了这个工作极

---

(接上页注<sup>③</sup>)并在表演、舞台布景、灯光和声效等一系列相关方面对英国古老的戏剧模式进行了改革，创作了许多在英国戏剧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新戏。他在十分钟内写成的歌曲《肮脏的老城》(*Dirty Old Town*)是他第一首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的歌曲。这首歌控诉了工业化对其家乡索尔福德的破坏，后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共鸣，堪称英国的“鹿港小镇”。他唱的歌多半是自己创作，与政治、大众生活有关的叙述性歌谣，极具社会批判色彩。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对于麦考这样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激进的民歌手来说，他所创作的最为著名的歌曲却是1956年为佩吉·西格所写的一首名叫《当我第一次看见你的容颜》(*The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的爱情歌曲。这首歌在1972年被女歌手罗勃塔·福莱克(Roberta Flack)翻唱，并被选作一部电影的插曲，赢得了当年的格莱美年度最佳歌曲奖。麦考对英国民歌的繁荣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英国民歌在20世纪60年代摇滚乐主宰一切的情况下顽强地活了下来。——译者注

- ① *Theatres of the Left 1880 - 1935: Workers' Theatre Movement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eds Raphael Samuel, Ewan MacColl and Stuart Cosgrov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5).
- ② 有一个错误被读者几次来信指出：并不是托尼·安巴提婊(Tony Ambatieolou)而是马诺利斯·格利宙思(Manolis Glezos)爬上帕台农神殿(Parthenon)，拔下了纳粹旗帜。
- ③ 这封信收录在伦敦主教门研究所主编的《塞缪尔选集》中，不过我们至今没有看到塞缪尔的回信(如果有的话)。更多的信息，以及关于塞缪尔的著作和东伦敦大学的拉斐尔·塞缪尔历史中心活动的资料，请参见他们各自的网站。

不寻常的一个方面，虽然不是按照那个写信者所愿意的方式。这些文章的新颖之处，甚至或许是独一无二之处，不仅在于这些属于政党的个人资料，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依然是十分珍贵的，而且这些材料是对一个少年共产主义者的幼年时代、青年时期及其成长经历的历史描述。

拉斐尔·艾肯·塞缪尔（Raphael Elkan Samuel）生于1934年，其家族是伦敦庞大的犹太家族的一支，从他母亲那一代就开始从事政治活动了。在逾越节时，他们仍然对能说意第绪语的老祖母表示尊敬，他们开始时用希伯来语祈祷，结束时却唱苏联歌曲。他的母亲，明娜·尼伦斯坦（Minna Nirenstein），1939年加入共产党，是一位勇于奉献的活动家和组织者，后来被选举为一个飞机厂的工人代表，是第一个参加混合机械工程工会（Amalgamated Engineering Union）的妇女，1943年时该工会才允许妇女参加。她对政治工作的献身最终让她和巴尼特·塞缪尔（Barnet Samuel）的婚姻陷于破裂，巴尼特·塞缪尔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犹太律师。拉斐尔强调，他和英国共产主义政党中的“宗教激进分子”都一致认为他父亲是一个“古怪”的人。他写到，共产主义意味着提供一种“彻底的社会认同”。从幼年到21岁，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中，他阅读的材料、友谊以及社会生活都完全由政治决定（正是这个孩子在校门口卖《工人日报》，把学校似乎当成了工厂，并试图招募同学卖报）。然而，在那里，他总是发现每个人的故事都有其特殊性。他记得看过一个长粉刺的巴斯克小孩的照片，有人告诉他，这个小孩生活在社会底层，看上去像一个充满恐惧和失败感的孩子；战争和伦敦闪电战、父母婚姻的失败、撤退到“进步分子”的寄宿学校，这些阴影笼罩着他。拉斐尔推测，共产主义满足了他对“权威的渴望”（他的父亲在他笔下渐渐淡出），然而，拉斐尔及其具有共产主义坚定信仰的未婚妻，都是来自婚姻失败家庭的孩子，他们后来拼命“渴求”有一个家。他告诉我们，他对共产主义的依恋使他成为“一个狂热分子”，在他许多自我抨击的肖像画中，有一张从外表上

看颇像一个十分滑稽的“少年委员”。在党派“路线”上，他修正了母亲的观点，阐明了舅妈们的看法，在某些情况下，这很容易看成灾难性事件。这个时候，拉斐尔就用心理分析的语言，如果不严格地说，就是用诸如“组织的拜物教”、“压抑”、“精神创伤”、“分裂性焦虑”这些词来突出他称之为“心理剧”，甚至共产主义“心理错乱”的东西。他需要这些词语来解释所谓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关系，也需要用这些词语来阐明，在撰写一部反映情感或精神状态的历史书时，提出反对意见也许是多么的不合时宜。他记得，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曾在伦敦地铁里用口哨演奏“国际歌”（想看看其他人是否附和），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这表明嘲弄个人和集体之间的人际关系（relationship）——拉斐尔称之为“联系”（nexus）——是多么的困难。在个人与他人之间，历史学家寻找的是共性，而传记作家则更加强调差异性。

1996年，拉斐尔在其精力鼎盛之时离我们而去，留下了一堆工作底稿和札记，包括一些近乎完成的文章草稿，这些文章草稿最后收录在《小岛的故事》（*Island Stories*）之中，作为《记忆的剧场》三部曲的第二部。尽管预定的第三部著作依然还在收集之中，《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却代表着最具有明确核心的著作，如脚注告诉我们的那样，他打算在沃索出版社出版。在他看来，我明显是他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但是当拉斐尔去世十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这些文章尽管没有完成，他的朋友、同事、出版商和我也一样，感觉它们自然成卷，代表了他的最高水平：历史研究和想象力以及写作技巧的成功。他离开“这个党”（他一直这样称呼它）30年以来，拉斐尔·塞缪尔的生活理所当然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可以解读为对古老的魔鬼的驱逐，一次长长的道别，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对往日的集体认同和政治斗争形式的一次“欢呼”和“告别”，是一篇对过去的某些理想主义活动和奋斗的颂词。然而，某些读者可能会把这种“告别”称之为背叛。在提供历史叙述的层面上，我认为本书非常像一本辩解书。拉斐尔在撰写本书时是殚精

竭虑的，抑制了愤怒，敏锐地看到了政治文化的诫命和“陶醉”，即使在他的幻想十分“怪异可笑”之时（他描写英国共产主义者对“乔大叔”的感情的段落，就是例证）。这些文章似乎是一些探索“我们生活所依靠的迷思”的碎片，之所以采用拉斐尔共同编辑的另一部著作的标题，是为了突出和过去的内在联系<sup>①</sup>。

感谢东伦敦大学拉斐尔·塞缪尔历史中心的彼得·克劳斯（Peter Claus），以及主教门研究所的档案保管员斯蒂芬·狄克斯（Stefan Dickers），还要感谢沃索出版社的汤姆·佩恩（Tom Penn）对全书的编辑。

艾莉森·莱特（Alison Light）

2006年写于伦敦

---

<sup>①</sup> *The Myths We Live By*, eds Raphael Samuel and Paul Thomps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 相关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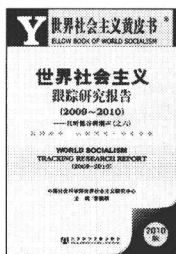
更多信息请查询：[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相关链接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织出版的一套以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为宗旨的学术著作，分“皮书系列”、“研究系列”和“参考系列”。“研究系列”以国内的优秀研究成果为主，作者均为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专家学者；“参考系列”以译著为主，收录国外著名学者的代表性作品。“皮书系列”主要是《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2006年我们出版了首部《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此后每年“两会”期间出版。这套丛书于2000年开始出版，目前已出版数十种。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成立于1994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会同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中央对外联络部、新华社共同成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在中宣部的指导和支持下，“中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高举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对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思潮、理论、运动与制度做了大量的、多视角、深层次的研究探讨，撰写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 皮书系列



李慎明 主编  
2010年2月出版  
89.00元

ISBN 978-7-5097-1296-2



9 787509 712962 >



李慎明 主编  
2009年3月出版  
79.00元(含光盘)

ISBN 978-7-5097-0657-2



9 787509 706572 >



李慎明 主编  
2008年3月出版  
98.00元(含光盘)

ISBN 978-7-5097-0073-0



9 787509 700730 >



#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 [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 皮书系列 (续)



李慎明 主编  
2007年3月出版  
80.00元(含光盘)

ISBN 978-7-80230-509-0



李慎明 主编  
2006年5月出版  
80.00元(含光盘)

ISBN 7-80190-429-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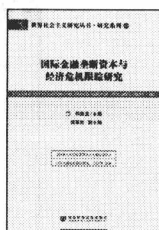


李慎明 主编  
2006年3月出版  
68.00元(含光盘)

ISBN 7-80190-971-2



## 研究系列



何秉孟 主编 博军胜 副主编  
2010年7月出版  
59.00元

ISBN 978-7-5097-1529-1



李慎明 主编  
王立强 博军胜 曹苏红 副主编  
2010年7月出版  
59.00元

ISBN 978-7-5097-1565-9



#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 [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 研究系列 (续)



李慎明 主编  
王立强 傅军胜 曹苏红 副主编  
2010年7月出版  
59.00元

ISBN 978-7-5097-1527-7



何秉孟 姜辉 张顺洪 编著  
2010年5月出版  
59.00元

ISBN 978-7-5097-1377-8



刘书林 蔡文鹏 张小川 著  
2009年10月出版  
35.00元

ISBN 978-7-5097-1086-9



李慎明 主编  
王立强 傅军胜 曹苏红 副主编  
2009年7月出版 88.00元  
(上、下册)

ISBN 978-7-5097-0784-5



#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 [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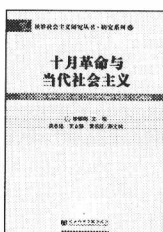


## 研究系列 (续)



谭索 著  
2009年6月出版  
69.00元

ISBN 978-7-5097-076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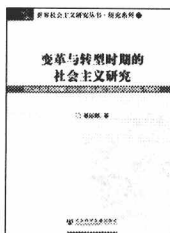
李慎明 主编  
吴恩远 王立强 曹苏红 副主编  
2008年11月出版 89.00元

ISBN 978-7-5097-0483-7



王金存 著  
2008年6月出版  
49.00元

ISBN 978-7-5097-0207-9



聂运麟 著  
2008年5月出版  
85.00元

ISBN 978-7-5097-0173-7



李慎明 主编  
姜述贤 王立强 副主编  
2008年5月出版 59.00元

ISBN 978-7-5097-0171-3



周新城 著  
2008年4月出版  
3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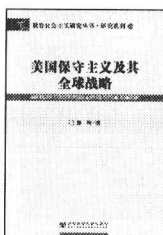
ISBN 978-7-5097-0148-5



#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 [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 研究系列 (续)



姜琳 著  
2008年3月出版  
39.00元

ISBN 978-7-80230-984-5



9 787802 309845 >



周新城 张旭 著  
2008年2月出版  
48.00元

ISBN 978-7-5097-0049-5



9 787509 70049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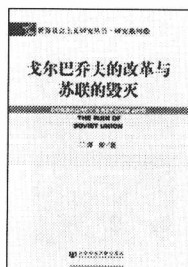


聂运麟 等著  
2007年11月出版  
38.00元

ISBN 978-7-80230-875-6



9 787802 30875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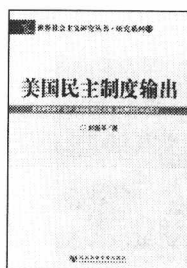


谭索 著  
2006年9月出版  
79.00元

ISBN 7-80230-259-5



9 787802 30259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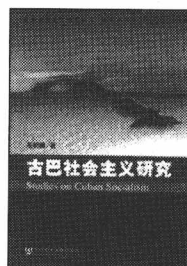


刘国平 著  
2006年8月出版  
45.00元

ISBN 7-80230-157-2



9 787802 301573 >



毛相麟 著  
2005年10月出版  
28.00元

ISBN 7-80190-740-X



9 787801 907400 >

#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 [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 研究系列 (续)



李慎明 主编  
2005年2月出版 80.00元  
(上、下册)

ISBN 7-80190-429-X



9 787801 90429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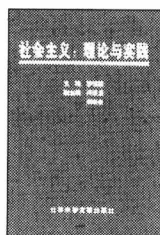


新辉明 主编  
2004年5月出版 58.00元  
(上、下册)

ISBN 7-80190-178-9



9 787801 90178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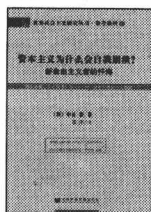
李慎明 主编  
2001年4月出版  
58.00元 (精)

ISBN 7-80149-482-2



9 787801 494825 >

## 参考系列



[日] 中谷岩 著  
郑萍 译  
2010年7月出版  
35.00元

ISBN 978-7-5097-1443-0



9 787509 714430 >



[古巴]·萨洛蒙·苏希·萨尔法蒂  
宋晓平 徐世澄 张颖 译  
2010年6月出版  
39.00元

ISBN 978-7-5097-1422-5



9 787509 714225 >



[法] 弗朗索瓦·巴富瓦尔 著  
陆象淦 王淑英 译  
2010年3月出版  
49.00元

ISBN 978-7-5097-1338-9



9 787509 713389 >

#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 [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 参考系列 (续)



[俄] 罗伊·麦德维杰夫 著  
王晓玉 姚强 译  
2009年6月出版  
39.00元

ISBN 978-7-5097-0791-3



9 787509 707913 >



[英] 张夏准 / 著  
2009年1月出版  
29.00元 (修订本)

ISBN 978-7-5097-0593-3



9 787509 70593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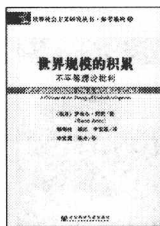


[英] 张夏准 / 著  
2009年1月出版  
39.00元

ISBN 978-7-5097-0592-6



9 787509 70592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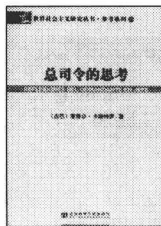


[埃及] 萨米尔·阿明 著  
杨明柱 杨光 李宝源 译  
李宝源 杨光 校  
2008年11月出版 79.00元

ISBN 978-7-5097-0426-4



9 787509 70426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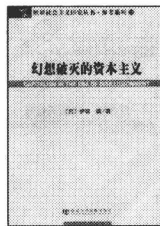


[古巴] 菲德尔·卡斯特罗 著  
2008年10月出版  
49.00元

ISBN 978-7-5097-0386-1



9 787509 703861 >



[日] 伊藤 诚 著  
孙仲涛 宋颖 韩玲 译  
2008年5月出版 29.00元

ISBN 978-7-5097-0193-5



9 787509 701935 >

#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 [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 参考系列 (续)



[英] 唐纳德·萨松 著  
姜辉 于海青 庞晓明 译  
2008年1月出版 138.00元  
(上、下册)

ISBN 978-7-80230-881-7



9 787802 30881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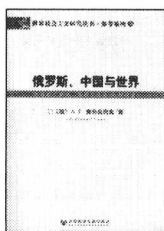


[保] 亚历山大·利洛夫 著  
马细谱 葛志强 余志和 赵雪林 选译  
2007年9月出版 48.00元

ISBN 978-7-80230-752-0



9 787802 30752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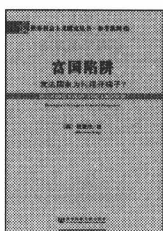


[俄] A. T. 雅科夫列夫 著  
孟秀云 孙黎明 译  
2007年5月出版  
58.00元

ISBN 978-7-80230-636-3



9 787802 306363 >



[英] 张夏准 著  
肖炼 倪延硕 等译  
2007年1月出版  
35.00元

ISBN 978-7-80230-362-1



9 787802 303621 >



[俄] 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 著  
何宏江 等译  
2005年9月出版  
85.00元(精)

ISBN 7-80190-701-9



9 787801 907011 >



# 目录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参考系列 43

序 言 .....	1
-----------	---

## 第一部分 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

第一章 衰落中的集体 .....	3
一 意识形态的混合物 .....	7
二 阶级的两极分化 .....	11
三 践行团结精神 .....	15
第二章 右翼共产主义 .....	21
一 争论的各方 .....	23
二 重生的幻想 .....	28
三 阶级政治? .....	31
四 多元主义的限度 .....	34
五 衰败的征兆 .....	38
六 失去中心的党 .....	42
七 “攀友社团” .....	48

<b>第三章 形而上的空间</b> .....	53
一 不公正与帝国 .....	57
二 道德上的乐观主义 .....	59
三 战斗的宗教团体 .....	63
四 冷战 .....	66

<b>第四章 家族共产主义</b> .....	70
-------------------------	----

## 第二部分 持久力

<b>第五章 团结的意志</b> .....	83
一 同志关系的代价 .....	90
二 “党的观念” .....	98
三 改变路线 .....	103

<b>第六章 组织纪律</b> .....	108
一 节约时间 .....	111
二 庄严的会议 .....	118
三 共产主义的街头纪律 .....	122
四 科学管理 .....	125

<b>第七章 领导的使命</b> .....	134
一 自上而下的组织 .....	142
二 “老乔” .....	147

<b>第八章 生存的策略（片断）</b> .....	156
----------------------------	-----

## 第三部分 阶级政治学

第九章 幽灵间的战争 .....	161
第十章 阶级的隐喻 .....	166
一 政党 .....	166
二 “生活就是斗争” .....	174
三 大有前途的阶级 .....	180
第十一章 道德精英主义 .....	189
一 整洁和体面 .....	191
二 工程师的政党 .....	194
三 自我教育 .....	197
四 辩论的艺术 .....	201
五 生产区里的知识分子 .....	203
六 对书籍的崇拜 .....	206
第十二章 工人主义 .....	210
一 争取权力的斗争 .....	211
二 遁入工会主义 .....	213
三 新信仰 .....	218
附录一 作者主要成果 .....	223
一 出版物 .....	223
二 讲话 .....	236
附录二 作者生平 .....	240
译后记 .....	242

## 第一部分

# 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



## 第一章 衰落中的集体

当代英国的政治生活似乎特别具有分裂倾向<sup>①</sup>。四个主要的政党在争夺着能够获得公众支持的势力范围（在威尔士和苏格兰有五个），而那里以前只有两个主要的政党，并且，政党内部的少数派和不同的倾向还像阿米巴虫那样不断地繁衍。随着联盟的建立，工党作为崇尚“道德和改革”的政党，不再具有垄断决策的权力，保守党在城郊地区也不再具有无可争辩的霸权——这个地区随着现代政党制度的兴起，曾经一直是在选举中支持它们的中心地带<sup>②</sup>。政党机构在特征上日益呈现一种分子结构，存在着具有影响力的竞争中心，却没有非常引人注目的发布命令的统治集团。上层已经不再有一个“神奇的圈子”，领袖们都从这个圈子产生，像20世纪50年代工党的盖茨克尔（Gaitskell）先生，1963年的休谟（Hume）勋爵，1967年的索普（Thorpe）所做的那样。在基层的选民协会中，对自治和权利存在着非常武断的看法。工党忍耐着这种无序，而这是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sup>③</sup> 人主交通部的日

---

① 感谢萨莉·亚历山大（Sally Alexander）、米兰达·蔡特（Miranda Chaytor）和加雷斯·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在本书写作时的批评和帮助，感谢乔治·马修斯（George Matthews）和贝蒂·里德（Betty Reid）在共产党文献方面的帮助，也感谢《新左翼评论》的编辑在校对本书时的耐心和帮助。当然，观点的谬误之处由我个人负责。

② 关于这种霸权早期阶段的精彩论述，请参见 James Cornfor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servatism in the Later Nineteenth Century”, *Victorian Studies*, VII, 1963-1964。关于伦敦郊区保守主义的独特论述，参见 C. Masterman, *The Condition of England*, London 1909。

③ 赫伯特·莫里森（1888~1965年），英国工党政治家，曾任英国内政大臣、外交大臣，1929年任英国交通大臣。——译者注

子里不敢想象的，交通部在决策过程中和那些自由主义者一样，几乎是散漫的<sup>①</sup>。在政治罗盘的所有点上都存在着忠诚的世俗化、自治的纵向崩溃和思想的分化。

共产党存在 65 年来第一次分裂了，这艘脆弱的三桅帆船面临着倾覆的危险。相比过去的暴风雨，这次倾覆它的却似乎是最微不足道的风暴——《今日马克思主义》的一篇文章如此说。工党也遭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分裂，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在他 1931 年著名的脱党事件中，追随他的仅仅是少数支持者，他的“全国劳工党”（National Labour）对他的保守主义主人来说只不过是一时的便利。但对于 1981~1982 年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即使是那些（就像作者本人一样）敌视它的人，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政分分裂，它掳走了几代职业阶层（这和费边社的分裂类似，但难以望其项背），因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长远来看，事实证明它在工党以前的许多大本营中产生了巨大的破坏<sup>②</sup>。1981~1982 年的震动显然对工会没有什么影响（尽管英国电气工会书记，在当时地位并不显赫，是顺应社会民主党的呼吁而成立最早的理事会的签字者），但最近却在内部的分裂中屈服了，这次内部分裂起因于下级组织对抗的戏剧性强化，以及个人和集体脱党的严重威胁。在布莱克浦，激起了会议成员敌意的工会联盟（TUC），对背叛者愤怒的控诉以及反对派脱党的威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以和平的方式艰难地度过了英国历史上的 120 年之后，在顺利地跨越了 19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新工联主义、“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和大罢工这些难关之后，工会联盟连续两年受到了日益逼近的分裂的威胁。

① 关于自由党中权力关系的不明确性，请参见 Arthur Cyr, *Liberal Party Politics in Britain*, London 1977; V. Bogdanor, ed., *Liberal Party Politics*, Oxford 1983。

② 在我自己所居住的新毕塔菲尔德选区，当共产主义者的议席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家园时，它成了工党的据点；而当孟加拉人第一次占据这个议席时，由于全孟加拉人的竞争，工党候选人在此后的一周内的递补选举中以多于其对手——联盟发起人——六票的多数，而拆毁了这个家。



就保守党而言，它在政策上的分歧似乎比慕尼黑事件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严重。它在行动上也是分崩离析，右翼的学生摆脱了控制，并且发展成海边的小流氓。因此，阿尔斯特的工会会员谴责保守党背信弃义，老牌政治家谴责他们背叛。于是，在中央现在出现了两个而不是一个党派，即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虽然在我写作本书时，他们在选举上并肩作战，关系友好，但他们的个性、气质似乎变得更加泾渭分明，而不是相反（现代化派和绿党的最初分歧也许把他们分成了两派）。威尔士民主党的领导人，勇敢地把社会主义钉在党的旗杆上方，却发现他们和北部、西部的威尔士农民选民处于对立之中。甚至工人革命党也已经分裂。不管是政治谱系中的右翼还是左翼，其创始人都处于困窘和噩梦之中，不是被当做众星捧月的权威，而是众叛亲离。

政党内部的团体大量涌现。激进左翼——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不同政见者——有12个“先锋”派，以及同样多的组织和团体，竞相争夺领导一个并不存在的、革命的工人阶级的殊荣<sup>①</sup>。而与此同时，在生活政治的荒滩上，分裂和分立主义却在滋长。共产党也正变得像自由党那样派系林立，变得像托利党（Tories）那样充满阴谋诡计，它的那些钩心斗角的术语也变得像伊索寓言那样玄奥<sup>②</sup>。在工党中，再也不存在一个团结的左派，如20世纪20年代那样，空想派、

---

① 我觉得，这些团体的定期出版物，恐怕很难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找到，而对于任何想品味一下这些出版物的人来说，应该在查林十字街科勒特的地下室里去阅读它们。在诸多令人惊奇的发现当中，有一个是，由前林彪派和前校园革命者组成的英国和爱尔兰的共产主义组织，现在正以欧内斯特·贝文社（Ernest Bevin Society）的名义进行活动，并且利用那个平台对矿工的领袖们进行恶意的却是有着充分根据的抨击。参见 *One Step Forward, Twelve Steps Back. Tribune and the Miners' Strike*, April 1985。

② 亚历克斯·米切尔（Alex Mitchell）的著作《英国斯大林主义危机的背后》（*Behind the Crisis in British Stalinism*, London 1984），是一本资料丰富的、有些政党色彩的、关于共产主义危机发展进程的论著。十分有趣的是，该书中的资料来自极端中央集权主义的工人革命党（Workers Revolutionary Party），在对共产党执政的观点上比《晨星》更为同情。

理想派和知其不可而为之派都团结在独立工党周围，或者像冷战时期那样，由支持它的各个党派和下院议员组成的一个多多少少有些稳固的集团，发起了支持“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活动。今天，工党中充斥着相互竞争的派系和集团<sup>①</sup>。所谓的“激进左翼”，如早前的动员委员会，是一个具有截然不同倾向的特别联盟，从迹象来说，最近已经失去其最受欢迎的公众人物肯·利文斯通的支持。在保守党内部，相互对立的团体很难形成统一战线。1975年接二连三的斗争表面上已经得到解决，但在十年之后，它依然在不断地蔓延；“中锋”（Centre Forward）刚刚形成，便已解体；而在希斯派<sup>②</sup>（或者普赖尔派）青年保守主义者与保守主义学生联盟的朋克（punk）右翼分子之间，也出现了惊人的分裂。

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身份的碎片化是以往无法比拟的，政治上效忠的对象更加分化，政治承诺也越发成为暂时性的。在现在的工会选举中，就如同以前的议院和地方政府竞选一样，选民的不可预测性恶名昭著，尽管政治科学家告诉我们，相比“变化无常”或“朝三暮四”，范围不断扩大的选择与甄别和这种现象更加有关<sup>③</sup>。政党不再是一个稳定的组织，不再（像格拉海姆·华莱士所说的那样）是“某种值得热爱和信赖的东西，并且在连续的选举中可以被视为与以前那个被热爱和信赖的同一个东西”<sup>④</sup>。相反，它如今看上去就像是一只变色龙，从一个十年到下一个十年，不断改变着它的

---

① 对20世纪70年代工党和那些竞争性团体关系的发展状况的令人不快但资料丰富的叙述，可参见 David and Maurice Kogan, *The Battle for the Labour Party*, London 1982; John Callaghan, *British Trotskyism,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1984; Michael Crick, *Militant*, London 1984。

② 爱德华·理查德·乔治·希思（Edward Richard George Heath, 1916~2005年），英国首相（1970~1974年），保守党领袖（1965~1975年），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1972年）的倡导者，曾多次访华。——译者注

③ 关于政党认同削弱的论著，参见 B. Sarlvik and I. Crewe, *Decade of Dealignment*, Cambridge 1983。

④ Graham Wallas,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London 1910, p. 83.

特征和种类。虽然其组织形式依然如故，但政党的实质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不但是它的领袖和政策，而且也包括其成员和积极分子。老一辈的共产党员抱怨他们的政党被陌生人挟持了，保守党人也抱怨他们的政党落到了不合适的人手中。资深的工党成员哀怨地呼吁重振“真正的”工党。现在的政党不是用于集体礼拜的教堂，毋宁说只是要到别处去的人们路过的通衢大道，是有待殖民的旷野，或者，用社会民主党赖以发端的那个比喻来说，它是一架等待起飞的飞机。就中间党派而言，人们也许可以像大卫·斯蒂尔在今年<sup>①</sup>的自由党大会上谈到贵格派教徒时那样，把它说成一个会堂。在那里，信徒们混杂在一起，思考着他们自己私下的想法，崇拜他们自己个人的神话。在左翼，政党成了争权夺利的竞技场，汇集了各种一触即发的怀疑；在右翼，政党则成了展览会上相互竞争的陈列区的聚集之所。

## 一 意识形态的混合物

从意识形态来说，政党日渐呈现为一种混合物，不再对应于任何具有明确信仰体系和思想的选民。每个政党的纲领都由片段构成，它们相互之间存在大量相通之处。那些如今被视为社会主义的东西，比如说，在当前支持少数民族权利的运动，或反对种族和性别歧视的运动，常常只是改头换面的自由的进步运动。同样，当代的保守主义也倾向于成为激进个人主义与更为传统的托利党教条（比如原罪信仰）的杂乱的混合物。在为其非集权化而受到喝彩的政治谱系中，国家主义是被断然拒绝的。所有的政党都采用现代化的语言。多元主义是一种普遍价值：不管那个美好社会是什么样的，它都会允许我们走自己的道路，允许我们成为各自的自我。

当代政治的那些大问题，既可能把各个党派联合起来，同样也

---

<sup>①</sup> 指作者发表此书的1985年。——译者注

可能把它们分裂开来。比如说，货币主义，虽然它和“撒切尔主义”有着特别的联系，虽然它作为公共紧缩政策是在卡拉汉先生当政时期推行的，但在所有的政党中都有其忠实的支持者。同样，对于收入政策，在所有政党中都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例如，最近发生的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地方自治，联邦移民以及英国欧共同体成员等问题，也是如此。环境保护运动固执地拒绝成为一项左翼或右翼的事业，主张动物权利的（尽管托利党人对狩猎活动有一种世代相承的喜好）和倡导生态学的也同样如此。对过去所谓“内政部门”的问题——比如说堕胎——的分歧，也拒绝与党派的路线保持一致，并且，尽管可以由左翼来领头（有记录表明，1934年以来的工党大会都不断地反对绞刑，但直到将近30年之后，它才被废除），但要在众议院中获得立法通过就必须恳请没有偏见的那一半保守党议员的支持。在公民基本权利问题上，尽管十分偶然，情形也是如此：支持亨登·诺斯（Hendon North）的正是极右翼的保守党下院议员约翰·戈斯特（John Gorst）爵士，正是他不断游说国会选举委员会转而支持受苦受难的苏格兰矿工。因此，人们对那些运动表示关注，最著名的就是女权主义运动，这些运动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严重地威胁着政党的权威。还要关注有哪些被暴露出来的想当然的特权，而党派的政治议程对此争论不休。最后，作为解决分歧的方法，在英国政治活动中存在着指向权利的引力。在工党中，不但教育事务的发言人如今需要宣布“标准”的必要性，而且正如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进步运动的全盛时期一样，公立学校校长也有必要解散学校的学生军训队，以便支持上门送食服务<sup>①</sup>。工党议员向住房所有权屈膝致敬（斯卡吉尔先生甚至说，公营企业止于前花园），而要振兴地方企业的市政厅社会主义者却与商人为伍，甚至还向跨国公司游说<sup>②</sup>。

① Meals on Wheels，是指给残疾人或孤寡老人的上门送食服务，通常是由政府付费的。——译者注

② Ferdinand Mount, "First Principles: A View from the Right", *Marxism Today*, July 1985.

政治上的联姻之所以呈现日益不稳定的特征，其原因也许在于激进个人主义和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进步运动的影响，它们使得私人的身份和个人的自主成了“最高的善”。正如在其他国家一样，例如英国，所有类型的权威关系都受到质疑，不管这种关系是基于资历还是公职，法律还是习惯，阶级还是性别。所有制度上的联系，在潜在的意义上，都被视为压制性的。甚至福利政策也受到怀疑，从好处说，它体现了一种家长作风，因此与独立自主毫不相容；从坏处说，也是十分险恶的，它被左翼指责为社会控制的手段，被右翼称为假公济私的虚伪形式。当前，对投票的迷恋，以及“一人一票”口号的流行，被视为促进各党派和工会积极参与的良方，这恰好说明了各种观点都在起作用这样一种混乱不堪的情形。作为货币主义经济中消费者权威的政治对等物，对投票的迷恋得到右翼的支持，却使左翼和工会运动处于混乱之中。然而，由于它主张，进行决策的应该是独立自主的个人，他应该运用个人的判断力，并作出自己的选择。这就和主张把个人放在首要地位的左翼的解放主义政治非常相似，即个人要有他所应得的“做自己的事情”的神圣空间。于是，在政治谱系的任意一端，都流行着权利的语言和对独立自主的多元主义的关切。

激进个人主义不但挑战了权力结构，而且还隐含着对集体根基的质疑。从理念上说，社会是一个没有疆界的开放空间，个人可以在其中自由地、任意地流动。集体，不再像在团结或服务、公平分配或平等那样的观念中被视为实现共同利益的手段，而是被视为强制的工具，它要促进的是统一性而不是多样性，它胁迫个人，使少数派服从于没有思想的大众。所有的统一化制度和整体性观念都遭到了这种抨击，但是，正是跟工人阶级集体主义有关的那些制度和观念似乎特别不堪一击。一旦罢工的决定变成了个人决断的问题，而不是服从集体纪律，或维护集体荣誉的问题，它就必须经受所有差异性和不同政见的考验，这就使得它逐渐变得难以解决。关闭的店铺突然又开张了，但它并不承诺“公平工资”和公平的正义，而

是表现为专制，拒绝给予私人判断以至高无上的地位。工会，由于它很早以来就抱有的信仰——“团结就是力量”，而被谴责为“狭隘的和团体主义的”。大众集会或纠察队，远远不是一种对抵抗的英雄表达（在“现实主义”油画和“社会抗议型”电影中，保留了这种象征空间），而被认为是欺凌和胁迫的许可证。在最近的矿工罢工事件中，不是矿区的居民们挺身而出，勇敢地抵抗政府的暴力，而是正如一位前共产党员（戴维·霍布鲁克）所说：“刚刚出现的法西斯组织，它所造成的危害性的社会政治影响与布莱希特所描写过的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恐怖事件所造成的一样……阻止怨恨滋长的力量减少了。”

在20世纪40年代，我有一个未发表的与众不同的观点，即集体原则在国民生活的各个部门都占据着支配地位，或者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占据着霸权地位。“公平分配”的意识形态，作为“工党首要的概念”，把战后重建与战时的生存策略联系在一起，把共同奋斗与自私自利对立起来。标准化和一致性是计划的要义，而“计划”是一个能让形形色色的政客们都服膺于它的万能术语。组织化就其本身来说就被当做一种善，它不仅在个人生活中被顶礼膜拜，而且在追求进步的机关和工厂中更是如此；它体现在舞厅中“步调一致的舞步”，假日营地里有组织的娱乐活动（这是近十年来的大众休闲活动），以及足球场上整齐的队列和看台上秩序井然的观众上。在英国，40年代达到了大众社会的顶峰，大众娱乐和观赏性比赛带来了大量的不断增多的收入，小型商店在合作商店、联号商店和百货商店出现前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在伦敦，除了圣潘克拉斯的共产主义“团结”剧院外，没有任何实验剧院。并且，除了瑞士村的一些熟食店和托特纳姆法院路的一个素食杂货店外，也没有别的可供选择的食品店。穿着打扮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严格管制的，它们体现的是个人的社会地位，而不是展示自我。裙子长短的变化都是统一的，超过或低于膝盖，则要根据各个季节的有关规定而定；而穿羊皮鞋的人的道德是值得怀疑的。

## 二 阶级的两极分化

相比今天的情况而言，过去的政治组织所要求的忠诚是排他性的，它们也能够得到热烈的拥护，它们在道德上的权威性和在组织上的必要性是无可置疑的——至少对其支持者来说如此。左翼和右翼之间在观点上的两极分化，在1945年就已经十分明显了，在此后的岁月里甚至变得更为突出，而地方上的左右分歧则受到全国舆论的影响。两个大党在20世纪50年代都达到了它们的党员总数的创纪录的高峰，形成了两个相互对峙的阶级集团，尽管与工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地位相比，保守党在中产阶级中的霸权地位更加彻底，同时也存在重大的地方的和地区性的差异（在威尔士，是工党占据压倒性的优势，这与今天苏格兰的情形差不多；而利物浦，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政治上都很落后）。对于工党的支持者——他们还沉浸在对大萧条时期工人悲惨境遇的记忆之中——来说，政治就类似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体验到的对“他们”和“我们”所作出的区分。

不管是从唯美主义者、精英分子和反对变革的人所偏爱的两极化，即雅文化和俗文化的角度看，还是从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改革家所喜欢用的术语，即“富人”或“穷人”的角度来看，共同的认同感都显示了对于社会分裂的洞察。尽管也许需要界定“我们”和“他们”，但“我们”和“他们”的垂直区分却是理解社会生活的主导性习惯用语，这种区分不但反映在政治和文化观念上，而且也反映在个人的行为举止上。理查德·霍嘉特（Richard Hoggart）对此曾写下珍贵的文字，描述了他在利兹的幼年时代。下面几段话，应该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可以重温一下：“‘他们’是‘高高在上的人’，是‘长官’。这些人给你们发救济，鼓动你们，让你们去参加战争，他们处罚你们，让你们家庭分裂……就为了避免在收入调查中减少救济金……这些人‘让你们受尽折磨’，他们‘是全然不可信任的’。这些人‘谈吐优雅’，‘却全都是骗子’，他们‘从不告诉你任



何事’（比如医院里等待救治的亲戚），他们‘给你们的是清脆的巴掌’……‘就像对待垃圾一样对待你们’。”<sup>①</sup>

在保守党看来，“他们”更是一个彻底让人感到恐惧的模糊的词语，它也许反映的是一种政治敌意，它更多的是指向中产阶级中背叛了这个等级的那些人，而不是指向工人阶级：“……像犹太人一样，你们千万不能相信他们的有些事情”，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鲁顿市内长大的人们还记得，这个地区的那些偏僻的团结的工党之家是怎样被注意到的。另一方面，与现在相比，投票在过去对双方来说都相当于一剂泻药，是对社会恐怖的消解，是各个小群体之间团结一致的行动。选举期间，在保守党控制的郊区，林立的蓝色窗户招贴充斥各地，这是家庭繁荣的量度器。而在工党控制的大街上，红色或黄色的窗户招贴则是团结精神的证明。

英国共产主义——这些文章的主题——具有史诗般的政治视野。按照一种与工党共享的惯用的说法，它是多数人反对少数人的斗争，是“人民”反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斗争。换句话说，正如我们已经提出的那样，这是劳动者反对资本的斗争，“工人阶级”反对“大公司”的斗争。再换句话说，（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这也是进步反对反动的斗争。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在“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世界之间，也存在着两个阵营的对立，并且存在着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解放运动的斗争。虽然他们从精神的视野上讲是国际性的，但他们心目中对不公正的理解则既来自英国人排着长队领取救济的记忆，同样也可能来自美国黑人的遭遇。但是，从国内来看，“我们”和“他们”的对立却是毋庸置疑的。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抨击工党政府背叛了工人阶级（这也是工党某些左翼成员所主张的观点），但是我们并不怀疑工党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

这两个大党垄断着他们支持者的忠诚和关注，并通过强有力的辅助手段来对他们施加影响。保守党是一个庞大的群众组织，其党

---

<sup>①</sup>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Harmondsworth, 1961, pp. 72-73.

员总数在当时接近 300 万人，是今天的两倍。保守党有一种几乎是独占性的社会魅力。保守党是有大房子有汽车的那些人的党，是穿着考究、“受过良好教育”、“说话得体”以及沉稳自信的那些人的党。它的那些宴会和舞会，作为生活宽裕的人的消遣方式，吸引着那些在社交上野心勃勃的人。它的那些联欢会、游乐会以及草莓茶会，是平淡乏味的日子里具有很高吸引力的地方，即使它们不再是开放的，就像在《正是威廉》(Just William)<sup>①</sup> 出版的时代由圣公会的牧师所举办的活动那样<sup>②</sup>。保守党还得到地方社团的非官方支持，比如说圆桌会议和扶轮社<sup>③</sup>、桥牌社和酒店的酒吧间，按照玛格丽特·斯泰西对 20 世纪 50 年代的班伯里所进行的出色研究，它甚至还包括香豌豆社的成员。青年保守派 (Young Conservatives) 被称为“郊区的婚姻市场”，其成员人数在战后急剧上升，曾高达 17 万人，是今天的 5 倍多。在成长于 50 年代的人的记忆中，它“也许是那个年代最活跃的青年组织”<sup>④</sup>。对于关爱自己子女的父母，以及有抱负的姑娘小伙来说，他们的舞会是一流的，崎岖难行的洛伽诺市 (Locarno) 和古板过时的教会大厅是无法与之媲美的。他们的汽车集会，作为 40 年代后期的新鲜事物，对于爱炫耀的人们来说，是令人兴奋的。在从事农业的县郡，保守主义占据着霸权地位（有趣的例外是诺福克，那里的农业工人不但激进，而且人数众多）。“保守党用不着你去支持”，我的一个朋友回忆说。“它是那种你认为理所

---

① 《正是威廉》(Just William) 是由里奇马尔·克朗普顿 (Richmal Crompton) 所写的儿童短篇系列故事 William Brown Books 中的第一部，出版于 1922 年，后来又改编成电视剧、电影和广播剧。——译者注

② 关于威廉如何在一个自称的乡村戏剧的帮助下，如何在破坏活动中取得胜利的动人叙述，可参见 Richmal Crompton, *Just William*, London 1922。

③ “扶轮社” (the Rotary)，即“扶轮国际” (Rotary International)，1905 年创办于美国的芝加哥，是一个由从事工商业和自由职业人员组成的群众性国际服务组织，其会议要在各个成员的事务机构轮流举行。——译者注

④ Elizabeth Wilson, *Mirror Writing*, Virago 1982, p. 31. 我发现这本自传不断地有助于为这个被遮蔽的时代提供一种看法，使上述略为有些超出上下文关系的引文，成为引起人们对许多内容并无优秀之处的文章注意的方式。

当然的东西。比如说上帝，他就在那儿。”（然而，在她自己的学校，女修道院的寄宿学校，事情却不会这样顺其自然了：当大选临近时，修女们会要求这些女孩别忘了为保守党祈祷<sup>①</sup>。）

工党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群众组织，在1952年，其党员总数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顶峰，有101.5万人。在工人俱乐部和工会俱乐部这些强有力的社会团体的支持下，工党也与消费合作社建立了有机的联系，那时，消费合作社的零售能力正处于全盛时期，并且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增长了4倍多的成员总数为倚靠。工党的出版业也是欣欣向荣，《每日信使报》的发行量有200多万份，还有十分出色的星期天报《雷诺新闻》，它是伦敦宪章派的最后一个喉舌，创刊于1850年，那时由消费合作社经营。“工党之家和工党家庭”可能数以万计，在工人阶级居住的任何街道上至少都有一户，我只是在选举期间才了解他们的。那时，我骑着自行车，按照要求把一摞摞的传单送到那里，以便他们再分发给邻居。我的朋友约翰·戈尔曼是在伦敦东部的斯特拉特福德长大的，他告诉我这样的工党之家是做什么用的。他所在的圣詹姆斯路大街，只有一个人把票投给了保守党，这个人就是这个街区唯一有车的人（他是铁路工人……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他也是个窗户清洁工。我猜他的车就是那样得来的）。约翰的父亲是一个木匠，对他来说，在晚上参与工会活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论天气如何，他都会去缴会费”。“那里只有一个真正的工党家庭，那就是罗宾逊先生家。他曾经是当地的工党支部的书记。要是人们碰到麻烦了，涉及房东、房租或者房屋的维修这些问题，就会在大街上拦住他或者到他家的门前，向他请教。为了房屋维修的事情，人们一直在与私人房东进行斗争。罗宾逊先生家的大门总是向人们敞开着。尽管这不是由于住

---

① 约翰·戈尔曼（John Gorman）是一个精通印刷史的历史学家，他是《右翼旗帜》（*Banner Bright*, London 1973）和《工党印象》（*Images of Labour*, London 1985）的作者，他被人们亲切地称赞为推进流行艺术研究和工党意识形态的口头材料研究的先锋。——译者注

在远处的人们通常不会到火车头大厅（这个大厅是由铁路工人修建的，那儿有工党的办公室）去，而是由于他们愿意到罗宾逊先生那里去。他从来不会把人拒之门外。”<sup>①</sup>

### 三 践行团结精神

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就是获得彻底的社会身份，这种身份超越了阶级、性别和民族的界限。正像虔诚的天主教徒或正统的犹太教徒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小的私人世界之中<sup>②</sup>，或者像这个时期的某些大家庭或扩展型家庭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紧密的……自我相关的（self-referential）团体”<sup>③</sup>中。我们的大量活动——这个时期的共产主义者如果不是“政治上积极的”，就什么也不是——尽管是形势所迫，但现在看来，也许可以被视为在践行团结精神。我们保持着密切的邻里关系，在工作场所的秘密集会则很少。我们光顾的是几个常去的咖啡馆（共产主义者经常在咖啡馆，而不是酒吧见面：我们中有非常严格的禁酒规定）。我们在周末一起出去散步。我们在社会主义青年营（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新福雷斯特的），在像尼德伍德这样的共产主义旅馆里一起度假，或者是与青年旅馆协会（YHA）一起徒步旅行（那些旅馆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们的管理员据说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或者，如

- 
- ① 这是来自米兰达·蔡特（Miranda Chaytor）的口头信息。我很高兴地记录下来，她虽然还在学校读书，却努力想让自己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
- ② 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义愤填膺》（A Sense of Outrage）一文，收录在诺曼·麦肯齐（Norman Mackenzie）主编的《罪过》（Conviction, London 1958）一书当中，对利物浦的天主教徒的孩童时期以及保守主义的耶稣会士的学校教育进行了论述，这些论述对笔者留下了超出他当时认识的非常持久的影响。
- ③ Harriet Gilbert in Liz Heron, ed., *Truth, Dare and Promise*, London 1985. 这里说的家庭（family），指的是由她自己的兄弟姐妹组成的大家庭，“自我指示的私人世界的意义”是自传的永恒主题。

果你能付得起5英镑的话，就可以花一周的时间和工人旅游协会在湖区（Lake District）或特罗萨克斯<sup>①</sup>（Trossachs）一起爬山度假。我们有自己特殊的说话方式，尽管我的政治热情很高，我还是几乎从来没能掌握那种说话方式，它要求我们在发表演讲时抑扬顿挫，不能拿腔拿调，并要控制好节奏。像共济会会员一样，我们凭直觉就可以知道某人是“我们中的一员”，我们同样也能很快就发现社会主义者所设想的、会对社会产生坏影响的人（folk devil），即“野心家”——对于这种人，我直到今天还在小心提防。在一个被围困的组织的狭隘范围内，我们维持着完美社会的幻影——它不受外界的影响，对外界敢于斗争，同时又保护在它里面的那些人。

共产党人是一种“特殊”的人，当冷战临近时，他们又回复到底层民众的地位。但是，在我看来，我们与民族文化的共同之处比我们当时所认识到的要多得多。例如，在政治路线的制定和实施方面，我们“一丝不苟”地强调“正确性”，我们为他人背离党的信条而焦虑不安，同时也压抑着自己内心中离经叛道的念头，这些都与当时的行为规范有明显的同源关系，也许还从那些规范中获得了无形的支持。即使是在我们内部，我们也并不是唯一隐瞒自己的疑惑的人，不是唯一压抑着刚刚萌发的内疚之感的人，也不是唯一留神不要说错话的人。在英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循规蹈矩远远不是出于机械服从。它决定了公共演说的构思，如果演说出现语病就会暴露出一个人出身的低下，而不得体的言辞则会招致他人的排挤。妇女要是让自己的长筒袜抽了丝就会被视为社会灾难，男人由于担心裤子的膝部下垂而勾住它的折缝，在这样的社会里，穿着打扮有它自己明显的规矩。正如伊丽莎白·威尔逊在其著名的自传——《镜像书写》中所写的那样：“正确的外在表象意味着其内在本质也是正确的。”<sup>②</sup>

① 苏格兰著名风景区，是苏格兰第一个被指定的国家公园。——译者注

② Elizabeth Wilson, *Mirror Writing*, Virago 1982, p. 19.

最重要的是，在英国，我们与别的组织有着共同的家长式的权威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人们向上而不是向下期待得到他们的舞台提示，权威被期望得到自动服从；老师之于学生，是“令人敬畏地高高在上的”；商店的巡视员在有顾客需要接待的时候，就向助手打一个响指；在电影院门口指挥观众排队的看门人（那个时候要看演出是件非常难的事情）；舞池中的主持和巡逻执勤的警察。工会被亚瑟·迪金（Arthur Deakin）这样的强硬跋扈之辈把持着，或者被那些面无表情的官僚把持着——沃尔特·西特林（Walter Citrine）爵士是他们中非常有本事的典型。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被称为“打字机后的拿破仑”，为工党树立了一个类似的榜样。

在过去，政党的团结是现在所无法比拟的，党员遵守着“集体职责”，十分庄重，好像他们是内阁成员一样；那些拥有权力和权威的人渴望获得理所当然的敬重，他们以服务来换得赞美和忠诚。党员表现出信徒的特点，忠实地支持着政党的党纲，遵守着政党的规章制度。在保守党中，发生了一次政策革命，他们接受了“福利国家”，甚至“计划”的观念，在政策的落实上也毫无异议，在领导层中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分裂。在共产党中，政治委员会的命令通行无碍。即使有人被开除了，也不像今天这样是因为政见不同，而是因为个人的缺点（唯一的例外是开除卫尔温花园城支部的左翼集团一事，这件事因为其独特性而闹得满城风雨）<sup>①</sup>。工党虽然并不赞成把“民主集中制”作为一项正式原则，但其行事风格十分具有斯大林主义的特点。它把领袖原则贯彻于各级组织，它颁布各种禁令以保护这个党免受外来不良影响的干扰，它定期清洗掉那些被怀疑的

---

<sup>①</sup> 这个事件虽然以开除这个悲惨的权宜之计而解决，但危险的是，必须接受依然面临着日益右翼化的工党政府这一实际难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的同志卫尔温（Welwyn）采取了非常类似于共产党自己后来采取的立场。这个事件和构成爱德华·阿普沃德的自传体小说《堕落的因素》（*The Rotten Elements*, London 1979）基础部分的事件十分相似，该书描述了当时的党内生活的许多有趣的小插曲。卫尔温左派分子的一个同情者，在当时也被开除出党，那就是伊利·赫弗（Erie Heffer）。

同情共产主义的人。市里的头脑和地区的组织者操纵着强大的政治机器，提拔他们的门徒，拉拢选区里的各个政治派别，确定候选人的资格。地方议会中的工党领导也以同样的方式行事，操纵着组织严密的高效机器，以开除或取消工党党员资格来威胁反对者<sup>①</sup>。运输大楼的英国工党总部以及由地区的组织者构成的网络掌控着巨大的影响力和权力，随意地干预议会候选人的选举；在党的大会上，每年都利用各个工会的集团投票（bloc votes）来迫使选区中的各个党派屈服。然而，比压制不同政见重要得多的是团结的意志，在工人阶级选民占据多数的地方，这种意志是压倒性的，以致稍稍有一点不同意见的迹象，就会被视同背叛。

导致这些社会和政治集团以及维系其团结和纪律崩溃的，是多重决定性因素，由于其复杂性，限于篇幅，本书难以提供详尽的叙述。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以来，共产主义的分崩离析作为世界潮流就提上了政治日程，而世界上两大阵营的消解，无论是称之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还是称之为“自由世界”和“极权主义”，均可以追溯到1954年的万隆会议。在国内，两党政治的全体选民不再忠诚于特定的政党，这似乎可以追溯到50年代的自由主义的复兴。自从第一次核裁军运动中“中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出现以来，保守党在外部郊区的霸权就遭到了威胁。在1962年的奥屏顿（Orpington）递补选举和随后的大伦敦市议会选举中，保守党在选举上的孱弱都得到了证明。反工团主义是保守党和联盟一再呼吁的主题（也是欧洲共产主义中的一股暗流），它可以追溯到1958年的伦敦汽车大罢工；就民意测验反映的公众态度而言，它也

---

<sup>①</sup> 雷蒙德·查利纳（Raymond Challenor），他加入了不同于独立工党的纽卡斯尔下莱姆的工党，他告诉我，仅仅在这个地区，一周内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连续被开除三次。同样是这个工党，还开除了工党的乡村议员温迪·高尔德（Wendy Gauld），此事发生在她参加罢租活动回到当地的出租房后。罢租活动发生的地区有五个贝文那特下院议员。关于这些分裂的论述，可参见 Frank Bealey, Jean Blondel, *Constituency Party Politics*, London 1965。

可以用统计数字来衡量。如果考虑的是横向而不是纵向的决定因素，人们也许会指出，政治上的分裂主义和公共生活的其他领域（比如，行政事务部门和英国广播公司）中对社团忠诚的衰落是密切相关的。或者，人们也许会发现，政治中的世俗化与英国学校的去基督教化也有非常相似之处。

如果不把政治视为原因，而是视为结果，人们也许就会注意到，政治上不再忠诚于特定的政党与当代思想的解构性转向具有共同的根源。政治集团的解体对应于这样一种美学：赋予多样性以特权地位，而牺牲了等级制度，并赞美无拘无束的、开放的空间。“雅文化”和“俗文化”不再作为敌对的阵营而互相对抗，它们之间现在存在着双向的流动。

值得指出的是，已经成为社会学和政治学关注焦点的工人阶级，就其政治上的变化而言，它的减少也许不如影响深远的文化革命更为重要，这种文化革命把中产阶级暴露于各种相互竞争的行为模式之下，并破坏了中产阶级作为政治集团的统一性。这里也许可以提一提在商业与各个行业之间日益增长的对立性，这种对立在某种程度上再次反映到保守党与各党派联盟之间的选票分配上，就像早些时候工党在中产阶级中的选票上升时一样。或者是看一看新型行业的兴起，比如营销和计算机，保守党的影响未能渗透到这些产业中去，而传统产业已经去中产阶级化（degentrification），或部分去中产阶级化。或许我们还可以看看，权势集团失去了它在英国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保守党人也许还保有他们的财富——他们擅长此道，但他们的社会魅力已经风光不再。各个公学也许还在招收学生，但现在绝没有人会像20世纪40年代那样，因为看到公学毕业生的校友领带（old school tie）而欣喜若狂<sup>①</sup>。如果从

---

① 伊丽莎白·威尔逊在前文所引的《镜像书写》一书中，描述了她住在帕丁顿贫民窟中的一段幼年时期。在那里，她全家生活在贫困的绅士门第之中。该书讲述了她的祖父在邻近的市场散步之时，看到某人系着利安得领带的欢天喜地之情。利安得领带也是划船俱乐部的标记，因其牛津和剑桥“蓝色调”而闻名遐迩。



我所住过的圣潘克拉斯那个老镇来看，保守党俱乐部已经毁于推土机和开发商了。作为中产阶级青年的圣地，青年保守党人俱乐部几乎无法与晚间俱乐部、鸡尾酒酒吧以及迪斯科舞厅竞争。保守党幻想出来的那些人物，“真正的”淑女和“真正的”绅士，已经失去了他们的超凡魅力：没有哪里比威斯敏斯特的国务大臣席位上更明显地缺少这种具有个人魅力的人了。如果社会分为两大阵营的观念已经失去了想象中的影响力，也许，其原因与其说在于我们自己这一方变了，不如说我们对另一方在哪里已经不太清楚了。

## 第二章 右翼共产主义

如果人们像笔者本人一样，关心的是对问题的分析而不是要偏袒某一方，也许就会发现，这一切尤其与英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有关。我们不用“正确的立场”或“不正确的立场”这样的字眼去考虑彼此对立的观点，而把它们都视为对生存焦虑的替代性（displaced）表达，目前英国所有的政治组织都多多少少地感受到那些生存焦虑。人们也无须从同时发生的危机这个方面去解释这些观点——当然也可以这样做，而是可以看看那些长期的演变，这些演变已经削弱了共产党员个人的活力、侵蚀了他们信仰的完整性，也破坏了共产党曾经完全拥有的对左翼思想和行动在细节上的掌控，例如，在工厂工作和工会方面，在文化政治和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也许最为重要的是，这些演变破坏了共产党曾经拥有的国际主义完美典范的形象（尽管在目前的争论中很少提到这一点）。这样，就可以把共产党内部的分裂理解为某种既有普遍性又带有鲜明民族特点的现象当中一个具体的、地方性的实例：政治中“两大阵营”观念的破灭，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左翼的历史基础的质疑，不管这种历史基础是主张进步反对落后，还是拥护理性反对启示，抑或是捍卫劳动反对资本。

熟悉的界标崩溃了，固定的边界消失了，由此造成的广泛的不安全感或许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分裂会受到外界的关注。不寻常的，甚至独一无二的是（除了过去这个党被指控煽动不满和组织未经批准的罢工的那段时期之外），英国共产党人已经把公众的关注当做氧气一样享用了。与它的那份方向不定的报

纸——《晨星》——所进行的较量迟迟不能结束，这给记者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对于他们来说，政治就是一种能招徕许多观众的体育活动。它已经成了第四频道的特色，《卫报》上也有它的固定的新闻栏目。那些“老战马”，党的办公室的岁月已经使之头发灰白，终于成就为有独到见解的名人；党的产业工人组织者受到了喝彩，就因为他是“性感的”（对矿工联合会的抨击似乎已经恢复了他现在对于新闻界的吸引力）；《今日马克思主义》的编辑成了媒体上的二流明星。在这些事情当中，有一些毫无疑问是出于制造新闻的需要（争论一旦私人化就要比从结构上的变化出发来得容易），然而，部分也是由于党的分裂只是同时代的英国生活中那些难以消除的、一直在争论的问题的表征，显然是已经失去所有固定的参照点的表征，尤其是1981~1982年社会民主党脱党以来似乎已经笼罩在劳工“运动”本身之上的那个问号的表征。

很久以来，这个党就不再是吸引着更年轻也更热情洋溢的灵魂的中心了，而这曾经是这个党特有的位置，是英国左翼的动力之源。的确，尽管分裂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正在走下坡路的小党中，但它在工党和各个工会中已经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按照当事人之一、我的朋友比特瑞克斯·坎贝尔夸张的说法，它“浓缩了劳工运动中所有的喧嚷和冲突”<sup>①</sup>。因为英国共产主义的分裂从1968年以来一直是一触即发的，并且经历了工会战斗精神的涨落——这是与工党现在的混乱有关的核心问题——的整个时期，因为从1977年以来，共产党的队伍中就有了公开的分裂，而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听说过“本宁主义”（Bennism）<sup>②</sup>和“市政厅社会主义”（town hall socialism）这另外两个利害攸关的问题，所以这样的看法既不能解释党的分裂，也无法说明其长期结构上的衰退。但这样的说法肯定是有道理的，即

<sup>①</sup> Beatrix Campbell, “Kinnock’s Crusaders”, *Marxism Today*, October 1985.

<sup>②</sup> Bennism, 1974年由英国工业大臣A. N. W. 本宁（A. N. W. Benn）提出的扩大国有化并干预私人企业的政策。——译者注

它近来所达到的高潮（在伦敦区许多人被开除了，包括《晨星》的编辑和副编辑，后来，工会联盟的共产党主席连同其他人也被开除了），与工党和工会运动中爆发的一系列两败俱伤的冲突，肯定是一致的：在市政厅社会主义者当中，冲突涉及税率封顶（ratecapping）和与政府斗争的策略问题；在左翼的支持者当中，则涉及选区的竞选主张与普通群众的自治问题；在工会运动中则是关于“工会与雇主私下签订的”协议问题。尤其是，当分裂在矿工罢工的最后几天里发生的时候，它极大地破坏了为支持煤炭社区而勉强形成的、脆弱的团结。在最后的几个月里，公众的感情明显转向了矿工。可是左翼中所有的派别（由于有待分析的原因）宁可去宣泄彼此间的怨恨，也不考虑矿工们作出的牺牲及其对自己的事业的真挚同情。在此过程中，正是共产党挑选了那样一个时刻算内部的账，从而使自己成了始作俑者。共产党内的分裂在另一个方面也许是可以作为范例的。它近些年来把“编外议院”（extra-Parliamentary）或“运动”左翼维系在一起的弦绷得太紧，把地方性的集团、文化上积极的行动和自治运动——其中，共产党是一支公认的力量——赖以结合起来的无形之网绷得过紧。当一帮人开始驱逐另一帮人时，就很难说什么共同的事业了。

## 一 争论的各方

共产党中的争论在表面上相当于我们在西欧其他政党中所看到的那些争论，这也就决定了新闻界给争论的主角们贴上“欧洲共产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的标签。人们所喜爱的另一种对立是“现实主义者”与“原教旨主义者”（Fundamentalists）之间的对立，这样看来，英国共产党人之间的观点分歧就对应于在近些年来把工党弄得一团糟的那些分歧。根据政治评论家们的说法，在党的效忠对象上存在着一种错配：工党中的“强硬左翼”应该和共产党中的《晨星》在一起；欧洲共产主义者应该和工党中的“温和左翼”在

一起，并支持金诺克先生。第三种对立是许多共产党人所偏爱的，它把《晨星》所主张的“阶级政治”的路径与《今日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社会力量”或者“零零碎碎的”分析对立起来。这些标签尽管很常用，却具有误导性。首先，不存在两个相互反对而又内部统一的政治集团，只有一些内在的不稳定的结合。在苏联问题上，绝不存在立场对称那样的事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含糊其辞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时承认：“在广泛联盟中有人反对1968年布拉格的坦克，也有人同情雅鲁泽尔斯基将军（General Jaruzelski）<sup>①</sup>并能理解苏联为什么进入阿富汗。”<sup>②</sup>抱有坚定信仰的“欧洲共产主义者”或者后阶级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很可能在党的欧洲共产主义派中只是人数极少的少数派。他们把自身在党的领导层中的优势更多地归于官僚主义的情性、成员的忠贞观念，以及——必须要说的是——在英国共产主义过去把它们视为专属自己的那些领域中政治上的疲软，而不是归于新鲜血液的加入<sup>③</sup>。他们最为坚定的支持者是那些在其他方面已经没有了梦想的（disillusioned）“老资格”，是些七八十岁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再盼望新的黎明，甚至不再特别在乎“新政治”这个想法，而是想在“左翼的复活”这出戏剧中间接地再现人民阵线的辉煌。围绕在《晨星》周围的临时同盟似乎同样可以多种标签混用。热情地为苏维埃辩护的人，即使他们可以使得指责背叛的哭喊声变得更加尖厉，也远不如那些依靠“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这座大山的工会积极

---

① 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1923年~），1981年10月当选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85年当选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② Eric Hobsbawm, “Retreating into Extremism”, *Marxism Today*, April 1985.

③（根据媒体报道）欧洲共产主义者已经赢得明显多数，即将重新获得对《晨星》的控制，尽管获得胜利的他们在上一届党的代表大会上大谈“用公交车接送”，他们也只能动员2000个人支持在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和伦敦同时举行的重大集会，这些集会将决定这份报纸的命运（有3000人支持《晨星》的管理委员会）。关于选票数问题，参见 *Morning Star*, May 1985，这或者是由于共产党人已经失去组织运动的意志——而那是他们的传统强项之一——或者是欧洲共产主义同时想做好太多的事，或者这两者都是。

分子突出。忠实于党的那些人被变化搞得心烦意乱。局外人要想去理清最初的感情和特别的诉求，不是件容易的事；可是，下面的这封信——它刊登在《晨星》上的时候这篇文章正在付印（1985年10月21日）——具有真实性，它如实表现了某个城市中最后一个工厂支部的迷惘，而在1945年的时候，这个城市大约有40个这样的支部：

作为很可能是考文垂市（Coventry）仅有的一个工厂支部的成员，我们一定要说一说英国共产党近来发生的那些开除事件。我们是英国共产党的一个积极的工厂支部，已经有了30多年的历史，这个工厂以其产品和工会组织而闻名。从平常的团结一致到国际的团结一致，我们在各个领域都建立起了联盟。

支部的成员更是《晨星》的朋友，这些年来，我们每天都在销售它。现在我们觉得英国共产党处在了无人地带。和我们打交道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面临日常生活困难的劳动人民。

科学社会主义在他们的生活中应当占有的位置，不仅应该存在于工会发言人的工作事项中，而且应该存在于真正意义上的日常的实际活动当中。

我们的支部感到孤立无援已有数年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导致我们退出了党的其他活动。不过，我们的确参与了劳工运动中所有的斗争。

我们工厂中有一个核裁军运动小组。要把它组织起来很难，但还是做到了，因为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主义者已经使之成为可能。我们的成员覆盖各个方面，我们的朋友就更多了：议员、行业委员会、地区委员会等。

我们感到那是一个真正的广泛联盟，它不在工会运动之外，而是就在工会运动之中。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目前在党的领导层中占据多数的那一群人竟然真的相信工党不需要更深入地参与到工会运动中去，就能站到左翼一边，并且会在实质上变得更加倾向于社会主义。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只有争取工会对左翼政策的支持，才能把工党也争取过来。要赢得这些政策，意味着要在他们的工作场所与人民进行逐日的商讨，商讨与他们有关的、影响着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问题。

献身于这个事业的人竟然被开除出英国共产党，我们对此感到震惊，继而感到愤怒。例如，对工程工人混合工会（AUEW）的总书记助理肯·布雷特（Ken Brett）怎么能那样做呢？由于他这些年来所承担的教育工作，全国的工会发言人都认识他。

当“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开除了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真的处在了无人地带。如果我们想为革命性的改变创造基础的话，那么，把工会排除在外往好里说是疯狂，往坏里说就是背叛。

我们会一如既往地继续销售《晨星》，我们也会继续执行上级的路线。

然而，我们需要声明，我们作为一个支部已经被孤立一段时期了，这只是由于别的工厂支部没有得到发展。假使它们得到发展的话，在地方上的工厂里所发生的大规模的开除就会遭到抵制，而工人们也不会仅仅是听天由命。

我们相信目前的共产党领导人所扮演的角色，将会被历史证明是失败的和不够格的。

对于全国产业工人的组织者最近作出的声明，用不着我们来答复。对于为争取工人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而进行的日常的、实际的斗争来说，它们毫无意义。

如果不扩大它在产业领域中的基础，党就会成为只是附属于社会民主党或联盟的一个构件，只会求助于“广泛的联盟”，而在经济方面没有作出改变的力量。

那只会进一步地让出共产党的影响力，而这样做将有损于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

G. 梅利、J. 休斯、B. 特雷默  
(英国共产党考文垂市弗拉尔斯支部)

的确，对于局外人来说，争论双方的共同之处似乎要比分歧多得多。例如，双方看起来同样致力于遵循或创造一种“广泛的阵线”的政治，尽管在《晨星》这一边是赋予工会活动以优先地位，而在《今日马克思主义》那一边是“进步人士”的更为坚定的联盟。在“正确性”上，双方似乎都有着这个古老的共产主义信念，这种信念类似于工党左翼中几代人一直在呼吁的“原则性的”立场，它认为“正确地”形成的政治路线如果得以始终不渝地坚持，再加上“头脑清醒的领导”，就必然能够实现预想的目标。（对于《英国的社会主义之路》，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理解。它被赋予了图腾般的重要意义，但30年来它显然没能激发起人们走这条道路的热情。）共产党人一直赋予组织以特权地位是其另一个残余的传统，这使他们偏爱从行政领导方面寻找解决政治难题的方法：就《晨星》而言，牢牢掌握一份超级出版物并向工会游说订阅，成了赢得更广泛读者的一种替代方案；而欧洲共产主义的领导这一方面，是把开除、调整专职的组织者以及解散持不同政见者的支部，作为把他们的对手从这个党里赶出去的手段。

“欧洲共产主义”这个词属于欧洲左翼的前进运动时期。那时，地中海国家中的法西斯主义的和右翼的政权正在垮台；那时，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正围绕一个共同的纲领齐聚巴黎；那时，全欧洲以工厂为基础的工会运动力量的发展正进入战后的高潮。但这个词对于理解今天的欧洲已经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了。对于参加这一运动的英国同志来说，也没有什么事情是特别“欧洲”的。事实上，这一点令人感触颇深，它至少反映出那些偏爱英国的事物的人——也包括笔者本人——的褊狭，这种褊狭使得在欧洲本身已经衰败了的东西——作为前进的策略甚至作为共产主义的生存策略——在这个国家中却被当做最新的东西而得到维护。这个词在西班牙未必有多少内容，那儿的西班牙共产党（PCE）——“Eurocommunist”这个词就来源于它——现在分裂成三个独立的政党，并且共产主义选票数也已经下滑。法国也是如此：那儿的共产党远远不像它在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全盛时期那样，追求充满活力的统一，而是已经公



开地与之分道扬镳。芬兰也是如此：在那儿，党的欧洲派和反欧洲派似乎仍在展开殊死的较量。希腊也一样：那儿的“强硬派”在选举中无比强大，欧洲党（Euro Party）无法与之相比。在葡萄牙，正是非欧洲党（non-Euro Party）拥有真正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选举力量。遗憾的是，东欧也是如此：那里的“人性化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工程失败了，这个工程是对欧洲共产主义发起时情形的生动回忆 [在波兰的 8 月，毋庸置疑属于工人阶级的团结工会（Solidarnosc）故意回避社会主义这个词]。也许，在意大利，欧洲共产主义党是强大的，它当然是英国的欧洲共产主义者要参照的对象。可是，把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大的共产党用来作为最小的榜样，这似乎有点令人叹息。无论是那份为了庆祝十月革命而创办的令人激动的新周刊——《七天》，还是《今日马克思主义》的销售从斯密和门泽斯扩展到小一点的经销商（这个党在秋季的另一个重大举措），看来都不可能使英国成为一个红色的博洛尼亚 [工党左翼的大伦敦市政会（GLC）当真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它很有想象力地借用了意大利模式]<sup>①</sup>。伦敦的 1000 所共产主义大学——“欧洲”派在英国最为成功的行动——在盎格鲁—撒克逊也不会起到相当于 1943 ~ 1944 年抵抗运动在意大利共产党（PCI）战后的壮大过程中的那种作用。

## 二 重生的幻想

虽然他们指责“强硬”左翼和“极端”左翼那些人，但欧洲共

---

① 一位参与过组建左翼的大伦敦市政会的朋友告诉我，这个新组织的部分准备工作就是阅读加杰、穆勒和施米特所著的《红色的博洛尼亚》，它是由作家与读者合作社在 1977 年出版的。罗马的共产主义式的管理，以及罗马在夏季安排的美妙的露天电影以及各种喜庆活动，作为榜样深深地印在大伦敦市政会成员的头脑中，也反映在他们最为得意的一个创新之中，即把地方自治的社会主义与公众的欢乐气氛联系起来。必须补充的是，共产党的产业工人组织者表示担忧的那种“庇护主义”（clientelism），如果说它正在这个国家的左派中流行的话，也在某种程度上源自意大利模式。

产主义者似乎也绝不是不受他们对自身的幻想的影响。他们表现出一种在英国左翼中少见的坚韧，回避机械的乐观主义，直面令人不快的现实（即对撒切尔主义的广泛支持），并且公开地讨论劳工运动中的不足与挫折。然而他们却喜欢沉湎于重生的幻想之中：要成为一个“真正现代的”政党，正如一个70多岁的老前辈激动地告诉我的，要成为一个从停滞状态发展为国家生活中主流的政党。除了《今日马克思主义》在公共关系中的成功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支持这一想象的了。党员人数在急剧下滑，党在产业领域中的基础正在被削弱，并且，尽管它像个政治家似的在提出建议，有时提的也的确是些合乎情理的建议，但它已经无法使自己得到在斗争中持好高骛远的、超然的观点的工会积极分子的欢心了。德雷克·罗宾逊（Derek Robinson），是隆布里奇（Longbridge）工会发言人的召集人，也是英国资方反工会转向中的第一个受害者，对他的开除，未必可以证明党重建其在产业领域中的基础的决心。“新的社会力量”——欧洲共产主义者就是以其名义说话的——在党内显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无论如何，它们有独立自主的运动和自己的组织，并且就它们所正在寻找的政治焦点而言，这个焦点就在于追随工党。共产党的上上下下，没有想到过黑人区；在这样一个逐渐丧失选举力的政党里，也没有想到过在地方选举或大选中，专门推出有可能成为候选人的妇女名单。这个党最近开除了极少数几个加勒比干部中的一个——温斯顿·品达，这肯定不会加强它对黑人的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本来就比它的美国同伴差多了。“多元主义”是欧洲共产主义者的另一个政纲，在它里面，双重标准极为明显。它也许会被采纳为“英国社会主义之路”的主导原则，可是在这个党的内部，却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情绪。“民主集中制”被标榜为约柜，当所有别的偶像都被具有现代头脑的人砸烂的时候，它幸存了下来。任何试图表示反对或者表达集体意见的做法，甚至像伦敦那些被开除的同志们那样，只是拒绝接受已经在一次会议上通过投票而下台的主席的决定，都被视为“反党活动”。在民主气氛浓厚的那段日子里，工党的全国执行委

员会（NEC）对于选区组织的事务哪怕只是进行试探性的干预，也会激起大规模的抗议。从前几个月的情况来看，在共产党内即使领导层解散整个支部、开除受人尊敬的老党员、“审查”新党员，也可能不会引起一句怨言。这个党正在进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全面清洗。这是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庆祝多元主义的来临。

在分界线的另一侧，标签也不是更明白——由于欧洲共产主义者正在掌握最好的媒体，这些标签具有典型的贬抑的意味。《晨星》的表现没有什么特别像斯大林主义的地方，相反，它藐视中央权威，这已经违背了列宁主义纪律中的第一条规定。进一步说，它几乎是义无反顾地发现了某种非常近于民主的东西：由真正开放的（尽管分歧也很严重）读者会议来决定这份报纸的未来。尽管在多年之后这份报纸重新拥有了它的读者群，但我惊讶地发现它似乎丧失了任何诉求，它的报道也远远不像我记忆中的那样有针对性。为苏联作辩护——只是假设有那回事，《晨星》的一些读者也的确宣称这是它的一个特别之处——似乎不是它的主导方向，不管它的出版情况怎样依赖于它在东欧的销量。这份报纸上有时会有为苏维埃政策或商贸活动（commercials）所作出的辩护；还有为到比利时度假所做的大幅广告，以及对苏联的“和平”政策的忠实援引。但是，不能说保卫苏维埃“路线”的需要支配或者强烈影响了这份报纸——那是《工人日报》在冷战时期的主要任务，也是它在那时对读者产生的主要影响。在莫洛托夫（Molotov）先生说“不”或维辛斯基（Vyshinsky）<sup>①</sup>先生愤然退出联合国组织的时候，《工人日报》会解释他们这样做的原因，而今天，《晨星》的许多读者是否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的名字还是个疑问。

读者仔细阅读这份报纸后也不会支持这样的观念，即它是强硬

---

<sup>①</sup> 安德烈·雅奴阿列维奇·维辛斯基（Andrey Yanuaryevich Vyshinsky, 1883 ~ 1954年），曾担任过前苏联外交部长（1949 ~ 1953年）、前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1954年）等职务。——译者注

左翼的根据地。相反，它一味地对金诺克先生恭敬有加，就像它早些时候对福特先生和更早时候对威尔逊先生一样（卡拉汉先生是不会轻易上钩的）。它连对右翼工会领导人的批评也是极为谨慎的，而且，由于正讨人喜欢地转向客观报道，它现在似乎会刊印右翼的和充满敌意的内容，且不加修改和评论。仔细地阅读之后我们会发现，与《晨星》真正具有密切关系的不是工党中的强硬左翼，而是工会运动中的中间左翼（Centre-Left）。它的理想型领导人是刚刚当选的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的书记罗恩·托德。

### 三 阶级政治？

外界的读者想要去辨别这份报纸的“阶级”政治倾向，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它对产业领域的报道相当缺乏力度，例如，在对罢工的报道上要比偏左的新托洛茨基主义报纸——像《新闻战线》（*News Line*）和《社会主义劳动者》（*Socialist Worker*）——无力得多；在对工会事务的报道上，要比《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小心得多。《晨星》事实上比它所声称的更加倾向于多元主义。自《星期天工人报》（*Sunday Worker*）创刊以来，它一直有一个非常成功的读书版，给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和美术作品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它不再是靠它在赛马方面的消息出名了，就像那次有名的意外获得成功的事件那样：凯顿（Cayton）在一年一度的越野障碍赛马（the Grand National）中把注压在“俄罗斯英雄”上，赔率是66:1；也不再像我小时候那样，举办一年一度的工人日报足球赛来庆祝赛季的开始。不过，这份报纸仍然有一个强大的体育版，虽然报纸在节约开支，但这个版面仍然被设法保留了下来。由共青团的前任组织者撰写的赛车专栏，不适合推荐给伦敦大学联合会（ULU）中的老家伙，或者推荐给作者本人（这点必须得承认）；可是，它可以使人想起，在它的忠实的读者小圈子里，它跟在它之前的《工人日报》一样，永远是一种家庭读物。“妇女”版，据说是党的妇女顾问委员会

的眼中钉，在“新社会力量”在别的地方激发起人们的兴趣之前很久，就有力地支持了妇女解放运动。在编辑方面，言辞华丽的发言重点更突出的是那个神话时代的范畴——“英国人民”（有时是“人民”），而不是产业劳动者；“阶级的观点”常常到头来成了老式的、得体的激进主义〔我曾就之前的汉兹沃斯（Handsworth）骚乱写了一篇非常率直的社评〕。这绝不是一种新现象。读一读老版《工人日报》上的沃特·豪姆斯的“工人笔记”以及20世纪40年代晚期的社评，就会发现，这份报纸跟那时的工党左翼一样，一直是更加关心“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问题而不是工厂的生产区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平问题”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它关注的焦点，尽管它与对苏维埃政策的辩护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1966年，当《工人日报》改成《晨星》的时候，开张典礼是由优秀的女演员、终生的社会主义和平主义者达姆·西比尔·松达克主持的<sup>①</sup>。

《晨星》的“阶级政治”把自己化成其对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基本忠诚的形象。跟这一运动本身一样，即使是在关系紧张和分裂比较明显的时候，它也一心要保持表面上的团结。它不考虑个人之间的分歧；它建议，只要有可能，这一运动中倾向于政治斗争和倾向于劳资斗争的各派就要采取统一的行动；它总是在失败面前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晨星》相当真实地反映了英国劳工运动中比较保守

<sup>①</sup> Claud Cockburn, "The Morning Star", *New Left Review* 38, July-August 1966. 在人民阵线时期演艺界发生左转之前很久，西比尔·松达克就开始信仰社会主义了——这可以追溯到爱德华七世时代，她的丈夫刘易斯·卡森也是这样。她作为卓越的“心灵”演员而受到20世纪20年代社会主义者的敬重，她在考文特加登（Covent Garden）（英国伦敦一广场名，皇家歌剧院所在地。——译者注）的盖特剧院的《圣琼》（*St Joan*）中的表演，尤其令人赞叹。她和她的丈夫把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1893~1939年），德国剧作家，曾参加过1919年的巴伐利亚起义，任红军总指挥，失败后被捕，被判刑5年，后流亡国外，在纽约自缢，作品有《群众和人》和自传《一个德国青年》等。——译者注〕和恰彼克兄弟〔Josef Capek（1887~1945年），捷克画家、作家和诗人；Karel Capek（1890~1935年），捷克小说家、剧作家，著有反法西斯主义的长篇幻想小说《鲛鱼之乱》等。——译者注〕的戏剧带到了英国。

的趋势，这一点也许是工会圈子中不为人知的疾患之一。它与工会领导人一样急于表现“负责任的”形象：它注重礼节和形式；它给予官方对有关事情的声明以特别的地位；它是工会领导人和工党“左翼”下院议员（MPS）的意见的传声筒，好像这些意见属于新闻事件。它不信任新奇，而依恋习惯和常规，对现任的领导人毕恭毕敬。它更在乎表现出它自己所理解的原则性，而不是更使人信服。尽管对于一份报纸来说，对新闻不太感兴趣是件令人遗憾的事，可是它至少不像它的那些更左的对手那样，假装把我们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纠察线上或者冲出纠察线与警察搏斗上了。现在，它与《今日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急于避免采取带有攻击性的模式。《晨星》提出了它自己的理想化的劳工运动版本，这一点可以从照片中（总是带有现在的那些递交请愿书和提出抗议的工会代表团所特有的矫揉造作）、从对于罢工的报道和对于劳工事务的报道中看出来。按照它的专栏中的说法，劳工运动正在不断地壮大——从共产主义的老传统来看，这表明了它是“积极的”，是不受外界情况干扰的。总之，《晨星》所提供的，首要的就是象征性地使人消除疑虑、恢复信心，当形势好像需要的时候，就拍几份电报，表示一下愤怒（常常是本分的，有时也带有一点真实的情绪），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潮水般的给人以安慰和高兴的东西。

《今日马克思主义》的风格也并无两样。它开始让人感到困惑、气恼。它把读者暴露于右派的争论之下，而不是使他们在左翼世界里得到保护。它从托利党的高层（哈尔西汉姆勋爵为欧洲胜利日那一期赐了稿）和《金融时报》的记者们那里约求稿件和意见。它的一贯正确的眼光可以发现弱点，发现社会主义的和工会的政治中言辞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它对于失败有一种病态的兴趣，但不能不承认它知道的很多。它在杂志封面上登载着撒切尔夫人的彩色照片；在印刷版面上，它偏爱国旗的颜色（the national colours）。它力避意识形态的说教，而喜欢高端访谈，采访引领时尚的人、娱乐界中的“大腕”以及政界名流，“主持”（用它自己的话说）圆桌会议，从

媒体上的人身攻击当中提炼出社会意义。它刊登那种关于经济和福利的冷静清醒并且带有极清晰的图表的文章。它关注当今的问题，同时又抽掉了这些问题中容易激发人的情绪的内容。它的那些安排得很有策略的小短文，常常出自职业记者之手，在传递消息的同时也突出了一种模范的姿态，那种见闻广博的观察者的姿态：有同情心但又保持超脱。像哈切特（Hatchet）所写的那些赞美“广泛的民主联盟”——当代的共产主义想象中不切实际的怪物——或者中伤党内对手的东西，相对来说是很少的。事实上，虽然《今日马克思主义》要求其余的每个人的政治观点要“冲在最前面”，但它自己却显然是谨小慎微的。例如，它对最近的党的大会的唯一一次评论，就是印在迎面页（the facing page）上的公告。《今日马克思主义》也是广大“新左翼”作家的论坛和平台，他们被鼓励要以比人们在其他杂志上发现的更为坦率易懂的方式去发表意见。艾伦·亨特（Alan Hunt）撰写的关于宪治的伤感的文章——他看起来像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白哲特（Bagehot）<sup>①</sup>——由于下面这些人的杰出的、缜密的分析而充分地得到补偿：布特瑞克斯·坎贝尔、希维尔·弗朗西斯、斯图亚特·豪，还有作家托尼·雷恩（Tony Lane），他的文章激起了与《晨星》最初的冲突。

#### 四 多元主义的限度

《今日马克思主义》可能并不像它自己想象的那样是多元主义的：它有非常清晰的政治界限，这表现在它对圆桌会议的主题和撰稿人的选择上，尤其是在缺勤次数的公布上（这一点也许可以反映这个刊物的秘而不宣的工作议程：它竟然允许它最优秀的编辑之一，

---

<sup>①</sup> 沃尔特·白哲特（Walter Bagehot, 1826~1877年），英国经济学家、新闻工作者和评论家，曾于1860~1877年主编《经济学家》杂志，著作有《英国宪法》、《物理学与政治》等。——译者注

约翰·福斯特，被开除出党，且没有说一句表示抗议的话。——的确，尽管我知道，到这些政治界限出现的时候，他的名字就不会再出现于报端了）。《今日马克思主义》泛出气泡的地方，与其说是在它的文章本身当中——绝大部分是毫无激情但还看得懂的散文，不如说是在于它的画技和包装、可笑的自我激励以及它自身的那种难以动摇的乐观。它所做的，就像它附带刊登的广告中的香槟一样，首要的就是冒泡。

在面对政治困境的时候，《晨星》只会逃避或者稍稍去触及一下；而在遇到利益或观点上的分歧的时候，它就会设法去脚踏两条船，就会去掩盖挫折和失败。相反，《今日马克思主义》——就像那些宣传材料告诉我们的那样——却颇为自豪地“冲在最前面”。它扮演着公开发告左翼所遭遇的困境的角色：没有什么比结结实实的惨败（近来也不缺少这样的题材）更能刺激编辑的肾上腺素或者使圆桌发出嗡嗡的声音了。《今日马克思主义》专挑痛处戳。它不是缩小分歧而是扩大分歧。它在与右翼的对话中是开放而宽容的，但在左翼中，倒真的可以被视为不和的制造者。在奇怪地复活了的两个阵营的政治观念中，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带有摩尼教特征的分类：善的和恶的、对的和错的、“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一方面有“民主左翼”，即工党领导人及其支持者；另一方面有“强硬左翼”，它作为对立面，就是斯大林主义者和极权主义者。《今日马克思主义》就这样在它自己的支持者中把分歧拔高了。尽管他们说了许多关于联合的话，但一涉及左翼，他们就不是主张重新统一的人，而成了分裂者。

更奇怪的是，尽管看起来还一样有趣，这种政治观念对于工党恢复元气能有多大的可能性，却在相当程度上是持不可知论的——对此已不能说得再轻了。与《晨星》不一样，《今日马克思主义》在感情上绝不留恋工党的过去（对于一份左翼刊物来说，奇怪的是，它不刊登历史方面的文章），对工党的现状也没什么敬意。它怀疑工党的政治能力，也不为工党领导人的恭维话所动（霍布斯鲍姆对金



诺克的采访显示，他远远不符合这个刊物严格的标准)。作为“运动政治”的参与者，它怀疑工党的“沙文主义”——也就是其所宣称的独自代表英国左翼的权利。它比较同情“市政厅社会主义”，但又总是觉得这种社会主义的实习生没有受过训练或者是些投机分子。本宁主义（霍布斯鲍姆称之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幼儿园”）尤其成为嘲讽的对象。用来讨论工会主义的字眼普遍带有否定的意味：劳资斗争（对于某个撰稿人来说，甚至包括1984~1985年的矿工罢工）在定义上几乎就是“狭隘的”，要求增加工资是“经济主义的”，工会意识是“社团主义的”。当然，《今日马克思主义》也有工会方面的撰稿人，这也许只是表明它对工党隐隐约约地有点过意不去，毕竟它所炫耀的胜利纪念品——“广泛的民主联盟”——不过是像首席巡视员艾德森或者是达拉谟（Durham）的杰金斯主教这样的人物。

《今日马克思主义》似乎在精神上——如果不是在政治担当上的话——比工党更接近社会民主党。它享有一种类似的“后阶级”政治和“柔性”策略。它对于产业领域和政治领域中身处困境而又无力自拔的人，有一种现代化的希望。像社会民主党一样，它也制造迷信——联盟的观念，并且在头脑发热的时候，设想进行一次辉煌的重组，把英国激进主义运动从地方主义和狭隘性中彻底解放出来，在“整个进步运动中”签订“新的历史协议”。像社会民主党一样，它指望欧洲能够提供抗衡工会主义的政策；意大利共产党成了社会民主党所钟情的巴特戈德堡的同义词。在情绪和风格上，或者是在雷蒙德·威廉姆斯所说的“情感结构”中，可以发现它们都讨厌不怀好意者和自以为是者，都对狂热表示怀疑，都养成了一种懒懒散散的风格。像社会民主党一样，它注重推进“明智的”政策、“激进但又合情合理的”政策，力戒教条和感情用事。这样看来，社会主义不再是伟大的彼岸，不再是与现存秩序相反的形象，不是个倒转过来的世界，而是以合理的方式去分配资源、监督社会开支和控制（尽管不是以社团主义的方式）生产和消费。《今日马克思主义》也有点社会民主党的那种自恋倾向。如果按照它里面的公告（署名

是党的书记，戈登·麦克雷恩，但未必是真的），入党似乎是件“逗乐的事”，这一点与这个刊物竟然会喜欢庸俗作品是一致的：卡纳比大街和搞笑的20世纪60年代的最新产品，以及像社会民主党的那些可与之相提并论的、很有点过时的产品〔最新奉献是日辉（Day Glow）牌T恤衫，在那上面，露齿而笑的格拉乔·马克思（Groucho Marx）<sup>①</sup>斜靠着卡尔〕。

在使共产党成为舆论的焦点这个方面，《今日马克思主义》确实成功了。就像公告中说的那样，它是“当今英国杰出的，也许是最好的杂志”（《金融时报》）。好的新闻报道的长处也是实实在在的长处，不应当受到那种总是搞些没有可读性的出版物的社会主义左翼的轻视。但是好杂志的长处与有效的政治活动的长处不是一回事。在期刊的星空中，《今日马克思主义》流星般的升起与党员人数的急剧下滑相一致，这也许不是偶然的。好的新闻报道的整个关键——不管是由W. T. 斯泰德于19世纪80年代发明的追求“轰动效应”的那种类型，还是今天那种关注时尚的追随者——就是要抓住你的好奇心。就《今日马克思主义》而言，就是用有吸引力的包装，去推销政治上最新的事情。尽管新奇对于提高可读性是个非常管用的招数，但它往往在不知不觉间削弱了杂志的担当。《今日马克思主义》没有政治上的或其他任何意义上的归属感。它不为自己的传统而自豪，也不对以它的名义所犯下的过错而愧疚，甚至也不为当前的共产主义在道德上的破产及其所暴露出来的巨大缺陷而苦恼。只要可以提供好的题材，阶级斗争就是有趣的；如果市政厅社会主义陷入困境了，也是有趣的。它的评论是温文尔雅、见多识广的，当然也会使我们对时事了解得更多，假如我们对那种事情感兴趣的话。它最好也不过是一种有精装本《经济学家》，最糟就是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

① 格拉乔·马克思（Groucho Marx，1890～1977年），本名朱利叶斯·亨利（Julius Henry），美籍犹太移民，20世纪20年代美国最受欢迎的戏剧演员和电影明星，作品以幽默诙谐闻名。——译者注

《在此之后》。它除了照例求助于葛兰西（Gramsci）<sup>①</sup> 和统治权之外，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在进行思想斗争，一场关于价值观的斗争；除了在暗淡的形势下痴迷于某种新政治之外——这是它首先关心的事，它只是在使自己出名，为自己创造空间。

## 五 衰败的征兆

《今日马克思主义》当然不是目前危机的原因，而是这一危机的后果。无论是在诋毁者眼里还是在赞美者眼里，它之所以显得突出，更多的是由于周围的地势比较平坦，而不是由于它固有的特点，即这个党的领导层所特有的套话和官僚政治的惰性，党员们越来越远离政治行动，尤其是这个党在产业领域中的基础被削弱——这一点要早于1974年的经济不景气，因而需要的是敏锐的分析而不是跟职业相关的统计数据。作为一个有着众多成员的组织，这个党似乎已经到了步履维艰的地步。曾经特别令党感到骄傲的工厂支部组织（在1950年，它们在苏格兰地区的222个支部中不少于79个）<sup>②</sup>，现在在许多方面都不如当年了。在20世纪50年代，不列颠的里兰（Leyland）和考利（Cowley）有两个工厂支部组织（一个是在轧钢厂，另一个是在莫里斯汽车厂），它们在60年代晚期或70年代早期就消失了，从而被左翼的竞争对手所超越<sup>③</sup>。从一份大会的决议来看，在沙德劳的谢菲尔德（Shardlow's Sheffield）——共产主义工程师们的历史悠久的根据地——参加投票的只有三个党员<sup>④</sup>。地方上的

---

①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 ~ 1937年），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译者注

② CPGB Scottish District, *Congress Report*, Glasgow 1949.

③ 关于这些支部在牛津汽车业工会主义的形成功中所起的作用，参见 Arthur Exell, "Morris Motors in the 1930s",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6, 7, 9, 1978-1980.

④ 与谢菲尔德工党中的一位朋友的口头交流。上文虽属道听途说，但应当加以说明的是，我的朋友是同情共产党的，他悲伤地而不是高兴地告知了这一事实——假设它是事实。

支部有许多都似乎已经放弃了所有的公共事务，而把精力放在内部斗争上。在选举方面，共产党仅存的极少数几个议席成了历史纪念品。在1938年，一个议会候选人在比格斯韦德（贝德福特郡的一个小镇，共产党在那儿的1.6万总人口中获得了700张选票）<sup>①</sup>，或者是在牛津的佛罗伦萨公园区（在那儿，一位共产党候选人，著名的路权斗争中的主角，获得了1000多张选票）能够获得比今天的任何议院候选人更多的支持<sup>②</sup>。即使在50年代中期，“共产主义者的选票”还是值得一提的，那时，我们的北圣潘克拉斯铁路工人候选人约克·尼克松获得了1500张选票。今天，当这个党甚至不能保证它的半数成员的忠诚时，对共产主义者的选票存在类似上述的想法就是异想天开了。一个更为令人震惊的衰落的标志是，党在近来的矿工罢工事件中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失败了。1926年，在总罢工以及矿工们随后所遭受的长达数月的停工中，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结果，党员人数增加了一倍，其中绝大部分新成员都是矿工。在1984~1985年的矿工罢工期间，尽管在矿工领导中有米克·麦克盖伊（一个了不起的人，这个党本来是有望为之骄傲的），尽管在威尔士采取了重大的共产主义行动（这些行动导致了为保卫煤炭共同体而召开的威尔士代表大会），但这个党在煤矿中的成员实际上却流失了，他们中有优秀的工人历史学家（worker-historian）马尔科姆·皮特<sup>③</sup>，全国矿工联盟在肯特的主席，以及肯特矿工的书记杰克·科林斯。

20年前，当1958~1974年工会运动的高潮正在积蓄力量的时候，新闻界猜测莫斯科插手了每一次的劳资冲突。这种想象似是而非。在1966年的海员罢工时，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首

① 有关这个镇的党的建设的报道，可参见 *Party Organiser*, April 1938。

② 关于这一地方性壮举的描述，可参见 Peter Collison, *The Cutteslowe Walls*, Oxford 1951；还可以参见前面所引的亚瑟·埃克塞尔（Arthur Exell）的个人论文集。在牛津大学罗斯金学院的 Abe Lazarus 档案中，有一些选举方面的资料。

③ 马尔科姆·皮特所写的《我们背后的世界》（*The World on our Backs*）这本书，把对煤矿中的工作和意识形态的精彩描述与1972年罢工的历史结合了起来。

相也照此抓方。在他对海员领袖们的众所周知的指责中，有一段话也许无意中表明了共产党在劳资领域所具有的尚未遭到损害的复原能力，尽管这段话带有他的情报部门的顾问的印记：“共产党跟那些较大的政党不同，它在产业领域中有一个高效的、训练有素的组织，它由共产党的大本营控制，议院对这件事情是会弄清楚的。在这个国家任何地方的任何产业部门所发生的较大的罢工，这个组织没有不插手的。也许是由于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无能，使得它想在产业领域的组织化中有所表现。共产党正在图谋在来年的大会上改变规则，并采取措施替换那些专职的工作人员……还要确保共产党目前在政治领域和产业领域的主要目标，即破坏政府的物价和收入政策。”

对于任何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共产党中成长起来的人——譬如笔者本人来说——现在的共产党人与他们最重大的对照之一是缺乏紧迫感。那时的共产党员总是保持警惕。他们被一种火烧火燎一般的紧迫感所驱动。时而是“前面有极大的危险”那种阴郁的警告<sup>①</sup>，时而是高翔的希望。形势不管如何总是处在——用哈利·波利特最喜欢发出的一种呼吁说——“英国人民曾经面对过的……最危急的时刻”<sup>②</sup>。经济危机即使不是事实，也即将来临；工人们即使显得平静，也是“动起来的”。矛盾，不管它们是在哪里发现的，都是爆炸性的。一方面，工人中也出现了“新的精神状况”，要把“大好时机”转变为现实，要抓住新的机会。这种责任是“艰巨的”——像约翰·萨姆菲尔德（John Sommerfield）在《五·一》中所说的那样。整个前途都处于持续不断的危险之中。

尽管处于高强度的行动和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之中，党员们还是为自己在这项事业中的贡献感到自豪：由于受到资方的惩处而丢掉了工作，放弃了职业上升迁的机会，抛弃了舒适的生活。每一个正在觉醒的人满脑子想的都是共产主义，它为他们的生活注入了意

① Harry Pollitt, *Unity and Victory*, CPGB, 1943 Congress Report, p. 33.

② Harry Pollitt, *Report to the 23rd Congress*, April 1952, p. 23.

义。他们在示威活动中注意穿着得体，但对私人的外表却好像毫不在意，也不去计较别人对此会怎么看<sup>①</sup>。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来说，他们的家单调乏味，一看就知道是贫困的，但藏书很多的书架补救了这一点，那是他们生活空间中的精神中心。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家就跟一个“好基督徒”的家一样与众不同，只是这个家中的偶像没那么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镶有镜框的列宁相片<sup>②</sup>，到了40年代是铁托或斯大林的半身像）。他们的家中总是有成堆的要分发的宣传品、要签名的请愿书（收集签名是共产党人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准备拿到《工人日报》的圣诞巴扎上去义卖的旧杂物或工艺品。据一些带有敌意的观察者看来——我认为他们的看法也不是完全错误的——这一时期的共产主义者对家庭疏于照料。叛变者鲍勃·达克说（他在资本主义媒体上谈到了他的变节）：你根据其荒芜的花园，就可以辨认出哪个是共产主义者的家<sup>③</sup>。并不是说共产党人不关心这

- 
- ① 爱德华·厄普沃在他的一本自传体小说中偶然证实了这一点。在描写他对核裁军（CND）运动中本地的秘书米拉的印象时评论说：“她不像个党员，她对自己外表的兴趣太明显了。这种兴趣的迹象在于，她看上去跟我们三天前第一次遇到她的时候多不一样啊！虽说她那会儿似乎也同样漂亮，可现在，她那高高的向后斜的发型要烫帖多了。”参见 Edward Upward, *No Home but the Struggle*, London 1979, p. 41。
- ② 在约翰·萨默菲尔德（John Sommerfield）的《五·一》（*May Day*）（London, 1984）第100页上充满感情地描述了那个时代只有一个房间的党的家庭。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共产主义影片《母亲克劳泽升天记》（*Mutter Krausens Fabrt ins Glück*），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青年共产主义工人所住的房间，它用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 1798~1863年），法国浪漫主义画家。《自由领导人民》是他的代表作。——译者注〕的“自由扫清路障”作为它的革命者的肖像画。
- ③ 我想，这样的指责一定是出现在达克变节不久为《每日梗概》所写的系列文章中。在鲍勃·达克（Bob Darke）的《英国的共产主义技术》（*The Communist Technique in Britain*, Penguin, 1951）中没有提到这一点，尽管并不缺少对这类事情表示气愤的信息。达克，公交车售票员。在他脱党的时候是哈克尼（Hackney）的共产主义议员，并且在资本主义的新闻界被给予贵宾待遇。公正地说，和我们在那个时候的想法相反，他在内心里并没有站到那一边去：这些年来他一直是哈克尼地区他那个阶层的、很有战斗性的租房者协会的主席，而且很活跃。

些事情（《工人日报》有一种完美的野生生物的特征，也有一个固定的园艺专栏），而是因为没完没了的活动几乎没给他们留下私人的时间。

今天的共产主义运动一点儿也没有这样的紧迫感。它已经不再相信它的行动的必要性，不再相信它的事业的世界历史意义。共产党人参与了和平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和贵格派教徒一起在保持核裁军运动的团结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他们回避灾变之说；他们遵照英国激进主义的优良传统，抨击武器扩散，却不用担心行将发生的世界大战。党员们不再活跃了：要是从我所熟识的那些党员的情况来看的话，他们过的是非常正常的生活。没有人像我们过去那样，为了赶着上早班，常常在五点钟的时候就要到火车站；也没有人会出去用白石灰水刷标语——我的一个共产党人朋友记得的最后一句口号是：“扬基佬，滚出去！不要U2！”人们似乎把共产主义当做一种私人感情或者（有时在局外人看来）心中的苦恼来对待了。作为集体尊严的承担者和受益者，他们非但不热情地“露出自己的党员身份”，还好像急于要与它保持距离。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被新的变化弄得灰心丧气，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还承受着太多往日遗留下来的东西。他们高谈阔论“觉醒”（disenchantment），掂量着“留在里面”的理由，仿佛这是件可以理性算计的事情，而不是在敌人面前开小差。

## 六 失去中心的党

英国共产党仍然组织得像个先锋党，但它对领导地位的要求即使没有在言辞上也已经在行动中被放弃了。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党员们不会再按照过去那种强制性鞭管的方式，为党的停滞不前而自我检讨。党如果还能尽量聚拢在一起，就已经不错了，而有些人希望至少能把他们的对手都除掉。《晨星》似乎更在乎如何在全体党员的眼里确立它自己的合法地位——近来它也关注起工会联盟了，而不是如何在读者中发现或者培养党的拥护者。一份社会主义的报纸

要卖 30 便士，并且每天只卖 10000 份或 12000 份，这似乎已经被当做米堤亚人和波斯人的律法了。对《今日马克思主义》来说，它似乎也安于做一个空谈家，或者是俱乐部中为别人的斗争而出谋划策的战略家。它的内容看上去不错，可这些内容在精神上更接近于当代艺术学院（ICA）的研讨会的内容，而不是任何可以被视为“思想斗争”的东西。不管它们的编辑意图怎样，从现存社会秩序的视角来看，《今日马克思主义》和《晨星》倒都像是没有害处的。其中之一为我们提供的是一座政治客栈，而另一个所提供的则是宗教式的静修（a religious Retreat）。

《晨星》派和“欧洲共产主义者”（Eurocommunists）都对共产党存在的历史基础含蓄地提出了质疑，包括这样一些说法：共产党是一种新型的政党，共产党人是用特殊的模子铸造出来的，他们的使命就是进行“领导”。一句话，就是质疑先锋党的观念。这两派都倚重外界的支持，其中的每一方都按照自己的方式选择了一条审慎的道路，尽管，就像我已经说过的，一方是从“觉醒”的辩证法中，另一方则借助于对工会的忠诚。它们虽然都对先锋党的观念恋恋不舍，但又在实际上背离了它。

《晨星》正依照自己的生存斗争的逻辑——也许还出于天然的同情心——越来越多地诉诸工会的支持，也从那里得到了大量的支持。它的中心不是放在工厂的生产区里，而是放在工会的办公室里，放在专职的工作人员那里。这些专职的工作人员是组织者，按照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是忠实于他们的会员的，但他们和会员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却是极为不同的，并且，就像最近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他们有时还令人悲哀地与普通工人真实的感情保持距离。《晨星》不可能像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发生共产主义运动时那样，在修车厂或者电车站台上发起辩论，也不可能像 40 年代和 50 年代那样充满关怀地呼吁创建工厂支部。它现在说话的腔调就像是工会中专门搞调查的干部、区书记或整个地区的组织者。《晨星》迟早是要发生变化的。它对工会事务所做的不偏不倚的报道，已经显示出一种可



喜的转变，它也有寻求新的支持者的自由和余地。但是，它再次行动起来所处的那种环境以及它将要刊登的各大书记的文章表明，它有成为工会联盟内部刊物的危险。

为了给“广泛的联盟”寻找源头，欧洲共产主义者转向了人民阵线，把它作为样板——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话说，“从长远来看，它是共产主义者在像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曾经发现过的最为有效的策略”<sup>①</sup>。这两者之间的类似之处不管在党的民间记忆中有多大的吸引力，也经不住仔细推敲。人民阵线的口号是“团结”而不是“联合”，而且它的行动领域与如今像“广泛的民主联盟”所倡议的相比，也有性质上的差别。霍布斯鲍姆给出的相关的当代实例是，动员上议院支持保卫伦敦内阁，但这与志愿参加西班牙战争，或者霍布斯鲍姆自己所想象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武装斗争”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无论如何，不管是票价公平运动（the Fares Fair Campaign）还是大伦敦市政会的市政厅社会主义——《今日马克思主义》就是为这种冒险主义而责备工党左翼的，都与共产主义的主动精神没有任何关系。“反种族主义之石”<sup>②</sup>和反纳粹同盟也是如此，尽管它们是近年来发起的最成功的“广泛阵线”（broad front）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罕见的主动精神的产物。该党抵制了民族阵线，并终结了支持种族主义表决的拍卖行为。如果在当今的左翼中能够建立同盟，那么很可能是情势使然，以及大众的态度出乎意料地一致起来，而不是由于共产主义式的精心策划和指引。

人民阵线的策略也被设想成为党借以补充力量、吸纳局外人的渠道。这要以外围同情者的广泛存在为先决条件，并且这些人要愿意承认党在道德上的优越性及其领导智慧。像人民大会（People's Convention）或者英国和平委员会（British Peace Committee）这样的

① Hobsbawm, "Retreat into Extremism", op. cit.

② 反种族主义之石（Rock Against Racism），1976年成立于英国的反种族主义团体。——译者注

新一代前沿组织更是如此。不管这些运动的原因有多么不同，它们都被视为通向共产主义的领导地位和统治权的垫脚石。最近进行的这种类型的尝试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后果。这些尝试与其说巩固了党，不如说动摇了党；与其说把别人吸引了进来，不如说把党暴露在各种离心力的作用之下，并且创造空间使得党员们能够独立于党的方向并最终脱离党的轨道。伦敦共产主义大学（CUL）——共产党组织或主持得最为成功的机构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是寄生性的，或者（用一个火气较小的字眼）是依赖于外界在知识上和文化上所提供的能量。作为欧洲共产主义思潮成长的外壳，它显然对党本身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可是，尽管它试图增添有关党的策略的辩论，但这样做是否加强了党对外界的影响力，还很值得怀疑。左翼读书俱乐部是20世纪30年代与之最为相似的组织，在那个时期，党员的人数增加了三倍。反之，在建立伦敦共产主义大学后的十年期间，党员人数却急剧减少。《今日马克思主义》在许多方面就像人民阵线的翻版，这损害了伦敦共产主义大学的形象。那些名流和有头有脸的人物之所以在那儿，并不是因为他们同情共产党，而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需要，有时也是出于他们对左翼的敌视。有人可能会说，共产党恰好是个幼稚的“阵线”，把它名字所具有的鼓动力借给了那样一些文章，那些文章如果只是在比较老套的赞助之下出版的话，就会湮没无闻 [在《观察家》（*Observer*）上抨击全国矿工联盟，或者是在《面孔》（*The Face*）上提供关于时尚的“最新情况”，几乎不会引起轰动，而在《今日马克思主义》上，它们如禁物一样带来了震颤]。《今日马克思主义》的撰稿人似乎不是来自党的支持者和潜在的新党员发展对象——人民阵线所特有的外围圈子，他们是前共产党员，68届的，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在大众传媒中都顺顺当当地安顿下来。这些人不会想到再去加入共产党，他们只是对在伦敦共产主义大学的日子还有点感情罢了。

放弃或部分地放弃先锋主义，会使共产党人与他人的合作变得更容易，但这样做也可能使得他们想要接受他们自己就比较难了，而且也的确已经比较难了。这还使得这个党存在的理由受到了质疑。

也许英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成为积极意义上的革命党——这是能使之脱离改革主义的历史基础，但它确实被认为对社会秩序来说是危险的力量，政府也是以这种观点来对待它的（党的整个领导层遭到监禁，是政府对付总罢工所制定的准备措施中的一部分。在1926年，有1/10的党员被关押起来，同时也有大量的矿工涌入党内。在1932年，当失业工人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这个数字大约是1/25<sup>①</sup>）。也许，这样说比较中肯：党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尽管是有限的）发展，是因为在它自己以及外围广大的支持者眼里，它把自己置于工党的左翼替代物、在某种终结意义上也是工党的竞争对手的位置上。共产党人还相信——其他人也相信——他们自己是用特殊的模子铸造出来的，特别的活跃，具有安排社会秩序的意志，并且也唯有他们具备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要是结果发现共产党人，至少就现在的他们来说，也是用普通的黏土造出来的，那么他们的与众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就不过是一种传统和遗传。目前，只有在它自己编造的戏剧里，这个党才似乎有能力担当领导的角色。尽管这会使它引起媒体的关注，但不可能使新一代人继续致力于政治行动，至少是那种使得英国共产党——即使它规模不大——成为英国生活中的一支力量的行动。在公共关系中获得成功是一回事，虽然这对于那些看够了这个党被诽谤和忽视的人来说，无疑是奇迹之源，但是像沃尔·哈宁顿那样，带领10万个壮汉，突破警察在海德公园角（Hyde Park Corner）的阻拦而进行饥饿大进军（the Hunger March），去书写这个国家的历史，又是另外一回事。还有登上了卡特斯劳墙（Cutteslowe Walls）<sup>②</sup>的高处的厄尼·凯林（Ernie Keeling）、开辟了奔宁步道

① 有关资料不知放在什么地方，一时难以找到。

② 卡特斯劳（Cutteslowe）位于牛津北郊，1934年“城市住宅公司”在此地开发私人住宅，并修建了一段横跨两条道路的围墙，这段围墙给居住在围墙另一侧“市建住宅区”里的人们的出行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从而引起了广泛的抗议。这段墙同时也成为社会中阶级划分的象征。在抗议活动中，英国共产党和左翼人士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经过若干年持续不断的斗争之后，卡特斯劳墙终于在1959年被拆除。——译者注

(Pennine Way)<sup>①</sup> 的曼彻斯特共青团，以及备受鄙视的全国矿工联盟的领导们——现如今是亚瑟·斯卡吉尔、佩特·希斯菲尔德和米克·麦克盖伊。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说，共产党是一个小党（“一直是”），它一直致力于英国的劳工运动，并还将继续如此<sup>②</sup>。这是个谦虚的说法，但它忽视了过去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动力，忽视了共产主义者的精神状况。如果一个党的目标如此狭隘，霍布斯鲍姆自己也不可能加入其中，因为，像其他人一样，他相信革命是一项严肃的使命，它需要有献身精神并且能干的干部。在1950年，他还坚信共产党人可以进行“有计划的领导”，坚信他们独自就可以“规划”未来，并且坚信马克思主义作家——用他在1950年还能够毫不心虚地援引的说法——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sup>③</sup>。

失业工人运动中的沃尔·哈宁顿和他的战友们，是霍布斯鲍姆就党对英国劳工运动的贡献所能想到的优秀榜样。虽然工党宣布他们是危险的，工会联盟也在回避他们，但他们所组织的饥饿大进军已经给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人们留下了记忆。他们的行动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他们是一个世界性的革命团体中的成员。体现了这一信念的还有，全国矿工联盟中许多的领导成员作为国际阶级斗争囚禁者援助组织（后来的名称是国际劳工保护组织）的组织者，发挥了双重作用。这一组织先后在全世界发起了声援萨科（Sacco）、

---

① 奔宁步道（Penning Way）是始建于1965年的英国国家步道，它贯穿英国的奔宁山脉，全长429公里，风光旖旎而又充满挑战。建立奔宁步道的设想最初是由记者（后来成为“漫步者协会”的主席）汤姆·斯蒂芬森（Tom Stephenson）在1935年提出的，但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要求受阻于英国的土地私有制度。大自然中许多美丽的地方都被土地的所有者圈起来，以供私人围猎之乐，这些地方有专人（gamekeeper）看守，他人不得擅入。因而，争取“漫步”的权利就成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工人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译者注

② Hobsbawn, “Retreat into Extremism”.

③ Eric Hobsbawn, “Introduction”, in Jozsef Revai, *Lukács and Socialist Realism*, London 1950.

凡佐蒂 (Vanzetti)<sup>①</sup> 和汤姆·摩尼 (Tom Mooney)<sup>②</sup> 的活动<sup>③</sup>。举个比较近的也是比较本地化的例子, 霍布斯鲍姆也熟悉这个例子, 他可能跟这件事也有一些关系。如果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小组就都铎王朝 (Tudor State) 的阶级本质作出公开声明<sup>④</sup>, 宣布: 按照他们的判断, 它既不是资产阶级的, 也不是过渡性的封建主义的, 而实质上就是封建主义的, 如果他们觉得在 1948 年这样做意义重大, 那是因为一个共产党人所说的每一句话, 就跟他的每一行为一样, 都是极其重要的, 要是这句话是在为这个人自己推卸他对于过去和子孙后代的责任的话。

## 七 “挚友社团”

1928 年, 麦卢尔斯基 (Manuilsky) 在第三国际的一次公然干涉

- 
- ① 马萨诸塞州鞋匠萨科和鱼贩凡佐蒂 (均为意大利人), 在 1920 年反共高潮中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 1921 年被判死刑, 1927 年以电刑处死。该案件在美国和世界各国引起广泛抗议。——译者注
- ② 汤姆·摩尼, 全名托马斯·约瑟夫·摩尼 (Thomas Joseph Mooney, 1882 ~ 1942 年),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地区劳工领袖, 由于被指控与 1916 年 7 月 22 日在旧金山举行的为准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游行中发生的爆炸案有关, 入狱 22 年, 经多方营救, 于 1939 年释放。——译者注
- ③ 弗雷德·柯普曼 (Fred Copeman) 的《起义的原因》(Reason in Revolt) (London, 1948) 对这两种运动的内外生活和人物的特点作了精彩的、的确是独一无二的描述。柯普曼, 用党的词汇来说, 是个变节者。他在 1939 年脱离了党, 后来成了一名天主教徒和道德重整运动的成员。但这本书却超越了它出版时的环境, 它对这个党中比较接近工人阶级的那个部分的描写, 异乎寻常的真实。令我惊讶的是, 诺林·布兰森在她新近出版 (也备受赞扬) 的关于党的历史的著作中却没怎么参考它。柯普曼是因弗高敦变节者 (Invergordon Mutineers) 之一, 在入党之后, 他就为全国失业工人运动和国际劳工保护组织工作, 后来担任国际旅英国营的指挥官。在书中所给出的许多令人感兴趣的线索中, 有一个描述了党无情地对待既令人敬畏又深受爱戴的伦敦的鼓动家、教师凯丝·邓肯。要是有一位研究历史的读者或前辈能够给我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我将不胜感激。有关较早时期对她的描述, 参见 Tom Thomas, "A Propertyless Theatre for a Propertyless Class", in Raphael Samuel, ed., *Theatres of the Left*。
- ④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Tudor England", *Communist Review*, 1948.

中指责，英国共产党没有认识到在革命中“砍掉某些人的脑袋也许是必要的”。他们也没有学会如何进行清党：“德国的同志们仔细琢磨人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他们不容忍任何对路线的背离；无论什么人，只要有丝毫偏离了路线，就要受到抨击……然而，在英国共产党内却存在着这样一种特殊的原则：党是一个挚友社团……我们对英国党内存在的那种团结一致表示欢迎，可是，在我看来，偶尔也应该稍稍突破一下这种团结一致。”<sup>①</sup> 在第三国际的催促之下，英国共产党那时的确打算（非常不成功地）进行严厉的自我批评，而且[正如诺林·布兰森（Noreen Branson）在她新近的历史著作中告诉我们的那样]在1929年的利兹代表大会上，充斥了相互指责。争议的确事关重大：党应该支持还是反对工会主义，工党是否在根子上是法西斯主义的，革命是否即将来临。会上发生了激烈的指责。经过投票，后来成为《工人日报》编辑的J. R. 坎贝尔（Campbell）以及安德鲁·罗斯坦（Andrew Rothstein）被免去了他们在中央委员会的职务。沃尔·哈宁顿（Wal Hannington）重新当选，这一点有悖于主席台上人们的意愿<sup>②</sup>。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卷入那个时期的激烈争论的同志们，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几乎又都继续在一起合作。提到这次大会上的各个角色，就像是对20世纪40年代领导层的点名。1939年9月的那次声名狼藉的分裂也是如此。其时，帕姆·杜德主导了对党的战时政策的抨击，迫使党的总书记波利特以及坎贝尔辞职。15年之后，他们三个人仍然在党的领导层共事。一种可以说是结构性的分裂——党本来是可以克服这种分裂的——并且是令人奇怪地被历史学家们视而不见的分裂，就是在专职的工作人员与从事在30年代被叫做“群众工作”的同志们之间所作出的区分。尽管党具有集权性质的组织结构，但它的一些重大行动的动力却在下面，

① Branson,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27 - 1941*, pp. 45 - 46.

② 布兰森对利兹代表大会的描述值得关注，遗憾的是，她对于这一描述的来源未加说明，除了说它来自于已故的詹姆斯·克鲁格曼（James Klugmann）档案中的一个文件夹之外。

在普通的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骚动中，比如 30 年代的公交员工运动、码头上的非正式运动（在 1945 ~ 1946 年，共产党起初是反对这一运动的）。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失业工人运动，它在自己最后的岁月里，不得不抵制上面对“广泛的委员会”（broad committees）的偏爱，而代之以街头抗议。不过，劳资方面的干部在那时候显然享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sup>①</sup>。

这个“挚友社团”在经历了路线上的艰难曲折之后，却以某种方式幸存了下来，一同幸存下来的还有对这项事业的忠诚，不管这一事业如何被重新定义。在冷战时期，当党在极力维护某些高尚的目标以及某些糟糕的东西的时候，当党员们在工会支部和街头不得不为无法辩护的事情进行辩护的时候，党在道德上和组织上还比现在更像个样子，尽管它现在的处境还不是无可救药的，尽管它现在要谦逊得多。这件事很是奇怪。但更为奇怪的是，只是在现在，在党存在了 60 年之后，“挚友社团”却正在经受它初次的大清洗，这很值得从历史上进行多方面的探讨。

这样的一些焦虑和困惑激发了这些文章，这些文章认为英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暗淡。这样的看法并非出于一种不友好的心态或傲慢的姿态。和其他的社会主义者一样，我感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被目前的危机牵涉在内，虽然我在其中没起什么作用，对争论双方也不抱有什么同情。我相信，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社会主义观念兴衰的晴雨表。新左翼——不管如何去定义它——要对共产党内当前的状况负有一定的责任，对工党内的状况也要负有一定的责任，因而，作为他自己批评的对象，一个人并不会置身事外。

---

① 要了解政治委员会（Political Committee）里为此所发生的分裂——南威尔士矿工领袖汤姆·曼（Tom Mann）和亚瑟·霍纳（Arthur Horner）对领导层的抵制——可参见 Fred Copeman, *op. cit.*, p. 154。关于普通的公交车员工，参见 Branson, pp. 93 - 94, 174 - 176。关于党反对码头工人自作主张的罢工，参见 Pollitt, *op. cit.*。对党反对 1941 年之后的罢工所做的尽管愤愤不平但资料翔实的描述，参见 Sam Boornstein and Al Richardson, *Two Steps Back: Communists and the Wider Labour Movement, 1939 - 1945*, London 1982。

还要说的是，我想，共产党内的分裂也使我本人感到了危险，尤其是在把开除和清洗的幽灵召唤来的时候。这些年来，这个组织似乎已经离我很远了，想不到它内部的变化还会牵动和困扰着我。就个人而言，我感到在自己对共产主义充满热情的童年时代中的一些东西，正在被某些人葬送掉，而这些人对共产主义所追求的以及一直在追求的，却毫无所知。当看到伦敦的那些被开除的老前辈的名单时——其中的一些人在我的童年时代即使没有接触过也听说过——我想，他们与圣潘克拉斯伴随着我成长的那些共产主义者很相似，他们看重礼节和惯例，一点也不为怀疑所困扰，但是却勇敢、无私，并且具有伦敦人那种能够让人轻松起来的机智和幽默。这些人中有：沃尔·哈宁顿，我是在后来才对他有点了解；哈利·洛克尔，建筑工人，也是我们家的常客（他是个糟糕的管子工，喜欢贝多芬和聊天胜过喜欢工作）；威利·罗伯茨，车辆制造工人，杜普尔罢工中的领导人，也是追求我母亲的人之一<sup>①</sup>；克劳德·伯里奇，北伦敦工程师们的领袖，一个暴躁的谈判者，却是个和善的父亲，他是我们支部的成员；他的习惯法意义上的妻子，莫莉，患有哮喘却总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她静不下来，也没有耐心，就跟圣潘克拉斯的另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佩琪·杜芙一样，后者所住的公寓是我放学后的庇护所之一<sup>②</sup>。

这也牵涉到我的智识世界。作为这样一个人，我是由于共产党才对社会主义有所了解的，而且我能成长为一个历史学家也应归因

---

① 这就是为什么我以前的文章《杜普尔罢工是如何胜利的》（*How Duples Won*）（“工人必读，定价6便士”）是由威利作序的原因。我记得，他那时是他的那个小工会，即“全国车辆制造工人协会”（NUVB）的主席。

② 关于佩琪·杜芙，可参阅她的充满魅力的自传《左翼，左翼，左翼》（*Left, Left, Left*, London 1971）。尽管佩琪·杜芙与莫莉住在同一座公寓里面并且还是工党的地方议员，但我只是在脱离了共产党之后才与她见面，这是工党与共产党之间在冷战时期关系紧张的表现，至少在我们住在圣潘克拉斯的后期是如此〔在南威尔士，事情可望好转，那里的不好对付的选民组织总是给运输大楼（指英国工党总部所在地——译者注）找麻烦〕。



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共产党的历史学家群体，我也感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价值被动摇了，而我却不能对此说些什么。总之，我感到被我充满激情地——至少在我早期时候——投身其中的东西排斥在外了。

我的一些好友是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情者，我所敬仰的其他社会主义者也是这样。因此，如果这些文章对他们有失偏颇的话，我希望不要认为是由我的先入之见导致的。在为这些文章的写作做准备工作期间，我得到了乔治·马修和贝蒂·里德的慷慨相助。要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好心没有得到好报的话，我只能表示遗憾，虽然我的确警告过他们，他们可能不太会赞同我所写的东西。我希望，即使是那些感到被冒犯的人们也会承认，我的这些文章至少对党的非官方的历史有所贡献，对共产主义的“来自下面的历史”有所贡献。当所有的官方历史已经出版的时候，这样的历史还可以写下去。我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共产主义者的内心世界方面，并且在此过程中去探讨其精神动力的隐秘来源及其自我理解——包括自我欺骗——的心理学。

### 第三章 形而上的空间

要是如经常所说的那样，政治是弱化的宗教，那么共产主义（至少是我生长于其中的 20 世纪 40 年代英国的共产主义）就类似于圣战骑士团，它用忠于事业的誓约把新加入的信徒与积极的行动结合起来（用我们青年时代歌中的话来说），他们是离经叛道的战士，为了精神上的目标而进行现世的斗争<sup>①</sup>。在一个将为之牺牲年轻的生命的人——与保加利亚的盲从者作斗争的弗兰克·汤普森——的梦想中，它服务于有着“清晰可见的”目的的“亲密的同志关系”这一理念<sup>②</sup>。共产主义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像早期的信仰一样，它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社会拯救方案。为了消除“我们时代中失败主义哲学”<sup>③</sup>所造成的胆怯和怀疑，它热情地作出了保证；为了消除罪恶，它承诺了蒙受上帝恩宠的光辉前景——“战争的终结”<sup>④</sup>、“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所有问题的最终的和永久的解决”<sup>⑤</sup>、“社会和文化无止境的进步”<sup>⑥</sup>。这是一项人们为之献出生命的事业，是“信仰”。

---

① 共产党作为宗教团体这一观念具有“巨大的魅力”，正是它把比特瑞斯·威布（Beatrice Webb）吸引到俄国去。有关这方面的表示同情的详细论述，可参见 Deborah Epstein Nord, *The Apprenticeship of Beatrice Webb*, Amherst, Mass. 1985, pp. 242 - 245.

② *There is a Spirit in Europe, A Memoir of Frank Thompson*, ed. T. J. T. and E. P. T., London 1948, p. 17. Letter of October 1942.

③ *There is a Spirit in Europe, A Memoir of Frank Thompson*, ed. T. J. T. and E. P. T., London 1948, p. 17. Letter of October 1942, p. 20.

④ R. Palme Dutt, *We Fight for Life*, London 1940, p. 11.

⑤ Harry Pollitt, *How to Win the Peace*, London 1944, p. 14.

⑥ Dutt, pp. 12 - 13.

对于它，就像密切关注着被占领欧洲的党的总书记哈利·波利特在1943年全国代表大会上说的那样，“没有什么可以毁掉它、吓住它或者胁迫它”<sup>①</sup>。它使那些落入盖世太保之手的人有勇气藐视折磨他们的人，就像捷克共产党员朱利奥·伏契克（Julius Fucik）那样，他死后出版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散发着爱和希望的气息<sup>②</sup>。在可怕的做样子的公审（show trials）中，它甚至能使那些老共产党员相信，为了更高的善的缘故就得诋毁自己。我书架上的一本旧书中就有这样的例子，它是特雷柯·考斯托夫（Traicho Kostov）最后的申诉——历史学家也许会说它是忏悔，与18世纪英国国教的神职人员常常从他们的囚犯那里获得的东西有相似之处。

在最后的时刻，我才认识到了我在最高法庭面前的行为的错误性。这种行为实质上伤害了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玷污了它的人民民主政府。我对我的这一行为真心实意地感到后悔，这种行为是神经过敏和知识分子病态的自恋造成的；还有，我在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和经济与财政问题委员会主席期间的所作所为以及种种罪行，它们损害了保加利亚的利益，损害了保加利亚与苏联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假如可能的话，我请求你们取消对我的死刑判决，并把它改为终身监禁。我认为最高法庭的判决是绝对正确的，是与保加利亚在它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代理人——铁托以及他那一小撮社会主义的叛徒——对保加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蚀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平稳有序的发展相一致的。我会把我的余生用来服务于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用来补偿国民大会主席团对我的宽宏大量，补偿我对保加利亚人

① *Unity and Victory*, Report to the 16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1943, p. 35.

② Julius Fucik, *Report from the Gallows*, London 1951. 伏契克是地下的《红色权利报》（*Rude Pravo*）编辑。这些刊物是在他被押解到柏林去受审和处决之前在潘克拉克监狱那段时期的产物，它们后来被一位同情的看守偷偷地带了出来。

民所造成的损失。

索菲亚，1949年12月14日

恭敬的

特雷柯·考斯托夫<sup>①</sup>

自然，苏联就是我们的希望之地，是“社会主义的活生生的体现”<sup>②</sup>。无论是在技艺高超的建设中，还是在英勇的反抗中，那里的人都已经成了巨人——在我童年的想象中，德涅伯派特罗夫斯克（Dnieperpetrovsk）的水电大坝是世界上的奇迹之一。它摆脱了地主和资本家；它废除了国王和王后。如同我们所相信的，它是这样一个地方，那里没有种族歧视——《等待左翼》中说，它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在那里，反犹主义是一种反国家的罪行”<sup>③</sup>。它解放了被统治的人民，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赶走了他们的剥削者 [普道夫金（Pudovkin）的《亚洲风暴》，用电影特有的随意性，把镜头从横扫草原的农民骑兵军切换到了这群人自身的愤怒]。它通过使其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而让囚犯和少年犯获得了自由 [马卡伦科（Makarenko）的《生活之路》是一份常常提到的苏维埃文本，它从三个层面描述了一个共产主义教育者的工作]。在党的集会上，我们

① Tenyu Stoyanov and Iliya Kyulovsky, eds., *The Trial of Traicho Kostov and His Group*, Sofia 1949, pp. 623 - 624. 根据这本书所提供的名单，在庭审现场的外国记者有：《泰晤士报》的维尔弗雷德、《人道报》的皮埃尔·哈维和《新民主报》的多米尼克·德桑蒂。曾经在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战斗过的考斯托夫，有勇气在法庭上声明他所供认的罪行无效。他的请求没有能够挽救他的生命。在写了这封信两天之后，国民大会的主席团驳回了他的请求；同一天，他被处决。[特雷柯·考斯托夫（Traicho Kostov, 1897 ~ 1949年），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曾担任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保加利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译者注]

② Archibald Robertson, letter in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20 December 1939, quoted in Bill Jones, *The Russia Complex*, Manchester 1977, p. 39.

③ Clifford Odets, "Waiting for Lefty", stage notes, reproduced in Raphael Samuel, ed., *Theatres of the Left*, London 1985, p. 352.

为苏联大唱赞歌：祖国，“对于每一个辛勤劳作的人来说如此可亲……那儿的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行走在大地上”。在散发宣传材料的时候，我们会把《苏维埃战争新闻》和《今日俄罗斯》夹在大量本地的小册子中。查瑞克洛斯路上的“塔特勒”电影院是专门用来在我们的战时集会上放映苏维埃影片的。我们看了大量的俄国影片，《列宁在十月》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部。在留声机里，我们播放的是俄国歌曲。我仍然记得的（我能说的唯一几句俄国话）一首是《拖拉机之歌》<sup>①</sup>。另一首是1943年贝尔萨兹公园的共产主义者都喜欢的一个曲子《瓦卢申卡的忧伤》，它令人想到俄罗斯人除了勇敢之外也是有人情味的<sup>②</sup>：

你可曾听说过瓦卢申卡的忧伤？  
这个故事说起来很不合情理。  
瓦卢申卡闷闷不乐，  
是因为可怜的伊万偷走了她的心。  
他为什么不告诉她，  
他为什么不告诉她，  
他多么爱她？  
他多么爱她？

我童年时代的共产主义是普遍主义的。尽管我们不再鼓吹世界革命，但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是普遍的进程；并且尽管各个民族仍旧可以保持自己的特性（我们对此是半信半疑），我们认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内容上却到处都是“一致的”<sup>③</sup>。共产主义就像

---

① 这是“主题”（Topic）早期出品的一张唱片，它后来继续录制了一些本土化的劳工歌曲，并且成为第二次民歌复兴的先驱之一。

② 这是“哥伦比亚”公司出品的唱片。另有一首节奏很棒的俄罗斯农民歌曲《卡林卡》。

③ John Gollan, *People's Democracy for Britain*, CPGB 1952, p. 9.

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一样，是唯一的、不可分的、有着共同信仰的国际联合体。在一位共产主义小说家的朝气蓬勃的幻想中，它意味着“大家一同劳动，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着共同的目标”；而用一首共产主义歌曲中的话来说，它意味着一种“伟大的憧憬”，把我们联合在一起<sup>①</sup>。国际主义不是一种选择而是我们的政治存在的必然性，是荣誉与价值的试金石。它主导着党在工会和劳工运动中的工作，在那里，“东—西”贸易作为无数决议的主题成了我们用来解决英国经济困境的特效药，而为争取“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后来，当冷战来临的时候，就是反对重整军备）所进行的斗争则成了左翼的集结点。共产主义是世界观，否则它就什么也不是。它实际上的榜样是苏联，可是作为国际性的休戚与共的整体，它遍及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尼日利亚埃奴古（Enugu）被英国军队枪杀的矿工、我们所支持的马来半岛的抵抗组织战士，还有新中国——在那里，就像在“紫石英”（Amethyst）号事件<sup>②</sup>时期或者后来的朝鲜战争时期一样，他们受到了外国干涉的威胁（对我们来说，“紫石英”是一艘帝国主义炮舰；而对于这个国家中其余的人来说，这艘船的船员们是国家的英雄）。

## 一 不公正与帝国

国际性也决定了我们关于社会不公正的观念。在法西斯主义于1945年垮台之后，“肤色障碍”（colour bar）就成了野蛮的最主要的例证，并且，就我们而言，也标志着美国是谋杀自己兄弟的社会。与此相似，我们也把殖民主义视为一种暴行。我最初的政治记忆之一，就是在我7岁的时候母亲告诉我，在1942~1943年孟加拉发生大饥荒

<sup>①</sup> John Sommerfield, *May Day*, p. 84.

<sup>②</sup> “紫石英”号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一艘护卫舰。在1949年解放战争渡江战役期间，它无视警告擅自闯入长江下游前线地区，从而引发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冲突。——译者注

期间，印度人在大街上奄奄一息，而欧洲人在他们的饭店里却吃着有七道菜的大餐。我还记得早期读过的克里夫·布兰森写的《在印度的英国大兵》，那是一位共产主义艺术家的书信，在他死后于1944年出版，它也证实了殖民主义对其他民族的蹂躏。后来，在我求学期间，我发现我的招募工作的议题常常是英帝国中儿童的生活状况——一本催人泪下的小册子的主题——以及南罗德西亚铜矿公司的利润、肯尼亚和塞浦路斯的镇压、英国对圭亚那的干涉<sup>①</sup>。在战后的繁荣与沉默当中，是这个帝国而不是英国本身成了典型，体现了“两大阵营”的政治、对富人与穷人（haves and have-nots）的区分，以及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在斗争中，它还是灵感的源泉。哈利·波利特在1954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说：“帝国主义者在非洲、马来半岛、西印度群岛所做的一切绝不会使争取民族解放的……强大运动垮掉。炸弹、恐怖行动、饥饿、集中营以及……谋杀，都不能使殖民地的兄弟姐妹们屈服。他们以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不屈的精神在反抗着。他们最终一定会胜利，会从英帝国主义的奴役之下赢得他们的解放。”<sup>②</sup>

马克思主义，或者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强化了这种普遍感。它沉溺于绝对与总体、基本原则与终结目的、共相与有机的整体。它宣称有权裁决经验的每一个维度以及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作为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具有统一的本质：它是一种生产方式，其矛盾一触即发；它是一种“制度”，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去推翻它。作为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无所不包的决定论，所有个别的事件都包含有必然性，而原因会不可改变地产生相应的结果。作为一种说理的方式，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先验的理解和法则，即那些能够指引行动、预见未来的规律。作为人生哲学，它使自我从属于一种更高的事业——用共青团的团员

---

① Steven Lukes and Raphael Samuel, eds., *Peter Sedgwick Memorial Volume* (forthcoming).

② Harry Pollitt, *The Challenge to Labour*, Report to 23rd Congress, CPGB, April 1954.

证上的话说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业”、“人类的解放”<sup>①</sup>。一旦用“指引我们前进的、绝对可靠的向导”<sup>②</sup>——马克思主义——来武装自己，用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来武装自己<sup>③</sup>，共产党员就成为唯一合适的导师和引路人。他们带着那个时代所推崇的自负宣称自己是解放进程中“自觉的推动力量”，是历史的“自觉的创造者”，是整个社会斗争的“自觉的领导者”。

## 二 道德上的乐观主义

这个时代的共产主义者在道德上是乐观主义的。他们乐此不疲地表明自己对于群众的信心，即使在他们的理由显然站不住脚的时候也是如此。经验本身就是伟大的导师，引导着人民不知不觉地走向进步。阶级斗争的教育意义在于培养了共产主义者团结一致、遵守纪律和无私这些无产阶级的品质。激烈的斗争对于那些参与其中的人来说，预示着更为重大的战役即将到来。换句话说，共产主义者赞成一种关于进步的形而上学。像其他的社会主义者一样，我们相信知识在变革中的力量，相信科学在人类解放中的潜力。像其他的社会主义者一样，我们也相信环境塑造了人，而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将会诞生一种完全不同的人——“新人”<sup>④</sup>（或者像在苏维埃的宣传中说的“社会主义的人”）。他们将免于竞争和忌妒，将会从自私和贪婪中解放出来。共产主义者显露出对于自身的自信，用不懈的努力来证明信仰的力量。即使是在最困难的处境中也能找到希望的迹象，这是这个时代共产主义想象力的显著特征。在别人是“消极的”和“失败主义的”地方，共产主义者按照他们的理想化的自我

① 这一段我想是引自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② Harry Pollitt, *How to Win the Peace*, CPGB 1944, p. 85.

③ N. S. Khrushchev, *Report to the 19th Congress of the CPSU*, Moscow 1952, p. 8.

④ Marian Ramelson, “Education in the Basic Party Units”, *World News and Views*, 19 March 1949, p. 143.



理解，是希望的使者。依照威廉·加拉戈尔（William Gallagher）在1949年的企鹅特刊《拥护共产主义的理由》（*The Case for Communism*）中的说法，这种“积极的”态度恰好为党所发出的倡议打好了基础：“对于我们周围的世界是否能够有一种理性的解释？我们是否能够控制经济和政治的变化？我们是否能够不再成为环境的牺牲品，而是像诗中所说的那样成为‘我们命运的主人’？对于这里的每一个问题，共产主义者都能够回答说‘是！’正是由于这一点，共产主义与悲观绝望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与那些政治说教者也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那些人告诉我们说，在我们当今的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是……个别的政客在经济和社会规律之外行动的产物。共产主义是希望的哲学，是对于人的信仰的哲学。我们确信人类有能力掌握它的命运。我们相信人类正在走出黑暗、进入到这样一种状态，其中没有战争、贫穷和不幸，这些东西只会成为历史教科书中讨论的内容。正是这一点给予共产主义运动以力量。”<sup>①</sup>

不管他们的看法在今天看来具有怎样的时序错误，那个时期的共产主义者认为他们自己是“现代人”（《现代季刊》，是《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前身）。他们与被称为“进步人士”的广大的拥护者结成了同盟，党员成为这一同盟中的先锋队。共产主义者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相信自己是与时代同步的，或者是走在时代的前头。他们引以为豪的是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把握住“新的”和“发展中的”的东西——“新文风”、东欧的“新民主国家”、工人阶级中永远能够被预知的“新氛围”。共产主义是“世界的青春”<sup>②</sup>。它是“新兴阶级”（在20世纪20年代它被称为“大有前途的阶级”）的历史表达；它是“新兴力量”<sup>③</sup>——“未来所有进步力量”<sup>④</sup>——的代表。有趣的是，至少是在战后初期，共产主义者对

① William Gallagher, *The Case for Communism*, Harmondsworth 1949, pp. 7-8.

② *Labour Monthly*, August 1954, p. 378.

③ Joe O'Farrell, *7th Congress, Hants and Dorset C. P.*, p. 14.

④ R. P. Dutt, *We Fight for Life*, CPGB 1940, p. 11.

大众社会 (mass society) 这一观念感到很适意。他们为巨大的工厂的威力而欢欣鼓舞, 把它们视为未来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堡垒。他们很早就热心支持教育中的综合原则、医疗中的康复中心、学校和民用建筑中的“体系建筑”<sup>①</sup>、城镇规划中的改造和按照其用途将之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即使仅仅因为苏联这个例子, 共产主义者也确实比其他的任何政治组织都更加符合“计划”这一观念, 并且在他们对此的倡导中也更为虔诚。类似的语言还被用来表达有关信仰的断言。乔治·汤姆森告诉《挑战》的年轻读者说, 共产主义“并不只是无聊的梦想或者良好的愿望, 它是有科学根据的、确定不移的事情”<sup>②</sup>。法灵顿教授则在1946年告诉听众说, 共产主义是由历史选定的“推动”力量<sup>③</sup>。

作为主张斗争的理论, 共产主义依赖于对救赎的承诺。社会主义有着崇高的本质, 它意味着道德的完善, 它有着超越性的对象和目标。它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最高形式、道德的顶峰<sup>④</sup>、进步的圆满完成、对于人类之伟大的发现。它是进化过程中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 或者在马克思的具有启示性的洞见中, 是史前时代的结束和“真正的历史”的开端。我们把它设想为与现存社会秩序相反的东西。它将消除异化并且使世界恢复它原有的统一 (oneness); 它会释放出科学的潜力并带来经济的繁荣; 它将消除城乡之间的“对立”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异; 它将消灭阶级并使性别平等; 它将消除民族的界线和战争的威胁, 尤其是国家将会消亡。简而言之, 它与基督教中的末世论相类似, 并在其对永久和平的充满信心的假想中与基督教中有关来世生活的预言相类似。

① 体系建筑 (systems-building), 指采用标准化预制构件的建筑。——译者注

② George Thomson, “A Change of Heart”, *Challenge*, 5 January 1949. 乔治·汤姆森教授是位古典学者, 有几年他成了党的中央委员会里做样子的知识分子。

③ B. Farringt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History?” in *The Communist Answer to the Challenge of Our Time*, London 1947, p. 57.

④ B. Farringt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History?” in *The Communist Answer to the Challenge of Our Time*, London 1947, p. 47.

这样，共产主义除了拥有一种政治的空间外，还占据了一种形而上的空间。在某一层面上，它是救世的召唤；在另一层面上它是德性的化身；再者，它还是隐秘神灵的世俗表现。马克思主义使它拥有凡夫俗子所没有的接近真理的特权，从而把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可以触摸得到的与不可言状的、当下的与终结的结合起来。超越于感觉之上的力量在支持着它，推动和激励着集体意志的行动。以“历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天命”或者“现实”在庇护着我们，这是一种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无形的力量。科学也是进步的推动力量，它不断地消除迷信，为实现平等创造出前提条件。辩证法也可以在进步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它所带来的是积极的后果而不是否定和对立。“斗争”本身可以被想象为圣餐，个人可以借此神秘地融入基督的实体之中——所以我们有时也称之为“The Struggle”。作为一种形而上学，它把当下的任务理解为历史使命，并使组织活动中平凡的细节沐浴在卓越的光辉中。它使个人的整个生活束缚于信仰所许可的范围之内。虽然它在表面上是面向未来的，但它把希望完全寄托于此时此地的行动所具有的变革的威力上。我们不像社会民主党人那样是福利与改革的能手（尽管它们也在我们努力的范围之内），在 J. V. 斯大林的令人意气昂扬的幻想中，我们渴望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按照一种与新教比较一致的说法——正如我在别处一直努力说明的那样，英国共产主义有一种强烈的，但还没有得到充分认可的新教的成分<sup>①</sup>。这个党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一个“集中的”宗教团体，一个与他人分开的群落，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又不属于这个世界。像其他自封的引领社会进步的先驱者一样——20 世纪 40 年代的英国到处都是这种人，我们的举止就像是上帝的选民（an elect），像是道德上的卓越之士和由真正的信仰者组成的教堂会众。我们向那些哈利·波利特习惯于用他童年时代小教堂里的话称之为“性

---

① Raphael Samuel,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New Left Review* 120, March-April 1980.

格严肃的工人们”发出倡议。入党是一种事关重大的体验，就像许多的回忆录所证实的那样，其在情感上的强烈程度，可与决定皈依基督相比。用通行的话说，它也暗示着新加入者是那些已经“皈依宗教”的人。同样，专职的组织者——他们之所以居于那样的职位，靠的不是选举而是对历史意义的领会——是在恪守天职或者响应对他们的召唤。

### 三 战斗的宗教团体

我们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宗教团体，而不是消极避世者的宗派。我们为群众性的行动而自豪；从那些追随者身上，我们检验了自己的力量并认识到自己的“领导”作用，这些追随者或者是支持党的主张或者是参与了党所发起的运动。像19世纪的传教士之城一样，我们也永远在留意寻找精神上无家可归的人，寻找那些乐意听取严肃的意见或者留心听取告诫的人。像富有生气的宗教中的践行者一样，我们也建立起个人的通道，像共产主义诗人兰道尔·斯威格勒说的，“把真正的福音置于隐秘之所”<sup>①</sup>。像从前的救世军一样，我们在野外用血与火的语言传布我们的启示。到贫民窟去——就我而言，就是从议会山空气清新的高处降临到肯特城的地下室——明显类似于（如我现在所明白的）“救济工作”；而那种渐渐地不流行的做法，“显示党的身份”，则类似于为上帝代言。威廉·加拉戈尔在1949年为了使他的苏格兰同志不要忘记早期的先驱者，引用了科林斯人的一段原话：“不是保罗所得的表决，而是鞭笞和投石以及其他各种严厉的惩罚。”<sup>②</sup>

党的大会总是在要求人们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要是重要的讲话不是以冗长的报告而是以耶稣显灵（epiphany）、神恩的涌现来结尾，这一点也不奇怪。哈利·波利特是爱德华七世时代的社会主义

① Randall Swingler, *Years of Anger*, London n. d., p. 19.

② William Gallagher, *Mr Brogan Opens Wide His Mouth*, Glasgow 1949, pp. 3-4.

者，20世纪初他在曼彻斯特度过了他的政治学徒期，并在卫理公会的小教堂里获得了修辞学方面的训练。他总是会求助于“社会主义之光”，以非常典型的菲利普·斯诺顿的方式，用“赞美耶稣”来结束他的演讲<sup>①</sup>。威廉·加拉戈尔是个英雄，因为他是下院中唯一（如我们所相信的）大声反对慕尼黑协定的人，但他是个讨厌的演讲者，他那明显的苏格兰口音使我们听不懂他的话，他喜欢用雪莱的诗句来结束自己的演说（《英国人》是这个党最喜欢引用的诗句之一）<sup>②</sup>。当然，威廉·莫里斯也常常被引用，就如E. P. 汤普森在他1955年的书中试图证明的那样，他被认为是英国共产主义自己的诗人<sup>③</sup>。在《国际歌》之后，人们热情传唱的歌曲中没有一首比得上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的社会主义老歌《起来，英国！》。通常由法国的演讲者（我记得最清楚的有马塞尔·卡香和雅各·杜克洛<sup>④</sup>）发表的充满兄弟情谊的讲话，令我们为兄弟党的力量——“抵抗运动的脊梁”——感到欢欣鼓舞。募集资金是会议议程中一个冗长的部分，这项工作是由伊萨贝尔·布朗（Isabel Brown）做的，带有她为之付出了一切的“援助西班牙运动”中的那股劲头。当允许保罗·罗伯森（Paul Robeson）参与这些事件时（大约在1950年，美国政府收回了他的护照），这些事情变得更加光彩。他受到犹太人的特别爱戴（他早期的政治活动之一就是1934

---

① 较早对这种使用了同一修辞格的演讲的描述，参见 John Mahon, *Harry Pollitt, A Biography*, London 1976, pp. 8, 94；对他的演说学徒期的描述，参见 Pollitt, *Serving My Time*, London 1940。

② 加拉戈尔把“像狮子一样奋起”（Rise Like Lions）用来作为他的第二部自传的标题。

③ E. P. Thompson, William Morris, *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 London 1955. 相比原来的版本而言，以简装本的形式于1975年出版的修订版更为人所知。它删去了论述波利特像莫里斯一样的“了不起的洞察力”那一段内容。汤普森的书是本极好的书，可它也许不像后来所认为的那样是非正统的。

④ 马塞尔·卡香（Maecel Cachin, 1869 ~ 1958年），法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雅各·杜克洛（Jacques Duclos, 1896 ~ 1975年），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译者注

年维护了德国难民的利益)，并且除了黑人的灵歌之外，他有时还会用意第绪语演唱，尤其是演唱《华沙犹太人区之歌》：

Es brent, bredele, as brent  
 In unserer stetl, bredele, es brent.  
 (它在燃烧，兄弟啊，在燃烧，  
 我们的小镇在燃烧。)

像具有战斗的宗教团体一样，我们生活在对伟大“觉醒”（一个被频频使用的字眼）的热切期盼中，希望“有一天”沉睡的大众能够站起来。像战斗的宗教团体一样，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在从事持久的斗争。带有军事意味的隐喻反复地出现。党的观点是“总路线”（在英国共产党的语言里，它被简称为“路线”）。劳资冲突方面的工作被委派给“工资阵线”（wages front）；不管其结局如何，这些隐喻预示和展现了阶级间的斗争。像党的历史学家所做的那样，参与学术争论就是进行“思想斗争”——我们从19世纪的自由思想中继承了这种说法。贯彻党的路线——比如说，在分工会中作出政策方面的决议——就是进行“战斗领导”。

号召人们作出牺牲也是党的中心工作。专职的组织者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这项运动，他们只能依靠微薄的津贴为生（我想，在1945年的时候每周不超过5英镑）。肺结核被视为职业性的危险不是没有道理的：在用做党的办公室的狭小房间里，到处摆放着复印机，要想不得这种病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在时间、舒适方面，还是在金钱方面，是否愿意作出牺牲，也似乎成了对奉献精神的考验，然而这种精神在这个党中从上到下都比较低落：在这个党近阶段的一些替代性组织中，仍然不断地要求其成员应当是“积极的”<sup>①</sup>。在哈

① “我们为什么总是以为，除非在我们所进行的每一项党的活动中都作出点牺牲，否则我们就不是好党员？”爱德华·厄普沃的《败坏的基础》（*The Rotten Elements*）中的艾伦问道。埃尔西回答说：“我觉得我们基本上已（转下页注）”

利·波利特对党员修养的呼吁中有一种明显的受虐狂般的严格要求：工作中要“不知疲倦”、“自我牺牲”，要有“献身”精神，在反法西斯主义抵抗运动中要发扬“崇高的英雄主义”。《如何去赢得和平》这部大作，波利特在1945年的主要奉献，就是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社会主义……给人以信心和勇气。它使男人和妇女能够变得勇敢、坚韧……它使得汉堡的码头工人奥古斯都·路特根（August Lutgens）要求纳粹的刽子手，在他把自己的头放到垫头砧上之前，把他的双手松开。松开之后，他就用他有力的拳头猛击刽子手的下巴。社会主义还使得苏维埃姑娘塔尼亚（Tanya）在纳粹的绞索在她的脖子上收紧的时候，仍然有勇气和力量高喊：‘妈妈，不要哭泣，能够为人民而死是莫大的幸福。’……社会主义给予矿区、工程业与船厂的市镇、纺织厂以及农村地区无数的无名英雄，不论男女，以勇气和远见，使他们在困境中还能够组织起来去进行战斗、鼓动和教育。尽管这一切在他们而言就像是黑夜一般，他们总是在想象着黎明。尽管有牺牲、监禁、放逐、饿死，看着他们的孩子憔悴消瘦而他们的妻子饥饿虚弱……但他们仍能忠贞不渝，绝不灰心。在以前，这样的人还很少，而现在，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我们才有了上百万这样的人。”<sup>①</sup>

## 四 冷战

当冷战来临时，在社会中受到诋毁的英国共产主义者从法国的榜样中汲取了勇气，那里的矿工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正在反抗

---

（接上页注①）经认识到牺牲本身就是值得称赞的，不管形势是否需要作出牺牲。那是……一种宗教冲动，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描述是在比较安逸的20世纪60年代对既往的一种回顾，并且缺少第一手的证明材料所具有的力度，但这段话和这本书中的其他段落一样，对于研究英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学家来说，应该是非常有趣的。

① Pollitt, *How to Win the Peace*, pp. 95 - 96.

着武装警察。亨利·马丁 (Henri Martin)，这个因为拒绝到越南作战而入狱的法国水手，对我们来说就跟我们的先辈对汤姆·莫尼、萨科和凡佐蒂一样熟悉。托尼·安巴提娄 (Tony Ambatielos) 也是这样。这个希腊海员的领袖曾经把纳粹的旗帜从帕台农神庙拔了下来，可他现在却由于英国施加的影响而被判处死刑，躺在雅典的监狱里。国内的情况也增加了对迫害的预感。在这样一个党内，它的头十五年几乎一直处于秘密状态并且在冷战时期地位卑微，它经常提到牺牲这个词以及预料之中的迫害，绝不全然是庸人自扰，尽管现在看来牺牲或者上黑名单的证据显然是不充分的（产业工人遇到的危险似乎要远远高于一般的从业人员）<sup>①</sup>。

号召人们作出牺牲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普遍现象。刘少奇写到，共产党员“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牺牲个人的利益，甚至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证明”<sup>②</sup>。也许，从许多不同版本的有关服务的道德观念中获取无形的动力，在英国对共产党有着特别的吸引力。这种有关服务的道德观念，世俗化的利他主义，从19世纪80年代直到最近，一直都在公共领域中占据支配地位。无论如何，一个饶有兴趣的事实是，共产党的党员人数达到历史最高，不是在红军击退纳粹入侵者的1943~1944年，也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抵抗组织在法国和意大利刚刚产生影响力的1944~1945年，而是在1942年那个黑暗的日子里，那时俄国人正在斯大林格勒浴血奋战，就像英国人在敦刻尔克一样。

牧师般的职责是党的灵魂中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这一点几乎没有得到承认。共产主义被视为为别人谋取利益。在“位高则任重”这个习语中，以及工会运动中表示非正式的道德规范的那些习语中，共产主义意味着强者要去帮助弱者，弱者即国内的不公

① 关于这样的呼吁在早期那些易受影响的新党员身上所起到的作用，参见伊万在刘易斯·格拉西奇·吉彭的《灰白的花岗岩》(Grey Granite) 中的独白。

②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延安马列学院的讲演》，人民出版社，1951，第53~54页。



正的牺牲品和国外的被压迫民族。而且，无论是在支部内部还是外部，这常常意味着一种亲身参与的社会工作。从某些零星的但是意味深长的迹象来看，对于劳工阶级的同志来说，共产主义所承诺的有时就是对先辈所受的侮辱和劳苦的补偿，是具有追溯效力的正义法案，这一法案主张的是那些没有能力或者是以他们的名义从事这一斗争的人们的利益<sup>①</sup>。

地方上支部的活动常常带有慈善活动的特点，就是在自愿工作（the Voluntary work）中更为常见的那种。在《金色的笔记本》一书中，多丽斯·莱辛（Doris Lessing）在对她的支部中的某些成员作了简短的描述之后写道：“共产党主要不是由关心政治的人组成的，而是由那些具有强烈的服务意识的人组成的。”<sup>②</sup> 这样的看法也许更适合女党员而不是男党员，不过，像这样的区别在我所在的圣潘克拉斯支部确实是存在的。男人们在那里主要从事“全国性的工作”或者在工厂支部里工作，而登门探望（district visiting）这样的工作则主要是妇女的任务——这是一种与“头脑的宗教”相反的“心灵的宗教”。

因而，共产主义不仅仅是政治实践，也是道德使命。虽然也关注生计问题，但令我们耿耿于怀的显然是超凡脱俗的东西。不管其结果如何，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善。“斗争”，不论其具体的对象是什么，都可以使人变得高尚。成为党员本身就是自我超越的行为。像英国左翼中的其他人一样，我们不信任官迷，看不起我们用工党的唯心主义语言称之为“权力政治”的那种东西。我们鄙视选举活动中种种粗俗的行为。要是我们参加竞选，这与其是为了赢得选票，倒不如说是在进行原则性的“斗争”。在宣传鼓动中，我们也是更在意纯洁（pure）——用共产党的话说就是“正确”，而不仅是政治上

① 威尔士党组织在1943年地区代表大会上起草的一份决议开头是：“作为劳动人民的儿女，我们……”

② Doris Lessing, *The Golden Notebook*, London 1977, p. 177.

的说服力。“成千上万的购物者”看到了（因为《工人日报》一直在通知读者）我们所组织的“标语牌游行”（poster-parades），这个游行更多的是为了证明，而不是为了自我推销。我们的游行示威活动尽管是为了“动员群众”，但事后看来，也可以视为一些仪式，借此可以使人消除疑虑恢复信心。

共产党的抱负及其成员的自我理解，无疑具有神权政治的特征。在组织上，我们把自己想象为由神的选民（the elect）组成的宗教团体，为了一项神圣的事业而订立了誓约。在政治上，我们热切期望成为导师和引路人。作为一个有形的宗教团体，我们从缔造者那里追溯自己的渊源，把他们的言论作为我们的方针政策的依据，并为我们所诅咒的对象贴上教父的（patristic）标签。权威在党内也具有神权政治的特征。它是具有制度化外观的克里斯玛（charisma），它在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发挥着作用。传达报告的时候就像是传达教皇通谕般庄严隆重，学习报告的时候又像是在研读圣经那般仔细小心。党的领导们就像神职人员，他们主持大会和仪式，权威性地结束讨论。干部们的举止就像“进行政治领导”的知识分子（clerisy）；支部书记是牧区中的牧师或长老。虔诚而有学问的理论家们要优先于积极参加共产主义活动的人；专职的官员要优先于从事群众工作的同志。R. P. 杜德的“每月评论”，把来自灵感的评论和带有教条般严谨的巴洛克式的散文结合在一起，他是我们最重要的撰稿人，也是我们最重要的神学家。

## 第四章 家族共产主义

我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信仰者长大的。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在阿斯普利戈埃斯的村政厅由我母亲安排放映的《孤帆》（*Lone White Sail*）。这是个关于1905年革命的感人故事：两个小孩把一个逃亡中的革命者藏起来，然后又帮助他逃走。最后的镜头是孩子们在码头上挥手道别，那个鼓动家向远处划去，肩上的大衣就像雷电一样迎风飘扬。

地图是信仰基督教的孩子们从中学习神圣的地理学方面知识的媒介，我有一本《苏维埃俄国地图册》。我记得，那本带有锤子镰刀浅浮雕的橙色封面的书是在我8岁生日那天得到的。我很快就能够炫耀我对于俄国城镇知识的威力了。后来，我用这些军事地图发明了一种包围德国军队的游戏，这种游戏让我着迷过一段时间。我用黑色的长箭头插到像罗斯托夫这样的地方，又用白色的箭头表示敌方的反攻。黑色的线条变得越来越宽，涂的黑色也越来越深。尽管我另外又发起了一些钳形攻势，但是那些不连续的线条还是逐渐被涂去了，直到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攻击群。偶尔我也允许敌方发起反攻，但还是厚厚的黑色线条占据着优势——恐怕，这就是我早期对全能（omnipotence）的幻想。

在幼年时期，我先后迷恋过票据收藏、园艺、足球和跑步。战争是我早期关注的焦点。学校的评价报告（6岁时）中有一条表示担心的评语，记录了我对“正义和公平”的执迷。每天的6点半，在通知我们进行冷水浴和绕着小围场跑步的铃声响起之前，我都会骑车到门房那取来为职工订阅的《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贪

婪地读着来自俄国前线的消息。在1942年1月，我开始对俄国前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那时，红军收复了塔甘罗格（Taganrog）。这是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都遭受围困的那个严冬的少有的一条好消息。俄国人的“焦土”政策，使得纳粹前进的道路上只剩下荒芜的农场、田地和庄稼，这好像紧紧抓住了我作为一个孩子的想象力；在工厂中所发生的类似的事情，如斯大林格勒的逐街逐街的保卫战，也同样令我震惊。

作为寄宿学校中一个孤单的男孩，苏维埃战争的新闻成了一根无形的纽带，把我和我的家庭连接起来了。放假的时候，在贝尔萨兹公园，我可以收听英国广播公司所有的公告，要是发生空袭的话甚至还收听11点钟的新闻。我的姨父契蒙（Chimen）是个俄国人，他总是给我解释这些新闻的意思。在学校里，我听不到什么新闻。年龄大些的孩子允许和女舍监一起在夜里收听ITMA<sup>①</sup>，还有9点的新闻，而我为了听这些新闻就得把耳朵贴在宿舍的墙上。当从俄国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糟的时候，我也会感觉不妙。学校里有个有钱的男孩叫做麦克斯维尔（我知道他有钱是因为他有一便士的黑邮票和两便士的蓝邮票，这种邮票我只是在斯坦利吉彭的橱窗里看到过），他发现了我在凌晨时的这个习惯并用它来折磨我：当基辅被攻陷的时候，他把一份不知怎么弄进学校的晚报撕得粉碎，我只好把那个令人不快的新闻拼凑起来。

我是一个较早成熟起来的，尽管恐怕不是非常成功的宣传家。我努力使我班上的同学信仰无神论和共和主义，因为我相信这些观念是共产主义的基础。我由一个大一些的孩子，——他叫克里斯托夫·维布，他的父母是党的同情者——陪着挨个问：“你相信国王吗？”“你相信上帝吗？”我用从妈妈那里学来的哲学道理，试图消除早晨训话中的那个教师所施加的反动影响。他是“有机”农业的

---

① 《又是他》（*It's That Man Again*），这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英国广播公司最流行的系列剧。——译者注

盲目追随者，认为“唯物主义”（我知道那是我们支持的东西）正在毁掉英国的农业。宣传工作受阻以后，我从书本中找到了安慰。别的孩子看的是《杜立德医生和说假话的人》，我则关起门来读《敌后》（讲述的是俄国那些已经成为焦土的地方以及儿童游击队员的故事），还有《铁木尔》（*Timur*），它讲的是一个年轻的苏联共青团员。在这套书中的第二集《铁木尔的誓言》（*Timur's Vow*）中，男主人公应征参加了红军，并与他的恋人依依惜别：穿着破旧裙子的女孩、正在向前线开拔的年轻的铁木尔——这样的场景总是令我心动。后来，我就开始读本土的说教性故事，像《为宪章而奋斗的同志们》（它讲的是一个参加了1839年纽波特起义的小男孩的故事），还有《反抗男爵的好汉们》（根据罗宾汉的故事改编而成，它里面的主要敌人是修道士和修女，至少对我的反天主教的想象力来说是这样）。

周末是我的天堂，那时我就可以到斯劳（Slough）跟我母亲在一起了。她是那儿商业区的麦尔克姆飞机制造厂的工程师。我特别喜欢那个地方。当我母亲作为工作进度检查员在厂区里奔忙的时候，我会和她的朋友们一起待在办公室里，在炉条上烤面包和人造黄油。办公室是个忙碌的地方，再加上我母亲承担着工会发言人和党的工作就更是这样了。周末就这样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活动中过去了；这一周的想法，特别是我所碰到的事情，就会纷纷地冒出来（当我了解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的时候尤其如此）：要贴到路灯柱上去的标语（“开辟第二战场的时候到了”）；还有和我母亲一起去收党费的同志；书架上看到的书，它们的名字很奇怪，像《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制革工人巷子中的革命》。

不时会有大的集会（当我骑在别人肩头上参加一个大的集会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托洛茨基”这个令人害怕的词，我想它跟当地要举行罢工的传言有关）。星期天，我们会到伦敦去看苏维埃电影，或者参加示威游行（我记得我的第一次“五·一”游行是在

1942年，可也许不太准确），或者跟同志们在彭汉姆毕奇（Burnham Beeches）或在温莎（Windsor）的河上举行野餐派对。假日是这样度过的：在贝尔萨兹公园的叔叔和姨妈那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家中（我的姨妈是那儿的支部书记）、在共产主义收获营（harvest camp）（莱斯特郡的一些党员为战争所作出的富有想象力的努力的产物）、在湖区跟着工人旅游协会一起爬山（对于一个喜欢幻想的孩子来说，那个假期中的一件出乎意料的令人高兴的事情是看到了一本哈利·波利特的《怎样赢得和平》，在另一个同样的假期里，这样的事则是在伦敦地铁里吹口哨，吹的是《国际歌》，就是想看看是否会受到斥责）。

在那段日子里，《列宁相册》就是我的圣经，它制作精美，里面有精确的复制品、相片和绘画。我被告知在这个国家中此书一共只有五本，我的姨父很荣幸地拥有其中的一本。它使我了解到什么是地下工作和迫害、革命和反革命、设置路障和罢工。我想，正是从这里我对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患难与共的婚姻有了初步的认识。有一幅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被流放在西伯利亚的画，房子里唯一的家具就是他们两个人读的书，列宁坐在桌子那儿，克鲁普斯卡娅在窗边。另外一幅感人的绘画，画的是个非法的学习小组，列宁是教师，工人们脸庞被油灯所发出的光照亮了。列宁住过的牢房、沙皇的秘密警察机构（Okhrana）拥有的有关他的档案、他在1917年藏身的地方（农民的一个棚屋），这些相片使我对逃亡生活有了深刻的印象。当我看到那些描绘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受到资本主义的围攻——1919~1920年白卫军和干涉军的进攻——而几乎在一生下来就被扼杀的彩色地图的时候，尤其感到震惊<sup>①</sup>。丘

---

① 过了40年再看这本相册，我发现尽管它里面的确有大量精致的复制品，实质上却是个制造神话的可耻的（shameful）东西。除了那些从清洗中幸存下来的以外，它把所有那些老布尔什维克都去掉了。有趣的是，正是这些带有列宾（Repin）传统中的革命浪漫主义风格的图片使他们深深地印在我这个小孩的脑海里。

吉尔对我来说是敌人——对英国矿工来说也是敌人，这并不是因为托尼潘迪（Tonypandy）事件（在做内政大臣的时候他出动了部队）或者总罢工（那时他为了制止罢工而组织了政府护送队伍），而是因为他在1920年把英国军队派往摩尔曼斯克。[“可是我们反对他”，我记得当我骑在肩上从白厅（Whitehall）过来的时候向我妈抗议道。那时庆祝欧洲胜利日的人群正在高唱“我们要胜利”。]

由于拒绝回到寄宿学校去，我在10岁的时候就来到了伦敦，这时我发现自己完全生活在一种共产主义的氛围中。我们所在的圣潘克拉斯那个小地方似乎全是共产主义者的家庭，我姨妈的屋子是当地的活动中心，客人们络绎不绝。我们的支部是一个坚强的支部，即使历经冷战的岁月仍然几乎是完好无损。1954年，当我们圣潘克拉斯与肯特城合并时，我们参加了租房者运动，那时候租房者运动才开始扩大。

在家里，似乎弥漫着非常浓郁的共产主义氛围，尽管只限于在一个单一的年龄段内，而不像工党家庭的世袭情形。共产主义是把我的家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事实上，我母亲的所有亲戚好像都受其影响。除了我母亲和她的两个姊妹外——在我从事这方面写作的时候，她们在政治上都很活跃，还有我的姨父（其中之一叫做契蒙，是我们家族中的共产主义的家长）和表亲。我的表亲芒迪那时是《挑战》的编辑，以前也做过党在汉兹和多塞特的组织者。我的表亲莉莉在为哈利·波利特工作。我的表亲菲丽思在妇女土地服务队（Land Army）里的时候就入了党。如果把由于婚姻关系而成为家族成员的那些人算在内，我的家族中总共有12个党员。另外还有我们在法国的表亲巴迪亚，我在少年时跟她在一起度过了漫长的假期。她是《人道报》的读者和法国共产党的支持者，尽管是一个持批判态度的支持者（她的丈夫萨沙在1940年的时候按照党当时的路线停止了抵抗，但还是被纳粹分子杀害了）。我们在美国康涅狄格的哈德福特的表亲，照我看来，也是“进步的”。我的祖母

是一个虔诚的妇女，但她对这个家族中的共产主义是宽容的。在为我们她举行的逾越节上，开始是用希伯来语祈祷，结束的时候则会唱苏维埃歌曲。我的莎拉姨妈说我的祖母“有点儿激进，总是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她会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她总是为自己对俄国作家——妥斯陀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了解而骄傲，她读的是他们的意第绪语版的作品。她对世界上不公正的事情反应强烈。她认为世界上应该更加公正”。我的米丽亚姆姨妈认为我的祖母原来是支持自由党的选民，后来在搬到圣潘克拉斯后才转而支持工党。她的兄弟拉贝尔是俄罗斯语和意第绪语的优秀歌唱家，我的莎拉姨妈说他是“非常坚定的工党党员”，晚年仍积极参加租房者运动的工作。

我的米丽亚姆姨妈是这个家族中的第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受她以前的男朋友的影响。他的男朋友在国际旅里，并且参加了埃布罗河战役。我的莎拉姨妈是三姐妹中最小的，当她还在上学的时候就信仰共产主义了。她在18岁的时候嫁给了我的姨父史蒂夫，他出身于一个非常正统的家庭，并且在他们订婚的时候仍然恪守他的宗教信仰。婚后他们在克里克伍德（Cricklewood）开了一家宗教书店，并开始他们的生活，可现在他们都已变成了自由思想者。这个书店想必是个很古怪的东西。“它是一个褻渎神明的联合体”，我的姨妈回忆道：“书店的一边是Talisim（即犹太教男子晨祷时披在肩上的有穗饰的长方形披巾），另一边是劳伦斯（Lawrence）和卫夏特（Wishart）<sup>①</sup>的书。作为卖书的，我们只是滥竽充数。顾客们在前面进来的时候，我们通常只是待在书店的后面读书。”

我的母亲是三姐妹中最大的，她直到1939年的春天或夏天已经30岁的时候才入党。在她还是学生的时候，她完全沉浸在她的音乐

---

① 乔治·卫夏特（George Wishart, 1513 ~ 1546年），苏格兰人，苏格兰宗教改革早期的殉道者之一。——译者注



中，可是在婚后，“由于阿比西尼亚<sup>①</sup>问题”，她开始关注政治问题。她记得自己在和平请愿中签了名，并开始致力于埃迪斯·塞姆斯奇尔（Edith Summerskill）博士在福尔汉姆（Fulham）东区的补缺选举，塞姆斯奇尔是在1934年以反战为选举纲领为工党赢得选举的。我母亲那时加入了汉普斯泰德花园郊区（Hampstead Garden Suburb）的工党，后来又成了妇女小组的书记。上学的时候，她很是受到了她的女教师的言传身教。这位女教师产生了“奇妙的影响”，她是“哈利斯博士，可是她坚持别人叫她哈利斯夫人”。她是费边社成员、工党党员，并且，用我母亲的话来说，“简直就像一个职业军人（a Simple Lifer）”，因为她是“一个讲究原则的人……很严厉……提出的标准很高”。后来，我母亲发现，她“内心里实际上非常善良，在我父亲过世的时候，她给了我很多安慰”。学校里有一半女孩是犹太人，哈利斯夫人很注意不让她们感到有什么不适。“她常挑选那些不会提到耶稣的赞美诗，这样犹太女孩就可以加入，就不会出现什么分别了。”（我的莎拉姨妈的回忆有点儿不同；这些赞美诗发下来以后，女孩们被告知省去那些提到耶稣名字的诗篇。）哈利斯夫人通过读一些世俗的东西来开始一天的生活。“她常给我们读罗斯金<sup>②</sup>。我们就是靠罗斯金长大的——罗斯金和《丛林之书》（*The Jungle Book*）。”哈利斯夫人还坚持认为女孩们应该把德语作为她们的语言，在我母亲上学的20世纪20年代，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所有其他的学校都把法语作为它们的第一语言。劳拉·普莱斯（Laura Place）用的是德语，所以我们不应成为德国人民的敌人。”这个学校在教育上是“非常先进的，人们常常从世界各地前来参观它……我们就像是一个小的大学，你可以把所学的科目放下来，集中精力

① 阿比西尼亚（Abyssinia），东非国家埃塞俄比亚的旧称。——译者注

②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年），英国艺术评论家，社会改革家，推崇哥特复兴式建筑和中世纪艺术，捍卫拉菲尔派的艺术主张，反对经济放任主义，著有《近代画家》、《建筑的七盏灯》和《时与潮》等。——译者注

做你喜欢的事。”要是天气允许的话，学习就会在露天里进行（我母亲一生都狂热地喜爱新鲜空气）。还有体操，按照那时的标准来看，也是很解放的。“我们常常把制服脱掉，就穿着运动衫和短裤做体操，在那时，这对女校来说也是很寻常的。女孩们即使是相互之间也很害羞。”在我母亲后来的童年生活中，令她极为高兴的事就是和大一些的女孩们一起应邀到那位女教师的家里吃叫做“肖”（Shaw）的茶点。这些茶点是由哈利斯夫人的丈夫准备的，——他也“写点儿东西”，但要承包“所有的家务”和购物。我母亲初次接触到除了色拉之外的她另一个终生喜爱的东西，这些茶点是用黑面包和生胡萝卜做的。据我母亲的描述，哈利斯夫人的丈夫看上去有点像“肖”，茶点之后他会给她们朗读大师的一些段落。我要补充的是，哈利斯夫人是素食主义者和热情的漫步者。她做“各种不合乎传统的事情。她常常穿着一件灰暗的帆布长裙，当有陌生人来到学校里的時候，他们经常会把她误当做打杂的女佣”。她似乎就是乔治·奥威尔时常嘲笑的那种进步人士，可是，要是人们考虑到那种环境，在一所伦敦东区的学校，它为移民的孩子服务，并在刚刚靠“绞死皇帝”——一个其尊严不容置疑的人物——的口号赢得选举的巨大胜利的那个英国鼓吹实现和解，她就不会受到嘲笑了。

共产主义在我母亲与父亲之间造成的巨大裂痕促使我的母亲投身到共产主义运动中去。他们曾经一起为来自德国的儿童难民创建了一个地方性的委员会，我父亲是主席，我母亲任秘书。由于形势急迫，我的母亲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并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24小时的委员会办事处。“它完全占据了我们的生活。”我的父亲对于袭扰着他的家庭的这股旋风感到害怕，于是就开始打退堂鼓了。我的母亲说，这就使她看清了他的弱点：他做这项工作是想得到人们的尊敬，但是又不想打乱自己的生活。我母亲在援助西班牙组织的工作中深受影响，也日益变得激进起来（我最早的政治记忆，大约从3岁起，就是看见一堆传单，上面有脸上长着脓疱的儿

童。别人告诉我说他们是巴斯克的儿童，靠吃青草为生)。她发现自己渐渐地与工党对西班牙的官方政策格格不入，可首先是她对“市郊”的整个生活状况感到不满。郊区的生活使得她与她在皇家学院(Royal Academy)学习过的音乐分开了；她还要求出席犹太会堂，而她已经不再信仰犹太教了。她讨厌“宴请客人”(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蹩脚的厨子)，并且很不喜欢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事上。她把家庭生活的破裂瞒着别人。我记得她在入党前不久，站在楼梯的上头，眼里含着泪告诉我的姨妈们不要再在家里谈论政治了，因为这会使我父亲感到不高兴。

战争爆发时我们回到了阿斯普利盖斯(Aspley Guise)，那儿，我就读过的一个“进步的”学校已经解散了。我母亲把她新的热情倾注在这个村子里。在1941~1942年的冬天，她让每人都为红军织袜子，就像我记得的那样，结实的白袜子，带有厚厚的螺纹。在1942年9月，我搬到了一个寄宿学校里，又一个“进步的”学校，而我母亲开始在斯劳的飞机制造厂工作。她的政治热情现在可以完全自由地释放了。她为厂里的党支部发展了大约50名新成员；她是第一批加入工程业混合工会(Amalgamated Engineering Union)的妇女之一——该工会在1943年才接纳女性成员——并成为她的支部在斯劳行业协会妇女委员会的代表。她发现了自己的演讲才能，露天或者是与挚爱的泰德·布拉姆利(Ted Bramley)——我童年中一个受尊敬有影响的人——一起分享着温莎剧院的舞台。那是她的演讲事业的高峰。她成了后来由于吸收了军工工人而变得庞大起来的斯劳党组织的支部组织者，担任宣传干事和培训班的导师(尽管她想不起这件事了)。她还爱上了比尔。比尔是她的工程师同事，她在大约15年后嫁给了他。这是她一生中过得很愉快的一段时间，在她于1945年来到伦敦以后似乎还继续是这样。她开始是在《工人日报》工作，实施了自由人员计划(Free Forces)，以便在《工人日报》的读者与在国外的武装力量的成员之间建立通信联系(她记得它起到了婚姻办事处的作用，当然，结果并不总

是令人愉快的)。此后，在我的印象而不是我母亲的印象里，她进行宣传的热度消退了。在我童年时代的后期，她很少参与党的公众工作，她的实际精力似乎转移到了工人音乐协会（她是协会中负责安排演出的干事，并且是合唱队的成员），转移到漫步（在童年时代的后期我时常被带到英国的乡间），转移到在我家举行的数不清的“社交聚会”以及重新捡起的音乐当中。共产主义的职责在她那里只涉及安安稳稳的信仰，而我却要在学校里进行充满激情的辩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俩的热情是交叉的，但却是向着相反的方向。在我的童年时代，我后来变得越来越狂热了，这也使得我们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我渴望了解事情的真相，以便消除我的困惑，或者就像我所表达的那样，去回击学校里的“诽谤者”。她想要过她的生活，已经远离了这种充满敌意的氛围。我只好转而从其他人那里去寻求政治上的支持，或者就像我那时总说的那样，寻求“政治上的理解”。

对我母亲那一代人来说，共产主义运动——尽管它本来的目的并非如此——是他们融入英国的一种方式，是犹太人居住区的孩子进入到这个民族的文化中去的桥梁。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对他们生长于其中的传统的突破，就像我母亲说的那样，是“把我们从宗教环境的狭隘性中解放出来”。它对他们来说起到了大学的作用，并且是那种更注重精神性的大学。它是理论与行动的结合，是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去发现志同道合的人，是学习和生活的学徒期。相比之下，对我而言，共产主义运动首先是一种表示忠诚的行为，它似乎表明我作为一个渴望回家的寄宿学校的孩子，变成了一个热衷于政治的人。共产主义所提供的不是对权威的反抗和逃离，而是满足了我对权威的渴望。它认可了对怀疑的压制。它也以一种与我母亲在汉普斯泰德花园郊区时截然不同的方式鼓励我去逃避，或者使我试图逃避周围环境的局限性。就像那个时代其他那些还没有形成自己文化的人一样，我讨厌做一个儿童，我青春时代的许多聪明才智都用在假装大人或者使我自己被大人们所接纳上面。上学期间我也

不安分，我总是待在家里看小说，或者找些可以信赖的有经验的人，他们会让我初步见识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像我那个时代的许多共产主义者一样，我的身上既有与别人保持距离的强烈要求，又渴望得到认同。我变换着反抗的姿态，只想成为这一群体中普通的一员。要是有人厚道些，他会说，当代的英国共产主义者发现自己深陷其中的困境正在于这种无法调和的二重性。

## 第二部分

持久力



## 第五章 团结的意志

在我的记忆里，在共产党（我于1956年脱离了那个党）中看不到较为传统的政治组织中所谓的“争吵”，这一点很不寻常<sup>①</sup>。接连不断的争斗作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内常见的毛病，在这里没听说过。在它存在的头十年里，这个党与它的领导人之间也的确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政治上的分歧远没有被个人间的钩心斗角——工党中的常态——所荼毒，而是被限制在同志关系的范围内。假若在执行委员会内出现了政治上的分歧，党员们是不会知道的。把机密报告泄露给资本主义新闻界更是难以想象，而这样的事情在今天却习以为常<sup>②</sup>。党

- 
- ① 感谢《新左翼评论》的编辑们，由于他们的帮助和耐心，这篇文章已经扩充到远远超过了它预想的篇幅。
- ② 在这篇文章即将付印的时候，《卫报》登载了由该报极为反对工党的产业记者约翰·特罗德（John Torode）写的一则新闻，《共产主义者抨击“腐败的”工会》（Communist Attack On “Corrupt” Unions）。新闻中说“共产党抨击工会运动领导人是不民主的和腐败的。在工会联盟召开关于法律改革特别会议前夕，该党领导已经批准了一项机密文件。这份文件指认在工会中有两种‘支配性的立场’。首先是强硬左翼，它‘缺乏策略，没有结盟的概念，没有必要地迫使许多人投入到右派的怀中’。共产主义的领导人认为强硬左翼要为在利物浦和矿工罢工期间的‘重大挫折’负责。下院议员的劳工运动小组被指责与好战团体（Militant Tendency）以及亲苏维埃报纸《晨星》中的斯大林主义的支持者结成了罪恶的同盟。工会会员中的第二派被认为是消极的新现实主义者，反对斗争，而只是坐等工党政府。”（*Guardian*, 11 March 1986.）有趣的是，刊登在党的周刊《七天》上的对这份文件的说明，尽管出自文件作者（劳工组织者）的手笔，却省略了这些，或者任何有争议的段落（参见 *Seven Days*, 15 March 1986）。它的标题是正面的：“工会掌握主动权的时机成熟了。”文章的开头是：“劳工运动的当务之急是创造一个群众性的浪潮，与印刷工人的罢工以及教师的抗议保持一致。”



的程序与工党的相比，是非常严肃的。领导们没有养成指责别人背叛他们的习惯（这是近来在工党左翼频频上演的情节剧，就像过去在它的右翼中一样），他们不会蓄意地在讲坛上发脾气，或者是忿忿然走下会议的讲台；代表们也不习惯于在自己的席位上大声谩骂。杜乔尔（Deutscher）在他关于斯大林的政治传记中评论道：“骄傲自大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美德。”<sup>①</sup>

共产主义的情节剧式的行为是与自我克制而不是与自我标榜有关，这些行为总是发生在幕后：在经人介绍而加入的封闭圈子里，同志们在进行“自我批评”；在难眠的深夜里，要与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进行斗争<sup>②</sup>；在铺着磨破了的油地毯的空荡荡的房间里进行纪律审查；或者是在机关里打印开除文件。至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他们的行为令人不满或者他们的忠诚受到质疑——所遭到的排挤和孤立，就更不引人注目了。我的母亲直到1956年退党为止，一直是一个忠实的党员，她记得的一件令人心痛的事情就是斯劳的一个叫做乔（Joe）<sup>③</sup>的同志被革职。她记得他在那时大概是支部的书记。他“十分诚挚”，“总是很乐观”，是“一个热心的工会会员”，可是他没能执行这个党的路线——我母亲认为这也许跟一次地方性的罢工有关（在那时，这个党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促进军需生产上）。支部委员会本来想让他以健康欠佳为由辞职，可是“地区”坚持派人来审查他的“政治上的不称职”。我母亲认为这是“最令人伤心的经历……其他许多人也有同样的感受。我们不得不同意上级的决定；但在心底里，我们是站在乔一边的”。乔本人，作为一个有过军队经历（他曾经是一个正规士兵）的西部乡村的汉子，默默地接受了对他的处罚。“随和的”和“好脾气的”他——就像斯劳党组织<sup>④</sup>的领导人想起他的那样——又开始作为普通的一员工作

① Isaac Deutscher, *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 Oxford 1961, pp. 315–316.

② Edward Upward, ed. *The Rotten Elements*, London 1979 ed., pp. 53ff.

③ 虚构的名字。

④ 口头交流，皮特·史密斯。

了。

在这个党中没有多数派和少数派这回事，相反，在任何场合下都只会表现出普遍意志。不管决定是怎么作出的，它照例是“集体的”。在党的大会上，决议是一致通过的，领导层是共同选出的。在党的委员会内，或者是在支部会议上，很少通过投票来解决问题。大会上的重要决定或者是事先安排好的，或者是交给管理委员会（the Control Commission）<sup>①</sup>。内部的分歧，例如在1935~1936年间折磨着斯泰普涅（Stepney）党组织的关于“街头”和“工会”工作的相对优先性问题，要在高一级的权威的干预之下或者在其呼吁之下才能得到解决。“伦敦区”（London District）也是这样<sup>②</sup>。

支部会议不是个深入而坦率地讨论分歧的地方，更不用说是按照宪政主义的方式去挑毛病的地方，这是工党的综合经营管理委员会（GMC）的祸根（或者乐趣）。支部会议关心的只是“落实”决议，使党员投身到党的工作中去。它们不是辩论的舞台，而是在一个充满敌意的氛围中，成为逃离政治本身的庇护所：在冷战期间，支部的会议是你唯一无须坚持自己的观点去战斗的地方。我记得，会议的内容都是些形式化，甚至程式化的事务。在会上，由支部的领导同志作报告，按照当前的“任务”来分配工作。如果困难多了，党员们就会显得过于急躁而不想去寻找共同点，不想去“倚靠”一

---

① 乔·雅各布斯（Joe Jacobs）在1936年因为支持“街头”骚动而被斯泰普涅党组织开除。在20世纪50年代，他又因为把群众抗议置于党的工会工作之前而再一次被开除。他的描述尽管让人们表现出失望，但仍然是可以认可的：“对于我们大会上所讨论过的重大事情，我不记得听到过任何不同的看法。事情总是通过一些委员会定下来……在侧重点和相对小的战术上的事情会有分歧……我们所有的内部会议的特征就是人们起身表示与领导的完全一致的频率……”（Joe Jacobs, *Out of the Ghetto*, London 1978, p. 167）

② Joe Jacobs, *Out of the Ghetto*, London 1978, pp. 259ff. 另外参见菲尔·皮拉廷（Phil Piratin）的《我们的旗帜仍然是红色的》（*Our Flag Stays Red*, London, 1948）以及阿诺德·韦斯克（Arnold Wesker）的《巴里的鸡汤》[*Chicken Soup with Barley*, London, 1961]，假如要使这些相互冲突的描述一致起来，就需要对杰出的萨拉·韦斯克（Sarah Wesker）进行专门的研究。

致达成的意见，不想去提出建设性的批评。结束会议议程的权威人物想要的是“积极的”结论。在行政区的会议或者地区大会上的冗长的报告中也几乎都是如此：要是这个党“落在了群众的后面”——这真是一个屡试不爽的自我伤害的好理由，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等候听取我们的“消息”。

必须承认的是（尤其对那些像当今作家那样的以缺少团结为憾的人来说），团结的原则与权威的原则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党员们毫无保留地“信任”领导。他们把党的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行动都视为集体意志的体现。党的“指挥”被当做理所当然的事情。对党的决议的执行也无须考虑这些决议是怎样产生的<sup>①</sup>。在党的概念中，领导与群众的利益差异一点也没有被考虑到。所有的党员在原则上都是共同工作的人，都享有同等的尊重。所有的人都要把自己视为不可替代的。杜德和波利特在他们的《组织报告（1922）》中写道：“共产党内不存在地位上的高低贵贱。每一个党员都具有某种特定的才能，并能够将其运用在党的工作的某一领域中。”<sup>②</sup>党不仅在发展规律问题上而且在战略战术上也是一元论的，这样，就只能有一个“正确的路线”，讨论就必须形成一致的意见。就像1957年的培训手册对民主集中制的过分的乐观主义描述一样：

党是由干部、领导机构和党员构成的统一体。在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作中，民主与集中之间不存在对抗。第25次（特别）大会（1957年的复活节）承认了过去以牺牲民主为代价而过于强调集中所犯下的错误，并且概要地阐明了消除这些

---

① 由约翰·阿特菲尔德（John Attfield）和斯蒂芬·威廉斯（Stephen Williams）1939年编辑的《共产党与战争》（*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War*, London, 1984）代表了有关这一变化的一种观点；由维克托·戈兰茨（Victor Gollancz）编辑的《左翼的背叛》（*The Betrayal of the Left*, London, 1940）代表了另一种观点。

② R. P. Dutt, H. Inkpin, H. Pollitt, *Report on Organisation*, CPGB 1922, pp. 11, 15.

错误的方法。共产党内也没有像工党那样存在两股潮流，普通党员们要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政策而与右翼的领导人进行不懈的斗争。在共产党内，各层各级的干部和党员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共同信念奠定了他们行动的基础。干部、领导机构和党员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党员们选举干部来领导，干部对选举他们的党员们负责。无论在党内什么地方，只要发现有官僚主义的做派（methods），无论是干部还是党员都要同样致力于消除这种做派。在共产党内，任何人都不能指望从领导职位或者是维持官僚主义和坏的工作作风中获取利益。所有的党员和干部都同样地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团结起来，共同奋斗。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这一奋斗本身得以组织起来的牢固的、行之有效的基础<sup>①</sup>。

这个党没有为异议，甚至“私人的”判断留下任何思想上的空间。在很久以前，“批评的自由”就由于会带来“混乱”、“动摇”、“使人们的思想误入歧途”而被列宁视为有害的东西<sup>②</sup>，英国的共产主义者也在一种相似的否定意义上理解它。“自由地鼓吹……小资产阶级观点……对党的基础产生了不良的影响。”<sup>③</sup>唯一可以被认可的批评是那种“巩固”党而不是削弱党的批评，是“真诚的”批评而不是“充满敌意的”或“破坏性的”批评<sup>④</sup>。分歧远远不会被推向截然相反的极端，而是被次要的目标（也就是对路线的理解中的细微差别或者是党的“策略”方面的问题）所替代。反对派似乎害怕承认自己是反对派，他们总是采用它的对手所用的词汇，并表现出一副极为正统的样子，以至于这两者最终会出人意料地彼此相像

---

① *The Ro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CPGB 1957, pp. 18 - 19.

② *What is to be Done?*, *Collected Works*, Vol. 5, p. 365.

③ “Freedom of Criticism”, *Communist Review*, June 1931, p. 239.

④ R. P. Dutt and Kay Beauchamp, *Leninism*, Marx House Syllabus 1940, p. 38.

(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外人总显得神秘莫测的一个原因)。不断地提出反对意见是难以想象的事，这不仅偏离了斗争的方向，而且，按照现在仍然在起作用的党的教条<sup>①</sup>，它也是不民主的，因为它表明，少数人在试图颠覆多数人的意志。1957年的培训手册讲述了其中的道理：

(iii) 派系。尽管党员们有权保留他们的意见、向上一级机构反映或者是要求对问题进行重新讨论，但他们没有权利去和其他党组织中像他们一样的那些成员联合起来，并为自己的主张而进行有组织的斗争。这是把民主颠倒过来了，因为它让少数人组织起来，去推翻业已经过充分彻底的商讨所表达出来的多数人的意志。

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允许在党内形成不同的派系。派系就是一些党员在党公认的组织，即在支部、行政区、区域与地区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之外，为了搞党内斗争而结合在一起。要是允许让少数人为了和某项政策对着干或是为了让个别党员反对党的政策的某些方面而结合起来，在全党发起一场维护他们的意见的运动，逻辑上就必然意味着为党内有组织的政治力量间的斗争留下隐患。这会产生可替代的政治中心和领导权、可替代的政策和可替代的对组织忠诚的义务。要是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党就会被拆散，它的团结和效力就会毁于一旦<sup>②</sup>。

在党内出现分歧的时候，不管是关于策略还是更大的问题 [例如，像“考德维尔 (Caudwell) 论战”或者卢卡奇辩论这种在我童年的家里显得很大的事情]，都将通过诉诸权威来“终结”讨论。

<sup>①</sup> *Marxism Today*, April 1985.

<sup>②</sup> *The Ro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p. 19.

无论如何，党内有一种癖性，一种不把精神上的居留之所示人的癖性。公开分歧会使党的好名声受到怀疑，甚至承认这些分歧的存在也会削弱党的影响。共产党人不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他们的“怀疑”只能表示他们自己的软弱，而不是党的路线错误。承认自己的“糊涂”是合乎情理的，党可能会犯错误则是不可思议的。“要是你碰到了不快的事情，你千万不能流露出来”，我的母亲回忆说。她觉得“非常难以接受苏德条约”，但“从未到怀疑党是正确的那种地步”。“它一定是真的”，乔·雅各布斯（Joe Jacobs）述说了他在季诺维也夫（Zinoviev）受审时的感受：“这一切早晚会展真相大白。”<sup>①</sup>

在取消了各种禁忌和人们能够明白地说出自己心中的疑问后，爱德华·厄普沃（Edward Upward）的《腐化》（*The Rotten Elements*）生动地描述了由此产生的那种精神上的创痛。这本小说再现了他脱党的过程（在小说里主人公是因为“左倾”主义而被开除的），它追溯了作者（以及他那相当倔犟的妻子）是怎样从小心翼翼的怀疑[他们难以接受党对艾德礼（Attlee）工党政府的支持<sup>②</sup>]，一步一步地走向断然的反抗。下面这一段话流露出由于这种反抗所产生的几分离愁别绪：

离会议开始还有三分钟的时候，艾伦估计，区里四个支部的大多数成员，都已经来到大厅里。丹尼·斯科里夫纳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块大的半猎用（half-hunter）表，看了看，然后把它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在艾伦的心头突然涌上一股对他的爱——不仅是对他，也是对这儿的同志们的爱。与几乎所有党外的人相比，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艾伦对他不感到更为亲昵，不管这个同志对这个党来说有多新，或者艾伦认识他的时间有

<sup>①</sup> *Out of the Ghetto*, pp. 126, 220.

<sup>②</sup> 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 1883 ~ 1967年），曾担任英国首相（1945 ~ 1951年）和工党领袖（1935 ~ 1955年）。——译者注

多短。即使他以前从未见过这些同志，他也还是有同样的感觉。一个共产党员不管走到哪儿，只要他跟别的共产党员在一起，他就跟在家里一样。这使艾伦想起他在战争期间住过的一个荒凉的小镇。他在那儿又遇到了另外一些党员，从那一刻起，小镇就变了样。他记得有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士兵，他是共产党员，有天晚上主动要给孩子们洗澡，好让艾伦和爱丽斯一同外出。爱丽斯高兴地、有理由毫无顾虑地同意了，尽管他们认识他还不到两周。艾伦希望，永不会从他那里夺走党员们彼此间感受到的亲密的友情和信任。他有一种冲动，想走上讲台要爱丽斯今天晚上不要去批评麦克纳尼写的书。可是，尽管她可能会同意（假如他提出很充分的，而他又没有时间去解释的理由要求她那样做的话），尽管撤回他们对那本书的批驳能使他们避免支部成员疏远他们，可是，假如不再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的话，艾伦如此珍视的、跟他的同志们的关系也就不复存在了。他和爱丽斯必须冒这个险，爱丽斯必须发表他们共同计划的演说<sup>①</sup>。

## 一 同志关系的代价

就跟在其他严密的组织里一样，要成为这个党的同志有着极高的要求。它要求一个人政治上积极的；它禁止，至少也忌讳，单独与外界建立联系；它绝不允许有丝毫的差异：人们或者是“忠于党，或者用我们最难听的话来说，是党的“叛徒”。这个党没有按照教会或者教派的做法去规定行为的模式，可是一个好党员应该

---

<sup>①</sup> Edward Upward, *The Rotten Elements*, p. 72. 爱德华和希尔达·厄普沃（Hilda Upward）告诉我，所提到的行政区是坎伯维尔南伦敦，那次会议是在1947年召开的。他们的讲述有一部分登载在《新左翼评论》第155期上。

按照党的章程和党的方式去说话做事。就像是通过忏悔来寻求归属一样，党内有一种强烈的（尽管是未曾明说的）反对“与不同信仰的人结合”（marry out）的偏见。和气的汤姆·维特林哈姆（Tom Wintringham）（他发明了空袭警报），党的最早的组织者之一，就是这种偏见的牺牲品<sup>①</sup>。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当大规模的党员发展工作已经结束、共产党员们定居下来成双结对地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共产主义者之家”风行一时，尽管从来没有被说成像“犹太人家”、“天主教徒之家”那样。在这样的家庭里，总是会有一杯茶、一张空床给代表们预备着。回家的感觉会给予其他同志以力量。

党内的同志关系既不完全是私人的，也不完全是政治的，而是兼而有之。它涉及亲戚朋友、邻里、工厂里的“克里姆林”（Kremlins）<sup>②</sup>，甚至还有（像作家圈子一样的）文学小圈子。作为回报，它能在私人间产生许多亲密的关系，但它毕竟是一种政治上的结合，是绝对依靠共同的目标才形成的共同体。多丽斯·莱辛（Doris Lessing）在《金色的笔记本》中出色地表达了这一点。作为在斯大林之后的“冰雪消融”时期（1954~1955年）的作品，她描写了在她与党内的上级之间逐渐产生的亲昵和信任的关系——他们

---

① 关于汤姆被开除的不同寻常的故事，参见 David Fernbach, “Tom Wintringham and Socialist Defence Strategy”,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14, Autumn 1982; 关于他被开除的通告，参见 *Daily Worker*, 7 July 1938。开除一事实际上发生在汤姆在西班牙担任国际纵队的指挥官的时候，是由他的新女友凯蒂——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引起的。在党的总部，她被怀疑是一个密探（事实上，她似乎只是波士顿的一个婆罗门。问题在于，在拜访国王大街的时候，她毫无保留地说出了她的想法）。汤姆的姐姐梅格现在还是党员，对这件事情“只是”说：“哈利·波利特并没想要汤姆退党，可是其他人坚持这样做。这是一个悲剧，对我和汤姆都是个打击。”

② “克里姆林”是阿曼福特（Ammanford）（南威尔士）劳动者俱乐部内室里用的词，指供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者聚会的房间。我大概是在1954年到那去过。要是读者能够提出一个更合适的词来指称在工厂里的同志们的小组，我将不胜感激。



都在党的一家出版社工作，他是主任编辑。她能够与他“毫无保留地”讨论她心中的疑问，一起分享着他们对于俄国事态的真实状况的违禁（guilty）知识。折磨着多丽斯的是她对工人阶级阵营中的真相的了解，她完全拒绝接受共产主义美学的“自我欺瞒的神话”。这是对在党的生活中不断产生的男女之间的“柏拉图式的”关系所作的少有但是有说服力的描写。可是，在多丽斯告诉他她将退党的时候，她知道这种关系将会结束了：“我们之间立刻就有了一条鸿沟——不是一条信任的鸿沟，因为我们相互信任，而是一条未来的鸿沟。他会说：因为他已经为党工作那么多年了，因为党已经成为他的生命，因为他所有的朋友都在党内并且还会留在党内。很快，在我们相遇的时候，我们会形同陌路。我想，他是一个多么好的人，那些像他一样的人也是。历史辜负了他们……要是我现在对他说起这事，他只会友好地点点头。我们会心照不宣地、无奈地相视……”<sup>①</sup>

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是按照距离我们事业的远近来对人作出区分的。居于世界中心的是党自身，不管它是作为引力还是斥力。在里层的是党的“同情者”，他们是可依靠的对象，会跟党一起战斗并坚定地支持它的路线。然后是那些具有良好意愿的“进步人士”，他们构成了外围。他们可能会响应党的“领导”，假如从这个词的足够宽泛的意义上说的话。在这个半球的另一部分——它是在一种否定而非肯定的意义上来界定的，但也并非完全不是按照与党的关系来界定的——存在着另一类人，他们属于“反苏维埃”或“反党”的反动派阵营。我们似乎完全忽视了国民中很大的一部分人。我们用最近的左翼政治组织的成员所熟悉的那种执拗和自我迷恋的方式说起他们，就像犹太人说起非犹太人、英国人说起外国人那样。我的母亲尽管总是和“无党派的人”一起工作，但她“从来没有想过”让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人成为她的亲密朋友。一个住在摩斯维尔山（Muswell Hill）阔气地方的人——他的见识要比我们多得

<sup>①</sup> Doris Lessing, *The Golden Notebook*, London 1977 ed., p. 347.

多——在回忆起较早时期的说法也与此非常相似：“一个人所有的朋友……所有的行动……都联结在一起。”

直到我 21 岁脱离了这个党，我自己的朋友圈子一直只限于共产主义者和我打算努力争取的人。因而，我的精神世界是封闭的。我不读违禁的书，我心里也没有任何异端的思想。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就是阶级敌人——很遗憾，我有时候也把我的父亲归于这一类人<sup>①</sup>。“无党派的人”，不知怎么的不太像是真实存在的。在家里，随着我的政治热情的高涨，我成了这个家庭的少年政治委员。我从我的契蒙（Chimen）叔叔那里学到了正统的台词，他精通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我试图去提高我母亲的理论水平 [1950 年，我给她的圣诞礼物是普莱卡诺夫（Plekhanov）的《保卫马克思主义》（*In Defence of Marxism*）<sup>②</sup>，它现在已经放到了我的书架上]，并且劝她去做更多的地方工作。我试图“清除”我的叔叔和姨妈们头脑中的糊涂思想，他（她）们关于南斯拉夫的“糊涂”想法最后竟至于发展到对莫斯科审判的怀疑<sup>③</sup>。

在圣潘克拉斯（St. Pancras），我加入了当地的共青团，并把我的名字改为“拉斐尔”，因为同志们发不出我原来名字的音。在学校里，我发起了一个共青团小组，把我新发展的五个人训练得像个有组织的政治单位的样子。我组织了一次针对校长的罢课 [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自以为读过《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自己就

---

① 我的父亲那时住在白宫（Whitehall Place）的“全国自由党人俱乐部”。似乎正是由于他们的离婚——我母亲成了我的监护人——我长大了才成为共产主义者。在星期天我到他那儿去的时候，我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早上我会出去卖《挑战》，或者在鱼吧里跟同志们碰面；然后我又会装作学校男生，在绅士俱乐部的豪华舒适中度过我的下午。

② 从另一处题词中，我得知她自己给我精心选择的礼物是吉朋（L. G. Gibbon）的《苏格兰人之书》（*Scots Quair*），它是共产主义运动对我们民族文学最好的贡献之一。

③ 我的萨拉姨妈告诉我，他们常常在支部里大声发表自己的不同政见。我怀疑，只是出于家庭的忠诚才使得他们在党里一直坚持到 1956 年。

变成左派了]。我由于好斗而被学校的辩论协会开除了。为了给林申科（Lysenko）院士辩护，我成了业余的农艺学家；我研究国际法的条文，以便为封锁柏林辩解；为了证明韩国侵占了朝鲜，我把地理学翻了个底朝天；在历史方面，我支持处决查理一世（历史教师海特小姐是一个好心肠的、宽容的人，她认为他只应当被流放），并且查阅了 A. L. 莫顿（Morton）和克里斯托夫·希尔（Christopher Hill）的书，就为了证明清教徒革命是资产阶级的，而保皇党人则是“封建余孽”。

我在 17 岁进了大学，那是一个发展新人的广阔的新战场。在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没上过老师的指导课。作为宣传干事，我拿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在各大学的校园里兜售 [第一次到萨摩维尔（Somerville）去就出乎意料地招了一个新成员]。不管是在牛津还是在肯特城，我所有的精力和所有最活跃的思维都似乎放在“建党”上了。甚至当我 21 岁订婚的时候——罗曼蒂克的求婚发生在俯瞰爱丁堡的亚瑟王座山（Arthur's Seat）的顶峰上——仍然满脑子想着党的目标。我的抱负就是成为党的组织者，琼·麦克琳德（Jean McCrindle）似乎是一个理想的同志。我们两个把“好”人集合起来（琼告诉我，我给她的信充满了鼓舞人心的事例，但这些信我从未见过）。我们两人都倾心于“共产主义者之家”的想法<sup>①</sup>（作为破碎婚姻下的孩子，我们可能都渴望从来没有

---

① 琼和我自己的一个榜样是埃尔西（Elsie）和约翰·戈伦（John Gollan），他们住得不远，我们都喜欢并且十分敬重他们。约翰那时是《工人日报》的助理编辑，埃尔西是卡弗汉姆路诊所的书记。诊所里有一群信仰共产主义的执业医师，后来这个诊所发展成为肯特城的康复中心。对于琼后来对于婚姻的怀疑，参见 Jean McCrindle and Sheila Rowbotham, *Dutiful Daughters*, Harmondsworth 1977。我对琼的热情似乎与对苏格兰的热情纠缠在一起。就像爱尔兰出了许多天主教牧师一样，苏格兰也出了许多党的组织者。我从所通信件中得知，我在牛津的最后一年里，不知是由于琼还是由于苏格兰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我形成了一种苏格兰口音。关于在法国共产党内对“长期同居”（coupledom）的崇拜，参见 Dominique Desanti, *Les Staliniens*, Paris 1975, p. 85。

拥有过的东西)。我们的初次见面是在国王大街党的总部里，在举行学生聚会的地下室里。恋爱中的高潮发生在我们搭便车到希普莱(Shiple)旅行的时候，在那儿，通过一篇精心准备的鼓动文章，我们发展到一个新成员<sup>①</sup>。

来自下面的要求统一化的压力一点也不比来自上面的少。一些未曾明确规定的行为规范塑造着党的生活中的非正式的文化。党员要遵守一些并未明文规定的要求，也不能逾越一些并未明文规定的界线。舞会在某种意义上已被视为“与社会主义不一致”的<sup>②</sup>。至于爵士乐，尽管它在这个国家的流行很大程度上肇始于共产党人，但它很久以来就被视为“颓废的”<sup>③</sup>。异国情调的服饰被当做时装表演而惹人讨厌<sup>④</sup>。将要成为苏塞克斯区党组织书记的厄尼·特洛里(Ernie Trory)(在后来，他成为这个党非正统的自传作者之一)，记录了当他还是一个新人的时候，是怎样与支部发生矛盾的。因为他与一帮不受欢迎的人混在了一起，并且经常光顾一个叫做“帝国”的低俗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位于布雷顿(Brighton)的中部，以赌博出名。最后，他得出结论，认为他不配成为卡普的成员，并提议开除自己！然而，同志们是宽宏大量的，并且给了他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同志：

你递交辞呈的行为引起了一场讨论，我建议你最好还是收

---

① 这里提到的同志是丹尼斯·布特(Denis Butt)。他以分拣羊毛为业，是约克郡的爱尔兰人。他作为一个学历史的学生来到勃利尔(Balliol)。他从心底里是一个劳工无政府主义者。我觉得，他的加入更多的是出于对友谊的认可或者为了加深友谊(我花了一年的时间设法说服他)，甚至也可能是由于恋爱，而不是由于我们所提出的理由的说服力。也可能因为我们一直到约克郡来发展他，使他感到很高兴、很满足。

② Dewar, *Communist Politics in Britain*, p. 115.

③ *Theatres of the Left*, for the attacks on the 1929 WTM cabaret.

④ Margaret MacCarthy, *Generation in Revolt*, London 1953, p. 190; Jacobs, *Out of the Ghetto*.

回这份辞呈。布雷顿支部作出决定，你将被留党察看，期限由地方党委会决定，具体的要求由支部规定……地方党委会已经开了会并提议留党察看的期限是6个月，从8月4日起。要求是……你不应当再到“帝国俱乐部”去，并且要参加你的工会支部的活动并按期缴纳工会的费用。这个提议将被提交给9月1日星期二晚上8点的支部会议。我们希望你能出席。愿你的苏联之行有趣而有所收获……

致以兄弟般的爱！

V. 获甘<sup>①</sup>

就跟劳工运动中的其他领域一样，这里对“野心”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忌讳。在考利的莫里斯汽车厂——它是牛津机器制造厂中的巨人——当这种事情发生或好像要发生的时候，支部会私下里进行惩治。亚瑟·埃克塞尔（Arthur Exell）在“历史工作室”为他录音时，描述了发生过的事。它讲的是帕特·米尔斯（Pat Mills）同志，时间是在上次战争后不久。帕特是支部中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活跃分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支部中最突出的家伙”，“他笑起来很迷人、爽朗……他是个第一流的拳击手”。可是，他被提拔成了工头，这使得他的同志们很不高兴。“我们竭力劝说帕特……不要干。我们在我家里开了一次会。他参加了这个专为他开的会。我们要他不要干，他不愿意，于是就退党了。这件事令我们大家都很难过。我记得他在角落里哭泣。帕特再也没有从这件事中真正恢复过来。我想他没过多久就回到了我们中间，但那个隔阂已经把他的整个生活搅乱了……他在党内很长时间了……他也一直是个好同志，可是我们无法说服他。他说：‘做了工头，我还会继续为党工作，并且我能为党做与不做工头时同样多的工作。’我们说他是不可能做到

---

① Ernie Trory, *Between the Wars — Memories of a Communist Organizer*, Brighton 1974, p. 76.

的。在那次会议之后，他退出了一切活动。不过，帕特的工头没做多久。考利的一个工人出了什么差错，资方解雇了他。帕特来到了法官面前，发现他自己在替公司说话。他意识到自己错了……一旦你发现自己被老板利用去对付工人，没有人会再相信你了……在那之后，他辞掉了工头的工作，后来又重新入了党，可以再也不跟以前一样了。”<sup>①</sup>

在所有地方，只有圣潘克拉斯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记录奇迹般地保存在牛津的博德雷恩图书馆。它记录了整整一大批地方上遇到的小麻烦。由于允许“赌博”，共青团支部一度受到解体的威胁。一位书商被要求退出支部，原因是他曾经是个保守党党员（那时他 20 岁，而那段时间也不超过一个月）<sup>②</sup>。在 1926 年，这个地方碰到的麻烦是，有一个叫做艾里斯·金斯顿（Iris Kingston）的同志，开始按照自己的哲学路线自行其是。一封流露着焦虑心情的致伦敦区党组织的信表达了拯救她的意图<sup>③</sup>：

亲爱的同志们，

我受地方党委之托向你们反映下述问题。我们收到信中所附的金斯顿女士的信，她是我们地方的一个党员。我附上我的答复。金斯顿女士尽管经过党的培训，成为党的正式党员，但是不接受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她相信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唯心主

① Arthur Exell, "Morris Motors in the 1940s",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Spring 1980, pp. 103 - 104.

② Pollard Papers, Box 1, Letter of 7. 4. 1926; Box 4, Letter of 3. 12. 1925. 并不是只有圣潘克拉斯的共产党人有这样的情绪。1928 年，一个试图在妇女合作基尔特的年度大会上发言的保守党妇女，被义愤填膺的代表们轰下了台。这样的做法要是在当今这个更加有教养的政治气候下，会被指责为“红色法西斯主义”。参见 Jean Gaffin and David Thoms, *Caring and Sharing: The Centenary History of the Cooperative Women's Cooperative Guild*, Manchester 1983, pp. 86 - 87.

③ Pollard Papers, Box 10. 写给伦敦区党组织的未注明日期的信。这封信没有署名。我不相信这是一件孤立的个案，要是《新左翼评论》的读者能够给我提供他们所碰到过的或者是（要是老党员的话）经历过的案例，我将不胜感激。

义而不是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就像你们从所附的《工人周刊》(*Workers' Weekly*) 的广告上看到的那样,她正在设法把与她观念相同的人组织起来。这已经是她第二次在《工人周刊》上做广告了。先前,地方党委会已经试图去处理她的问题。托尔和班查拉克同志受命去商量这件事。可是我明白,经过漫长的、令人疲惫的谈话之后,她的观点没有改变。她是一个相当可靠的党的工作者,参加她的小组活动,在工厂外也能被人接受,有一些固定的读者,并且缴纳应缴的党费。

致以兄弟般的爱!

书记<sup>①</sup>。

## 二 “党的观念”

从英国共产党早期与其他政党一同隶属于第三国际起,它就极为看重自身的一体性 (*oneness*)。它成立于1920年那个充满感情色彩的名为“团结”的大会上。在开幕词中,大会主席亚瑟·麦克马努斯 (*Arthur MacManus*) 构想了一个“可靠、刚强、正确、坚定”的组织<sup>②</sup>。草案(随后在1921年的曼彻斯特会议上正式通过)要求党员做到“忠诚”和“坚贞”,以及对党的意志的无条件服从<sup>③</sup>。1922年的整顿把这些规范更具体地表现在每一天的实践中,要求党员们在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中都把党人格化。两年后,一本培训手册把“民主集中制”(原文如此)(“共产主义组织的特征”)比做国民对国家的忠诚:“党员有义务保持对党的自发的忠诚,这种忠诚

① 在圣潘克拉斯档案中有一封信,日期是1926年3月22日,由约翰·马洪 (*John Mahon*) 代表伦敦区署名。这封信里说,“由于出版了一份煽动反对共产国际 (CI) 决议的小册子”,金斯頓女士已被开除,“尽管她有权提起上诉”。

② *Klugmann, History, Vol. 1, p. 39.*

③ *Klugmann, History, Vol. 1, p. 49.*

必须是与国家所培养起来的爱国主义同等的，国家可以采取强制手段要求其服从……对于党的决定，尽管个人不同意，他也必须遵从那种由国家提倡并（尽可能）强制实行的‘宪政主义’。要是一种牢固地建立起来的制度都觉得宪政主义对于它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战斗的反对派组织还需要多少那种来自它的成员的考虑呢？共产党人必须永远记住，他们所拒绝的宪政主义也正是他们的敌人的长处。”

接下来对党的组织结构的叙述就像是由公务员起草的。要想“有效地发挥作用”，党需要：

(a) 一个引领方向的中央机构，它对整个党具有完全的权威（对应于中央政府）。

(b) 地方性的组织，以落实中央的要求（大致对应于各省的公务员）。

(c) 地方性的组织，以保持中央与党内的普通党员之间的联系，并（在中央批准后）根据地方条件确定地方性的政策（对应于郡议会）。<sup>①</sup>

在群众工作中，对党的拥护和忠诚，用英国在第三国际的代表 E. H. 布朗的话来说，“取代”了所有其他义务<sup>②</sup>。在工党和工会中工作的个人，组成各个小组并服从集体的领导。“不参加小组会议的党的代表绝不能在这个大会上发言”，1926 年伦敦区对出席左翼运动大会的同志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sup>③</sup>。

党的观念（party-mindedness）不太容易强加给本性上非常异类的党员，在许多方面也不容易与工会运动相一致。然而，在英国共

① CPGB, *Manual of a Party Training*, 1924, pp. 45 - 46.

② P. P. 1926, *Communist Papers*, p. 21.

③ Pollard Papers, Box 1, London Distric, 1. 1. 1926. 英国共产党在 1925 年发起了由工党和工会的左翼分子组成的左翼运动。它在 1929 年的向左转（left-turn）中被放弃了。



产党最初作为工党的革命性替代物而形成的那种情境中，对自足（autarky），也就是在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自足的要求已是其应有之义<sup>①</sup>。党的观念由于党内外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而得到了强化。早在1921年，西尔维亚·潘克斯特（Sylvia Pankhurst），第三国际成立时的英国代表，由于她拒绝把她的报纸《工人的无敌战舰》（*Worker's Dreadnought*）交给欧洲共产党接管而被迫退党<sup>②</sup>。工党总部的亚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这段时间在试图控制《每日信使报》（*Daily Herald*）时碰到了同样的麻烦。在1922年，发生了与“群众联盟”（the Plebs League）的严重分裂。主张实行独立的工人阶级教育的“群众联盟”成立于1909年的拉斯金罢工之后，它提出了一种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在铁路工人和南威尔士矿工中特别受到拥护。汤姆·贝尔（Tom Bell）在他1937年对英国共产党历史的叙述中提到了这一分裂所造成的奇怪局势。“‘群众联盟’的领导层大多数是党员。问题的争议在于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形式。‘群众联盟’尽管是由党员领导的，却无视党的作用，坚持他们的学术性的、无党派的教育。”<sup>③</sup>

为了取代“群众联盟”的教育，英国共产党采用了一种非常工

- 
- ① 尽管列宁从远方一再催促，但向工党请求接纳的决定在1920年的团结大会上只获得微弱多数人的支持，而且他们所提出的理由几乎不能令意向性伙伴放心。T. A. 杰克逊（Jackson）在会上的一次有名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人应该把工党的领导人掌握在手中，“以便日后扼住他们的喉咙”。莫斯科的列宁以老练得不能再老练的手腕催促他的英国同志支持斯诺顿（Snowden）以及其他一些人，“就像绳索支持被绞死的人一样”（参见“*Left-Wing Communism*”，p. 70）。在全国的领导权上相当“左倾”的伦敦区党组织，敦促1925年的大会“明确地表示，党认为……劳工运动蜕变成……反对工人的武器……是英国政治形势中最重要的因素”（Resolution in Pollard Papers, Box 4）。
- ② Bell, *History*, p. 83. 由于这本书出自一位参与者之手，它理应被视为原始的资料。对于诸如与群众联盟的破裂这类问题，它要比克鲁格曼的历史更为可信。
- ③ Bell, p. 84. 其他关于这一分裂的描述，参见 Stuart Macintyre, *A Proletarian Science*, Cambridge 1980, pp. 36, 76-81; Jonathon Rée, *Proletarian Philosophers*, Oxford 1984, pp. 46-55; J. P. Millar, *The Labour College Movement*, London n. d., pp. 87-88, 96-97, 259-262。

具性的教育方式——“党训”。一个似乎已经被历史学家忽视了类似的分裂活动是退出社会主义周日学校，建立一个自成一体的共产主义儿童教育组织，以便“改掉对待儿童的家长作风，并引导儿童投身到革命活动中去”<sup>①</sup>。这一新的运动不顾所受到的反对（在曼彻斯特它在党内引起了分裂），于1924年在共青团的帮助下成功地召开了一次大会，“孩子们在第二天召开了他们自己的会议”<sup>②</sup>。这种自立门户的倾向在“联合阵线”和由党积极发起并在党的领导之下或靠拢党的领导的辅助性组织，如失业工人运动、少数派运动、反帝国主义同盟、国际阶级斗争囚禁者援助组织中同样很明显。例如下面的一则1925年伦敦区党组织的指示：

意大利自由同盟的朋友们：

政治局发布指示，要求所有的党员跟这个组织不要有任何瓜葛。原因是，在该组织的第一次会议上就决定它应当成为在国际阶级斗争囚禁者援助组织领导之下的委员会。然而该组织的负责人没有执行这一决定。所以，党员们不要再与该组织有任何联系<sup>③</sup>。

党在观念上的蔓延，在意识形态上就表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来临和党宣布对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权的垄断。这一点直到20世

① Edmund and Ruth Frow, *The Communist Party in Manchester, 1920 - 1926*, Manchester n. d., pp. 75 - 76.

② Klugmann, Vol. 1, p. 339. 在他们位于曼彻斯特的“工人阶级运动图书馆”里，埃迪和鲁斯·弗劳有几份《青年同志》、《青年先锋》，以及一张复制的《战鼓》。埃迪是1924年入党的。他认为儿童组织在曼彻斯特没有幸存下来。可是，某种与它非常类似的组织似乎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斯泰普涅兴盛起来。自传性的描述可以参见 Emanuel Litvinoff, *Journey. Through a Small Planet*, Penguin 1976.

③ Pollard Papers, Box 4. London District, 23 July 1925. 要是《新左翼评论》的读者能够提供这些早期的反法西斯主义活动的信息，我将不胜感激。

纪60年代才受到挑战。就像乔纳森·雷（Jonathan Rée）在《无产阶级哲学家》（*Proletarian Philosophers*）中有力地证明的那样，人们在这里面对着两种同时发生却又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势。在俄罗斯，有一个作为少数派的哲学学派——德波林学派，他们成功地使得他们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登上了霸主地位（尽管最终以他们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他们在30年代作为孟什维克被清洗），这是一个名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完整的理论体系<sup>①</sup>。在英国，党的观念与“革命”培训的发展成了“群众联盟”和劳工大学所倡导的“工人阶级哲学”的替代品。在两者当中的任一种情形下，显示出来的是这样一种观念：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哲学体系，与其他思想的交流只会使之受到污染而不是变得丰富。除此之外，“理论与实践的一致”也完全把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发展混为一谈（即使是在退党已经30年后，我仍然觉得难以把超越党派之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想法真当一回事）。斯大林的格言——“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结不出果实的，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对于几代共产党人来说，就像是辩证法课堂上恩格斯的开水壶（Engels' boiling kettle）一样熟悉。党的教育也依此照做。问题都是经过仔细掂量才提出来的，答案也是预先给定的。这一教育公开宣布的目标就是教会工人们“想什么”，而不是工人联盟在认识上所耿耿于怀的“怎样想”。

就像在共产党随后进行的讨论中所提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目的首先是保护性的，是要确立可接受的思想的界限。这个党从来没有走到它近来的追随者“工人革命党”那样的地步。工人革命党在开除了考利的工会发言人艾伦·托乃特后（大概是在1974年的某个时候），进而又在小册子上谴责他的“新康德主义”。不过，那时我们确实把异端视为有害的，在思想工作中就像在其他战线中一样，顽固地坚守一条原则：关于商业资本和封建国家（1924年培训手册

---

<sup>①</sup> 从一个稍稍不同的角度来看，雷和麦金泰尔对这些发展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提到的问题)<sup>①</sup>，以及关于改革的“正确的”立场、进步和反动这两个阵营的划分、“思想斗争”。

### 三 改变路线

这个党对于统一性的热情再没有比在路线发生变化的时候更明显了。不仅在中心，而且在最外围也可以感觉到它所造成的震动。第一次较大的震动发生在1928~1929年间，那时在采取了“以阶级对抗阶级”的路线之后，随即发生了一连串的分裂。在乔治·辛斐尔德（George Sinfield）（后来成了《工人日报》的产业记者）领导下的英国工人体育联盟，开始抨击“改革主义的”足球队（其中之一还被指责为酗酒）<sup>②</sup>；反帝国主义同盟还把独立工党的领导人詹姆斯·马克斯顿（James Maxton）从主席位置上赶下来；“红色”徒步旅行者们绕开了“漫步者协会”的温和领导，准备宣传“大入侵”（Mass Trespasses）（1932年对靳德斯科特的占领不太可能是漫步者现在享有在奔宁步道漫步的权力的根源之一）<sup>③</sup>。

1935~1936年间的路线变化（即转向人民阵线），尽管对其成员来说不如1928~1929年间那么痛苦，甚至比记忆中的1939年10月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还要好些，但在意识形态或社会学上更为重要。它牵涉到对所有那些“联合阵线”组织的系统清洗。这些组织一度

- ① *Manual of Party Training*, pp. 15 - 16, 24. 由于思想工作形式上非常严格，对年轻的新成员所要求的课程设置在知识上的目标非常高，以及参考资料的范围非常广（尤其是历史方面的），因此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 ② Alun Howkins, “Class against Class”, in Frank Gloversmith (ed.), *Culture, Class and Social Change*, 1980.
- ③ 霍华德·希尔（Howard Hill）的《自由地漫步》（*Freedom to Roam*）描述了年轻的伊万·麦考（Ewan MacColl）为之谱写“我是一个漫步者”这一运动。阿伦·霍金斯（Alun Howkins）告诉我，漫步者协会的共产主义小组所提出的各项要求中有一条是“对于唱歌不要有任何琐碎的限制”。这一运动是以曼彻斯特为根据地的。关于这一时期伦敦东区的漫步者歌手，参见 Ruth Adler, *A Family of Shopkeeper*, Coronet ed. 1985, pp. 196 - 197.

成为党的运动的先锋和它的公众形象（public face）。国际劳工保护组织，也就是先前的国际阶级斗争囚禁者援助组织被解散了，以便为新成立的争取民权全国委员会让路<sup>①</sup>。反帝国主义同盟也被冻结起来，这个同盟曾经把有关英属印度的辩论协调起来。甚至还企图——这种企图被沃尔·哈宁顿机智地阻止了——要用“广泛的”委员会来取代失业工人协会<sup>②</sup>。这个党从半地下状态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它用协商和请愿取代游行示威作为指引其的运动的路线，并把一些“名人”吸引到它的讲坛和请愿队伍中来。它呼吁的对象逐渐地转向了“进步人士”、“具有善良信念的人”、“英国人民”，而不是产业劳动阶级，或者只是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它所使用的词汇变得温驯起来，“团体”、“支部”取代了“小组”，“委员会”取代了“机关”。伴随着“团结”成为这个党所有新运动的口号的，是对任何好像是分裂性的东西的压制。在英国以及其他国家，新的转变在文化上的牺牲品之一就是“工人戏剧运动”，另一个是革命写作中名称很有表现力的杂志《风暴》。“工人戏剧运动”的创始人汤姆·托马斯（Tom Thomas），在1977年向我讲述了这件事。即使经历了40年之久，并且由一个垂死之人说出来——汤姆已经经受了6次心脏病发作，但言辞之间仍然存在着那种自我贬抑，那种像斯劳工会发言人乔那样毫无怨言地承受自己命运的忠诚者的心态。

在1934年，“工人戏剧运动”的政治方向逐渐发生了变化。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政治斗争显然无异于同归于尽。在欧洲的其他地方，要生存下去就得依靠所有受到法西斯主义威胁的个人之间的联合。当这种明智的态度被广泛接受的时候，“工人戏剧运动”的麻烦就来了。我们的整个工作曾

---

① 关于以专横的方式把路线的改变强加给伦敦东区，以及哈利·波利特试图缓和这一打击的情况，参见 Jacobs, *Out of the Ghetto*, pp. 141, 152 - 155.

② Harry McShane, *No Mean Fighter*, London 1978, p. 220.

经就是反对工党和独立工党，以及反对国民政府。麦克唐纳（MacDonald）、斯诺顿（Snowden）、杰米·托马斯（Jimmy Thomas）及其同类在他们加入（保守党）国民政府之前，在我们的抨击之下毫无还手之力。我们嘲讽杰米·麦克斯顿（Jimmy Maxton）和乔治·兰斯勃利（George Lansbury），对待工党和保守党也是这样。新的人民阵线路线不那么容易适合于大众戏剧。就戏剧来说，提出一种建设性路线，例如建立反法西斯主义联合阵线，要比写讽刺和抨击阶级敌人的作品难得多。

作为“工人戏剧运动”的组织者和许多关于工党的讽刺作品的作者，我持续担任领导工作，可能被认为在某些方面成了人民阵线发展的小小障碍。这使我非常惊讶。如果我的辞职能够搬掉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障碍，我也不可能允许我个人的失意去挡道。于是，在经历了近十年勤勉的，可也是有趣的和有益的工作之后，我不干了。然后我开始参加维尔温加登（Welwyn Garden）市共产党的活动，并忙于征集和平请愿的签名。这个镇所有进步的人都在一起参与这项活动<sup>①</sup>。

团结的意志，尽管被共产党人视为革命政治的特有标志，是“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基本原则”，却与英国国民生活各领域中对社团的忠诚极为类似。就拿“团队协作”这个已经不知不觉地出现在党的文件中的词来说，就是竞技场上的意识形态，它与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形成的对体育比赛的狂热有关。对党的“好名声”的关心所产生的回响有时就是对学派精神的呼吁（下面是约翰·萨姆菲尔德的《五·一》中的一个例子）。党内的同志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按照共济会的方式，或者用一个争议少一点的例子，是按照互助社（friendly societies）的方式开展的。党员们可以便捷地从一个地方转会到另一个地方，且仍然可以放心地与具有同一信仰的人们在一起

<sup>①</sup> Tom Thomas, “A Propertyless Theatre”, in *Theatres of the Left*, pp. 93 - 94.

（“你加入一个新的小组，立刻就会感觉到如同在家里一般”）。“团结就是力量”这一观念当然是英国工会运动最悠久的口号之一，这无疑会有助于赋予英国共产党自身无数的“团结”运动以合理性。在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随着工会的合并（例如导致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形成的那次合并），随着工会联盟常务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工党、工会组织和合作社三方同盟的形成，这一观念增添了新的含义。正是在 20 年代早期，“劳工运动”这一术语开始运用于政治领域。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坚持划清界限对于工党来说，至少和英国共产党一样是当务之急，甚至更加如此，因为它感到自身受到了来自左翼的持续的威胁。今天，在激进方面，工党自己那些叛逆党派远远超过了左翼的支持者 [波普勒 (Poplar)、巴特海 (Battersea) 和西南贝斯纳格林 (South-West Bethnal Green) 都是大都市中极好的例子]。工党花了 6 年时间才结束了个别党员的双重身份现象，然后，就开始设计越来越长的禁令清单，以便把工党与共产党人发起的运动分离开来。在工党内部，各式各样的自主性也受到了打击；工党逐渐变得更加牢固，它培养了整整一代的忠实信徒，他们像英国共产党的党员一样毫不怀疑自己与领导的关系。可与之相提并论的趋势也存在于工会运动中，尤其是在 1926 年总罢工失败之后。首先是从各行业协会中开除（或试图开除）共产党员，然后是禁止共产党员在工会中担任职务。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英国共产党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建立和巩固，是与“官僚集体主义”作为组织原则在英国的蔓延、与公共领域中的企业活动和就业，以及资本主义所有权的垄断形式的普及相一致的。它是随着公司（例如英国广播公司）的出现而产生的回响，是服务业的伦理观念向诸如住房供应这样的先前专属私人企业的领域的延伸。简单地说，团结的观念，不管它现在是多么乏味，那时候却与广泛的社会转型、以牺牲私人零售商的利益为代价普及开来的商业合作社（在伦敦，它的成员数量在两次大战期间的数年里增长了 4 倍）、大众娱乐品味的渐渐统一，以及给予公共领域之于私人领域更多的权利这一特定的理念是非常

协调一致的。

党的团结在实践中自然从不像它在理论上说的那样坚如磐石。各个地区发展起了他们自己特有的传统。举例来说，在谢菲尔德是与工党的人并肩战斗，而在伦敦东区则对他们抱有敌意。各个时期的群众运动都享有一定范围的自由，在至关重要的岔道口上，是他们独立的能动性日积月累地改变，甚至颠覆了党的路线。从事“群众工作”的同志们——失业工人协会的沃尔·哈宁顿和南威尔士矿工亚瑟·霍勒（Arthur Horner）都干得很出色——享有很程度的自主性，并且在受到压力时可以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就像霍勒在1930年受到党的批评时所做的那样。1922年杜德和波利特的《组织报告（1922）》武断地要求把党和“群众联盟”分割开来，但这一分割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彻底完成。《星期天工人报》（*Sunday Worker*）是这个国家曾经有过的最好的共产主义报纸，这份优秀的报纸与“群众联盟”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经济学家马里斯·道博（Maurice Dobb）和哲学家、历史学家及无产阶级文学家T. A. 杰克逊是那些与“群众联盟”继续一起工作的共产党人。

奇怪的是，正是人民阵线的产生，它表面上是一个“自由的”转向，却似乎使得在英国共产党内就像在别的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样，不能再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了。这个党接下来的20年的历史也像其他国家一样，是一段逐步使自身组织像磐石般巩固并使其成员统一起来的历史。即使如此，在党的生活中为人所知的表层之下仍然存在有限的自主权利。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伦敦的共产主义码头工人，他们一度（1945~1947年）在党决定维持劳资和平的时候，自己在河边从事政治活动（包括无数次的罢工）。人们也可以像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常做的那样，诉诸团结在《我们的时代》周围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所拥有的相对的自主权。党是自己治理自己的，这样的观念无疑是广为传播的。1956年，人们之所以对持不同政见者表现得义愤填膺，原因之一就在于发现在他们的党内，无法有效地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



## 第六章 组织纪律

共产主义除了与对信仰的服膺有关，也关涉到组织纪律。共产党不仅是道德共同体，也是官僚化的集合体。其中，责任是按照所担任的职位来界定的，下级要服从上级。它作为“强制协作”的体系，按照非常韦伯式的方式运行着。这个体系不是成员之间松散的联合体（在第二国际的政党中所抱怨过的“混杂在一起的东西”）<sup>①</sup>，而是一个垂直集合起来的整体。这个党由专职的官员来实施持续的管理和控制。优先采取的路线不是出于行政上的便利，而是作为对团体忠诚的考验。党员们要受到各式各样服从的限制，他们要“顺从”党的意志，要听从上级。刘少奇在他的《论党》中清楚地说明了党的组织原则：“党的法律和秩序是建立在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以及全党各个组织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基础之上的。”<sup>②</sup>

第三国际建立在一种双重的从属关系上。加入其中的各个政党根本不是独立的政党，而是这个世界性的组织的组成部分，它们听命于它自己的领导层。它们不像第二国际中的政党那样是群众性的党，而是像斯大林说的“工人阶级先遣队”那样的核心小组，要遵守像军队里那样的纪律。英国共产党对之亦步亦趋，取消了地方和支部的自主性，而这种自主性是马克思主义和工团主义组织所特有的，英国共产党也是从这些组织中产生的。按照列

---

① Grigorii Zinoviev, *History of the Bolshevik Party*, London 1983, pp. 88 - 89.

② 刘少奇：《论党》，解放出版社，1950，第88、100页。

宁在 1902 ~ 1904 年关于俄罗斯的争论中的说法，党的成员不是作为单个的支持者而是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等级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在发挥作用。“共产党”，20 世纪 50 年代的培训手册写道：“不只是它的个别党员的总和……它的力量取决于这些党员怎样组织和结合在一起。”<sup>①</sup>

党的生活的组织原则不是它的代表性而是效率——果断地采取行动以及对重大事件迅速作出反应的能力。党员们为自己是“热情的”、“活泼的”、“积极的”而感到自豪。他们容忍，甚至欢迎那种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说是“狂热的”行动。英国共产党开始成为一个主张直接行动的党，诉诸“直接的斗争”。这标志着它与它的前辈们分道扬镳。它的目标不是“宣传”，而是“对整个劳工运动产生系统的、有组织的影响”<sup>②</sup>。它不指望通过议会冗长的程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在 20 世纪 20 年代，这被鄙夷地称为“吵闹秀” (gashouse show)]<sup>③</sup>，而是投身于群众运动之中。英国共产党把自己视为左翼的发电机，“劳工运动的推动力量”<sup>④</sup>。它策划聚会和集会，组织示威，发起紧急抗议，鼓动支持罢工。总之，共产党人像他们的俄罗斯前辈或者他们自己的工团主义创始人一样，是“鼓吹行动的人”。

与之类似的是，党内的生活是围绕各种“运动”建构起来的：党员资格运动、党员发展运动、援助西班牙运动、募集资金运动、《工人日报》运动等。还有一年一度的冬季戏剧，它从 9 月就开始，并常常持续到次年的 3 月；有“重新注册”运动，到那时，要用新党证换旧党证，欠党费的党员则会受到“同志般

---

① CPGB, *The Ro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1955, p. 11.

② R. P. Dutt, H. Inkpin, H. Pollitt, *Report on Organisation*, London 1922.

③ R. Samuel, "Theatre and Socialism in Britain, 1880 - 1935", in Samuel, MacColl and Cosgrove, *Theatre of the Left*, p. 48.

④ 出处一时难以找到。

的”劝告<sup>①</sup>。下面是西汉诺斯（West Ham North）在1954年处理此

① 由此可以看出党员们常常是多么拮据（缴上来的是些3便士或6便士的硬币），以至于每周的党费也会被当做一项大的负担。下面是1926年来自圣潘克拉斯的一封信，它使人明白参加党的活动以及用党员的工作来冒险，对于那些低工资的和失业的人来说，似乎也成了一项代价很高的义务，尤其是当它被负债的恐惧所放大的时候，就像下面这个例子。这封信按原文格式摘抄如下。

阿林顿路 28 号  
卡姆登镇，NW 1  
1926 年 1 月 11 日

K. 布查姆书记

麦尔顿路 44 号，NW 3

亲爱的同志，我刚刚收到您1月8日的来信，邀请我参加12日星期二的小组会议。作为答复，我非常遗憾地告诉您，在我目前的境况有所好转之前，我不可能再参加任何会议了。

去年的12月6日，我交给科蒂同志一封信，解释了我为什么暂时无论如何都得放弃参加党的活动。我还得辞去伦敦北区委员会特别分会的工作，以及联合区委会和其他我所承担的工作，尽管我知道这些工作对党是有益的。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几个月前，我给地方党委会写过同样的内容。地方党委会那时的确偿付了我5先令，但我不想继续花费了，因为我负担不起自己掏钱到处奔走。我想把这整个事情先放一放，直到我能够承受得起。就像我对科蒂说的，这是我无法控制的事情。我的工资是2英镑15先令10便士。您只要想想一周就这一点工资要负担我自己、我爱人还有三个孩子。光一个房间的房租每周就需要14先令，煤炭、木材和灯油每周要8先令6便士。牛奶每周要4先令，每周的面包总得要4先令。同志您这就可以看出我们要花上所有的时间去弄到足够的食物，而不能浪费一个便士去乘车或者买一小盒香烟去开会。我希望我能让您明白并且相信，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要去做事是多么的不明智。是的，能做，但却非常令人不安。我们无力使自己的孩子穿得稍微像样些。就在最近，他们还得了支气管炎。我不得不请医生，这样一来，我就背上了债务。

除了这些，我想告诉你我最大的麻烦是，我欠了博拉德（Pollard）同志6先令6便士的一沓票钱，欠了马丁同志的《工人周刊》2先令，为小册子还欠了3先令6便士。我希望这个星期能够偿还一些，可是，这只有趁早才能做到。我只能诚挚地希望并相信您能原谅我拖欠这些应付的款项。只要一有机会，我保证这些会被全部偿还，因为共产党是我唯一真心实意拥护的党，再说，我也不想给他们造成损失。我希望您能原谅我写了这么多，耽误了您的时间。

D. 摩斯利 谨上  
(Bodleian Lib, Pollard Papers, Box 10.)

事的方式。

### 你的党证与人民斗争

伦敦码头工人正在举行罢工。伦敦的公交车司机已经取消了加班。700万个工人的房租将要提高。美国、保守党以及叛变的工党右翼领导正在不惜一切代价力图重新武装西德。西德的工会联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大选临近，人们可以写写这方面的事情。

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一天一天地激烈了，来年必将是自1945年以来进行工人阶级伟大战斗的一年。同志们，对于这些伟大战斗的结局我们绝不能听天由命！军阀和百万富翁们用氢弹威胁着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正危在旦夕。我们必须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去争取每一场战斗的胜利。这样的领导必须是坚强的，要想坚强就必须把这个国家中最优秀的和最能战斗的工人吸收进来。它必须从一个意识到自身的政治品质的阶级那儿得到充分的支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给党现在的每一位党员重新登记注册和我们支部必须在圣诞节前至少发展8位新成员的原因。我们在过去的1个月里，已经发展了6位新成员。有20个同志已经重新登记。

这仅仅是开始——

在12月1日之前我们对每一份党证都进行重新登记

到1月1日将有100名共产党员在西汉诺斯

领导为实现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战斗

支部的每一位成员都有责任去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贡献。

J. 戈尔曼（组织委员）

## 一 节约时间

除了“积极”之外，共产党人还一心想表现出“负责”，也就

是要杜绝没有准备的、随意的言行，提倡管束和控制。别人是依照自己的本能，我们要有更高的出发点；别人凭冲动行事，我们要靠“有组织的”领导。党做任何事情都得预先考虑，至少也是有目的的。我们说“考虑过的”话，我们采取深思熟虑的行动，我们对计划和预见进行论证。自发性会招致冒险主义，唯意志论会产生怀疑，无纪律会招致耻辱。在1971年占领之初，在上克雷德·希普比尔德（Upper Clyde Shipbuilders）的一次著名的事件中，当那位主要的工会发言人——一个共产党员，先前曾是共青团的全职工作人员——用“反对流氓主义”的禁令来吸引听众的注意力时，他只不过是把50年来的警告再现为常识。

“组织”是党的词典里的关键词，它通过一系列的环节而被放大了：“有组织的”工作，“有组织的”斗争，“有组织的”领导。它与效率有显而易见的联系，并且更多的是在潜意识里与理性和科学也联系在一起。它界定了我们行动被选定的范围（“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以及关于我们自身的理想观念，不管是作为工会发言人，还是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的带头人一般被称为“党的组织者”；我们的报纸仿照列宁《火星报》（*Iskra*）的光辉榜样，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组织起来就是为了成为重大事件的支配者而不是工具。组织在一种语域（register）中意味着齐整，在另一种语域中意味着力量，再在另一个语域中则意味着控制。

“……坚持不懈的、长期的、耐心的、有时显然是受累不讨好的组织工作”<sup>①</sup>，是我们的中心工作，它比更大的政治问题所引起的争议要多得多。在党的媒体上，它是能够引发真正的争论的极少数几个问题之一——也许，这不过是要不然就会被压制的不满的一种替代性的表达。在区和全国的大会上，它吸引了最大部分的富于想象的注意力。在支部里，我们按照我们应当达到的目标来衡量成功和

---

① Dimitrov, “Speech in Reply to Discussion”, *Seven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London 1936, p. 4.

失败。“系统”和“方法”，就像一个热情的地方书记说的那样，是共产主义工作的“本质”。“一个支部的组织无疑是这个支部的最重要的部分。没有组织，什么事情都干不了。做那些不重要的工作肯定是马马虎虎的，它所产生的坏处很可能要比好处多。”<sup>①</sup>

尽管从来不像工党和工会那样主张宪政主义，英国共产党循规蹈矩的迂腐气一点也不少。它喜欢按照指定的程序办事，喜欢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它形成了一些官僚习气：形式化的交流，标准化的程序，“尽心尽责、直截了当、准确无误的报告”（按照1923年的一份手册，这是党的生活中绝对不可或缺的），“落实决议时的最高效率”，“单调而平凡的工作中的耐心和决心”。就像其他的官僚机构一样，它认为把事情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来是非常重要的<sup>②</sup>。作出的决定总是要记录下来，发表的讲话要认真保存，回信要一丝不苟，并且（依照新左翼草率的标准）还要以令人羡慕的快件方式<sup>③</sup>。

像其他官僚机构一样，英国共产党也反对浪费。组织不时地要被“紧一紧”，以防止工作和职责的重叠。通过成立像南威尔士的采矿谷那样的“集中区”（concentration districts），挑选出“重点”工厂，关注“重点”问题并全力支持单一主题的运动，党的精力都集中在如何有效地利用资源和让党看上去比它实际上更加强大。在党的实践中，更多地反映了韦伯和其他人所发现的为现

① *Penge Discussion*, No. 1, May 1938.

② *Discussion*, June 1937, p. 3. 记笔记是党的工作中的一个首要的技能，也是刚入党的年轻人要最先学会的技艺之一。要是想到在党校里认认真真地做的那些笔记，以及党对文书工作的重视，一个手头没有笔和笔记本的共产党员实在是难以想象。关于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代表们对此的期待，参见“Hints to Congress Delegates”, *Party Organiser*, September 1938.

③ 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例子，参见 Nancy Williams, Letter of 8 Nov. 1927, in Pollard Papers, Box 11. 贝斯纳尔格林（Bethnal Green）的一位妇女来信询问有关妇女工作的情况，她的笔迹相当难以辨认，南茜在回信时加上尖刻的“又及”：“请你注意所有与此有关的信件必须寄给罗伯森，他再把这些信件送交给有关部门。”——这样的回信在旁人看来不啻为一枚炸弹。

代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节约时间”的观念。信件是简明的典范<sup>①</sup>，发言则以其严谨而备受称道。会议最好是“定期的、准时的并且要适当的短”。“不要拖延”，党的一个组织哲学家告诫支部委员会：“两个小时对于任何自重的委员会来说足够了。”关于这件事，彭吉（Penge）的支部书记用具有英雄气概的韵文向他的同志们呼吁说<sup>②</sup>：

将来的支部会议在处理完有关事宜后，会专门讨论当前的政治问题。讨论会由一位有能力开个好头的同志开始，他要为他的发言做好准备。要有一位沉稳的主席来主持会议，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在过去的支部会议上，吹毛求疵、没有根据的争论以及偏离讨论的主题，会浪费几个小时。细节上没有结果的争论不是商讨，而是阻碍……

集合起来前进

现在绝不是吹毛求疵或者漫谈的时候

从某种角度来说，兰道尔·斯温格勒（Randall Swingler）在他那首《五·一之后》<sup>③</sup>的诗中所说的“始终如一的准时”，最终被视为共产主义品德的精髓，就像那些被组织者指责为“不准时的”人被认为是政治上不可靠的一样<sup>④</sup>。邀请参加会议的纸条上明确说明了

---

① “这封信在简明、正确的表述……语言的朴实……方面是个典范。”参见 *Party Organiser*, March 1937, p. 8.

② A. T. Clarke, in *Penge Discussion No. 1*, May 1938.

③ “酝酿中的组织，悄悄赢得  
谨慎的人们的信任……  
那始终如一的守时，倾耳聆听……  
绝不惹人注目，除非面对错误……  
做一个共产党人就是如此”。

参见 Randall Swingler, “After May Day”, in *The Years of Anger*, London n. d., p. 19.

④ Upward, *The Rotten Elements*, p. 31.

开始的时间并要遵照执行。“你必须在8点到达。如果你答应了，就要出席。要是有人迟到了，你要去看看他们。”<sup>①</sup>我母亲对于战时的斯劳支部有着相似的印象。“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迟到。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那么盼望着开会。”在这样的事情上，领导同志要做个好榜样。他们不会摆出一副舞台明星的派头姗姗来迟，相反，他们认为提前到会是很重要的（根据其传记作者的说法，哈利·波利特总是比预定的时间提前半个小时到达开会的地点）。廷悉德（Tyneside）区的一份1942年油印的手册（《怎样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建议班级导师要按照下面的这个样子去做：“在上课的时候，导师必须带着全部的讲义提前至少15分钟到达，要检查班级书记是否正确地履行了他的职责，并绝对要在规定的时间准时开会。准时是至关重要的。无论什么都不能影响准时。”给班级书记的指令更加严格：“班级书记要比预定时间提前至少30分钟开始工作，把教室准备好。这必须成为一个硬性的规定。没有什么比松松垮垮的准备工作更能毁掉一门课程了。”<sup>②</sup>

在这个党的早期，官僚政治的热情是通行无碍的。行政机构常常打着漂亮的幌子迅速膨胀。1925年的伦敦区委会就把自己称为“主席团”<sup>③</sup>。为了保证行动的统一性还同步进行了一些活动（如“反战周”）。党小组作为党的基本的组织内核，会收到来自中央的

---

① 根据 R. 贝拉米的说法，在战前牛津的学生支部里，有一个与这不一样的例子。“组织是极为严格的。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女友将要去加拿大一年，他去车站为她送行，回来参加支部会议时晚了10分钟……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被罚了5先令。”参见 Memoir in Margot Kettle ed, *A Younger Generation* (unpublished typescript)。

② Communist Party Archives, *How to Run Marxist Education*, NE District 1942, pp. 15, 21.

③ Bodleian Lib., Pollard Papers, Box 4, letter of 7 August 1925. 这封信的署名是约翰·马洪，他后来担任了伦敦区党委书记。一位曾经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关系密切的昔日同事记得他的“博学”，最后，他成了一名历史学家。参见他的《哈利·波利特传记》(*Harry Pollitt, A Biography*, London, 1976)。



大量指令和建议<sup>①</sup>。被任命为负责政治教育的“指导员”和“教员”，必须通过笔试才能获得上岗的资格<sup>②</sup>。

一个与此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党的生活中难以消除的特征，就是对汇报热衷到极点。汇报既可以作为一种精心设计的监护机制，又是一种承担责任的方式。“定期汇报的机制”被强加于党的各级单位，并采取一些标准化的形式鼓励人们这样做<sup>③</sup>。英国共产党在最初的时候，要求各个支部和地方党组织一周汇报一次，而党员个人则似乎要填写每天的工作表<sup>④</sup>。到了1927年，不那么狂热的每月汇报一次就成为常规了<sup>⑤</sup>。早在1921年11月的伦敦区，就要求地方党组织中的各类积极分子都要定期汇报，包括支部领导、宣传人员、出售小册子的人、工会或者工党的代表、合作社的成员，以及在失业者当中做鼓动工作的人<sup>⑥</sup>。到1923年，由于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报告——一个是统计的，另一个是政治的——以及金字塔式的监管措施，而使汇报的程序系统化了。《党员手册》规定：“……个人每周要

---

① 备忘录是党在写作上最饶有兴趣的发明创造之一，它提供了关于工厂生活的丰富信息。在马洪1926年关于工厂文件的一份备忘录中，对中央的指令和建议，有最为详尽的说明，甚至包括图画使用方面的技术性的建议（“……前页的卡通画非常重要”）。参见 Pollard Papers, Box 2, LDCP Factory Group Dept., July 1926。

② Pollard Papers.

③ *Handbook for Party Members*, 1923, pp. 4 - 5.

④ 有一个来自圣潘克拉斯的早期例子，日期是1921年10月。它记录了肯特城的C. E. 布伦斯顿同志整整一周的工作情况：

周一 失业者会议，如果有的话

周二 选举地方党委

周三 党的执行委员会

周四 工会委员会

周五 党的大会

周六 失业者会议

周日 党的户外集会

代表地方党委会

失业时 失业者委员会

⑤ *Handbook on Local Organisation*, 1927, p. 12.

⑥ Pollard Papers, Box 11, London Dist. Council, Nov. 1921.

向他的小组领导汇报；小组每周要向地方党委会或者负责的专门委员会汇报；地方党委会每月要向地区党委会汇报，汇报的副本要送交总部；区党委会每月要向总部汇报；领导层每个季度要向国际汇报。”<sup>①</sup>

这个党还初步养成了对部门划分和委员会工作的偏好。根据1930年实施的组织规范，每个地方党组织要维持不少于六个主要部门（有趣的是，还包括一个负责“殖民地工作”的小部门）<sup>②</sup>。工厂的同志同样要进一步细分为“部门的”和“工厂的”小组，每一个都应当有他们自己的“办公室”，“应当定期开会……讨论与党在工厂中的常规工作相关的问题，检查各个部门的小组工作，确定当前的任务”<sup>③</sup>。其次还有各个地区的委员会——地方的和工厂的党小组都要向他们汇报——以及联合阵线组织和特别委员会。一位伦敦的同志在1931年写道：“让我们把每一个小区（small district）都画一个图下来”，抱怨为了党的工作需要“爬”到这个大都市的每个地方。“我们有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少数派运动、宪章委员会、青年宪章委员会等。再者……与此有关的还有数不清的支部委员会。这会有什么后果呢？领导同志们发现，他们总是在从一个委员会的会议飞快地赶到另一个……这些同志们的精力完全耗在所有这些数不清的组织中了，要是说这里还在进行实际的斗争，那可真想不到。”<sup>④</sup>

---

① *Handbook for Party Members*, 1923.

② 这六个部门中的每一个还要细分。“在组织部里，有一个党员负责搞活动，一个负责管理，一个负责财务，特别要有一个负责共青团。在劳资部，一个党员负责少数派运动，一个负责全国失业工人运动，一个负责国际工人救济组织，一个负责合作社工作。在宣传部，一个党员负责情报，一个负责媒体，一个负责培训，一个负责殖民地工作，一个同志专门负责选举工作。”（*Building the Party in the Factory*, 1930, p. 27.）也许是作为党的国际主义的一种象征，也是它对议会制度的轻蔑的象征，“殖民地工作”应该享有对于选举工作的优先权。

③ “Party Life”, *Communist Review*, Jan. 1932, p. 55.

④ “Bring Them All Together”, *Communist Review*, July 1931. 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主张用一次会议来终结所有的会议，这也许可以提醒人们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一现象的国际性。

## 二 庄严的会议

从早期开始，共产党就对它在程序上按部就班的特点引以为豪。例如，（在1927年的培训手册里）工厂小组要“从严要求”开展他们的工作<sup>①</sup>。我们从党的一位组织者的论文集中获知，曼彻斯特铁路第二小组每周的例会有一个正式的议程，并且“会议记录随后要打印出来”<sup>②</sup>。地方党委的会议也要预先做好认真的准备并且会议的进行要符合爱德华·厄普沃所说的“形式的正确性”——他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参加过一次<sup>③</sup>。“领导同志”对自己的报告要经过“最充分的准备”，到会上去的时候要事先对有关情况有充分的了解<sup>④</sup>。事先起草好会议议程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准备工作无论是对支部会议还是对支部的委员会，都是书记的“最重要的任务”。“每一项内容都要依据这些议程”，1944年，米德兰（Midlands）的同志们被告知：“……它们体现了党的生命和党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给予它们应有的重视，不能掉以轻心。”<sup>⑤</sup>

尽管没有议会上的那种议事程序<sup>⑥</sup>，党的会议也有完全属于它自己的规矩。你的发言不要像参加过大学研讨会的人们所熟悉的那样，恭恭敬敬地去讨论如何“作出贡献”的问题。假如由你来开始，你

---

① *Handbook on Local Organisation*, 1927, p. 27.

② Ruth and Edmund Frow, *The Communist Party in Manchester 1920 - 1926*, Manchester n. d., p. 19.

③ Edward Upward, *No Home but the Struggle*, London 1979, p. 43.

④ Blackwell, *Some Guiding Points*, pp. 8 - 9.

⑤ Blackwell, *Some Guiding Points*, pp. 5, 10.

⑥ 1937年，当支部委员会提议采用议事程序的时候，南安普顿的党组织中惶惶不安。对议事程序的接受是以如下条件为前提的：“当政治的地平线由于法西斯主义的威胁而黯淡下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准备抛开它们。”参见 *Discussion*, Dec. 1937, p. 9。研究早期劳工运动的历史学家们常常充满感情地提到这种对于规矩的偏爱。参见汤普森（E. 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第一章。

就要作个“报告”；要是由你来结束，你就作个“总结”。当你要在会上发言的时候，你要经过会议主席的批准。“你可以站出来说出你的想法。”我的母亲（一个容易激动的人）回忆道：“可是你要以正确的方式说——‘主席同志……’。”在较高级的党委会上，甚至要更正式地来宣布会议的规范要求。“你可以发一次言，也只有一次。”约翰·萨瓦尔（John Saville）回忆起他战后在共青团伦敦区委的日子：“不能即席发言或者信口开河，不能随随便便地，而是要按照笔记来讲。”<sup>①</sup>

然而，必须要说的是，这些纪律与其说是宪政主义的，不如说是政治的。党的会议要把事情解决好，要把当前发生的大事解读成正在进行的冲突。在“吸取教训”和说明目标和任务之前，会议开始的“政治报告”要先讲国际形势（即使是解决违纪问题的听证会也要从它开始）。如果讨论纠缠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就会有人提醒我们形势的严峻性，以此来“提升讨论的水平”。另一方面，如果有同志“唠叨”（也就是离开主题去泛泛而谈），就会有人提醒会议还有“工作”要做。

我母亲的丈夫比尔原先是个水手，后来成了工程师，他在1934年入党，他记得他最初参加的那些会议是“庄严的”。利物浦的瓦梧树（Wavetree）支部（那时叫做“小组”）虽然小（“有20个成员，但只能有10~15人到会”），却非常活跃。区委书记弗兰克·布莱特非常欣赏它<sup>②</sup>。这个小组在火车司机比尔·汤林逊家的厨房里开会，

---

① 口头交流，约翰·萨瓦尔。在埃塞克斯的罗姆福特他的地方支部里，事情比较轻松自由。

② 一个简短的论文集，参见 Edmund and Ruth Frow, *Frank Bright—Miner, Marxist and Communist Organiser, 1891 - 1944*。布莱特从党一诞生起就参与进来。他是南威尔士的矿工、地方鼓动者，在监狱里关过一段时间。后来，他进了莫斯科的列宁学校，回来后成了专职的组织者。比尔说：“他相当了不起。我常常好几个小时地听他讲话。他没钱租房子，就睡在办公室的桌子上。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总是在为我们忙碌着。”在一条较为私人化的注释中，比尔称他“五官轮廓分明，非常英俊。他就像磁铁一样把所有的年轻人都吸引到他的身边”。

他的妻子爱丽斯也是这个小组中的积极分子。支部的领导人是普雷斯·威廉姆斯，一个威尔士教师。比尔“跟他合不来”（“纯属私人的……他有点争强好胜，想当头”），可是却说“他为党工作了许多年，我想他付过我们的房租了”。支部管财务的是“戴着一顶布帽子的秃子”乔治·卡尔洛，他是来自丁格尔（Dingle）的码头工人。提到他，比尔说：“他头脑里没什么政治观念，但是热爱党。他对于经费有特别的热情，常常举起双手说：‘同志们，财务管理是党的生命线。’看着自己的脏兮兮的小党证，我们都有一种愧疚感。只要他在那儿，你总会把欠款付清。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可爱的人。”瓦梧树的小组会议也会讨论世界上发生的大事，但它的主要作用还是“检查决议是否得到贯彻”（“党有这样的癖好”）。“人们对于党是非常认真的。你要做的是重要的事情。‘星期二皮克顿路的群众集会，谁愿意去写标语（chalking）？’我们知道将要发生一场战争，我们要把这件事告诉人们：‘今天炸弹落在了马德里，明天就会落在伦敦。’”<sup>①</sup>

比尔在战时工作过的赫斯敦（Heston）飞机制造厂的支部要大些。“这是个优秀的小组。我们相处融洽，协调得也很好。”支部会议在附近的一个叫做“三只喜鹊”的小酒馆召开，比尔是召集人。“它不是非常正式，可那儿有许多权威人物。不是我，是房间里的。我宣布会议开始的时候总是说：‘好了，兄弟们，让我们开始吧’。我从不喜欢用“同志”这个词，它听上去没有英国味。有一次我为此招来了麻烦。有个年轻的家伙，他向西米德尔塞克斯（West

---

<sup>①</sup> 比尔说支部里的害群之马是托米·麦卡恩，铁路上的一名送货司机，但比尔跟他相处得很好。“他非常喜欢杰克·伦敦，我们过去常常滔滔不绝地谈论杰克·伦敦。可是他从没有去过那儿。我们常常不得不把他唤醒过来。你不可能使他符合《工人日报》的方向，他大多数时候是在读莎士比亚。”然而，在1940年，当比尔偏离“芬兰路线”（Finland Line）时，他发现托米是竭力捍卫正统的人。“他甚至懒得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而是逐字逐句地按照《国际新闻通报》（*Imprecorr*）上面的话。”比尔把他的经常性的缺席归因于轮班工作。“他在工会中是非常积极的，而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要通过工会的。”

Middlesex) 的菲尔·帕勒廷提意见。可他们好像没当回事。”<sup>①</sup>

在公众集会上，需要的是另外一种纪律。我们把工党的人在拉选票时的那种耐心和专注都用在上面了，当然，也用在示威活动上。地方和支部会接到大量关于集会筹备的指示（20世纪40年代流行的“组织活动表”一周接一周地安排好了任务）。随着日期临近，我们卖力地推销入场券<sup>②</sup>，大量散发传单，并派出写标语的小分队[我的表哥蒙蒂告诉我，在南瓦克（Southwark）的党组织中，有一个专门负责写标语的干事]。宣传部在1927年建议说，“有组织的准备是关键”，不是为了维持秩序，而是为了“留下好印象”。主席将会通过准时开会、“恰当地引用和参考待售的资料”来“消除懒散”。

党的演说家们从来不做无准备的发言。特德·布兰姆利（Ted Bramley）过去时常对他的发言人学习班的学员说：“要是没有事先为你的发言做好准备，这对于工人来说是一种不尊重。”1930年左右的要求——至少也是中央的建议——是负责宣传的领导、发言的人和主席要开一个预备会，要把发言人的讲稿再检查一下，以便“确保会议的负责人已经对会议做好准备……没有准备好的发言人不应当允许发言。”<sup>③</sup>年轻的厄尼·本森发现，不仅对发言人是这样要求的，对于主席也是如此。1929年，当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工程师加

① 我要强调的是，比尔从来不像我的母亲和我自己那样，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者。在入党之后不久，他就因为出席工人教育协会而惹上麻烦[瓦梧树的同志以劳工学院全国理事会（NCLC）的名义起誓]。后来又在1937年因为在参加国际旅的路上在巴黎被拦回来而厌恶地离开了党。在20世纪40年代，他“事实上已被逐出”，因为他拒绝支持芬兰路线（“我认为俄国人保卫他们自己是对的，但他们应该诚实，不要假装芬兰人在准备发动进攻”）。大约在1951年，他被开除出党。对于这些，他尽管感到苦恼，但悔恨的心情还是占了上风——“它是英国人民曾经有过的最好的党。”比尔说：“可惜斯大林……”

② 参见 Margorie Pollitt on the “Crusade” Campaign in *Party Organizer*, Jan-Feb. 1939. p. 6. 我相信，入场券是人民阵线时期的一个创新，就像地方报纸上的广告一样。

③ “The Organization of Meetings”, *Communist Review*, July 1931.

人利兹（Leeds）的党组织后，他发现自己不仅要负责主持公共集会，还要负责预定场地、组织散发传单和写标语等。“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我几乎没有吃午饭和准备集会开始用的讲稿的时间……可是我想人们不会想要听我讲多少，墨菲同志（党的领导成员之一，那时是第三国际的代表）会设法搞定的。在我站起来开始讲话的时候，发现到会的人相当多。可是我说了还不到一分钟，就听到墨菲对我咕哝，‘你没为这次集会做好准备呀！’”<sup>①</sup>

### 三 共产主义的街头纪律

与近些年相比，党所组织的示威活动在过去要训练有素得多：有节奏的此起彼伏的口号声、整齐的游行队伍，还有大合唱。在提出“正确的战斗口号”，去掉不合适的口号，以及示威游行时的秩序等方面，党都花了很大的心思。例如，下面是1928年“五·一”大游行中伦敦区委给党的各先遣分队的指示：“在示威游行中，我们的党员应该加快脚步、整整齐齐，不要像往常那样拖拖拉拉。尤其是要指定一些负责指挥的人员，去带好党的先遣分队。合唱也要这样安排：党应该带头唱一些真正的革命歌曲和劳工歌曲，例如‘红旗’、‘国际歌’、‘红军进行曲’等，不要唱像‘究竟是谁’这样的曲子。”<sup>②</sup>示威者知道他们可能会遭到警察的攻击。的确，直到1934年（那年在宽容的舆论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警察驱散共产主义的示威活动还是司空见惯的（这样的事情在1947年和1948年的伦敦再次发生，那时的工党政府禁止举行“五·一”大游行，我们不得不举行了不合法的游行活动）。可是示威者自己也极为注意不要“挑衅”或者情绪失控。随着人民阵线的形成，这个党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要求党员走上街头时衣着体面。为了维护“团结”，对一些口

<sup>①</sup> Ernie Benson, *To Struggle is to Live*, Newcastle on Tyne, 1980, Vol. 11, p. 77.

<sup>②</sup> Pollard Papers, London District Party Committee, 19 April 1928.

号进行了修改<sup>①</sup>；早些时候的宗派主义歌曲也不唱了；还在场面的壮观和色彩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对于良好秩序的重视还一如既往。《党的组织者》在1939年的一则注释中这样写道：“如果你要的是步伐整齐的行进而不是漫步，就不能小看任何一面鼓。”<sup>②</sup>

饥饿大进军（the Hunger Marches）按理说来是这个党对英国劳工事业的最大贡献，也是它重视秩序和纪律，以及有能力去组织持久而紧张的运动的证明。这些进军必然需要复杂的组织工作，它们需要仔细的安排和计划。沃尔·哈宁顿是一位结构工程师（在1917年他是肯特城的一个工头，后来他在斯劳从事斗争工作），作为这些游行的主要组织者，他对什么事情都“相当有办法”。他一丝不苟地指导着示威者，就像他日后对待工会中的日常事务一样 [他的《主席先生！》出版于1950年，是谢特林（Citrine）的《主席资格ABC》的左翼的替代物]。

自从饥饿大进军受到警方的持续骚扰，包括有计划地利用特务和安插密探以来，领导工作显得至关重要。他们必须通过谈判来消除《济贫法》的权威人物，甚至工党领导和工会联盟的敌意，还要争取群众的支持。饥饿大进军的领导层必须把它的政治功能翻一番，承担起军需部门的角色，使得一队一队失去工作、常常饿着肚子的男人们能够行进在那成百上千英里的路上（1930年，在游行队伍中有一个妇女小分队，尽管按照通常的规矩，它是被分隔开来的）。1934年大进军的指示可以为行动的规模提供一些信息：“由于这次进军要在隆冬时节进行，所以必须要为每个示威者配给一定量大号的衣服、结实的靴子和大衣，以及一个真正的军用背包。没有这些

---

① 我的表哥蒙蒂描述了1938年的一个“团结”的例证。他记得南瓦克的同志争论到凌晨三点钟才决定了一条大家都认可的标语。具体争论的是怎样为“塔博德演员”——本地的一个党小组——演出《奥利弗·特威斯特》的有篷货车制作一条合适的横幅。最后，我的表哥偶然想到了那条成功的标语：“狄更斯为孩子们的幸福而战斗，团结起来把战斗进行到底。”尽管读起来不怎么悦耳，但它表达了集会的主题。“我们必须设法保持‘团结’。”

② *Party Organizer*, April 1939.



必需品就不能把示威者派出去。每个先遣队里都必须要有鞋匠或者会修补靴子的人，还要准备好合适的工具。在白天，必须要为示威者提供热饭，因此，在一些主要的先遣队中，如苏格兰、东北海岸、兰开夏以及约克郡，那里的人们在路上已经走了十多天了，我们就必须携带野外厨房。这就意味着现在就要去弄些锅炉。”<sup>①</sup> 参加饥饿大进军的人们非常重视行进中的步调一致，他们每 20 个人组成一队<sup>②</sup>。这样做部分是由于“可以使人们走得更快些”，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依照关于游行的一条指示）“这样可以更加引起公众的注意并且体现出效率和管理能力”<sup>③</sup>。按照号声整好队伍出发也成了游行中的常规<sup>④</sup>。军队里的号令响起来了。例如，在 1922 年第一次全国性的饥饿大进军期间，当示威者“在 10 月 31 日雾气蒙蒙的早晨”集中在博尔顿的维多利亚广场时，他们相互谈论着过去在军队里的日子，按照“各队——报数”的命令排成队形<sup>⑤</sup>。在 12 年之后的 1934 年的游行中，军队的气氛仍然很明显。兰开夏郡的队伍按照军队的样子走了 50 分钟后，接下来就休息 10 分钟。在开始的几天里他们由一个军士长走在旁边，保证队伍步伐一致、排列整齐<sup>⑥</sup>。可是，只有 1928 年的威尔士矿工的进军似乎才是所有队列当中最具有军人风格的。组织委员会为了保证进军的效率和纪律，一度急于招募退役军人。他们得到了成百上千的志愿者。最终出发的 300 人当中有 60% 都是老兵。每个 20 人的小队都有自己的队长。两个小队组成一个连队，每个连队也都有自己的连长。所有的领导都是退役军人。袖章上的一颗、两颗、三颗红星，分别表示他们的级别。急救

① Peter Kingsford, *The Hunger Marchers in Britain, 1920 - 1939*, London 1982, p. 177.

② Wal Hannington, *Unemployed Struggles, 1918 - 1936*, London 1979, p. 189.

③ Wal Hannington, *Unemployed Struggles, 1918 - 1936*, London 1979, p. 210.

④ 关于地方上失业者大进军的例子，可以参考 Frow, *The Communist Party in Manchester*, p. 21——这是一场从奥彭肖（Openshaw）、高敦（Gorton）和牛顿希斯（Newton Heath）开始的大进军。

⑤ Kingsford, p. 38.

⑥ Kingsford, p. 182.

由一位前皇家陆军军医队的中士负责。有一辆卡车装着野战厨房，一辆摩托用于侦察。由4人组成的纪律审判团有权开除任何不遵守纪律的人。每个矿工都带着他的安全灯，黄昏时就点亮它。在路上遇到这成千上万的人，首先看到的就是远处黄昏中300盏灯发出的摇曳的光<sup>①</sup>。

尽管大部分人都是自愿参加的，但偶尔还是要通过开除一些行为不端的人来加强纪律性。按照规定，不允许在行进过程中喝酒，示威者为自己乞讨更是被严格禁止。没有请假就擅自离开好像也是被作为行为不端来对待的。在利塞斯特（Leicester）1922年的饥饿大进军中，它成了一次正式审判的主题，一件后来想想都觉得怪异、搞笑的事情<sup>②</sup>：

从他们自己中间挑选出来的法官、陪审团、律师和官员们，集中在工会的俱乐部里，传达员以大不列颠苏维埃共和国的名义宣布开庭。被告所受到的指控是，他故意缺席参加饥饿大进军的人在诺丁汉某地的宿营，结果使他们租了一张床却没有使用。他还缺席了会议，也没有参加第二天早晨到拉克城的游行。他认为自己没有过错。在宣誓之后，他在律师的讯问之下承认：他碰到了一个老朋友就跟他去睡了，因为他想洗洗。他被认为有过错，并被罚以“每天推车，直到我们到达托特汉姆；停发烟草津贴三天”。

#### 四 科学管理

共产党常常被它的批评者（后来则被它自己）指责为“斯大林

---

① Kingsford, p. 84.

② Kingsford, p. 63.

主义的”，可是，党的组织工作把纪律置于中心地位——根据这种纪律，持不同政见者现在仍被开除出党——这一点在灵感上却是前斯大林主义的。对它的基本原则作出坚定甚至专断的陈述的是杜德和波利特的《组织报告（1992）》。该报告被1922年的巴特海代表大会通过的时候，斯大林的名字至少对于英国的同志们来说还不知道。这份报告按理说是党的历史上最重要的文件，应该得到比它已经得到的更多的关注。这份文件出自年轻人之手，它对于那些被说成“讨论会”（discussion shops）的会议很不耐烦。它毫不含糊地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党的专政”<sup>①</sup>。它赋予专职的办事人员以一种特权的，甚至垄断的地位，而在英国共产党创立之初的那段时期，就像在它的社会民主联盟的前辈那里一样，这些人是不能担任党的任何职位的<sup>②</sup>。杜德和波利特对创造出一个“机器”的必要性论述得非常清楚而准确：“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建立某个鼓动家的社团或者是革命者俱乐部，而是要去创造一个高效的阶级斗争机器，它能够组织所有的工人阶级的斗争活动，能够与复杂而集权的国家机器相抗衡，并能最终把生产它自身的组织工作掌握在手中。”<sup>③</sup>

他们的基本原则是工作的集权化和专业化，这些口号实际上绝不仅仅是必要的补充。他们主张不再把支部当做一种单独的东西，相反，每一个党员应当直接隶属于党中央，它是共产党中“持久地指引方向的机构”，它的工作人员都是专职的办事人员（有一种令人产生恻隐之心的要求，坚持认为他们应当生活在伦敦和大城市里，并且上班的距离要在步行的范围之内）。这份文件反对任何不在党的领导之下的组织，包括群众联盟。“我们不能让我们党员的培训受到外来的影响。”<sup>④</sup>于是，新发展进来的人

---

① *Report on Organisation*.

② 参见 Tom Bell, *The British Communist Party, A Short History*, London 1937, p. 82. 其中论述了地区和支部的自治传统。

③ *Report on Organisation*, p. 15.

④ *Report on Organisation*, p. 52.

立刻就进入党的培训小组。“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必须体现在党组织的最小单位之中……指示和报告中的路线必须在党内得到正确贯彻。”<sup>①</sup>

英国共产党所执行的组织纪律，在思想上可以归结于同时存在但又绝不完全一致的若干不同影响。作为一种管教和控制的冲动，发号施令的意志在社会主义观念刚刚诞生时就已存在了。这种意志在据称是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的“乌托邦主义者”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那里，比在被认为是权威主义者的马克思那里，说得更多。相比马克思来说，恩格斯是一个现代主义者，是理性和科学的热情倡导者，他明确地把组织与进步联系起来。他还把它视为社会革命中的主导特征。在他的《论权威》（1873年）一文中，他竭力反对“自治论”。他认为，组织化是现代工业的突出特点。那些把社会革命作为他们的事业的人同样有责任采取“联合的行动”。组织意味着权威，而权威则又以服从为“前提”。恩格斯严厉批评了那些认为可以不要权威的人。“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sup>②</sup>

当然，列宁在他对革命队伍中“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者”和“把革命当做业余爱好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批评中，也同样表示出鄙夷。他认为组织是无产阶级的唯一武器。1902~1904年，在他批驳“自发性”和迁就群众的尾巴主义（tailism）的文章中，他阐明了革命政党的基本原理。然而（人们可以争辩说），列宁在1902~1904年的小册子里说的组织，本质上与生存有关，与沙皇专

① *Report on Organisation*, p. 70.

② Frederick Engels, "On Authority", in Marx-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 1, Moscow 1950, pp. 575 - 57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27页。——译者注)

制统治这一特殊条件下暗中酝酿的骚动有关。就社会主义的前途而言，他在（十月革命前夕匆忙写成的）《国家与革命》中的想法还是像巴黎公社时期的一样——工人自治的民主国家。新的秩序将会建立在工厂委员会的基础之上，就像“双重政权”（dual power）时期的苏维埃那样。

战时共产主义（1919~1921年）和第三国际的成立把纪律和组织从手段拔高到目的，并使之渗入到所有共产主义事物的骨子里。集权化的纪律是第三国际主导性的观念，而在俄国遭到同盟国干涉的时候——那段时期契卡（Cheka）到处活动并处死了许多人<sup>①</sup>，“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发生了新的和难以挽回的转向。战时共产主义是发布专断命令和指令的共产主义。作为“革命队伍中的通病”（托洛茨基）<sup>②</sup>，“组织拜物教”也受到了“阶级斗争”观念的怂恿。“阶级斗争”这个术语源自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20世纪20年代的共产主义者把它拿来作为自己的术语<sup>③</sup>。革命不再被想象为在设置街垒路障时期的自发的群众起义，或者是大众的狂欢，而是一场由上面（第三国际在早期常常被说成“工人的最高指挥部”）来指引方向的军事上的和思想上的斗争，它的追随者要默默地服从，要无条件地自我牺牲<sup>④</sup>。

在20世纪30年代，“计划”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程序和万应灵药，“组织拜物教”也发生了全新的转变。“官僚乌托邦主义”绝不只是为共产主义者所独有的特点。的确，就像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讲

---

① 对于契卡在内战时期的普遍存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他的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证明是很有价值的。感谢西奥多·肖宁对此的讨论以及其他与战时共产主义相关的观点。

② Tro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 818.

③ 要是有《新左翼评论》的读者能够提供这一术语的来源，我将不胜感激。

④ 这是布莱西特（Brecht）的《手段》（*The Measures Taken*）中令人心寒的主题，也是哈克麦特（Hikmet）的诗《列兵》和《列兵之死》中的主题。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不能录下西奥多·肖宁好心地为我译出的译文，但它们将出现在沃索版的书中。

过的那样<sup>①</sup>，苏联的五年计划对费边主义者比对共产主义者有更为直接的巨大影响（工党领袖 1932 ~ 1933 年在俄国朝圣，而英国共产党此时却仍专心致志地在失业者中进行宣传鼓动、搞群众运动和“以阶级对抗阶级”）。社会主义首先被费边主义者接着又被共产主义者重新界定，它不再是英国共产党过去一直理解的“工人的专政”，也不是卫布斯（Webbs）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里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民主国家的制度。它是计划经济、理性社会，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化和物质繁荣的未来。在 20 世纪 30 年代，计划成了普遍的偶像，它把共产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在共产主义想象中显得朦胧而又庞大的新的追随者即“进步人士”，联系在一起。俄国人的口号“技术决定一切”，既是党组织的当务之急，也体现在它广泛的社会理想中。共产主义意味着最新的效率，意味着按计划进行劳动。就像约翰·萨姆菲尔德的富有想象力的工人在《五·一》（1936 年）中说的那样：“一旦我们掌握了政权，我们就可以从容地开始，因为一切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多的工厂，还有其他的一切。”<sup>②</sup>

英国共产党的组织热情也可以更多地归结为福特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外在影响。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也具有“科学管理”的特征，布尔什维克想把这种“美国效率”引入俄国。“科学管理”信仰的是“精确性”和“节约劳动”的装置，并致力于“把事情做好”。共产党人对准时的执迷再次与“快速”和那些按照时间与动作（time-and-motion）来管理的事务明显地密切联系起来，这些东西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引入英国比较先进的工业部门的 [例如“贝德克斯（Bedaux）制”，它是共产党人领导的若干次工程业中的罢工的目标]<sup>③</sup>。它可以追溯到那些古老的道德准则，尤其是节约时间。这些准则就像爱德华·汤普森（依照韦伯的观点）所说的那样，对于

① Raphael Samuel, “The Cult of Planning”, *New Socialist*, January 1986.

② John Sommerfield, *May Day*, London 1984, p. 123.

③ Mick Jenkins, “The Time and Motion Strike”, *Our History*, Richard Croucher, *Engineers at War 1939 - 1945*, London 1982.

工业革命来说是本质性的<sup>①</sup>。诸如此类的联系不全是思想上的。哈利·波利特在成为共产党的领袖之前是制造锅炉的，他以“刚好准时”散会而闻名<sup>②</sup>。在他的自传中，他坦率地把他的准时归结为他的职业的产物。“我的父亲”，他写道，“总是在铃响前至少一刻钟就开始干活了，他也使我养成了同样的习惯。这么多年来，无论是在工厂、锅炉车间，还是在造船厂，我不记得有一次上班迟到的。”<sup>③</sup>

其次，也可以认为，在英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与工党和工会相应的新的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亲缘关系，可能是一种同胞之间的竞争。在这里，人们可以诉诸 1922 年的合并活动，它产生了运输和普通工人联合会；或者是诉诸 1920 年工会联盟的代表联席会（General Council）的成立（另一个带有更多宪政主义色彩的由工会发言人团体和工团主义者所要求建立的“最高工人指挥部”）。在工党内部，亚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在党的总部正试图在某种程度上按照杜德和波利特的方式，把那些自治的组织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并且，在整个党内有一种趋向于排他性的忠诚的力量<sup>④</sup>。在地方上，英国共产党对于蓝图和规划、目标和计划——尽管是用于集会和示威活动这样的事情上——以及发展新人和散发材料的热情，可以视为与 20 世纪 20 年代由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所倡导的“采用科学的方法争取选票”以及工党在大城市中处于萌芽阶段的组织机构相对应的东西，尽管是在非常不同的领域内。

最后，可以把“组织拜物教”限制在行为理念的宽泛范围内，例如，公学中的合作精神，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制度”和“方法”，商

① E. P. Thompson,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1967.

② John Mahon, *Harry Pollitt*, p. 431.

③ Harry Pollitt, *Serving My Time*, London 1940, p. 27.

④ 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讨论，参见 Ross McKibbin, *The Evolution of the Labour Party, 1910 - 1924*, Oxford 1974; James Hinton and Richard Hyman, *Trade Unions and Revolution*, London 1975; Raphael Samuel, "Enter the Proletarian Giant", *New Socialist*, July 1985。感谢蒂姆·梅森所建议的“同胞之争”。

业主义的“推动力量”、工厂劳动在职能上的相互依赖和专业化（葛兰西在1920年把共产国际比做覆盖全世界的制造工厂）。随着人民阵线的到来，小资产阶级的财产观念也在不知不觉中出现在党的言论中。“得体”（correctness）这个观念可能在列宁的秘密（clandestine）著述（或者是在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系统化）中，有它的根源，可是它在英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故作体面的举止中，有其行为上的对应物。追求团结——相应的就是害怕分裂——不仅出现在党的标语中，也似乎表现在这些标语的书写方式上。“要是用整洁的书法和漂亮的标语把它搞好”，阿伯丁（Aberdeen）支部的书记在1938年写道：“效果非常好。除了本地的大人物之外，没有人会感到不快。印刷体的字母、几米高、伸手伸脚的快到了街中间，是一种丑陋的东西。”<sup>①</sup>从同一时期起，《工人日报》在斯沃因海（Swansea）的党组织者，就怎样扩大报纸的销售量同时又不违背商业法则，提出了他自己的建议：“为了接近店主……我们应该就把报纸当做一门生意来对待，我们作为党的代理人和成员，应该一直保持整洁，并把有条不紊的方法与善意地倾听关于税率和坏账的牢骚结合起来。”<sup>②</sup>

共产主义者相信他们自己是现实主义者（按照列宁的说法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是用实践活动来检验理论的。共产主义，在其自我理解中，是理性主义的、世俗的，甚至是主张专家治国的。然而，对于组织化的执著既掩盖了又表现着对于全能的幻想。假如我们的弱点可以归因于（像它们一直如此的那样）组织上的不成功，那么计划和体系当然可以克服它们。就像区的组织者为了给大会的代表鼓劲而常常说的那样：“只要我们的行动正确，就没有什么事是办不到的。”<sup>③</sup>在

① *Discussion*, March 1938.

② 参见 *Party Organiser*, Nov-Dec. 1938, p. 21。其中写道：“这使得《工人日报》对人民产生影响。”在早期，《工人日报》遭到了报纸经销商的联合抵制，只好由志愿者来分发。

③ 参见 Ernie Trory, *Imperialist War*, p. 235。引自他1940年在苏塞克斯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五年计划时期，共产主义最终被设想为——用休·麦克达米特（Hugh MacDiarmid）的话说——“组织化到极点”<sup>①</sup>。因而，假如目标可以充分实现的话，一个敏感的青年作家，例如《五·一》里的约翰·萨姆菲尔德，就可能依照日程表去想象革命。组织化的幻觉正是他梦想中的东西。

去年4月底，伦敦的共产党有4562名积极的缴费党员，组织成183个工厂小组和主要是以街道为基础的237个其他小组。12个月以后，党员人数上升到了7084，组织成342个工厂、铁路、车间和运输小组，以及286个其他小组。可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人数——它去年只有2680名成员——翻了3倍多，达到了8000多人。

《工人日报》在伦敦的销量已经从工作日的平均27000份和周六的41000份，分别上升到工作日的平均51000份和周末的72000份。但是，伦敦区委针对这些数字已经作出了严厉的批评，因为它们已经严重地落后于形势。现在要发动一场攻势，使得到这个年底，伦敦的销量要达到10万份。

两个月前出版的小册子《红色伦敦》（*Red London*）到目前为止已经销出了超过10万份。宣传资料的销量总的看来也有了大的增长。

在劳动节期间散发的传单，包括地方上和工厂里复印的传单，总数是31万份。2000幅大的宣传画已经被张贴在围墙上，发放了1万份背面涂有粘胶的招贴纸。

根据指挥人员今晚的最后会议的报道，估计将会有7万~10万名工人从各个现场参加游行活动。

这些精确统计的内容已经成为党的出版物为我们提供的主食。

---

<sup>①</sup> “Second Hymn to Lenin” (1932), in *The Complete Poems of Hugh MacDiarmid*, Penguin 1985, Vol. 1, p. 328.

有人可能会说，它们只是象征性地使人增加信心的方式。定额完成了，目标超过了，这些专注于增长率的说法至少能够使我们暂时忘记自己的状况，忘记自己作为一种相对孤立的政治力量（至少在冷战时期）而存在的根本状况。同样，可以把我们的组织机构视为在制造控制的幻觉。党的演说家们有时采用内阁的腔调——在政治局（the Political Committee）的声明中是习以为常的，这是对国家的可笑的模仿。的确，在这个党的早期，当第三国际作为一种类似世界政府的东西建立起来的时候，建立与国家相反的组织这一观念似乎是党的集权化运动中的一个真实的成分。

像其他组织一样，党的许多活动，与其说是实际作用的，不如说是表现性的；它是在建造象征之城，而不是（或者也是）要达到实际的目的。在许多情况下，它起到了慰藉的作用。集会和会议常常显示了什么是想象的力量；参与人数之多尽管会成为《工人日报》的大标题，也只是为了补偿缺少真正的民众支持的缺憾。党员们需要相信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是意义重大的，在这一点上，不管已经离自己的目标有多远，他们并不全是在自己骗自己。在促成反法西斯的公众舆论的形成中，或者是在推动联盟（the League）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挑战英国人的殖民热情而进行的辩论中，或者是在高级酒吧对着把澡盆当火炉的报道而暗自发笑的时代，租房者们为了使住房问题进入政治的议事日程而发起的抗议中，凯博（Cable Street）大街的战斗所起的作用，或者是围绕莱比锡审判所发起的运动的作用，必然只是一种臆说。可是，一个无力得到矿工们的支持、一个已经证明自身不能担当起反对血汗劳动的重大任务的左翼，是不准备对那些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一直致力于饥饿大进军的人们纡尊降贵的。这篇文章并不是要去思考共产主义政策的对错，可是，即使一个人只是像我一样要去重构一种政治的思想方法，也得充分了解想象与现实的一致之处。重复较早时候利物浦的瓦梧树支部的话说就是：“人们对于党是非常认真的。你要做的是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将要发生一场战争，我们要把这件事告诉人们：‘今天炸弹落在了马德里，明天就会落在伦敦。’”

## 第七章 领导的使命

虽然承诺要实现平等，并且在许多方面也真的尝试着这么去做，但我们几乎像保守党人一样，渴望着权威人物，渴望着有一条“忠诚之线”把自己与领袖们联结起来。我们拒绝接受军队、教会和国家中那些推销给我们的权威，但却建起了我们自己的万神庙，里面有像在莱比锡审判中的季米特洛夫（Dimitrov）那样的英雄<sup>①</sup>，他们是共产主义品德的化身，有久经考验的坚强的舵手（像1935年第三国际所说的那样，他们是“无产阶级政治家”）<sup>②</sup>，以及像纳奇姆·海克姆特（Nazim Hikmet）那样的与“阶级斗争”共命运的作家和艺术家。在本地，我们也有我们的英雄，比如那些说话有分量的“重要的同志”、担任工会发言人或者支部负责人那样重要职位的“起领导作用的工会会员”、租房者运动或者合作社中的“受尊敬的人物”。更早些时候，如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有煤田的领导人、“阶级斗争中的被囚禁者”、维护失业者利益的人，甚至〔正如斯图亚特·麦金泰尔（Stuart Macintyre）在《小莫斯科》（*Little Moscows*）中感人地回忆的那样〕偶尔也有信仰共产主义的地方官员<sup>③</sup>。

这个党有许多令人尊敬的人，有许多你很荣幸能遇到他的人，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这项事业。还有许多具有不屈精神的人，“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的人”。有些同志用他们的干劲和热情为

---

①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 1882 ~ 1949年），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译者注

② W. Pieck, “The Activities of the E. C. C. I.” in *Report of the Seven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London 1936, pp. 54, 79.

③ Stuart MacIntyre, *Little Moscows*, London 1980, pp. 154 - 156.

其他人树立了榜样。有能够详细解释“策略”的理论家，比如约翰·逖乔（John Teacher），他是刘易斯·琼斯的《科马迪》（*Cwmardy*）中来自朗达（Rhondda）的自学成才的人<sup>①</sup>。有能够把生硬的教条用朴素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前辈<sup>②</sup>。还有那些头脑清醒的人，他们不会因为路线方针的改变而迷惑。在工厂里，老一点的工人会照看年轻一点的工人，就像瓦依达（Wajda）的电影《一代人》里的那个机修工<sup>③</sup>，或者是高尔基的《我的大学》里面在船上工作的厨师，这也是在工程学和伦敦东区的家具行业中招募工作的主要渠道。在支部或者朋友的圈子里，总是有人充当正统的卫道士和自封的导师，就像多丽斯·莱辛提到的“珍妮同志”（一个英国国教的主教的女儿）那样<sup>④</sup>，她把帮助动摇犹豫的人当做自己的责任。乔·雅各布斯在加入斯泰普涅党组织时，就碰到了一个这样的人。这个人照顾过许多需要帮助的人，他“像疯了一样”努力想办法把人们“拉进来”。年轻的乔就是他关照过的人之一。“我们的守护神无情地支使我们”，他写道：“他总是提醒我所承担的重大的责任。我必须确保我们的工作做得‘正确’。”这里也有师生关系的成分：“我的守护神一直在督促我接受党的培养……他除了

① 参见刘易斯·琼斯（Lewis Jones 的）《我们活着——威尔士矿区的故事》（*We Live—The Story of a Welsh Mining Valley*, London, 1978）中有关“约翰图书馆”的描述。琼斯是一个来自朗达的矿工，后来成为矿区里一个没有工作的鼓动者，最后成了那里的共产党的组织者。这本书是他的朗达系列小说中的第二部，他作为一个知情人对那里的党的描述是极为有趣的，那里是这个党在英国能够得到群众拥护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之一〔《科马迪——威尔士矿区的故事》（*Cwmardy—The Story of a Welsh Mining Valley*）是刘易斯·琼斯的朗达系列小说中的第一部。——译者注〕。

② 我在这里想到的是杰克·科贝特，他是一个老兵，中年时成了牛津的伯里尔学院历史学系的大学学生。他竭力向学院里的年轻同志传授经验。他自己在战前的伯明翰时期的导师是杰西·伊登。

③ 杰伊·瓦依达（Andrej Wajda, 1926年~），波兰著名导演，《一代人》是他早年的一部反映德国占领期间波兰的社会政治状况的电影。——译者注

④ Doris Lessing, “The Day that Stalin Died”, *New Reasoner*, Vol. 1 No. 2, Autumn 1957. 比利是一个类似的人物：“他62岁，消瘦、机敏、冷静。”参见 Ruth Adler, *Beginning Again*, London 1983, pp. 95 - 99.

监督我自己进行学习之外，还要我参加学习班和听课。”<sup>①</sup>

用现今的标准来看，党员们是极为恭顺的。我们从“四个伟大的导师”那里汲取我们的信条，以为他们的话具有预言般的洞察力。我们把他们的话当做权威来援引，认为这些话就是“科学”。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享有无限的信任，普通的党员看待他们的方式甚至近于“敬畏”<sup>②</sup>。领导的文件，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每周发给党员们的“政治信件”<sup>③</sup>，或者是后来的政治局的“讲话”（这些都是《工人日报》和党的其他媒体的主要内容），与其说是读过了，不如说是“研究”过了。公式化的阐述中包藏了大量的含义，含混不清的言辞则承认有隐秘的难题。在回忆战时来自上面的文件（尤其是在1939~1940年那段艰难的日子的那些文件）时，我母亲说：“你知道，一定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在里面。你分析它，一遍又一遍地读它。你引述一段，然后又引述接着的段落……要是碰到不好理解的，就需要把你自己摆正。”<sup>④</sup> 区上的组织者，“一群非常劳累、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sup>⑤</sup>，也受到人们打心底里的敬重。他们会在大会和集会开始的时候作报告，或者是在结束时作“总结”。约翰·戈尔曼回忆说，在西汉姆诺斯，他们是“小神”，不时地降临到支部里，使党员们行动起来<sup>⑥</sup>。

层级制的原则以分子那样的方式在全党的政治机体中形成了。各支部委员会就像小型化的政治局，负责日常的领导，“指导支部的所有工作”。支部书记是“关键”<sup>⑦</sup>（根据一本培训手册的说法）。

① Joe Jacobs, *Out of the Ghetto*, pp. 98, 103, 170.

② Edward Upward, *The Rotten Elements*, p. 31.

③ 关于政治信件，参见CPGB, *8th Congress Report*, 1926, p. 49; *9th Congress Report*, 1937, p. 28.

④ 与我母亲的口头交流。

⑤ Ernie Benson, *To Struggle is to Live*, Newcastle-on-Tyne, 1980, Vol. 3, p. 176.

⑥ 这是约翰·戈尔曼在伦敦东区的经历。在牛津，那个抽着烟斗、态度冷漠的“全国学联”的组织者（现在是欧洲共产主义天空中的一颗二流明星）的造访，是相当不一样的：无论我们要做什么事，他似乎总是要泼冷水，而不是激励我们。

⑦ CPGB, *Handbook for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1962, p. 20.

“他的工作就是负责政治领导。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是一名共产党员，能够代表党的利益说话，并在这样做时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sup>①</sup> 支部中次要的负责人要符合与此相似的条件。根据一个组织者的《1944年袖珍手册》所写：“一个健康的、有魄力的支部委员会，应当包括宣传委员、财务委员、教育干事、组织委员和负责材料的干事。在每个人的周围，还要有一些同志去帮助他工作。”<sup>②</sup> 即使是收缴党费这样最简单的事，也要用领导的术语把它说出来。下面是一位组织委员在西汉姆诺斯1954年党的年会上对此所做的热情的描述：

自从3个支部合并以来，我们的党员人数达到了最多。最重要的是，在努力与党员们保持定期的政治联系的过程中，我们学到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在下一年的目标是：组织好15位同志，这些同志能够胜任政治的领导工作，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解决工人阶级的问题。围绕这15位同志，把党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协调好，包括资料、财务、政治和社会活动……在消除目前相当一部分同志身上的冷漠的同时，把革命观念带给支部的全体党员。

在我们的支部中有15位这样的同志，他们能够成为那种能把战斗的领导能力带进每一个党员家中的负责人。新的支部领导层的首要职责是，保证这些同志有机会接受最广泛的政治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教育。支部进行这样的教育是可行的<sup>③</sup>。

---

① Sam Blackwell, *Some Guiding Points for Strengthening Party Organisation*, Birmingham 1944, p. 2. 布莱克维尔那时是米德兰区的党的组织者。我很有兴趣听到他后来的情况。

② Blackwell, p. 12.

③ 作者满怀希望地补充道：“这会使我们的支部逐渐具备带领人民夺取西汉姆的政权所必需的规模、品质和警惕性，这些也是争取劳工运动的胜利和决定性地结束英国的资本主义政权的关键。”参见 North West Ham Annual General Meeting, Branch Committee Report 1954。感谢约翰·戈尔曼为我复印了这份文件。

政治工作的前提是，只有领导层有权采取行动。除非是在上一级权威的主持之下，否则不能召集会议；除非有“有经验的”同志领导，否则不能进行任何讨论。“每一项活动”，用1923年的培训手册中的话说，“都有它的领导委员会或者是指引方向的权威”<sup>①</sup>。总之，领导在党的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像刘少奇在《论党》（1950年）中说的那样：“一个工厂或村庄里有三个党员，并不必然构成一个党组织。他们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在通常情况下，三个人中的一个应当成为这个小组的领导，其余的两个成为这个小组的成员，这样，在所有的活动中，都会有一个领导和两个支持者。只有在这时，它才能成为一个党组织。”<sup>②</sup> 在英国共产党中，算术比例有时也绝不比这种说法少些古怪。在党的工作的每一个方面都少不了“领导同志”，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的党中，即使是最小的、不超过三人的工厂小组也会有“领导同志”。在反法西斯战争那段较为兴旺的日子里，也在坚持这一原则，如果说不是比例的话。“工厂的党小组，”萨姆·布莱克维尔写道：“必须有它的领导。十人以下的，一个领导；超过十人的，由起关键作用的同志组成委员会。”<sup>③</sup>

在共产党内实施的领袖原则，与工党和大的工会中流行的做法是非常不同的。它拒绝任何名人的观念，它没有为这样的人留下任何空间：代理人、掮客或者是“牌”（card）——也就是在背后操纵的核心首脑，赫伯特·莫里森是20世纪20年代这种人的原型。党的领导人没有威斯敏斯特的政客所特有的趾高气扬、妄自尊大，也不像市政厅里的显贵那样提携自己的庇护人、签订昂贵的合同、派发慷慨的馈赠。他们不会像旧时的工会头头那样逞威风（这个党没有像欧内斯特·贝文或者亚瑟·迪金那种“心地善良但举止

① CPGB, *Handbook for Party Members*, 1923, p. 5.

② 刘少奇：《论党》，解放出版社，1950，第87页。

③ Blackwell, *Guiding Points*, p. 20.

粗鲁的人”)。领导们受到赞赏,不是由于他们自身或为了他们自身,而是因为他们表现了党所珍视的各种品德:尊严、坚韧、执著、献身、学问和(属于英国共产党的)好脾气。正如在英国生活的其他领域中,有一种明显的——尽管没有明说——反对卖弄小聪明的倾向。人们对于领导人的期待,不在于他们有多杰出,而在于他们要沉稳。他们的演说需要有激情,可首先的也是最重要的是要“清楚明白”。“清楚明白”在共产主义品德的万神庙里与“得体”同等重要。在消除思想中的混乱时要做到“浅显易懂”;在解释党的方针政策时要有“准确性”;在摆道理时要“极端的简单朴实”(这“正是斯大林的特征”)①;能够抓住问题的实质,“以便使那些能把读书人难住了的问题变得明白易懂”[用一个崇拜威廉·加拉奇尔(William Gallacher)的人的话说]②。不管它名义上的神是什么,在共产党里绝不存在像英国的新托洛茨基主义组织里那样的宗教领袖般的权威,没有像工党的“草根”运动赖以成名的民众领袖,没有从才智的天空中一闪而过的流星,或者像20世纪20年代的摩斯利(Mosley)那样冉冉上升的、把大会的代表都给迷住了的明星。

权威在各种场合都要保持低调。支部的委员们要安于把自己当做共同的劳动者来看待。为了回报人们对他们的信任,他们应该承担许多杂活。在支部会议上,他(她)要表现出牧师般的关怀:通过分派任务把党员们吸引进来,使他们参与决策的过程(“同志们总是能更好地贯彻他们自己积极参与作出的决议”)③;鼓励新人们“表现”自己,并且要让他们有机会发言。“支部书记应当把问题提出来并且

① R. P. Dutt, “Introduction”, *Leninism*, Marx House Study Course 1940, p. 6.

② (Dan) Wilson, *Living in My Time*, typescript autobiography, 1976, p. 68. 这是个非常有趣的文本,他的作者是铁路工人的“时刻保持警惕”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这一运动是“第三阶段”中由普通党员发起的最成功的活动之一。感谢奈尔·贝尔顿(Neil Belton)和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让我看了这份文本。

③ Blackwell, p. 6.



定下调子……直到最后……所有的同志都在鼓励之下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以后才作出决定。”<sup>①</sup> “有限制的讨论”（controlled discussion）（就像一个班级书记在 1944 年说的）也是党的教育中常见的特点。指导教师们“自己尽可能少说，但要通过精心提出的问题使得班上的同志去揭示出所要讨论的问题的含义”<sup>②</sup>。在党员发展工作中，家长作风也由表面上的沉默寡言遮掩起来了。开始时先把对方当做党的事业的同情者，强调共同点，然后把具体问题当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而在同时要使他们认识到党的价值和意义。通过反复给他们看有关党的材料，邀请他们参加党的会议，尤其是让他们参与到党的某些活动中来，例如请愿、运动以及以前的那些群众性的行动、游行和示威活动<sup>③</sup>，在上百次微妙的威胁之下，同情者就被吸收成为党的同志，“直到渐渐地……他们发现它在塑造着、改变着他们的整个看法”<sup>④</sup>。

共产党认为它的工作就是培训工人阶级的领导人。新发展进来的成员是被当做年轻的新兵看待的，要在次要的岗位上经受考验才能被提升到党的“责任重大的”位置上<sup>⑤</sup>。干部们——就是那些“已经成熟的”或者“正在成长的”准备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在好心的上级的监督之下接受培养，这在 20 世纪 20 年代甚至有时候也叫做“训练”。他们会根据需要而被到处调动。就产业领域的同志来说，地位已经相对固定下来的会被尽力提拔到工会机关，而有前途的新人会被安排到“重要的”工厂里。在工厂工作还多多

① Blackwell, p. 7.

② Nan Brewer, “What Has Happened to Party School Students?”, CPGB, *Party Organisation and the Invasion*, London 1944, p. 17.

③ 参见刘易斯·琼斯的《我们活着》中的某些戏剧性的描述。尽管如此，这些描述却有着强烈的真实的气味。

④ R. Palme Dutt, H. Inkpin, H. Pollitt, *Report on Organisation*, London 1922.

⑤ *Party Organization and the Offensive*, p. 20. “我们必须……像园丁培育他最喜爱的树木一样，去培养人民”是共产党人喜欢引用的斯大林的一句格言（奇怪的是与他自己的实践并不一致）。参见 *7th World Congress Report*, XIII, p. 2。

少处于地下状态的时候，许多“产业领域的领导同志”似乎都是这样过来的——据我所知，其中就有我们在肯特城铁路工人的领导人约克·尼科尔森（Jock Nicholson）。党的教育一直被视为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把未经雕琢的新人改造成适合做领导的材料。在20世纪20年代，对于新党员来说，参加培训班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形式。有潜力的产业领域的干部一派出去就一个月也是常有的事<sup>①</sup>。被选定要担任党的专职工作的有能耐的人，会被送到莫斯科的列宁学校，在神秘失踪18个月或者更长时间（为了保密的缘故，这似乎已经成了规定）以后，回来时就成了专职的工作人员了<sup>②</sup>。

---

① 这样的事就发生在我们南米德兰的区委书记厄尼·凯林身上。他在1934年莫里斯汽车厂罢工期间加入了党，那次罢工是牛津的第一次现代的工会行动。厄尼那时还刚刚从农村出来，说话还带有明显的牛津腔——他一直是这样——就被送到伦敦去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党训。他印象最深的那位老师是一个严厉的苏格兰人。“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国家会怎么样，凯林同志？”“它……会消失。”“它会消亡，凯林同志，它会消——亡。”党在苏格兰矿工中的教育活动所遇到的类似的困难，参见 Bob Selkirk, *A Worker's Life*, Dundee 1966。非常感谢乔治·马修斯从考菲尔德的菲夫（Fife）那里弄到了这样一本自传。地方的出版物常常就是这样，在罗素大街据称是国家的图书馆里没有副本。要是当局不想麻烦去找出没有送给他们的书籍，那他们为什么不能使用那有用的现代发明——复印机呢？斯图亚特·麦金泰尔的《小莫斯科》，大量参考了鲍勃·塞尔科克的书，因此，它的存在并不是个秘密。

② 关于马里恩·拉姆森以这样的方式失踪的事，参见厄尼·本森（Ernie Benson）的《活着就要去斗争》（*To Struggle is to Live*，）第11卷，以及玛格丽特·麦克卡锡（Margaret MacCarthy）的《革命年代》（*Generation in Revolt*）第177页至最后。在列宁学校刚刚宣布成立的时候，区里就被告知：“在挑选那些即将报名参加资格考试的人时，必须声明，只有那些为党的工作作出了贡献，并且具有能够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品质的人，才能被选上。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假使合适的人没有被选进来，那么这个学校的全部价值就没有了。学员们要……把他们全部的时间用于学习，要离家18个月，然后回到某个地方，从事党分配给他们的具体工作，例如作为宣传员、组织者等。”参见 P. P. 1926, *Communist Papers*, letter of 9 May 1925。这些文件是警方在逮捕12个共产党领导人时收缴的，并随后把它们出版了以作为议会的蓝皮书。

## 一 自上而下的组织

英国共产党在本质上和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一样，是自上而下地建立起来的<sup>①</sup>。在其原来的理解中，英国共产党根本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组织，而是隶属于共产国际。它的那些党员是它发展来的，而不是它所要代表的，因而它的中央委员会首先要对其负责的，不是它的党员，而是莫斯科的第三国际。第三国际的委员会或者领导层在原则上决定党的路线方针。作为“共产主义组织的支点”，各区的党委与党中央一样，其权威性也是来自上面。“区级领导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是该地区的独立的管理机构，而在于它是中央在该地区的代表。”<sup>②</sup> 地方党这一单位在1922~1923年间被各个支部所取代，地方党的次要地位是很清楚的，就是从区和中央接受指示，并把它们传达给个人和支部。“从区或中央接到……紧急指示的时候，地方党的组织者要与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一道，必须立刻行动起来，不容耽搁。”<sup>③</sup> 同样，支部要对“相应的、掌握方向的……委员会”负责<sup>④</sup>。任何形式的擅作主张都是不允许的。所以，依照1927年的手册，在地方的劳资工作中，“负责人应该有一个小的、由工会积极分子组成的委员会去协助他的工作。为小部分人制定政策，这不是该委员会权力范围内的事情，它所应该做的就是用最好的方法和手段去落实地方党委和区党委的指示。”<sup>⑤</sup> 当然，为了帮助地方党委和区党委，它可以提供建议和信息。在“妇女工作”中也是如此，“领导人……用不着非得是女同志。在选择一个小委员会协助

- 
- ① Lenin, "One Step Forward, Two Steps Backwards", *Collected Works* Vol. 7, pp. 204 - 205.
- ② CPGB, *Handbook for Party Members*, 1923, p. 7.
- ③ *Handbook on Local Organisation*, 1927, p. 11. 地方党委的文件在这一时期必须由区党委批准。*Handbook for the Party Members*, 1923, p. 13.
- ④ *Handbook on Local Organization*, 1927, pp. 26 - 27.
- ⑤ *Handbook on Local Organization*, 1927, p. 10.

领导人时，要注意，它是地方党的委员会而不只是由妇女选出来的委员会。”<sup>①</sup>

共产党里的领导们不是从党员那里而是从党那里取得他们的权力。他们是由上面按照政治上“合适”的标准挑选的，而不是由下面选举的。“最好的同志”被提拔到责任重大的岗位上<sup>②</sup>。领导层包括（根据杜德和波利特《组织报告（1922）》中的详细说明）“党内能力最强的掌握方向的机构”<sup>③</sup>。1930年党的一本手册中说，要挑选“最积极可靠的同志”担任地方党的组织者<sup>④</sup>。小组负责人的要求（“最能干的同志”）也与此相似。1929年当利兹大会在选举中采取“评议小组”或者推荐时，“阶级斗争的经验”<sup>⑤</sup>就成了担任领导工作的条件。在后来一段时期内，根据1962年的手册，规定组成支部委员会的应当是“支部中最有经验和最能干的党员”，或者“那些从人民、工厂工人和劳工运动的立场出发的人”，以及带来活跃气氛的“刚加入不久的、朝气蓬勃的同志”<sup>⑥</sup>。

要进入党的机关工作，主要是靠提名而不是靠选举。专职的组织者是由管理委员会（control commission）任命（后来是由组织部门）并随后正式认可的。至少是在1929年以后，党不再按照“社会民主主义的”<sup>⑦</sup>或者“孟什维克的”<sup>⑧</sup>选举原则，而是采用单一的候选人名单，选举再也没有造成过不和。在全国和区的大会上，由评议小组或者政治小组确定名单，然后交给代表们作为候选人。

① *Handbook on Local Organization*, 1927, p. 11.

② Idris Cox,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rty Organisation”, *Communist Review*, Feb. 1930, p. 58.

③ *Report on Organisation*, 1927, p. 10.

④ CPGB, *Building the Party in the Factory*, 1930, p. 23. 在1927年的《关于地方党组织的手册》中，这一要求是“地方上……最积极可靠的同志”。

⑤ Reg Groves, *The Balham Group*, London 1974, p. 25.

⑥ *Handbook for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1962, p. 19.

⑦ Groves, p. 25.

⑧ Zinoviev, *History of the Bolshevik Party*, London 1983, p. 110.

下面是1940年某个区的组织者对这一机制的运作情况所作出的说明：

全国委员会……不是一种代表组织，而是一个政治团队，是依据政治经历选出来的……在大会开始的时候，会选出一个政治委员会（a Political Committee）。这个委员会将长期开会并……会考虑所有候选郡委员会的提名和向大会提交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它将依照授权建议大会，在所有的提名中有哪20个同志在它看来将是组成新的郡委员会的最佳政治团队……在提交报告后，万一对名单中某个同志有反对意见，就对这个提名进行投票。要是仍旧坚持反对，就把这个提名去掉并提出一名替换者。在考虑了所有的反对意见之后，修正过的名单将会一起提交给大会。代表们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听命于党的支部或小组，而必须根据大会的规定来决定按照哪种方式进行投票<sup>①</sup>。

在支部里，委员会更可能是通过自愿者和共同的选择而不是“评议小组”来产生。可是，一些活跃的支部也可能模仿上级组织的程序。在西汉姆诺斯，显然就有过这样的事。1954年10月份的《支部新闻》曾骄傲地宣布过：

11月1日星期一上午7点在帕克学校召开的年会，将会迈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自从西汉姆诺斯共产党支部成立以来，它将首次选举整个支部委员会的16~20名成员……新扩大的支部委员会将会努力把西汉姆的人民团结在一起……同志们……我们……希望你们来参加这次最重要的年会，并帮助即将离任的委员会和评议小组选出一个积极的、有战斗力的委员会，它将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支部和西汉姆的人民，把我们反对地主、

<sup>①</sup> Ernie Trory, *Imperialist War*, pp. 83-84.

老板们的斗争掀开新的一页，并且一劳永逸地结束保守党政府在英国的统治。

“坚定不移的”、“自信的”、“生机勃勃的”共产党人相信他们肩负着领导的使命。他们是全世界阶级斗争的“自觉的领导者”，他们在唤醒落后分子，使群众加快行动起来，他们提出了以往人们没有提出过的要求。按照他们自己理想化的自我理解，他们是劳动者当中最杰出的人，是从它的“最优秀部分”——那些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先进的部分”<sup>①</sup>——中发展出来的“最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先锋队”。用列宁的话说，党是这个阶级的“记忆”，是它的历史命运的监护人。党是这个阶级的“大脑”，把知识的力量应用于解放的运动；它是这个阶级的“神经”，是这个阶级意志的集中表达。

就像他们所理解的（今天仍然存在这种看法），共产党人是唯一具有“策略”的人。用列宁的话说，他们把“冷静的计算”当做他们的任务，把“巨大的热情”与“高度的冷静”结合起来<sup>②</sup>。他们不是靠粗略的估算、凭直觉判断，而是靠“分析”去“科学地”得出他们的结论。他们辨别出了“关键的”问题和“中心的”任务。他们的战术伴随着“铁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来自对各种力量的对比和对手实力的现实主义的衡量。共产党人把秩序和设计带到了自发的运动中。他们把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他们把为满足当前需要的斗争理解为通向权力之路的手段。最重要的是，共产党人有一种“透视”的能力，一种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能力。

有一种说法，这种说法与圣西门比与卡尔·马克思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尽管它的直接的来源是列宁），它认为共产党人是“启蒙的先驱”<sup>③</sup>，头脑清醒的精英和“指引方向的核心”——这在某种程

① CPGB, *Course for New Members*, 1937, p. 3.

②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XIII, 1935, p. 22.

③ 刘少奇：《论党》，解放出版社，1950，第59页。

度上近似于圣西门所提出的艺术家和工程师的精英。共产党人是“职业的”革命者。他们把革命提升到科学的水平，也就是列宁说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党的领导角色是用专家治国论的术语表达出来的：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劳动，展示出“联合行动”的实力，表现出机器的力量。这里可以看到一种更普遍的看法，即主张共产主义先锋可以把自身与之任意联系起来的 20 世纪 20 年代的“机器美学”、把精力集中在“大”工厂，以及把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现代化等同起来。在政治策略上注重交流与合作，在党的教育中注重“干部”的培养，也都是如此。

在另一种更像是教学法的说法中，共产党扮演着人民大众的老师 and 领路人，要使他们达到自我意识，要依据他们的现实命运来教育他们。共产党人在这里所提供的是“科学”与预言的混合物。就像 R. P. 杜德在第三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的讲话中所说：“我们能够科学地预测那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我们能够分析支配着意识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社会条件发展的进程。我们能分析矛盾的发展……我们能以科学的准确性指出，所有的挫折和道路选择上的错误，只是暂时的。因为革命意识和革命意志赖以产生的矛盾是无法消解的。”<sup>①</sup>

用一种更加军事化的语言来说，共产党人把自己想象成革命的突击队，有计划地前进，有秩序地撤退。他们在进行着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每一个工厂都是潜在的堡垒<sup>②</sup>，每一个地区都是潜在的前沿阵地 [就像彼得格勒的维堡 (Vyborg) 或者柏林的维丁 (Wedding)]。第三国际自身是作为最高司令部建立起来的，而它在各国的分部则被当做一支假想的“工人军队”的“总参谋部”<sup>③</sup>。这

① British Museum, Dutt Papers.

② “每一个工厂都必须成为我们的堡垒”，出自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第 263 页。

③ 这是在英国共产党成立以前革命的工团主义所要求的東西。参见 W. Gallacher and J. R. Campbell, *Direct Action*, 1919, p. 16.

一比喻很大程度上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可如下事实已经使之具有了新的内涵：在 20 世纪 40 ~ 50 年代这段时期，在中国、被占领的欧洲、各殖民地，共产党人先后卷入了武装斗争和游击战争。典型的军事语言也被用来表达劳资斗争：雇主们发动了攻势，而共产党人则领导工人们进行抵抗。“在保卫社会主义第六战区的战役中，带有几分军队的特点”，圣潘克拉斯工人的组织者回忆起 1939 ~ 1941 年英国共产党处于围困之中的艰难时期时说：“‘干部’和坚强的纪律，以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你站在哪一边？在最后，就是要像一个优秀的战士应该做的那样，相信领导和苏维埃联盟，去为我们的路线而战斗。”<sup>①</sup>

## 二 “老乔”

这些观念尽管在来源上带有异国情调，但绝不是与英国格格不入的东西。尤其重要的是，领袖原则普遍存在于小教堂里（许多共产党人把他们早期的成长都归结于它们），存在于学校的教室里、操场上，存在于企业和帝国里，特别是存在于家长制的家庭里。它也是“新联合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新联合会”是一个由不熟练的工人和半熟练的工人组成的群众组织，它从 1889 年港区罢工以后就已经在英国发展起来了。它用一种较新的方式依靠专职的工作人员，直到这些工作人员中出了个（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欧内斯特·贝文为代表的专横跋扈的家伙。也许，工会发言人的产生（1900 ~ 1922 年间的一种现象），可以被视为把领袖原则引入了熟练工人的尤其是工程师的工会运动之中。同时，它也可能表明，“工人的最高司令部”这一观念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革命的工会发言人团体首次提出来的。毫无疑问的是，领袖原则在英国共产主义运动诞

<sup>①</sup> Dave Waddington, in John Attfield and Stephen Williams, eds., 1939: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War*, London 1984, p. 137.



生之时就已经存在了。正如艾伦·威尔金森 (Ellen Wilkinson) 告诉“团结大会”的：“假如我们要建立一个革命政党，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人总参谋部并且心甘情愿地服从它。”<sup>①</sup> 早期的另一个例子是 R. P. 杜德。在 1919 ~ 1921 年发表在工党媒体上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文章中<sup>②</sup>，他抓住新运动的突出特征并把它当做一种欧洲的和国际的现象，令人钦佩地预见到了在它的未来发展中的一些主要路线，领袖原则当然也在其中。下面是他刊登在《共产主义者》(1921 年 7 月 16 日) 上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没有人比共产党人更了解在战争中必须有领导人并且这些领导人必须拥有权力。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当已经找到合适的政策并且有人愿意毫不畏缩地执行这些政策的时候，他们手中的权力就一定会像他们肩负的责任一样是可畏的。可是，他们必须是勇于领导的领袖，而不是害怕去领导的领袖。那种害怕去领导的领袖笨手笨脚、犹豫不前、脚踏两只船，他们一遇到危险就投降认输，与敌人搞秘密交易……”

至于因自身的德性而成为神的选民 (moral elect)，这种观念可能甚至更容易移植过来，因为它在许多方面都与英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者的自我理解相一致。在独立工党中，它有它的显而易见的类似物，即自我标榜的“有道德的理想主义者”；在妇女合作社基尔特中，是工人阶级共同体中启蒙的使者；或者在工党中，是与文化上的提升有关的成员资格。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它也合乎那些工人阶级当中的杰出分子，尤其是工程师。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干部都是从中发展过来的。也许在 20 世纪 30 年代，它才有了另外的维度，那时党开始从大学和公学中发展新成员。可以肯定的是，在约翰·萨姆菲尔德的《五·一》中 [可以想象，这是英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受过高价教育 (expensively-educated) 的新成员中具有代表性的看法]，领袖原则似乎令人不安地近似于在军官训练团里会碰到的东

<sup>①</sup> Hugo Dewar, *Communist Politics in Britain*, p. 17.

<sup>②</sup> 这些文章被按照顺序保存在英国博物馆杜德的资料中。

西。所以，在某段情节中，我们被介绍给比尔·雷利（Bill Riley），一个普通党员，“一个好人……可是看上去似乎需要领导”<sup>①</sup>；而在另一段中则再现了伦敦的街头景象，那段描写显得更接近于《荒原》中社会和性方面的令人厌恶的事情，而不是近于革命的精英主义：“……这些头脑简单的姑娘们做着自己编造的明星梦，穿着劣质的丝袜，抹着廉价的口红，傻头傻脑地努力着……等待着她们的阶级领袖。”<sup>②</sup>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不管它在今天显得多么令人吃惊，或者对那些曾经在某种程度上这样做过的人来说多么令人羞愧，在那个时代却是与对共产主义的理解非常一致的。它远远不是自外移植过来的东西，不是俄罗斯“落后”的产物，而宁可说是由第三国际助长的权威的集中化原则的延伸。而且，它可能意味着，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没有哪里比处于最前沿的和最带有雅各宾派色彩的共产主义政党中，例如法国共产党，得到更为热情的奉行和更为荒诞不经的复制。首先由列宁和托洛茨基将其人格化的“革命天才”观念，在第三国际早期广为流行。截至第三国际的头一个十年底，接连推出的英雄和烈士，如中国红军的崛起连同其光芒四射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和“无产阶级政治家”，最后还有季米特洛夫这样一个杰出的人物，所有这些都助于使英雄般的领袖这种观念获得新生。更为普遍的是，斯大林被当做共产主义的化身。他是最重要的缔造者、总设计师、最高司令，是现代的君主。毛泽东致斯大林的颂词（1939年12月1日在延安的讲话，发表于这个苏维埃领袖60岁生日那天）尽管估计是关于个人的，却更像是对一个理想化的人说的，他不是实际生活中苏维埃党的总书记，而是作为共产主义品德的化身的超人〔对照作为帝国主义超人的张伯伦（Chamberlain），英国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这个时代中对第三国际的路线有一种让人感动

---

① *May Day*, p. 81.

② *May Day*, p. 30.

的忠诚。而革命教育中的导师可以认识到他们自身的价值，他们被毛泽东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

不管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阵营中都必须有人担当他们的领袖，担当他们的指挥。谁是反革命阵营的指挥？是帝国主义，是张伯伦。谁是革命阵营的指挥？是社会主义，是斯大林。斯大林同志是世界革命的领袖。由于他的存在，事情就进行得更顺利。大家知道，马克思去世了，恩格斯和列宁也去世了。要是我们没有斯大林，谁给我们发布命令？这实在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当今的世界上有苏联，有共产党和斯大林，世界上的事情就能比较容易地得到解决。一个革命的指挥官干什么？他要保证每一个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地方住并且有书读。要实现这些目标，他必须带领十多亿人开展反对压迫者的斗争，并夺取最后的胜利。这就是斯大林要做的。既然这样，难道所有那些受压迫的人不应该祝贺他吗？我认为他们应该祝贺他，而且必须祝贺他。我们要祝贺他、支持他，并且要学习他<sup>①</sup>。

英国人眼中的斯大林尽管受到共产党人无与伦比的赞扬，却在总体上是一个较为现实的人物，他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我们对自己的理想化的观念。他是一个言语不多、没什么特别的嗜好、本质上讲求实际的人。我们把他当做俄罗斯的丘吉尔来赞美，他集不屈的勇气和世俗的常识于一身（“你播种了吗？”斯大林与某些意识形态上言语空洞无物的人的相遇，既轰动又神秘——令人奇怪地类似于新约中耶稣与圣彼得的相遇，似乎有着特别的吸引力）<sup>②</sup>。我们把他看做一个清醒镇定的人，尽管其内心风起云涌，却仍然在默不作声地

---

① Stuart Schra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Harmondsworth 1969, pp. 425 - 428.

② John XXI, pp. 15 - 17.

忙于自己的工作。尤其是，我们把他想象成一个非常有耐心的导师，他关心普通党员的困难，热心地把他的意思解释得“清楚明白”。一个朋友回忆说，列宁在辩论中屡屡提到迁就群众的尾巴主义者（khvostists）、清算人、新康德主义者和“造神者”，其晦涩难懂使人如同行走在茂密的灌木丛中，再看看斯大林通俗易懂的文章，真是令人如释重负。

我们似乎已经把斯大林视为一个平易近人的人了。毫无疑问，这表明，尽管并不是有意如此，我们把他的名字加入了英国籍，并用一个慈祥的、不起眼的、显然是无产阶级的和英国式的名字“乔”（Joe）（后来是“老乔”，战时是“乔大叔”），来取代那个硬邦邦的布尔什维克名字。而且，这一改变似乎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发明（一位学者告诉我，这样冒失的做法在苏维埃党内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尽管列宁获得了人们的爱戴和敬畏，但也只是有时被叫做“耶里奇”；斯大林的每一次讲话都要引起“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仍然要被严肃地叫做“斯大林”）。斯大林的衣着，就像铁托或者近来的卡斯特罗的一样，似乎证实了他的不拘小节。他不会带着折起的雨伞，也不会穿细条纹的套装，而是像我最喜欢的一张他的照片中的那样（摄于1922年，与列宁一起坐在花园里的椅子上），穿着一件伏尔加船夫所穿的短袍。我的母亲好像不像我这样压抑着自己对这些事情的回忆，她记得自己感到“喜欢”斯大林，在他去世后的追悼会上她“哭得很厉害”。她认为他是个“父亲般的”人（“他过去不是常抽烟斗吗？”），喜欢小孩子（他被拍到跟小孩们在一起的时候要比撒切尔夫人跟小牛在一起的时候还要多）。

至于我自己，我首先认为他是个年轻的鼓动家——我对他领导巴库石油工人闹罢工的一幅油画印象很深；其次是他视为一个逃亡者 [在沙皇的秘密警察机构（Okhrana）中的一幅照片里，他被拍成满脸络腮胡须，看上去就像《与众不同的人》里面的詹姆斯·梅森]；最后是他视为高尔基（我童年时代的另一个英雄）那样的人：有皱纹的眼睛，粗而密的髭须（在我的想象中漏掉了大元帅的

制服)。伊万·麦考 (Ewan McColl) 的《乔·斯大林之歌》，写于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用西部乡村的班卓琴伴唱。在我所收藏的《美国一瞥》和《圣詹姆斯救济院的布鲁斯》中都有这张唱片。迈克尔把他的斯大林描绘成英雄人物，但又像任何好党员一样，对他的同志和声细语，就好像是矿工神话和歌谣中的“大休尔” (Big Hewer) 的远房表亲<sup>①</sup>：

乔·斯大林有力量，他有力量。  
他带领苏维埃人民走在胜利的道路上。  
革命中他始终战斗在列宁的身旁，  
他们联合起来，直到列宁去世那一天。  
乔·斯大林是个南方人，他出生在佐治亚 (Georgia)，  
那儿的柑橘树又密又结实，田野里有滚滚的麦浪；  
乔是个农民，他园艺高超；  
他种植了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大的一片庄稼。

一天，他抬头看着地图，皱起了眉，摇摇头；  
“绿色不够而褐色太多”，他这样说，  
“我们得改变一下天气，孩子们，”他说道，然后笑了，  
“那就让我们种上三千英里的树吧。”

乔·斯大林有力量，他制订了伟大的计划；  
他给自然套上犁去为人类的福利而工作，  
他用锤子锻造出未来，他是领头人 (foreman)，  
他创造了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好的工人国家。

---

<sup>①</sup> 哈姆西·亨德森 (Hamish Henderson) 在他作为英国军队的士兵而被派驻在意大利的时候，描绘了一个更为家常化的斯大林：“希特勒不抽烟，丘吉尔抽雪茄，可是乔大叔抽的是工人的烟斗，戴的是出租车司机的帽子。”

领袖原则很令当代社会主义者反感，他们中也包括笔者自己。这种原则不仅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且与由英国和德意志帝国主义炮制的优等民族的意识形态有着不祥的关联。在国内，就如引用过的约翰·萨姆菲尔德的话所提醒我们的一样，它令人不安地近于本国语言中的舍监、童子军团长和队里的队长。在工党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中，领袖原则是与领袖对政党的控制这一现象联系在一起。正如女权主义所告诉我们的，在价值观上，它顽固地坚持家长制。

人们之所以会接受这些观念，原因在于，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确实产生了一些杰出的工人阶级领导人，甚至在第二代中比第一代中的还要多。这就能够吸引工厂里的年轻人，如考利的莫里斯汽车厂里的厄尼·凯林，并把他们转变成演说家，组织者和善于讲道理的人。这些领导人教会了他们怎样去做笔记，怎样去进行辩论，怎样去搜集证据，怎样运用历史的洞察力来调节激情；把他们引入书的世界；使得国外旅行不再神秘；使得他们像保加利亚的锁匠吉奥尔吉·季米特洛夫、马厄迪的矿工亚瑟·霍纳，或者是圣潘克拉斯的工程师沃尔·哈宁顿一样，不再害怕面对资本主义的法庭。先锋党的观念也绝不是荒诞无稽的。在社会主义作为工人信仰的那段时期，共产党人是这一观念的最为无畏的实践者，他们即使不像他们所相信的那种头脑最清醒的人，也是最有勇气的人。近40年来，英国共产党对英国左派一直保持着吸引力；它是一个引力场，其影响难以摆脱。甚至在它最为宗派林立的阶段（1928~1934年），也仍然能够发动劳工运动中广泛的友爱合作精神，1932年和1934年饥饿大进军所获得的巨大支持就是证明。除了那些响应党的“领导”的人外，还有人相信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不管它有什么缺点或者发生了什么样的畸变——当然，这样的支持者逐渐少了，但在20世纪60年代仍然存在。

无论是作为一种世界性的运动，还是一种土生土长的政治产物，共产主义在今天已经被剥夺了它的道德权威性。然而，它没有考虑

环境的变化，仍然主张自己对领导权的要求，即使不再有支持者响应这一要求，不再有团结一致党员去承认它的合法性。政治委员会仍然在发表内阁般的讲话，尽管他们不再作为主要的新闻报道出现在《晨星》上。“战略”和“战术”仍然是党内讨论的重大问题，这一点可以从它的新月刊的版面看出来。共产党人现在和过去一样，可以为自己是“责任重大的”而自豪。的确，与流行于议院外左派中（也流行于工党的选民政治的更加荒芜的海岸上）的表现性的、生活方式化的政治活动相比，他们不难积极地表现得像政治家一样：在一个政治上无家可归的时代，即使是民主集中制（对于那些没有不幸成为其中失败的一方的人来说）也会有它的迷人之处。可是，它现在与服务于阶级的支持者、坚持传统或者是保卫被包围的社会主义祖国之类的观念分开了。

在党员们的眼中，党所主张的“战略”仍然是它的主要优点，也是它的长期规划，即英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被认为能够逢凶化吉的原因。可是，这种战略不是“战斗的领导作用”，而宁可说是借来的影响力（*borrowed prestige*）。这恰恰是《今日马克思主义》派别在全国的领导地位的特征。“保持活力”（*Staying Alive*）是由《今日马克思主义》组织的为期一天的大会的主题。关于“保持活力”的力量，我们了解到，“核裁军运动中那么多杰出分子的自愿参加”不仅表明了他们对党为和平运动所作出的非宗派主义的贡献的高度敬意”，而且也表明“党正在担当该运动的战略推动者的角色”<sup>①</sup>。这种说法把只是在星期六发生的事情拔高成重大的政治事件。这个党所提出的“重组”左派的主张，也就是抛弃矿工、与市政厅社会主义分开、认可金诺克先生在工党中的领导地位，就更是夸大其词了。戴夫·库克（*Dave Cook*）是全国组织者（*the National Organizer*），他把这一主张比做英国的十月革命：“历史上类似的事情总是有风险的，可是，共产党就是从对国际和英国国内工人阶级运动的重组中

---

<sup>①</sup> John Bloomfield, “Staying Alive”, *News and Views*, 21 March 1986.

诞生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党长远的战略定位。难道左翼中正在进行的重组——我们对此已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是同样清晰地指出了未来吗？”<sup>①</sup>

先锋主义是以科学的全知者的观念为依据的，它总是会导致狂妄自负。但在共产主义的英雄时代，共产党人的表现使得它并不难以被人所接受。当 1/10 的党员被关进监狱（在 1926 年矿工们被停工期间英国共产党的遭遇），或者是当党秘密派遣人员到英国的殖民地发起工会运动时 [例如共产党的工程师本·布莱德利（Ben Bradley）以及和他一起被关押的人在米鲁特（Meerut）被指控从事阴谋活动而受到审判]，对于先驱地位的主张，不太固执的人是可能会予以承认的。当党无力发动任何全国性的抗议活动而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的时候，当它不是由“无产阶级政治家”来领导而是越来越由大学毕业的无所不知的人来领导的时候，当以前令内政大臣们感到害怕的工厂的组织者成为向资本主义媒体泄露消息的人的时候，就呈现一种全然不同的局面。

---

<sup>①</sup> Dave Cook, “On the Role of the Party”, *News and Views*, 21 March 1986.



## 第八章 生存的策略（片断）

尽管共产党仍然满口说着战斗辞藻，但其已经很少成为 1968 年的校园革命者或者近来好战的工会运动那样的对抗主义者。相反，正如前文可能已经指出的，它在敌人面前变得小心翼翼，倾向于保护它自己的阶层。在劳资领域，它总是小心避免“挑衅”，在罢工中它从来不如在退却中勇于承担责任。在政治上，这个党摆出了积极的姿态，指向有限的目标——用列宁的话说就是把“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最严格的忠诚”与“进行所有必要的、合乎实际的妥协、签订协议、制定迂回曲折的路线以及实施退却等的能力”结合起来（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由于必然性的力量，共产党人还擅长布莱西特（Brecht）所说的“生存的策略”。共产主义运动生来便是一种革命性的运动。在俄罗斯，它是在沙皇专制制度的迫害下形成的；并且，作为一种泛欧洲的和国际性的运动，被宣布为非法或者近于非法是它通常遭遇到的命运。20 世纪 20 年代的阶级斗争采取了极为暴力的形式，这一方面是由于劳工斗争和农民暴动，另一方面是由于诸如东欧和中欧的军事政变，这些军事政变常常伴随着对共产党人的杀害和囚禁。即使是在宪政主义的英国，党在它存在的头 15 年里，也不断地遭到迫害。开始是来自国家，后来是工党和工会的官僚，而这期间一直存在的则是来自雇主们的迫害（直到 1941 年，工厂里的工作都是处于半地下状态，公开的支部在工厂里的出现对于以前的同志们来说不啻为一个奇迹）。

英国共产党在它成立还不到一年的时候，就受到威胁要被宣布

为非法。这可能是因为它成功地在失业工人当中发起的抗议活动，但一般而言，是由于政府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恐慌。1921年5月，党的总部受到袭击，党的总书记阿尔伯特·应克平（Albert Inkpin）因为出版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论文而受到审判并被判处9个月的苦役。与此同时，全国组织者鲍勃·斯图尔特（Bob Steward）由于在南威尔士发表的演说而被判9个月的监禁。在总罢工的时候，党员遭到了大规模的逮捕。1926年10月，内政大臣乔伊森-海克斯（Joynson-Hicks）禁止在矿区举行共产主义的集会，随之而来的就是进一步的逮捕浪潮。例如，大卫·斯普林豪（David Springhall）因为“印刷并散发会妨碍煤炭生产的传单”而在10月份被判监禁3个月；特德·艾里（Ted Ainley），共青团在维冈（Wigan）的组织者，许多年以后成为《工人日报》的书记，被判监禁28天，罪名是发表有意引起“国民不满”的煽动性演说。曼彻斯特当局采取行动防止党散发“大背叛”的传单，它们是在5月13日，也就是在工会联盟下令复工两天后在索尔福德（Salford）复印的。许多同志因为散发传单而被捕，他们中有患有糖尿病的杰克·弗肖（Jack Forshaw）。他在狱中感染了肺炎，并因拒绝狱医的救治而死亡。

第三国际与秘密社团有几分相似。并不是只有它的敌人才赋予它以不可思议的力量。它的那些使用化名的信使非法地往来于各个国家，使用阴谋和间谍的手段躲避警察的监视。它是在一种不合法的氛围中壮大起来的，的确，正如威尔海姆·皮克（Wilhelm Pieck）提醒出席1935年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它的67个支部中只有22个是在合法或半合法状态下开展工作的。博罗丁（Boroding）日后由于他在坎顿起义（the Canton Rising）中所起的作用而出了名。他在格拉斯哥遭到逮捕——20世纪20年代早期他曾在那儿短期担任过第三国际的特派员——并用布朗这个名字接受了6个月的监禁。“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伊万·麦考回忆起在工人戏剧运动时期，索尔福德的一个信使的到来：

关于她我所能记得的就是，她被称为“鲁特米拉同志”。几乎难以置信的是，她是由共产主义青年国际派过来的。作为信使，她要作个关于欧洲农民运动状况的报告。她到曼彻斯特，包括其他地方，研究英国的农民运动。她到了索尔福德。我跟她是在咖啡馆（洛克哈特咖啡馆）里碰面的。她在那儿的同一天晚上，那里遭到了警察的袭击。她从厕所里的窗户逃了出去……在脱身方面，她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说的是，她没有护照，或者，她有许多护照。我不知道究竟属于哪种情况。无论如何，她在那儿是不合法的。

## 第三部分

# 阶级政治学



## 第九章 幽灵间的战争

像马克思主义政治组织中的许多分裂一样，英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也如同幽灵间的战争，其中，招来的鬼魂令活的演员相形见绌。关于“不列颠道路”的争论是1977年的代表大会上的主要议题，就是在那个时候，现在的分裂露出了端倪。这一争论几乎从英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就纠缠着它，是对从未得到解决的有关“议会主义”争论的回响。“广泛的民主联盟”的主张，反映了从第三国际第三阶段（1928~1934年）“以阶级对抗阶级”的政治路线向人民阵线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尽管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者们一直在竭力鼓吹这两者之间的类似之处。当前争论的双方都急于诉诸共产主义的过去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就像在一个家族的传奇中，每一方都主张自己对想象的血统的权利并沉湎于再生的幻觉之中。就像在一个家族的分裂中，旧日的痛楚使争吵充满了怨恨。的确，现在使这个党面临着分裂危险的那种恐惧和嫌恶，似乎更多地与过去的创痛有关，而不是与当前在政策上的实实在在的分歧有关。因此，当《晨星》的支持者——绝大部分是成熟的忠实于工会的人——被他们的对手贴上“战车派”（也就是1968年苏联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辩护者）的标签时，就显得尤为险恶。《今日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们，那些由悔改的阿尔都塞派（Althusserians）、醒悟过来的忠诚者和获得新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联合起来的人们，在非常绝望地努力不让“共产主义”这艘船沉没掉，他们也同样像是些清算者、阶级通敌分子，甚至（就像一个老前辈告诉我的那样）像“敌人的代理人”。尤其是“斯大林主义”的阴魂不散，它在20世纪20年代俄

国党内的争论中所造成的恐怖大致类似于“热月”时的恐怖一样。在最近一次党的领导会议上，一个主要的议程就是要求为在莫斯科审判后被处死的老布尔什维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Kamenev）平反，这也许表明了斯大林主义的持续影响，同时也表明了英国共产主义与较为传统的政治组织之间仍然存在鸿沟。

《今日马克思主义》派虽然宣称是“现代人”，却仍然坚持党的传统观念。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属于第二代共产党人，其中有《今日马克思主义》和《七天》的编辑以及它们的最有才华的作家比特里克斯·坎贝尔（Beatrix Campbell），这些人都热切地表白他们的效忠之心。他们用葛兰西的名义来为自己的事业增添光彩，甚至有时候忘乎所以地把自己视为在创造一个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组织。像他们的强硬派对手一样，他们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即“正确的”分析，如果得到忠贞不渝的执行的话，就会带来所需要的结果。跟老一辈的共产党人一样，他们的自我形象首先地和首要地是策划对左派进行重组的战略家，是工会运动中的设计师，是“新现实主义”的，其观点处于“支配地位”（而工党在工会运动中只是作为“合作者”），是不列颠左派的领跑者和探路者。

这个党尽管摆出了多元主义的姿态，但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摆脱它的过去。它仍然把自身视为政治世界中的震源，是某个新一代领导人所说的“左翼运动的战略和凝聚力的关键”，或者用一个老党员的话来说，是“英国劳工运动中不可或缺的特殊成分”。它的远景规划，即被称为“不列颠左翼最全面的战略”的《英国社会主义之路》（*Britain Road to Socialism*），被赋予了图腾般的重要性，尽管它源于现时已经显得可疑的“人民民主”观念。“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党内得到了严格实行，它不仅被用来开除个别的持不同政见者，而且，在伦敦和兰开夏还被用来解散整个区的党组织。这个党继续派遣友好的代表团，并为兄弟党的成功（或相对的成功）感到欣慰（日本共产党最近与意大利共产党的会面可以作为一个范例）。英国共产党装出要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的样子。它派出候选人参加大

选，尽管从6月11日的结果来看，它在地方上能够得到支持的假象已经荡然无存；它发起经济和劳工战略，但在工厂中却没有人去实施它们；它发表关于当今局势的看法，但没有报纸会刊印它们。

《晨星》毫不掩饰它的退却主义。作为真正的“教皇至上论者”，它留恋共产主义的过去。它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所有新奇的东西，用各种效忠的义务制定了一整套政治信仰——其基本内容反映在发表于1986年英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之前的、以“我们的传统”为题的一系列文章中，这些东西招来了20世纪40年代的各种神灵和思想权威，那个年代似乎是《晨星》开始在工会中赢得支持者的时候，例如塔斯社周围的那些人。它把党的老口号发掘出来，例如“和平与社会主义”，再把它放在遭受资本主义围困时期的报纸的报头上，就好像这两者还可以互换似的。它到处开展苏维埃外交活动，好像英国的劳工运动还处在40年代和50年代争取“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的斗争中。公告栏中对死者的纪念被用做感人的手段，重申与这一事业的久远的联系以及为此所作出的贡献。老革命，尤其是那些最近被开除出党的老革命，在书信栏上处于荣耀的位置。它远远没有沉浸在摆脱党的控制所带来的欣喜中，相反，它坚持自身的正统性，对它的支持者可能有分歧的事情，例如民用核力量，圆滑地保持沉默。像《今日马克思主义》一样，它在实践着自己那一套“战略”，在挫折和失败面前唱唱高调，保持一种政治家般的洞察力，一种超脱和冷静，即使是在当今的共产主义运动无能为力的问题上。

有趣的是，在托洛茨基主义者内部产生分裂的时候，俄国问题通常是分歧的焦点，但在英国共产党中造成分裂的并不是这个问题，也不像1956年和1968年英国共产党内在苏维埃对待东欧的方式的问题上激烈争论那样，而是英格兰的状况这个问题。尤其是由于共产党人重新揭开了对于“劳工”社会主义的种种忧虑，自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修正主义争论以来，它们就一直纠缠着工党。在欧洲共产主义者当中，没有热心于“团结工会”的人，就我所知，也没



有它的任何代表出现在《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大会上。在这一分水岭的另一侧，英国—阿富汗友好协会也没有去为苏维埃入侵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相反，争论现在已经转向了“阶级政治”的问题。欧洲共产主义在70年代后期继续抨击“经济主义”（也就是把提高工资作为斗争的目标）。它采取的方式是与党内以及更多的（假如我的文章的观点是正确的话）是与在工党和工会左翼中的“强调工人利益的观念”进行辩论。在它已经得到支持的范围内，它仅仅在不同程度上代表“新的社会力量”。

每一方在对待其他各方时所表现出来的仇恨和鄙视，现在都似乎超过了“本宁主义”风头正劲的时候工党内的表现，党的忠实信徒中沉默的大多数所承受的迷惘和痛苦也是如此。与那时的工党左翼一样，欧洲共产主义阵营内的仇恨和鄙视也通过代际的语言典型地表达出来：“你为什么还不死啊？”这是在最近的一次集会上，一个新一代的多元主义者的叫嚷，当时，一个老一辈的人正准备发言。在先前的1939~1940年或者是1956年的共产主义危机中，工厂的支部仍然是牢固的，甚至它的力量还有所壮大，反倒是“知识分子”那时被怀疑已被搞垮了。这一次是工人同志对党的忠诚已经开始动摇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似乎已经集合在《晨星》的周围。正如这个党的劳工组织者最近在工会联盟一周后所概括的那样，“白种的、男性的、中年的”工会会员们，在党内已不再受到尊敬，而是受到社会意义上的甚至是性别意义上的憎恶。在别的左翼政治组织中，政治上的分歧由于种种社会学意义上的不愉快而加剧了。渐渐地，单一的组织已难以容纳这些令人不适的事情，并且，尽管在共产党内和工党内所造成的结果并不一样，在它们中辨识出同样在起作用的分裂性力量并不是异想天开的，这就是在效忠于阶级和社团的人们中间同时发生的分裂。

毫无疑问，这些既是政治上的又是社会学上的和代际的分裂，在欧洲别的政党中也可能发现（例如，荷兰共产党似乎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以非常相似的方式改变了它的总的社会特征）。可有趣的

是，在英国，工会问题一直是导致分裂的支点，以至于论述工会主义的文章是“不受欢迎的”，因为正是它导致了共产党与《晨星》之间最初的裂痕，而且也正是“矿工”的罢工及其后果使之扩大成全面的分裂。

这些问题与过去令党员人数骤减的那些问题比起来，是非常琐碎而微不足道的。一篇关于工会官员的争议性文章几乎无法与苏德协定、医生阴谋或者是苏联入侵匈牙利相比。使它们具有过去所没有的破坏性的是，它们使得这个党存在的权利受到了怀疑，使得党所宣称的代表产业劳动阶级的历史使命受到了怀疑。还可以进一步说（就如我在这篇文章中试图去做的那样），英国共产党内争论的真正焦点与其说在于这个党自身，不如说在于工党和工会中的“左倾主义”走进了死胡同。在共产党内的分歧，像我在这些文章中的第一篇所提出的，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工党左翼的分裂以及较少宣扬的1968年之后的院外左翼的分裂的催化剂。它已经成为各式各样的分裂与脱离（secessions）的范例，成为对历史丧失信心的范例，而这种信心在某种程度上是英国左派共同拥有过的。所以说，英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病理不仅仅在于病态的趣味，而且这些病理对那些间接触的人和当下的剧中人都可能会产生同样大的影响。

## 第十章 阶级的隐喻

### 一 政党

阶级，或更具体地说“阶级斗争”，是共产主义存在的历史权利，而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5 年写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以来，社会的“现实运动”就成了它最终的上诉法院。即使现在，当这个党或者至少是其处于支配地位的派别，正在拉上已经进行了大约 60 年的劳资战争的大幕的时候，它仍然是要被顶礼膜拜的图腾。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盛时期，不管是作为解释性的范畴还是作为修辞手法，它的首要地位都没有受到过质疑。每一个问题都是“阶级问题”，不管这个问题涉及的利益差异有多大。“争取和平的斗争”（或者是“争取殖民地解放的斗争”）和那些像“工资阵线”（Wages Front）<sup>①</sup> 那样的更直接地致力于物质生存条件的斗争，都是如此。共产主义政策是“阶级”政策，不管它们是否得到群众的支持。它的政治路线，它的宣传和运动的“总路线”，特别是像英国那样的对外政策的“路线”，照例是阶级的政治路线，不管它发生了怎样的变形和转向。最近那些为人民阵线辩护的人似乎已经忘记了在莫斯科审判中和在援助西班牙（Spanish Aid.）<sup>②</sup> 中一样有一条“阶

---

① 这是马格特·海涅曼（Margot Heinemann）1947 年出版的一部著作的名称，那时她在劳工研究部工作。

② 季米特洛夫曾经写到过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审判，认为它是“国际工人阶级反法西斯斗争中必要的组成部分”。托戈里亚蒂（Togliatti）说它是“保卫民主与和平、保卫社会主义与革命的行为”。参见 M. Ercoli,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November-December 1936。

级”路线。同样，在意识形态的斗争（“思想斗争”）中，所有的观点在“客观上”都是阶级的观点，不管它的参与者有着什么样的确定的目的（或者社会形势）：存在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sup>①</sup>，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

共产党人认为政党是阶级存在的集中表达。这些政党不是根据纲领和政策，而是根据它们是否能够帮助阶级发现它真实的命运来评判的。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共产主义政党，不管它的成员的社会特征如何，都是阶级的领导。它是“无产阶级的最有才智的（intelligent）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组织化的最高形式”<sup>②</sup>，是“无产阶级实现它自身的根本任务的唯一历史手段”<sup>③</sup>。用布哈林（Bukharin）和普里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在《共产主义 ABC（1922）》中的豪言壮语来说，它“把无产阶级身上所有的伟大与魅力融为一体……结合了它的英雄主义、明确的阶级意识、对资本主义的刻骨仇恨……它的创造新社会的伟大要求”。

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崇高使命的代理人，致力于它的世界历史任务。它成了某种集体性的超我，要在政治上，用列宁的话说：“唤醒”无产阶级<sup>④</sup>，并使它摆脱狭隘的宗派主义。斯大林写到，党要把群众的素质提升到“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水平”<sup>⑤</sup>。由于它的无畏和坚定不渝，共产党在保卫无产阶级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所承担的角色与其说是代表性的，不如说是模范性的，它是这个阶级的优秀品德的化身，它体现了“革命的道德力量以及把它坚持下去的意

---

① 对这一特性所作的恶意的描绘，可参见加罗蒂（R. Garaudy）的《掘墓人的文学》（*Une Littérature de fossoyeurs*, Paris 1947），而抬高这一特性的评论，可参见卢卡奇（G. Lukács）的《存在主义或马克思主义》（*Existentialisme ou marxisme*, Paris 1948）。

② Stalin, *Leninism*, London 1944, p. 78.

③ 托洛茨基在（苏联共产党）第13次全国大会上的讲话，引自 B. Knei-Paz,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Leon Trotsky*, Oxford 1979, p. 379.

④ *Lenin on Britain*, Moscow 1959, p. 60.

⑤ Stalin, *op. cit.*, p. 73.

志力”<sup>①</sup>。共产党人，“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雅各宾党人”<sup>②</sup>，是革命风暴的中心。在革命处于像1917~1921年那样的高潮时期，他们是胜利的组织者；在低潮的时候，他们坚守着对革命的信念。共产党人并不害怕担当起领导和引路人的角色。他们不能取代无产阶级，可是他们能够像在心理剧中那样，通过化身为这一阶级内心深处的意愿来模仿他们。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尽管它在无产阶级当中仍然有它的社会基础”<sup>③</sup>，却是资本家阶级在劳工当中的代理人。根据英语国家中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杜德的说法，它是“阶级叛卖的意识形态和行为”<sup>④</sup>；而根据葛兰西和陶里亚蒂在他们的里昂论纲（1926年）中的说法，它“不是……工人阶级运动的右翼”，而是“资产阶级的左翼”<sup>⑤</sup>。其他政治流派的特征也是用类似的术语去说明的。民族主义，不管它的群众基础如何，是“资产阶级的”，尽管从它的政治联盟的本质来看又可以分为“革命民主主义的”或者是反动的<sup>⑥</sup>。法西斯主义是“金融资本本身的力量”。按照季米特洛夫对纳粹的刻画，它不是超阶级的民族统一运动，而是“金融资本的最反动的、最沙文主义的和最帝国主义的成分的公开的恐怖专制”<sup>⑦</sup>。和平主义（共产党人与之联合起来追求共同目标的时候不包

① Dimitrov, “The Working Class against Fascism”, *Seventh World Congress,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London 1936, p. 25.

② Maurice Thorez, *The People's Front*, London 1936, p. 180.

③ Antonio Gramsci, *Political Writings (1921 - 1926)*, London 1978, p. 359.

④ Address to the 7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n *British Mus. Dutt Papers, Memoranda and Reports, 1934 - 1950*, fol. 17.

⑤ Gramsci, *op. cit.*, p. 348; the discussion on this formulation in *ibid.*, p. 358, and the harsher characterization-also in the Lyons Theses-in *ibid.*, pp. 373 - 374.

⑥ 关于国民党的性质的变化，参见 Stuart R. Schra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Harmondsworth 1971, pp. 208, 221, 223。1935年，在与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前不久，蒋介石还是“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的“首领中的首领”。

⑦ Dimitrov, *op. cit.*, pp. 6 - 7.

括在内)是“小资产阶级的”。这是一种源自列宁的《帝国主义与劳工中的分裂(1916年)》,并且在接下来50年的共产主义观念中被忠实地重复的说法。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被归于“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以及“流氓无产者”,不一而足。它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产物,是它的生产的分散状况的产物……(也)是工人组织的不成熟的产物”<sup>①</sup>。这正是考茨基以及其他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classical Marxists)在十月革命时期对布尔什维克的指责。

阶级也是党内斗争的惯用语,尤其是在第三国际最初的10年,那时各个成员党之间的派系冲突是种常见病。再加上以前就有的种种分化,例如1914年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所特有的那些(也就是在温和派与极端派,或者说多数派与少数派之间的),于是就有了一个全新的备受争议的词汇,在争论中无论是“左倾”分子还是右倾分子,都被诊断为“小资产阶级”。他们或者是无意中被邪恶势力利用了,或者就是些“腐化分子”。学说的争论主要不是指向命题的真实性而是指向参与者假想的阶级忠贞,并且渐渐地,随着“布尔什维克化”的发展,指向他们的阶级背景。策略上的分歧,很少是根据当下的可能性来解决的,而是诉诸阶级的无意识,也就是有一个无产阶级在等待着党的领导。“机会主义”与“宗派主义”同样被谴责为对群众缺乏信心或者说“低估”了群众<sup>②</sup>,第一种情况是由于“落后”,第二种情况则是由于“自我孤立”。替代性的选择被当做截然相反的东西,而不是当做价值观之连续的音阶上相对不同的位置,或者是同一谱系中相对不同的点。可以合法地进行争论的范围渐渐地变窄了,直到任何与党的路线的不一致都被诬蔑为投靠阶级敌人。这种变化常常归罪于“斯大林主义”,但在20世纪20年代俄国党内的争论中,这一点既是他们的中间派和右翼的迫害者的特征,

① “Spain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Facsism”,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November-December 1936, p. 635.

② 这些是葛兰西和陶里亚蒂1926年在他们的里昂论纲中的表达方式。参见前面所引用过的葛兰西的书。

同样也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左翼反对派”的特征。并且，作为争论中的一种共同的倾向，在欧洲其他政党中也是如此，而那时斯大林相对而言还不为人知。因此在1924~1926年意大利党内的争论中，葛兰西随意地给波尔迪加派（党的左翼的反对派）安上密探的罪名，指责他们“对抗无产阶级的精神”，“表现了对工人阶级革命能力的顽固的悲观主义”；他指控其犯有“派系主义”的错误，是“警察用来破坏革命政党的一个工具”，并把他们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进一步给他们涂上邪恶的色彩<sup>①</sup>。

对阶级耿耿于怀，且几乎像沉迷于掷骰子一样着迷于此，是俄国党内的通病。在那里，阶级就像是在令人辨不清方向的陌生地形上空的北极星。俄国共产主义运动是建立在对阶级前景的预判基础上的，也就是列宁在《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中费了很多的篇幅去辩护的那个命题：一个完全的无产阶级将会出现在一个由农民、小生产者构成的民族中。村社的社会发展特性，农民的“分化”或者是俄罗斯民族经济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原本就引起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派之间的对立的问题，又处于20世纪20年代党内争论的风口浪尖。不仅是不同农民阶层的规模和相对的力量，还有如何分配可拿来出售的剩余粮食——像加米涅夫说的“收成当中的社会内容”<sup>②</sup>——都成了衔怨争论的主题（这就是1926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背叛屠统治地位的斯大林—布哈林领导层的起因）。为了评估“反无产阶级的因素”在农村的发展，人们热烈地讨论着不同的分类方法，有些人用支付工资的劳动作为标准，有些人用牲口，还有人用财产和收获的粮食作为标准。农艺学家和制订计划的人支持

---

① 同前面所引用过的葛兰西的书第333页和第362页。对于葛兰西来说，就像对这一时期俄国争论中的斯大林来说一样，“小资产阶级”当然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根据印出来的记录，在里昂大会前的政治委员会中，葛兰西还给“极左的”反对派涂上了邪恶的色彩。“在党内搞派系”“在我们当前的形势下”就是在“充当密探”。

② E. H. Carr,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1924-1926, I, London 1958, p. 299.

党的理论家们所作的统计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研究。1928年，共产主义科学院的土地部门正在探讨一套包括具体指标的别出心裁的体制，它可以把“小资产阶级”农庄从“小资本家的”和“半资本家的”农庄中区分出来。而另一个研究小组使用支付工资的劳动这一标准，区分出所谓的“无产阶级的”农庄与“半无产阶级的”农庄。“第一个范畴包括那些每年出卖他们的劳动力超过50天的农民。第二个包括……那些每年出卖他们的劳动力20~50天的农民。”开头作为政治经济问题来争论阶级问题，到最后却以一种等级表而告终，在这张表中，最下层的农民阶层被赋予了准商人的地位。

英国共产党在许多方面要比俄罗斯共产党更像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是由革命的工会发言人和工人阶级团体联合组成的，最初主要是在克莱德河畔（Clydeside），后来是在伦敦、曼彻斯特和南威尔士。从一开始它就是由产业工人领导的，并且，在最初的40年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工程师们领导的（工程业混合工会的成员在党的全国大会的代表中绝对是最大的集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多达50%，到了20世纪60年代也达到30%）。同样是从一开始，这个党就赋予了工人斗争以首要的地位；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是它所选择的领域，工厂（“尤其是大的工厂”）则是它的取胜之地。在第三国际的各政党当中，只有英国共产党保持或试图保持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有机联系（也就是拥有同时成为工党成员的双重身份），并且第三国际在1928~1934年间也认可了英国共产党与工会的“特殊”关系，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却鼓励共产党员脱离工会。

英国共产党尽管只能得到少数人的支持，人们却并不怀疑它是这个阶级在历史上的代表，用它早期的一个新成员的话说，是“用来进行……斗争的工具，而对方带着越来越多的恶意也在进行着这一斗争”<sup>①</sup>。它承担的是“阶级的领导”，采取的是“阶级的立

<sup>①</sup> Arthur Horner, *Incorrigible Rebel*, London 1960, p. 67.



场”，依据的是“阶级的洞察力”。相反，尽管工党从工人阶级的支持者那里汲取了选举的力量，并在理论上以工会和合作社组织为基础，但从社会关系上来说，却是工会官僚与野心勃勃的议员们的混血儿。在观念上，它是不可救药的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它委曲求全；在道德上，它软弱无力。英国共产党是从对工党的深刻敌意出发的，并且在1928年的向左转和采取“以阶级对抗阶级”之前很久，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把自己当做资本主义的第三政党看待的。这个党早期的一位领导人，格拉斯哥的铁厂工人汤姆·贝尔在1926年英国共产党的一份培训手册中对此概要地作出了毫不夸大的说明。它采用三段论的方式宣布，工党“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党”，因为它“没有……阶级的基础”。费边社是“抱着小资产阶级态度的中产阶级团体”，它还把它的观点灌输给了工党的领袖。独立工党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团体，其中，“无产阶级的成员”已经被那些持有“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宗教观念的人排挤出去了。掌控工会的是一个有着“相当顽固的小资产阶级观念”的官僚集团，而这种观念正是“劳工中工人贵族的”特征<sup>①</sup>。另一个有经验的工会运动家J. R. 坎贝尔，在1928年的一本小册子中，为了证明工党而不是共产党是混进来的敌人，又推进了这种推理的方式：“因为工党代表着资本主义的政治观点，就工会而言，它是真正的外在的组织，因为这个组织表达的是敌对阶级的政治观点。共产党必须使工会接受一种革命的哲学，从而使他们在政策上作出必要的改变，这种改变能够使得工人阶级获得对资本主义的彻底胜利。”<sup>②</sup>

阶级对于英国共产党的法人身份感，以及它的理想化的自我形象——不管是作为革命的先锋队还是作为被压迫者的保护者，是极为重要的。它相当于党的真正的工会和工厂力量，相当于那些它有

---

① *Manual of Party Training*, 1926, pp. 10 - 11.

② J. R. Campbell, *Red Politics in the Trade Unions*, CPGP 1928, p. 17.

能力建立的极少的地方根据地。阶级对工党政治的语言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可是，或许有人会提出它还充当了一种能够给人带来信心的象征物。英国共产主义使用这种从它自身以及别的地方得来的阶级语言去掩饰它狭窄的群众基础、它在选举活动中的弱点，以及它在1926年后就缺少群众运动的事实。在德国、中国和其他国家，共产党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阶级的代理人，而在英国，随着革命浪潮的退去，形势颠倒了过来：由组织者和演说家们不断唤起的这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掩盖，或者是被用来掩盖这个党的无能。这个党无能依靠自己去动员人们支持它，而诉诸那个在人民阵线时期采用的、制造神话的范畴“英国人民”。这个范畴有助于使“进步的力量”最大化，而使反动的力量最小化。与此类似的是“广泛的联盟”的运动，在这一联盟中，工人阶级带领着各种专业人员、“小”农场主和店主们，但这个运动被用来掩盖在英国缺乏建立人民阵线以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联盟的关键性的东西。阶级分析方法也在培养一种认为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幻觉。它把注意力从使党感到棘手的问题上转移到被认为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深层次动力上。它似乎把党置于一种支配的地位，在想象中控制着事件的进程，实施着“战略”并“发号施令”，即使没有人响应。至少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与“《今日马克思主义》的没落”之间的渊源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阶级意识”，事实上是政治意识的另一种说法，尽管是一种较为具体的说法。它远不是“我们”与“你们”或者集体的自我意识——在日常生活条件下养成的“朴实的”阶级意识——这样简单的事。它与那些大量出现在关于后街生活的论文集中反映的共同体价值观也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对于工人阶级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这样的快乐主义，对于生产区伙伴间的亲密关系，对于人们的“根”所在之地的邻里亲情，它也都没有为它们留下存在的空间。用共产主义者的语言来说，“好的阶级态度”就是政治上正确的态度。它不是工人们可以自发产生的态

度，他们必须接受更有觉悟的人的教育。这就需要接纳某种世界观，即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用《哲学的贫困》（1847年）中所提出的经典语言来说，这牵涉到这个阶级能否逐渐意识到自身的总体性。

共产党人是在一种隐喻的而不是其本来的意义上使用“阶级”这个词的。他们不在乎细微的社会差别，而只关心终结的目的。他们忽视了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例如个人的抱负和与生活方式有关的政治观点，对社会地位的怨恨，由于阶级的区分所带来的日常不便。他们的目光主要集中在社会发展的法则和趋势上，集中在“现实之辩证的前进运动”上——就像英国的一位共产主义作家表达的那样。在列宁主义的理解中，阶级是一个道德的而不是社会的符号；它是一种行为的隐喻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归属的隐喻；它不是依据职业和收入而是依据忠贞来衡量的；它是与政治相关的而不是——或同时也是——与经济相关的；它不仅是一种社会的状况也是一种心灵的状况，一种意识形态的联合体而不是身份这样简单的事情。R. P. 杜德在1922年写到，阶级是通过其成员的“意志和意识”构成的。他们用战斗来使自己变得更强。他们在与其他阶级的斗争中实现了他们自身，他们在争取权力的斗争中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原来的主张的一种奇怪的颠倒：不是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规定了社会存在的方向；政治观念与其说是对社会中阶级的反映，不如说是构成了社会中的阶级；意识形态是原因更甚于结果。

## 二 “生活就是斗争”

按理来说，相比共产主义的政治观念，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更加强调以阶级来界定，它不承认有个人选择或者判断的余地，而只承认社会的法则。权利与利益、价值观与社会需要都是不可分割的。资产阶级道德规范只是有组织的伪善，是对各种剥削的掩饰。

无产阶级的道德规范是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上。忠诚、旺盛的斗志和自我牺牲精神，作为这个党的理想的品质，是工人阶级在苦难和斗争中培养起来的特点；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是资产阶级明显的标志。善恶问题不能与其存在的条件分开；要是强制性地剥夺压迫者的权利，就会扩大群众的自由。依照这种看法，对待苏联的“积极的”态度，就成了阶级忠贞的证明。就像 R. P. 杜德用一段三段论推理所表达的那样，“对于资产阶级评论家来说……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对自由的无法容忍的限制。对于具有阶级觉悟的、了解工厂奴隶制的现实的产业工人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代表了对于解放的憧憬”<sup>①</sup>。这种说法流行了约有 50 年之久，并且在某些地方仍然存在。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阶级是一种排他性的甄别。它禁止或者说使得那些替代性的归属形式丧失了合法性，它把民族、宗教、种族都说成“虚假的意识”。它不允许相互冲突的阶级定位或者是对地位的不满。它把社会的流动性视为病态。个人可能像叛徒或者工党右翼的领导人那样，脱离他们的阶级——抛弃它或者“背叛”它。他们可能像流氓无产者一样堕入深渊，但他们不可能体面地改变自己所属的阶级。共产党人极其厌恶不属于阶级的人（the unclassed），并且，尽管他们迷恋平等的观念，但他们有一种几乎是封建的等级感。他们尤其痛恨暴发户，尤其蔑视阶级属性不纯的人。流动性是一种污染物，稳定性是力量之源；对集体的忠诚就像在军队里或者寄宿学校中一样受到推崇。总之，阶级意识是件有关道义（honour）的事情。

阶级的道德被附加上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伦理要求，按照这种要求，振臂挑战无数的艰难险阻是对品质的最高考验。消极无为是“不光彩的”，是奴隶心态的表现。抵抗显示了英雄的气概。阶级斗

---

<sup>①</sup> Palme Dutt,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Doctrine of Communism*, London 1938, pp. 29 - 30.

争既是一种普遍的状态，又绝对是一种道德上的善。它是对人民群众的“真正的”教育<sup>①</sup>。它使得他们的意志变得刚强，使得他们的品德变得高尚。它使得下等的阶级成为他们自己命运的主人，成为他们自己命运的裁判者。既然鼓励个人为了更崇高的目的而牺牲眼前的好处，那么这一斗争在道德上也是有所回报的。20世纪30年代的一本共产主义小说中的人物说道：“对我们而言，生活就是一场搏斗，是在工厂烟囱的长长的阴影下的一场搏斗。”<sup>②</sup>

共产党人用激烈和强调的语言把他们的生活概念化了，他们的自传证实了这一点。《永不屈服》是失业工人团体的组织者沃尔·哈宁顿所选择的富有表现力的标题；四处漫游的水手鼓动家乔治·哈代（George Hardy）的自传标题是《暴风雨的岁月》；党在船厂工人中的意志坚定的干部鲍勃·斯图尔特（Bob Stewart），其自传标题则是《挣脱锁链》。《克莱德河上的革命》是威廉·加拉奇尔为他作为一名工会发言人组织抵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段时期所起的名字。《像雄师一样奋起》（取自雪莱的《英格兰人》里的一个标题）和《雷声隆隆》（取自威廉·莫里斯的一首军歌）是他后来的作品。不过，较近时期的一些作品标题的表现力也毫不逊色：《生活就是斗争》是厄尼·本森所选的标题，它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层所提供给我们的很少的几部自传之一；《生来就是要斗争》（*Born to Struggle*）是梅·霍布斯（May Hobbs）的；《除了斗争没有家》是爱德华·厄普沃的三部曲。

在第三国际的早期，“风暴”（storm）这一观念是共产主义想象力的中心，它勾画出了革命的过程以及群众的强劲力量。在美学上，共产主义想象力大量借用了德意志的表现主义，柏林的“风暴”（Der Sturm）画廊是它的休息室——英国的共产主义雕刻家皮特·佩

---

① V. I. Lenin, *Selected Works*, III, p. 6.

② John Sommerfield, *May Day*, London 1984 ed., p. 91.

里 (Peter Peri) 在那里度过了他的艺术学徒期<sup>①</sup>。大量被称为无产者文化 (Proletkult) 的其实只是政治化了的的表现主义。普多夫金<sup>②</sup>的《亚洲风暴》(1928年) 带着它关于未来的启示, 掠过蒙古平原, 捕捉到了它的狂喜的时刻——用电影剧本中的话说就是, “积累起来的能量的突然爆发”<sup>③</sup>。呼唤“工人阶级的风暴预告鸟”去为他们的殉难者复仇的克利福德·奥德兹 (Clifford Odets) 的《期待左派》(1935年) 是另一个高潮<sup>④</sup>。20世纪20年代波兰工人的歌曲《危险的旋风》, 尽管被人民阵线把它从官方的歌曲名单中删去了, 但在我的共产主义青春时代仍在被秘密传唱。这首歌属于那种缺乏必胜信念的作品, 它在精神上也许更接近于在资本主义围困中所经历过的那种斗争。

危险的旋风在我们的周围旋转,  
打击着黑暗和恐惧的势力。  
争取人类解放的战斗仍在进行,  
自由的红旗一定会胜利。

工人们, 向前进,

① Catalogue, *Fighting Spirits*, Peter Peri, Cliff Rowe, London 1987, p. 22.

② 维斯耶沃罗德·普多夫金 (Vsevolod Pudovkin, 1893~1953年), 与赛吉·爱森斯坦 (Sergei Eisenstein) 和亚历山大·杜甫琴科 (Alexander Dovzhenko) 被并称为苏维埃时期鼎立的三位大师。其导演的《母亲》、《圣彼得堡的末日》和《亚洲风暴: 成吉思汗子孙》, 奠定了他在世界影坛上的地位。其他影片还有《米宁和波札尔斯基》、《苏沃洛夫大元帅》、《海军上将纳希莫夫》等。普多夫金首先把戏剧中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用于对电影演员的指导, 他有关电影表演的理论在世界电影表演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亚洲风暴: 成吉思汗子孙》是他所拍摄的最后—部影片。该片描写了一位在战乱中饱经磨难的青年的政治与社会意识觉醒的过程。故事背景设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蒙古战线。普多夫金将压迫与人性的贪婪化为精彩的影像语言赤裸裸地显示在屏幕上, 却使此片的完整版本长期被封锁。——译者注

③ Jan Leyda, *Kino: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and Soviet Film*, London 1973, p. 248.

④ Clifford Odets, “Waiting for Lefty”, in R. Samuel, ed., *Theaters of the Left*, London 1985, p. 351.

自由在等待着你们。  
在遥远的陆地和大海上，  
争取人类解放的战斗仍在进行，  
自由的红旗一定会胜利！

在20世纪20年代，尤其是在1928年向“左”转之后形成的共产主义理论中，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变得尖锐起来。当反革命发觉自己处于守势的时候，它的压迫就加倍了。随着资本主义最终危机的临近，统治阶级转向了法西斯主义。在苏联那里，集体化是“第三次革命”。根据官方的说法，它是由农村中贫苦的和中产的农民所进行的反对“富农”压迫者的阶级斗争。斯大林教导说，被剥夺者的残余分子对苏维埃政权发动了更为绝望的进攻。“社会主义的胜利前进”并没有使得阶级消亡，反而导致“阶级之间的冲突不断地加剧”<sup>①</sup>。就像陶里亚蒂为了证明莫斯科审判的正当性所写的那样，“无产阶级的正义之剑”从来没有像在资本主义的最后挣扎中这么必不可少：“……恰好是在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使得他们的消亡不可避免的时候，被击败和消灭了的特权阶级的抵抗又死灰复燃，并且采取了特别绝望的形式。”<sup>②</sup> 中国革命经过了大约20年的武装斗争所取得的进步，为这些真理提供了一个更加可信的例证：在它们最终把毛主义神化之前大约30年，它们就已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常识”。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阶级是活的、有意识的存在。它们能够作出选择，在挑战面前能够站起来或者不站起来。尽管它们显然只是些抽象物，却被当做与个别的人一样是真实的、可以触摸得到的。它们有自己的思维和意志。它们有“本能”和“利益”，即像弗洛伊德的本我（id）一样的强制性的欲望和冲动。以神人同形同性论

<sup>①</sup> Moshe Lewin, *Political Undercurrents in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 1975, p. 43.

<sup>②</sup> Ercoli, *op. cit.*, p. 643.

的方式，它们被赋予了行为的属性；在精神上，它们被赋予了无意识的动机和愿望——就工人阶级而言，就是“积累起来的革命能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寻找一个理由、一个时刻，有时甚至是一个显然无足轻重的时刻爆发出来”<sup>①</sup>。阶级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它们可能是软弱的或者坚强的，勇敢的或者胆怯的，心胸狭窄的或者心胸宽广的。《历史唯物主义》（1922年）是《共产主义ABC》这本小册子理论上的姊妹篇，布哈林在这本书中的下述基本观点提供了一种马克思主义者的颇相学：无产阶级方面，“革命精神”、“同志关系”、“习惯于有组织的行动”；农民方面，对私有财产的迷恋“使得他们不喜欢变革”；流氓无产者——共产主义者被压抑的梦魇——则是“偷懒”、“缺乏纪律”、“根据愚蠢的任性来采取行动”<sup>②</sup>。

在第三国际的意识形态中，阶级的地位是根据战斗精神或者列宁所说的“革命精神”来衡量的。虽然小资产阶级也可能赞成变革并追随工人阶级领导，但只能占据一个卑微的位置，因为它是一个缺乏能量、先天孱弱无能的阶级。农民没有被当做一个阶级，据说（错误地依据东欧的发展状况）他们不能使自己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是分散的、孤立的，这就使得“他们的精神视野必然受到限制”。尽管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并且饱受压迫，他们也只能担当配角。即便是对农民极为同情的第三国际的理论家布哈林，也只是为它提出了有限的要求。他在1925年写到，在俄罗斯，农民也许能进步为“工人阶级中一个落后的部分”；他们能够被接纳为“无产阶级专政中较低的阶层”<sup>③</sup>。

工人阶级之所以处于光荣地位——“历史赋予它自觉地改造社会的任务”——不在于其数量而在于它出众的战斗精神，这使得它成为“已经起来为第三国际的事业而斗争的阶级”。它承担着武士阶

① Stalin, in “Report”, *Fifteenth Congress CPSU*, London 1928, p. 31.

② Nikolai Bukhar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ichigan 1976, pp. 289 - 290.

③ Lewin, *Russian Peasants and Soviet Power*, London 1968, p. 45.



级的角色，并且被赋予了军人的品质：目标专一、意志坚定、逆境中的坚韧，尤其是（英国共产主义宣传中的主旨）愿意为事业而牺牲他们自己。毛泽东在1926年写到，工人是“特别优秀的战士”。

### 三 大有前途的阶级

在共产主义想象中，阶级是基督教末世论中“天道”的远房表亲，是推动着社会发展的无形而“真实”的东西，是把人类从低级阶段提升到高级阶段的创造性力量。阶级的特征体现在他们注定要去完成的使命上，体现在历史赋予他们的任务上。阶级不仅对他们自己还对他们的子孙后代都负有责任和要履行义务。依据社会演变的动力学，他们被指定承担起扮演进步的或者反动的角色的任务。阶级斗争是一场辩证的戏剧，其中，年轻而富有活力的挑战衰老而腐朽的，有创造力的阶级与寄生的阶级在进行着斗争。用第三国际早期的一位理论家的话来说，“适合掌握领导权”<sup>①</sup>的阶级将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塑造社会，而垂死的阶级将会在历史中湮没无闻。

资本主义是一种气数将尽、行将消亡的社会制度，这种看法是第三国际的出发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自杀性的疯狂”和“血腥的灾难”已经揭示了资本主义在道德上的野蛮性<sup>②</sup>。它带来了饥饿和瘟疫。国家之间的危险的对抗似乎由于即将到来的和平而加剧了，军备竞赛这种“国际的无政府主义”证实了它们的毁灭性力量。在经济上，旧的秩序已经破产，步履踉跄地从狂暴的通货膨胀走向金融崩溃。政治上，它一片混乱，临时政府取代了传统的统治精英，白色恐怖成了它阻止普遍的叛乱的唯一手段。在欧洲，它面临着武装起义和全面的工人斗争；在亚洲，它面临的是刚刚觉醒的殖民地人民的反

---

①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1968, p. 52.

② Palme Dutt, “Notes of the Month”, *Labour Monthly*, April 1923, p. 195; Trosky,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New York 1973, I. pp. 29, 45.

抗。“在欧洲连一个健康的地方也没有”，第三国际在它早期的呼吁中写道：“在经济上，德国已经倒退了几十年。奥匈帝国的各个碎片被带刺的铁丝网彼此分割开来……法国在战争债务和军国主义的重压之下正走向崩溃。意大利被削弱了，不可能再从动摇了它的基础的动乱中恢复过来。英格兰甚至没有想过去恢复它战前的实力。”<sup>①</sup>

20世纪20年代“暂时的稳定”，就像第三国际所描绘的那样，几乎没有减缓日益迫近的危机感。在接下来的10年里，这一点又得到了新的证明。1929年的大衰退使得认为资本主义最终危机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信念焕发出新的生机，而独裁者们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出现至少在其早期阶段使得人们相信，“新一轮的战争和革命”即将来临。不管在国内面临着怎样的困境，英国共产党人并不怀疑资本主义注定要灭亡并且它的死期已经近在眼前。费边社把资本主义称为一种“正在衰败的文明”；哈利·波利特最喜欢的一个比喻是，它已经“成熟了并且腐朽透了”，只需致命的最后一击。与之密切相关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资本主义是“垂死的文化”，而创造的责任已经传递到他人手中。这个观念同时也是20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写作中最喜欢用的一个主题。20世纪30年代早期，海克尼（Hackney）的一个叫做“红色无线电”（Red Radio）的剧团敏感地把握住了即将到来的覆亡的意义<sup>②</sup>。他们的主题歌是：

旧世界正在轰然倒塌，  
让我们帮忙把它砸烂，  
然后建立起一个属于工人的世界。

法西斯主义——共产党人预先就察觉到了它的威胁<sup>③</sup>——在这种

<sup>①</sup> Jane Degras, op. cit., II, p. 108.

<sup>②</sup> Samuel, op. cit., p. 90.

<sup>③</sup> 有关的文件和有益的讨论可参见 David Beetham, *Marxists in the Face of Fascism*, Manchester 1985。

病态的意义上被解读为证明了资本主义不再能够容纳自己的矛盾。这是对无产阶级的惩罚，因为他们没有继续推进从俄国开始的革命。第三国际在1923年写到，这是资本主义腐朽的“特有现象”，是“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解体和资本主义国家分裂的反映……它的最有力的根源在于这一事实，即帝国主义战争和由于战争而加剧、加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混乱，对于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农和‘知识分子’构成的广泛的社会阶层来说，意味着……他们以前的生活条件的毁灭”<sup>①</sup>。纳粹主义的产生一开始并没有打扰对这一自信的分析。R. P. 杜德在他那本有力的《法西斯主义与社会革命》（1935年）一书中把它归类为“垂死的资本主义文明临死前发出的叫声”<sup>②</sup>。

与“垂死的文化”相对，共产主义代表的是“新的”、“发展着的”文化。在工业方面，它站在电气化的高度上；在意识形态方面，它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在教育方面，它主张实验；在政治方面，它主张国际主义。这些现代化的潮流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的危机中还代表着无可置疑的善。它支持进步，反对倒退；拥护理性，反对启示；维护未来，反对过去。共产主义是“世界的青春”。它向“思想严肃的青年工人们”发出它的呼吁，并且用展示了物质力量的图画来象征性地表现它自身。同样的精神还把苏联抬出来作为根据，比如20年代所说的“俄国试验”，或者是哈利·波利特在五年计划时期喜欢说的“年轻的苏维埃联盟”<sup>③</sup>。甚至在“年轻的共产党人”这支军歌中，城市化也体现了希望的原则：

① Degras, op. cit., p. 39.

② Palme Dutt, *Fascism and Social Revolution*, London 1934, p. 231. 也有人指出：“只有揭示法西斯主义的阶级基础，揭示其赖以产生和发挥作用的阶级关系的机制，揭示它所扮演的阶级角色，才能界定它的具体特征。只有这样，才能在与资本主义发展和腐朽的特定阶段相一致的具体现实中理解法西斯主义。”参见 Degras, op. cit., p. 76.

③ Harry Pollitt, “Introduction” to Allen Hutt,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Britain*, London 1933, p. xvi.

城市的呼声永不停息，  
工厂鸣响汽笛，发出信号。  
因为这是一代新人，  
为青春的战斗而欢呼。

同志们迎风肃立，  
向冉冉升起的太阳致敬。  
我们的同志们面向黎明，  
开始了新的生活。

用20世纪20年代共产党人与工党共享的富有表现力的话语来说，工人阶级是“大有前途的阶级”，也就是R. P. 杜德不厌其烦地所说的“历史上的新兴阶级”<sup>①</sup>。在数量上，它正变得越来越庞大，成为人口中“压倒性的大多数”，它所面对的只不过是少数的压迫者。在组织上，不管受到过什么样暂时的挫折，它变得越发坚强了。在政治上，它正变得“成熟起来”，集中所有的战斗力，检验它新成立的政权。

工人阶级是按照可能性而不是现状来界定的，它是“一个已经把未来握在手中的阶级，尽管它还不知道”<sup>②</sup>。不管它现在的地位多么卑微，它潜在的是全能的，只要它意识到自己的历史真实性(historicity)。按照英国共产党人所喜爱的一句格言的说法，没有什么力量比“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更伟大了。在第三国际的意识形态里，无产阶级扮演了“解放者”阶级的角色。它已经被赋予了解放的使命，不仅要消除社会的不正义，还要使社会从阶级的奴役中挣脱出来。它是世界范围内争取自由的斗争的“领导阶级”，支持着包

① Palme Dutt, *The Crisis of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53, p. 500.

② Jack Beeching, intro. to Ralph Fox, *The Novel and the People*, London 1948, p. 15.

括都市工人阶级以及殖民地和落后地区的“劳苦大众”在内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事业。它肩负着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重任，在解放它自身的同时，也将解放全人类。

### （一）无产阶级巨人

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共产主义艺术，包括无产者文化和结构主义的艺术，都赞美劳动的力量。在莱热<sup>①</sup>的机器美学中，工厂不再意味着人们想要逃避沉重乏味的工作，而是工人力量的象征。飘拂的长袍、遥远的中世纪的手艺人与农民，这些出现在早期社会主义者“五·一”横幅上的未来的预报者，现在被无产阶级巨人取而代之了。结实下巴、肌肉强健的胳膊和卷起的袖子，身边是他的女伴，紧握着没有展开的旗帜——这个巨人是生气勃勃的栋梁。这样的形象常常与30年代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以及五年计划中英雄们高超的劳动技艺联系在一起。可是，在早期的共产主义出版物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在《共产主义者》中埃斯坡（Espoir）的那些令人生畏的复仇者身上<sup>②</sup>；在《共产国际》杂志的封面上（一个长着胡子的运动健将正把雷电掷向压迫者）；在美学化的工厂、矿山、工场中，以及象征着斗争的那些剪影中，这些剪影装饰着《党组织者》，发出了无声的挑战。

欧洲社会主义向“工人主义”（workerist）的转向要比俄国革命早10年。在布尔什维克把它变成一个偶像之前，“无产阶级巨人”——挣脱了锁链的普罗米修斯——早就出现在社会主义的海报艺术中。如果看一看1917年都灵（Turin）的群众罢工，或者是

---

① 费尔南德·莱热（Fernand Léger, 1881~1955年），法国画家，作品多以抽象几何形体和广告色块表现城市生活和工业题材，1945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主要作品有《城市》、《瓶》、《建筑工人》等。——译者注

② 选集已由英国共产党再版。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是由艺术家—印刷工人全权负责管理的，有关的细节参见 Sir Francis Meynell, *My Lives*, London 1971; Pat Francis, “Socialists and the Art of Pringting”,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Spring 1987。

1917~1919年全欧洲的动荡，就可能把俄国革命视为一个结果而不是世界范围内反抗活动的原因。那些相信俄国革命是工会发言人组织的胜利的群众联盟的同情者们，也许只是些蹩脚的预言者，可是他们所做的也只是表达了这一时期的一种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情感<sup>①</sup>。

工党独自抵制着俄国革命的呼吁，而英国的工团主义在经历了1917~1920年的工会高潮之后逐渐被边缘化了。不过，一种朴素的“工人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英国却是非常明显的，尽管其不倾向于革命。群众联盟拥护无产者文化事业，而且，当1926年工党大会要求调查将来工人的管理会在多大程度上培养起“无产阶级生活观”的时候，它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即使是对正统的费边主义者而言，这段时期的工人阶级也终于成了集体主义理想的体现。“工人的统一体”，尽管采取的是联邦制的形式，却是工会、合作社和党三者联盟的基础，它使得工党从议会的组成部分转变为渐渐地被视为劳工运动的东西。工党向“公民们”呼吁而不是向无产阶级呼吁，它还声称自己是全民的党。它回避阶级斗争的观念，但像无产者文化的追随者一样，把工人视为“大有前途的阶级”，并且把选举的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信念上，即工党天然地在全国拥有大多数。第一个工党政府是“劳动者的……政府……（因为）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工人的政党……成功地引领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工人”这个字眼通过隐喻性的夸张而与社会主义事业本身联系在一起<sup>②</sup>。对共产主义者来说，无产阶级的专政不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它还像R. P. 杜德说的那样，是解放本身<sup>③</sup>。

至少直到1927年或者1928年，这个党早期的共产主义观念或

① 上文概括说明了塞缪尔《走进无产阶级巨人》(R. Samuel, "Enter the Proletarian Giant", *New Socialist*, July-August 1985)一文中的观点。

② 上文概括说明了塞缪尔《走进无产阶级巨人》(R. Samuel, "Enter the Proletarian Giant", *New Socialist*, July-August 1985)一文中的观点。

③ Palme Dutt,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Doctrines of Communism*.

者是吸收了英国工党和工会运动中的“常识”，至少是其中比较“左”倾的成分，或者是作为其一部分，或者是与之有同族关系。认为资本主义正在遭遇它最终的危机，这样的观念并非共产党人所独有。韦伯斯（Webbs）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衰微》中的观点作为工党在战后的指导路线之一，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对这一观念进行了有力的辩护。认为工人是属于未来的阶级，这样的观念是20世纪20年代的工党最喜爱的思想主题。阶级斗争当然不是工党的信条，但对于它的实践却是极其重要的，尽管这只是在一种防御性的而不是攻击性的意义上来说的。并且在那个年代，当英国的政治活动按照阶级的路线开始两极分化的时候，它确实几乎成了整个英国的政治观念中的常识。

## （二）诞生的时刻

共产党的诞生是在这样一个时期，那时，阶级在英国的政治中正获得一个全新的突出地位。它在1920~1921年的建立，与作为主要反对党的工党的出现，以及劳工运动观念的产生，几乎完全是一致的——就像劳工运动主要的设计师亚瑟·亨德森过去常常念叨的那样“一个大写的字母L和一个大写的字母M”。在斗争中，尤其是在后期的斗争中，工人阶级的观点已经变得激进了，工人的力量也得到了实质性的扩张。工会会员的人数翻了一番，从1913年的400万人增加到1920年的800多万人。在各个地区和地方建立起来的“工人应急斗争全国委员会”，使得工会对政治权力产生了兴趣，而在同时也使他们所代表的范围从劳资问题延伸到健康与住房、食品供应与营养，甚至婴儿福利之类的问题。这些所谓“女人的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将会把工党从工会的党转变为整个工人阶级的党。劳资的冲突渐渐地把国家卷入在内。政治上，根据工党1918年的章程，这些冲突把工会卷入争取社会主义目标的运动当中。国有化和工人的管理出现在国家政治事务当下的议程中，而1918~1921年的短命的产业基尔特通过直接参与提前实现了工人的

自我管理。

表现了新工人阶级自信的一个显著例子是，英国的合作社成员参与到了政治活动当中，开始是1917年合作社党的产生，后来是建立工会同盟被通过，最后是20世纪20年代事实上被接纳进工党。消费合作社原来是非政治的，现在却构成了劳工运动的第三翼或者消费主义的一翼，它将为工党在地方政府和议会中发挥代表作用提供仅次于工会的人力和财力的支持。就像在1919年6月份的《工人》所表达的那样，合作社的这一新的转向是“对阶级斗争的潜意识的承认，它一点也不比在工会中所说的少”。也可以用相似的方式来对待工会的合并和联合，例如1920年的工程业混合工会和1922年的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的产生，它们显示了已经提高了的阶级觉悟是怎样克服小集团的和宗派的分歧的。希望被寄托于工人阶级的普遍力量上，寄托在工会间的联合上，尤其是寄托在工党的统一上，而不是（或者也是）寄托在对某个宗派或集团的好斗的忠诚上。工会联盟常务委员会（the General Council）的成立，也是基于类似的精神的鼓舞，这个委员会承担着“工人的最高司令部”、“工人的总参谋部”或者工党的“内阁”等不同的角色。

在其最初的岁月里，共产党与标志着工党进入成年的整个系列活动几乎是分不开的。例如，在战后广泛开展的劳工大学运动中，解放的精神毫不逊色，这一运动总体上致力于宣传所谓的独立的工人阶级教育，尤其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念”。也许有人会提出，由乔治·兰斯勃利（George Lansbury）编辑的《每日信使报》之所以产生，既有原工团主义的原因，也因为他对俄国革命抱有深切的同情。其他的例子有：“全国退伍军人协会”（National Union of Ex-Servicemen）那样强大而短命的工人阶级退伍军人运动，以及在1920年大萧条开始时发起的失业工人的鼓动活动（20年代早期，在伦敦好像已经有三个这样的活动，各省也有一系列的自治运动，它们都是与沃尔·哈宁顿和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全国性的运动不相干的）。在各工人委员会和工人协商组织（Workers' Discussion Circles）



中，可以发现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在肩并肩地工作，在工党的一些比较“左”倾的支持者当中，也可以见到这样的情形。尤其是为了应对对俄国的武装干预所带来的威胁而在1920年成立的行动委员会，证实了工人阶级组织的抱负以及它刚刚建立起来时的信心——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之后，工人阶级组织体现了这样一种政治倾向，即心甘情愿而且实在是热切地把对外政策以及军备问题视为自己的事情。

## 第十一章 道德精英主义

不管其社会构成如何，就代表性而言，英国共产党并不是工人阶级的组织。在这个国家中没有任何地方让它开始得到群众的拥护或者是赢得选民们有组织的支持，除了一些少数的例外，如一些数量有限、相对孤立的工人村，像斯图亚特·麦金泰尔提到的莱文山谷<sup>①</sup>、南威尔士的采矿谷、费夫煤田，伦敦东区的犹太工人阶级有一段很短的时期也包括在内。在选举方面，除了上述例外，它的历史几乎就是不断衰落的历史。只是在其最初的岁月里——直到1926年的总罢工但是不超过这一时间——它与工人阶级的感情才是合拍的。英国共产党牢牢地植根于工会之中，它在合作社中的根基则很不确定，在那里，它有一些著名的支持者。工人俱乐部就像党所注意到的那样，被工会会员用来作为工人阶级社交活动的重要中心，而工党则用它来作为在地方上培育其选举力量的地方。这个地方成了异乡，这部分可能是因为台球（不像网球，它从来没有成为党的运动），部分似乎是因为啤酒。在党的早期，要求纠正这一缺点的呼吁表明了党对工人缺乏理解<sup>②</sup>：

这些社交中心并没有成为激励人的、能够创造出所有那些有益于工人阶级进步的文化因素的地方，相反，它们只是使人堕落的酗酒的巢穴，对我们阶级的成员充当着道德的……（原文缺失）我们希望在这个国家看到的是人民之家（People's

---

① Stuart MacIntyre, *Little Moscow*, London 1980.

② *All Power*, December 1922.

Houses)，就像比利时、斯堪的纳维亚、瑞典、德国以及现在的俄罗斯的工人们在城镇中所有的社交中心那样。它们是工人以及他们的家人能够在那里得到启蒙和发现志同道合的人的地方。为理解工业的历史、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共产主义所举办的学习班应该成为这些工人俱乐部的特色；游泳、板球、足球和所有那些能够使得工人们更好地进行斗争的健康的户外运动，都应该成为这些俱乐部所具有的一部分功能。要是你们是俱乐部的成员，就开始行动吧。

共产党人对工人阶级的文化感到不安。他们回避娱乐场所的欢乐而喜欢宗派主义的咖啡馆。他们在合作社举办圣灵降临节活动的简易大厅里和党的“房间”里开会。就如今天那些参观《晨星》的人所能看到的那样，他们的建筑绝对是不舒适的。和英国其他的社会主义者一样，共产党人倾向于认为工人阶级的那些娱乐是堕落的。“好莱坞电影”是垃圾，是人们很喜欢看的“废物”；至少在党的早期，体育运动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运动，报纸是“资本主义的媒体”，无线电收音机是“资本主义的麻醉剂”。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党在音乐家联合会中做了一些党员发展工作，舞厅却仍然被人们用怀疑的眼光视为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服装）的模仿（在共青团的联欢会上，我们唱的是美国工会的歌曲，可是在我的经历中，从来不跳舞。根据《工人日报》的公告栏来看，到了30年代，事情就很不一样了）。肯·威勒（Ken Weller）在谈到他作为一名工程师在伦敦北区所度过的那些青春岁月时告诉我：“辨别前党员的一个方法是，他们不跳舞。”一方面是由于，至少是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舞会上使用的舞曲被怀疑为“美国的垃圾音乐”；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穿着打扮的观念完全受到排斥。党内的妇女总是穿着“实用而不时髦的”鞋子、工作服和家常裤，而不是高跟鞋和塔夫绸。男人们则穿着开领的或者是“埃尔特克斯”（Aertex）牌衬衫，胸前的口袋里有钢笔或者铅笔而不是丝绸手帕。

在共产主义者看来，晚上出去不是要到梅柯或者勒卡诺那样的地方去，而是到“维克菲尔德的品达”去参加工会的联欢会，到“团结”剧场看演出，或者是到以前的贝尔萨兹公园的卧室兼起居室——印度学生和德国避难者的家——参加聚会。

共产党人在“闲暇”方面就跟他们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是“积极的”。拔河比赛是新密尔顿的社会主义青年营活动的高潮，而在我依稀记得参加过的温斯泰德公寓的一场室外游乐会上，高潮则是障碍赛跑和拳击。在假日里，共产党人不会懒洋洋地躺在帆布躺椅上；他们会在乡间——最好是野外或者山区——进行心旷神怡的散步。[约翰·戈兰 (John Gollan)，党的一位非常受尊敬的总书记，显然是一个伟大的登山家，我记得他瘦长而结实，没有一点赘肉；站在公共讲坛上，神情镇静，体现了一种集中表达的意志。]

## 一 整洁和体面

就共产党中的工人阶级成员来说，他们是从那些体面的人中发展来的。党的呼吁针对的是勤劳的、“思想严肃的青年工人”，而且至少在潜意识里是针对那些整洁的人。共产党人与《工人日报》一起调查了贫民区的情况，还举行了一些有名的针对房租的罢工。但就这个党的成员而言，却在很大程度上遗忘了“常常成为工党堡垒”的后街（像《党的组织者》在1932年观察到的那样）<sup>①</sup>。在格拉斯哥，相当多的共产党的拥护者是来自信仰新教的工人阶级。在像斯普林蓬 (Springburn) 那样的“优秀工人阶级的地区”，来自机车中心的制造锅炉的工人成了最大的职业团体<sup>②</sup>。在毕格斯韦德 (Biggleswade)、贝德福特郡 (Bedfordshire) ——这个党1939年在这里能够获得地方上6000个选民中的700张选票——“我们的同志非

<sup>①</sup> *Party Organiser*, October-November 1932.

<sup>②</sup> Michelle Gabbidon, D Phil thesis, Sussex Univ., 1987.

常受劳动人民的欢迎，就是因为他们有些正派的、普通的人，他们在自己的工作方面全都是熟练的。”<sup>①</sup> 在人民阵线期间，共产党的党员与才智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有新建住宅区的地方，例如大维森肖庄园，是共产党肥沃的土壤”，1938年的《党的组织者》里的一篇文章写道：“在这些稳定的工人阶级地区，产生了最优秀的、最具有社会意识的那种类型的工人。那些人为了走出贫民区而愿意付出较高的费用和房租，以便使得他们的孩子在一个更健康、更幸福的环境里成长。”<sup>②</sup> “我们主张聚会用的房间要更好、更整洁并且更有吸引力”，哈利·波利特在这段时期写道：“我们已经强调了许多次，工人是整洁的，他的家是整洁的，并且他需要一定水准的整洁和一定水准的舒适……当他来参加共产党的支部会议时，他也需要同样的东西。”<sup>③</sup>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在共产主义的思想中广泛流行但很少以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个概念就是“流氓无产者”。按照它在英国的通俗用法，这个词泛泛地用于贫民区的穷人。像“劳工贵族”一样，尽管是在不同的社会范围内，它被随意地用来说明英国共产主义运动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尤其是它在大众中所遇到的敌意。在一种语域中，它重复了在“粗野的人”与“体面的人”之间的古老的区分；在另一种语域中，它又再现了在工人阶级的保守党人与沙文主义者中间区分出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困境。它通常还被共产党人用来解释工人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现象。工人阶级的法西斯主义是像肖第奇（Shoreditch）和贝斯纳格林（Bethnal Green）这样的东伦敦市镇的特色，这些市镇在战后仍然向摩斯利<sup>④</sup>提供少量的支持。在利物浦，这个词直言不讳地指称这个城市里的爱尔兰人聚居区，共产党人在那儿可能会遭到包围。像《穿破裤子的慈善家》

① *Party Organiser*, November 1939.

② *Party Organiser*, November, April 1939.

③ *Party Organiser*, November, August 1938.

④ 莫斯利（Mosley，1896~1980年），英国法西斯主义者同盟的发起人。——译者注

中的罗伯特·德雷塞一样，共产党人总是用它来指那些士气太低落而不想反抗的人，那些容易受到资本主义媒体的影响而不接受“严肃的”印象的人。那些太喜爱啤酒的人，就跟那些靠自己的狡诈吃饭的“黑市买卖人”一样，是“破落的”（lumpen）。赌博是“破落的”，尽管《工人日报》在这门生意中有最好的提供内幕消息的人。这个词还表示身体上的鄙视，它常常跟肥胖和懒散联系在一起。或许共产党人并没有意识到，“破落的”这一观念与伯克<sup>①</sup>的“乌合之众”的观念，以及19世纪社会学中的“危险的阶级”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它被用做一个确定无疑的、表示指责的词，这就反映了共产主义与民众之间有多大的距离。

工党吸引了工人阶级中的一小撮不正派的人，而共产党人则以他们的严格（有时也被称为“正派的生活”）而闻名。他们不使用“污秽的”语言，不会像“政治上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那样“恶语相向”。从党的基金中“借了钱”而欠债的党员自然要被开除。那些在警方那里惹上麻烦的人也会如此，除非是因为政治的原因。“我们制定了一个非常严格的行为标准，”约翰·麦克阿瑟（John MacArthur）回忆起西费夫的矿井支部时说，“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有家小的男人遇到难处时使用工会或者其他的工人阶级的基金，这种现象并不罕见。虽然这样做是能够理解的，但我们已经定下了规矩，这样的事在共产党内是不能容忍的。不时有相当多的党员因为没有处理好党的基金和党费以及从矿井的报纸和党的机关借来的钱，而被开除了。”<sup>②</sup>在党员发展会上，潜在的党员们被告知他们所要加入的是一个新型的政党，它“是个对联欢会、舞会和茶会不感兴趣的政党”<sup>③</sup>。

---

①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年），英国辉格党政论家、下院议员，维护议会政治，主张对北美殖民地实行自由和解政策，反对法国大革命。——译者注

② John MacArthur, in EA MacDougall, *Militant Miner*, p. 140.

③ John MacArthur, in EA MacDougall, *Militant Miner*, p. 140.

我常常要作讲演，谈谈我们对加入了共产党的人们的期待以及共产党员应该怎样管理好他们自己。乔·斯大林后来因为下面的这一说法而出了名——共产党人是一种新型的人<sup>①</sup>。可是在我们读到斯大林的任何东西之前，我们就努力使得新发展进来的党员能够接受类似的概念了。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在信仰加尔文主义的苏格兰人中长大的，以及早期与提倡节制的鲍勃·斯图尔特和威利·卡拉奇尔，还有清廉的约翰·麦克林（John Maclean）这样的领导人的关系，我们作为共产党员不能像其他普通工人那样在行为上那么随意。普通工人或者工会官员不同于共产党员，他们即使行为不端、酗酒、踢椅子，甚至还殴打妻子、与许多女性发生关系，也不会受到追究。可是我们规定，共产党的党员应该牢牢记住，党的声誉至关重要，他们在私生活中的行为对他们的支持者会产生影响，反过来又会影响到党。因此，我们应该像恺撒的妻子那样无可挑剔。除此以外，要是我们想赢得支持，要是我们希望我们的领导在我们工作的地方能够被人接受，就应该尽一切可能在工作中练就最高超的技艺。我们应该成为全面的、做事彻底的、能干的矿工，这样，我们在宣传政策路线时，才不会留下空子让资方甚至一些不同意我们的工人，说我们是因为自己没有能力做好工作而为自己辩护。要是我们说的是劳动条件方面的缺陷，要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优秀的、能干的工人，我们的道理就会比不是这样更乐意被人接受<sup>②</sup>。

## 二 工程师的政党

在产业领域，党所发展的成员来自于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

---

① 斯大林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42页。）

② John MacArthur, in EA MacDougall, *Militant Miner*, p. 140.

不管这些人属于哪一个阶层，他们都为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而感到自豪，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受到保护而不会受到连累。因此，在大约 40 年来一直作为党在工会中的中坚力量的工程业混合工会中，党员完全来自“第一阶层”的成员，来自“计时培训的”（time-served）（也就是学徒的）人员；在各个煤田，党特地从地面上的工人中间发展新成员；在船厂，就从专门的技术人员中发展。在服装厂——例如利兹的博尔顿，1937 年的一次著名的罢工就发生在那里——党的力量在于裁剪师当中，他们是裁缝中的精英，掌握着在大批量生产中制作定做服饰的方法<sup>①</sup>。伦敦公共汽车司乘人员的群众性骚乱 30 年来一直是工会头头们的眼中钉——据说欧内斯特·贝文之所以提出他的反共产主义学说，就是由于他在他们当中所遭遇到的暴行。这个党从他们中的司机中发展它的干部。就像最近的一本历史书中所恰当地描绘的那样，这些人是“激进的优秀分子”，继承了“红色按钮”工会的工团主义传统——这个工会在 1921 年被合并进了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但是仍然保持了某种自负（这似乎是他们之所以不能与有轨电车的司乘人员以及无轨电车的司机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联合起来的一个原因）<sup>②</sup>。在西伦敦的帕克罗耶尔（Park Royal），它是红色工程师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一个中心，共产主义的特殊力量存在于较小的行业协会中。人们可能会以钣金工人为例，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对他们的“专长”如此自负而不愿意与其他的工会发言人联合起来；还有车辆制造工人，作为另一种古老技艺的传人，他们组织了 1950 年的丢帕斯（Duples）罢工；或者是绘图员，他们成功地领导了 30 年代飞机制造业工人的一些

---

① 口头信息，来自杰姆·罗奇，1986 年 12 月。罗奇的文章，包括《新博尔顿的领导者》和 1937 年罢工的文章，已经被作为特殊的藏品存放在牛津的罗斯金学院。

② Ken Fuller, *Radical Aristocrats, London Busworkers from the 1880s to the 1980s*, London 1985; Hugh Clegg, *Labour Relations in London Transport*, Oxford 1950.



罢工<sup>①</sup>。铸造工人把他们的共产主义的领导权归于制模工人，那是一门古老的行业，正在指挥着一场保卫他们特权的战斗<sup>②</sup>。

应该说一说党在工程师中间的不同寻常的力量。英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工程师们创建起来的，革命的工会发言人就像他们在都灵、巴塞罗那和彼得格勒的同道一样，被产业和阶级的动荡浪潮裹挟而前。在1920~1921年被称为“共产主义的联合”(Communist Unity)的协商会议中，工程师们“在作为代表的工人中很可能是最大的部分”<sup>③</sup>。在共产国际1921年的大会上，有一半的代表是工程师，共产国际早期的领导人也主要出身于工程师。他们中包括亚瑟·麦克马努斯(Arthur MacManus)，英国共产党的第一任主席，一个黄铜模具工人；哈利·波利特，制造锅炉的工人；汤姆·贝尔，一个铁模具工人；J. T. 墨菲，谢菲尔德的工会发言人，主张由工人进行管理的主要的理论家；还有克莱德工人委员会的威廉·卡拉奇尔。沃尔·哈宁顿是全国失业工人运动的共产主义领导者，也是1926年被囚禁的党的12个领导人之一，他的职业也是个工程师，尽管在1920年领导了一次著名的罢工之后他就上了黑名单<sup>④</sup>。党的最杰出的工会活动家汤姆·曼(Tom Mann)也是这样。在1922年工程业停工之后，开除和失业大大削弱了工程师的力量，尽管失业的工程师为全国失业工人运动提供了干部从而对这项运动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党早期在产业领域所发展的党员包括克劳德·布里奇(Claude Berridge)和乔·斯科特(Joe Scott)，他们日后将成为工程业混合工会的杰出的领导人及其在伦敦

---

① Terry Thomas, "Red Park Royal", Ruskin College history thesis (in progress). 托马斯是帕克罗耶尔的一个制造工具的工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也是共产主义的工会发言人。特德·布莱克的《具有优秀品质的人》是一本关于钣金工人的优秀的历史书，尽管对他们的较为宗派主义的做法显得慎重了些。

② H. J. Fyrth and Henry Collins, *The Foundry Workers*, Manchester 1959.

③ James Hinton, *The First Shop Stewards' Movement*, London 1983, p. 318.

④ 《永不屈服》是哈宁顿的优秀的自传。莱斯·莫斯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布莱顿, 1979年)第20~23页就描写了这样一个人，当他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年轻的新兵的时候，就中了哈宁顿的魔咒。

的主要负责人。20世纪30年代中期见证了党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开始，党员们成为各飞机制造厂的联合以及移植第二次工会发言人运动的排头兵<sup>①</sup>。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工程师的政党，工程业混合工会的成员在1942~1945年间的党的全国大会的代表中要占到大约1/3<sup>②</sup>。在1947年的党的第19届全国大会的665个代表中他们占了154个，在1954年的第23届全国大会上的615个中占了108个，在1963年的461个中占了87个<sup>③</sup>。

工程师党员的特殊力量体现在工具间里。就工会而言，他们是“能够在艰难的日子里让旗帜继续飘扬的那些人”；对党来说，他们则是产业领域中领导干部的最重要的、唯一的源泉。他们是产业部门中的精英，是“被指望着运用他们的创造力的有经验的人”，从事着需要高度精确性的工作。用一个制造工具的老工人的话来说，它吸引着“那种爱动脑子的家伙”，因为“制造工具的工作既需要动手又需要动脑子。你必须懂得三角运算。你自己能够绘图。你还常常得设计出自己的工具。这要对一些相当坚硬的材料进行非常精密的、困难的加工”<sup>④</sup>。

### 三 自我教育

就像英国激进主义运动的早期版本一样，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提倡劳动者的自我教育。它早期的领导都是典型的自学成才的人。例如，J. T. 墨菲是“一个勤奋的青年”，他从神学转而阅读康乃利（Connolly）和马克思的作品<sup>⑤</sup>。铁模具制造者工会的主席汤姆·贝

① 我已经在关于“工会主义”的一章里探讨过这一发展，它将出现在论英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沃索版书中。理查德·克劳奇的《战斗中的工程师们》和皮特·佐金（Peter Zinkin）的《要仔细观察的人》中的描述与之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② Croucher, op. cit., p. 144.

③ CPGB 19th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pp. 30-31; 23rd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pp. 10-11; 28th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pp. 96-97.

④ 与肯·威勒、埃迪·弗劳、特里·托马斯的口头交流。

⑤ Frow, *Engineering Struggles*, p. 448.

尔，在成为党的专职工作人员之前是“一个注重理论的人……他似乎……对马克思主义中的定义而不是对管理更感兴趣”<sup>①</sup>。亚瑟·麦克马努斯，党的第一任主席，是“一个极为博学的人”，他和贝尔一样对“政治理论”有特别的兴趣<sup>②</sup>。

工人阶级同志们钦佩地谈到的那种“深入思考”，在党的词典里占据着一个荣耀的位置。它是共产主义的首要的特效药，用来医治它在政治上的弱点，是可以预防各种罪恶和故态复萌的良方。无论多少经验、无论多少积极的行动也不能代替它。对理论的“真正透彻的领会”在劳资工作中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它把劳方的鼓动家们武装起来，去争取他们的目标。它把社会主义的宣传工作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它把具有战斗精神的人变成了讲究策略的人。他们可以预见所发生的事件，并在政治上可能的限度内追求长远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对这些事件作出被动的反应。它采用“透视”的方法来观察当今的问题：“科学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和我们党的一个特征。对我们来说，政策问题以及其他各种问题的答案，并不是偶然的，不是按照个人的感情和人们的选择产生的……对我们而言，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取决于客观的情况，并且对于每一种具体的情况，也只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去发现这个答案。可是，只有采取了正确的方法和做法，才能够找到这个答案，并且会带来我们所想要的结果。”<sup>③</sup>

学习，经常性的“系统的”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而且也正是共产党员的特点。例如，杜德写道：“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的地方在于它的党员在参加实际斗争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学习。”<sup>④</sup>米德兰的同志在1944年的时候被告知说：“在工作中我们一有空就学习。”这样的话显

① Harry McShane, *No Mean Fighter*, p. 53.

② Murphy, *New Horizons*, pp. 59 - 60.

③ Palme Dutt, *Introduction to Leninism*, Marx House syllabus 1929, pp. 3 - 4.

④ Palme Dutt, *Introduction to Leninism*, Marx House syllabus 1929, pp. 3 - 4. 参见 Gladkov, *Cement*, London 1929, p. 70.

然是从列宁那里学来的<sup>①</sup>。自我教育是 20 世纪 20 年代建立起来的工厂中的党小组的“第一要务”<sup>②</sup>，对于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迅速产生的党小组来说也丝毫不差。它需要努力学习，需要学习有助于自我完善的系统的课程，而不是像今天的记事本马克思主义者（Filofax Marxists）那样，随便翻翻杂志，拣些只言片语。所有的新党员都要参加学习班，干部们要参加党校。在早期，要成为党员似乎都必须这样。即使是在气氛比较宽松的 20 世纪 40 年代，这依然是一个严格的先决条件。下面是弗劳档案中保存的、能够使任何学院中的导师都感到忌妒的指令<sup>③</sup>：

曼彻斯特与索尔福德地区

共产党教育部

1947 年 7 月 15 日

致：迪克·托平同志

亲爱的同志：

地区书记处已经选派你参加为我们地区的干部举办的四个晚上的高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班。

日期：8 月 1、18、25 日，9 月 1 日。

时间：下午 7：30。

导师：C. D. 内特顿，他刚参加了关于这一主题的一个全国性的学习班。

按照你的要求，你把上课作为你优先考虑的事情。在给地区的信中，也把上述事宜通知了你们的支部书记，所以，在上

① CP archives, Sam Blackwell, *Some Guiding Points*.

② Bodleian Library, Pollard Papers, Box I, CPGB, *Formation and Work of Factory Groups*, n. d., p. 5.

③ 收录于弗劳档案。罗斯金学院现在已经初步收藏了学习班的记录，既有学生的也有导师的。其他的材料，不管是影印的还是原件都将是受欢迎的，并可以提供给管理员，牛津罗斯金学院的大卫·豪斯菲尔德。

面提到的那些日子里，你不用担心支部的事情。

请注意，假如你没有出席第一次课，后面的课也不能参加。

你可以通过你们的支部书记确认你会参加，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CEN6444）或者尽早通过邮件来确认。

希望尽快收到你的回复

致以兄弟般的问候

Y. 贝文

地区教育干事

演讲班是这个党在早期的一个特色，那时候街角和工厂门口的集会既是这个党所选择的活动的形式，也是它吸引新成员的主要手段。在南沃克地方党组织中，这些演讲班是与经济学方面的“基础培训”一起进行的。主要的讲课人是汤姆·斯特鲁维奇，他是个地铁司机，“一个高高的、温和的、善于辞令的人”。后来成为帕克罗耶尔的车辆制造工人的波特·爱德华回忆说：

我还记得告诉我们的深呼吸的方法和要学会放慢说话的节奏。

我们班上都是些年轻小伙子。当一个人一开始进行演讲时，他说的速度往往要比想的速度快，这样他的脑子里就会出现空白，就会变得烦躁而坐下来不说了。我的建议是：“要一直留神听着每个词最后的字母。”听着班上的人在做着这样的练习真是很有意思。要是有同学说“我说不出来”，我的窍门是跟他静静地交谈，让他谈谈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比如狗、足球或者拳击。我会记着这个学生已经谈了多少时间，然后会说，“你已经说了十分钟了”……党在温斯利大街和沃尔沃斯路的街角上以及西莫尔兰路上举行露天集会。这些集会就是年轻的演讲者们的训练场。他们先散发传单来建立自己的信心，然后进去坐下。为了帮助主席，一些人就开始提问题，以便引起讨论并且吸引路

人。正是从学习班上学到的东西使我能够参加工会支部和地方上工党的讨论活动……在工会支部的年度大会上，我被选进了支部委员会，从那以后，我就一直从事机关的工作<sup>①</sup>。

## 四 辩论的艺术

在党的工作中，教育是个普遍的用词，而且，“政治上受过教育的”也确实成了我们描述真正信仰者的方式。我们不断地从政治形势中“吸取教训”，并为这些教训的“逻辑”提供论证。政治宣传是纯粹理性方面的锻炼，是政治的阐释“理论”。我们有自己固定的书籍可以援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我们的理论文本是以“论文”的形式写成的；我们的权威为党的路线增添了光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是“四大导师”。我们的领导人也依样照做：他们不是试图去说服人的宣传员，而是用事实、数据和论证去阐明一般真理的学究。党内地位较低的人也起到了教育的作用，他们参加学习班，发表演讲，“澄清”或解释党的路线。党训依照学校教育的模式，（根据战时的做法）安排了“基础的”、“中级的”和“高级的”学习班、教学大纲、全面的阅读书单和课程。党的宣传工作通过一般被称为“材料”的书籍、小册子和期刊的形式进行。党员发展工作是我唯一擅长的党的活动，我现在意识到，它涉及一种导师—学生的关系，尤其是它在教师与被教者之间故意做出来的平等的样子；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展示了知识的力量。新党员入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反复地学习。工党会让新党员们去挨户敲门游说或者是进行选举登记，我们则规定新党员们学习《联共（布）简

---

① Ruskin College archives, MS Autobiography of Bert Edwards, fols. pp. 57 - 58, 83. 由于受到他妻子的压力，爱德华后来退了党，可是在伦敦的工会行动主义存在期间，他似乎一直跟党保持联系。

史》和《共产党宣言》。费夫的一位矿工在描述他那时遭受的“轰炸”、那些要学的古怪的新词语，以及要应用政治活动中的“科学”方法时说道：“那就像是又开始上学了。”<sup>①</sup>

共产党起到了工人大学的作用，它为那些渴望知识的人，也就是作为党的发展对象的“思想严肃的青年工人”，开启了一个广阔的天地，而这绝不是它所带来的最小的好处。下面的叙述来自他们中的一员，年轻的纺织工人玛格丽特·麦卡锡，她在20世纪20年代加入了阿克林顿的地方党组织<sup>②</sup>：

我开始学习一切我所能找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东西。这样做部分是出于我作为党员的义务，也有点儿是为了超过那些主导着我们团体的男孩子们，可是更主要的是因为我有一种火一样的学习热情。这肯定是由于我在13岁的时候就辍学了，而现在，自那以后第一次有人希望我，甚至要求我去学习，而且通过资料、演讲、课堂和会议这些手段有目的、有方向地去学习。我学习和懂得的东西越多，我就会更好地成为青年共产主义者。为了使我们学习中剩余的部分可以理解和合乎逻辑，我们共青团员接受了培训，了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观念。我们详细学习了俄罗斯革命运动的历史，特别是列宁的革命政党理论。

按照玛格丽特·麦卡锡的描述，政治会议与上述情况非常一致，他们做的就是进一步的学习、教育和训练：

因为我们把所讨论的每一个实际问题（例如我们自己行业中的劳资问题）都跟由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不可避免地引起的

---

① John McArthur, “Recollections”, in *Militant Miner*, op. cit; Bob Selkirk, *A Worker's Life*, Dundee 1967.

② Margaret McCarthy, *Generation in Revolt*, London 1953, p. 97.

繁荣和衰退联系起来，即使是我们日常工作的会议、我们的地区和全国的大会，都体现出了学校教育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会议的特点。因此，一项关于纺织业雇主们竭力要引进一周工作55.5小时的决议，不仅牵涉到关于工业中的经济问题及其与全国乃至国际形势的关系的讨论，还要牵涉到关于马克思的一般的经济学观点，特别是关于共产党的作用的辩论<sup>①</sup>。

英国共产党还提供公共生活方面的基础教育，教导它在工人中的新党员怎样才能有条不紊地、有组织地发挥“战斗的领导”作用。他们要学会怎样记笔记和怎样依据笔记发言——记笔记似乎是沃尔·哈宁顿给他的新党员上的第一课。他们要学会怎样传达大会的报告和会上提出的决议。为了给少数派以及在工厂里常常不受人欢迎的观点进行辩护，他们需要对事实和数据了如指掌，并且在公共辩论中使自己的论证更加有力。复写的传单，或者是20世纪20年代工厂中油印的报纸，使他们熟悉了新闻工作的门道。其次，还有党的教育所涵盖的课程大纲、要掌握的定义以及需要处理的大量文书工作。工会工作把这些技能运用到政治管理中，使得年轻的新党员掌握了委员会工作、群众集会或者是与雇主协商的奥妙。“他们是移动的百科全书”，肯·威勒在回忆起北伦敦的共产主义工程师们时说，“他们对工会章程倒背如流，他们能记住《工厂法》。他们能够把老板给绕糊涂了。他们与资方的每一次争论都被印在脑子里。他们的整个生活都围绕着这些事情……”<sup>②</sup>

## 五 生产区里的知识分子

负责劳资工作的同志成了生产区里的知识分子，并把志同道合的人引上他们的轨道。工头们警惕地把他们当做“教授”来对待<sup>③</sup>，

<sup>①</sup> Margaret McCarthy, *Generation in Revolt*, London 1953, p. 98.

<sup>②</sup> 1987年5月与肯·威勒的口头交流。

<sup>③</sup> Bert Edwards' autobiography, fol. 119.



那些发现自己成为他们的抨击对象的人——例如，在比较古板的支部官员当中成为政治对手——就会抱怨“被科学给搞糊涂了”。在埃迪·弗劳（Eddie Frow）关于他们的描述中，曼彻斯特的共产主义工程师卷入了几乎是持续的争论中：“与那些不同意的人进行辩论，那些人有不同的想法——自由思想以及天知道是什么的东西。辩论的地点或者是在食堂里，或者当工头不注意的时候就在生产区里，在工程业有一个小时的晚餐时间。一群人或者是在散步的时候，或者是在机器的后面，进行严肃的讨论。在工厂门口有许多集会——戈顿-檀克（Gorton Tank）就是个出了名的地方。”<sup>①</sup> 在索尔福德电气工具厂他自己的工具间里，有6个人加入了左翼读书俱乐部。“在晚餐时间我要骑自行车到克莱特去把它们拿到厂里来。”（这些书尤其是在夜班的时候可以好好地读，那时的监管不那么严格。）

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样的“工厂里的克里姆林”才盛行起来。其享受自由所带来的新的体验（20世纪30年代工厂里的支部大多数还是处在地下状态），在共同生产委员会中展示他们的力量——这个委员会让工人们在工厂的管理方面有了发言权——以及着手处理“交通、灯火管制、工资、劳动条件等”福利工作，除此之外，它们还对政治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课是在晚餐时间进行的，它们在曼彻斯特的维克斯阿姆斯特朗被称为“路边石课堂”。“它不是演讲，而是讲课，是在室外进行的。讲课的常常是杰克·欧文和弗兰克·阿隆。他们都在那儿工作。杰克站在一个大机器上。它们不是宣传，绝对是讲课。”<sup>②</sup> 在利兹的福勒工厂，晚餐时的讲课更有作用，至少在厄尼·本森对它们的描述中是这样：它们“使人们认识到生产的必要性，而管理层似乎并不擅长这一点；还使人们认识到必须要尽我们的力量去打败法西斯主义”<sup>③</sup>。资料的销售

---

① 1987年5月与埃迪·弗劳的口头交流。

② 1986年6月与埃迪·弗劳的口头交流。参见 Frow Archive, Mick Jenkins, "Prelude to Better Days", fol. 238。

③ *To Struggle Is To Live*, vol. 2, pp. 206 - 208.

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工厂里卖的不仅有《工人日报》，还有《劳工月刊》（在1942年，它每月的销售量达到5万份）。厂里的支部发现小册子和书籍也有巨大的市场。一些像曼彻斯特的费厄利飞机制造厂那样的支部成立了读书俱乐部。“俱乐部里有20个成员；每人每周要付1先令，然后抽签来决定次序，按照这个次序每个人都会收到价值20先令的资料。”在曼彻斯特的迈特洛-维克斯，“他们在防空洞里有一个书店，销售的规模很大”。下面是亚瑟·埃克塞尔对在牛津的莫里斯冷却器厂发起的支部图书馆的描述<sup>①</sup>：

它发展得非常快。在图书馆里我们有多达500本书。我们把它们放在工头办公室的盒子或者小提箱里。当地的工头很合作。他们不可能对我们抱怨什么，因为我们……的的确确在生产，这一点正是工头所喜欢的……借书的有两三百人，不仅仅是党员，各种人都过来要求借阅。我们有成套的藏书，像列宁小丛书和斯大林小丛书……还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左翼读书俱乐部也是这样：休赖特·约翰森（他是坎特伯雷的教务长）的《社会主义震动了世界》、弗里曼的《阿美利加的证明》。人们对俄罗斯也很感兴趣……《静静的顿河》、《顿河流归大海》、《战争与和平》——我们有一些优秀的读者，他们会读大部头的书……《我的绿色山谷》这本书不仅仅是在威尔士人当中很受欢迎。他们还读克里夫·布兰森的《在印度的英国士兵》……马克希姆·高尔基被谈论得很多，他们也读他的书。人们对列宁和斯大林的书不是很热心……那更多的是给知识分子读的。他们的书很难读……可是，像A. L. 莫顿（《英格兰人民的历史》）那样的就不同了，他们读他们的东西。

---

<sup>①</sup> Arthur Exell, "Morris Motors in the 1940s",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9, Spring 1980.

## 六 对书籍的崇拜

像早期的那些自学成才的人一样，而且也跟他们时代中的其他许多人一样，当作家仍被视为能够影响别人的人的时候，共产主义的工人就容易形成对书籍的崇拜。有时是在老工人的引导之下，有时就靠他们自己，许多人都好像是通过阅读才加入了这个党。其他人是在党内才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在那里，书总是会被不断地推荐给人们，并在人们之间传阅（“读书专栏”一直是《工人日报》的一个特色，就像过去是《星期天工人报》的特色一样）。在《应该珍惜的老朋友》一书中，T. A. 杰克森收集了他发表在《工人日报》上的评论文章，该书的标题很有表现力。在党员的家中，“藏书”一直是荣誉的展览品，是世俗的圣殿。它可能只是一个书架而已，可是它里面的内容会被阅读和研究，其中的一些段落也会被人用心记住。“引用一些东西……尤其是诗句，是人们非常喜欢的一个窍门。”<sup>①</sup> 这样的书在工厂里会在“一个选定的圈子里”传阅，有时也会有意借给新发展进来的年轻人。“要是他们当真感兴趣了，我们就会说，‘《共产党宣言》，那就是你得去读的东西。’”下面是埃迪·弗劳对他作为一个书虫时的那些日子的回忆<sup>②</sup>：

在我上学的时候，我父亲每个星期都给我带来 H. G. 维尔的《历史大纲》中的一些部分。我还能给你背出其中的最后一句……“人类会像站在凳子上一样站在地球上，把他的范围延伸到星空之中。”那时我大约有 13 岁。有一本影响了我一两年的书是《铁后跟》——我读了很多杰克·伦敦的东西。有趣的是，那时我没有看过《穿破裤子的慈善家》，几年以后我才读到

---

① 1987 年 5 月与埃迪·弗劳的口头交流。

② 1987 年 6 月与埃迪·弗劳的口头交流。

它。我读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的时候，是在1923年的冬天，那时我17岁。我在布兰德福特买了两本书，欧内斯特·哈克尔的《宇宙之谜》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它们是最珍贵的财产，我仍然保存着。在1924年，和我一起工作的所有的人都疯了似的参加劳工运动，甚至比在1945年还要兴奋。我那时还不敢说什么，只是自己想到：“他们不会对国家政权怎么样的。”《国家与革命》迷住了我。这本书似乎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它似乎把一切都解决了。在我入党的时候（1924年），对我影响颇大的两本书是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简明教程》和《共产主义ABC》。在我加入支部（利兹支部）的时候，他们对我大惊小怪，就像是收了一个小孩子。他们拿了许多书给我。一个叫做厄尼·巴克豪斯的年纪很大的人——他在职工委员会（Trades Council）中——常常说他每年都读《共产党宣言》，并且每次都能从中得到一些新的看法。

共产党的成员像其他工人阶级组织中的成员一样关注文化素质的提升过程，或许更甚。它“培养”干部的方式是，用一种截然不同的说话方式、“科学的”术语和政治上保持“积极”的决心，去把他们与其同伴分离开。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它把他们提升到悉尼（Sidney）和比特里斯·威布（Beatrice Webb）所说的“脑力劳动者”的行列。它的成员要面对大量的出版物——“没有哪个政党像共产党那样生产和销售了如此多的学习资料”<sup>①</sup>。它要求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们去掌握一整套的秘书技能。在一个与官僚体制结合在一起并且赋予细节以超乎寻常的重要性的政党里，就是这种状况。它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工人通讯记者”或者是厂报的投稿人——培养成见习作家。它也许是以不平衡的方式传播了对于文化的崇拜，对于“好的”书籍、“严肃的”音乐和“合乎逻辑的”争论的崇拜。

<sup>①</sup> *Party Organiser*, January-February 1939, p. 25.

政治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路线的变化是对辩证法的技艺的考验。政治宣传需要进行思想斗争——有时是历史学，有时是道德哲学，还有就是政治经济学。

语言也强化了共产党员的与众不同的感觉。这需要学习一套带有科学光环的深奥词汇，新手们对此掌握起来就有点难了。“我们要去弄明白某些说法的含义真有点费劲”，约翰·麦克阿瑟在他关于费夫煤田的论文集中回忆说，“对于我们来说，许多教导都是非常令人费解的。”<sup>①</sup>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只不过是普通的工人，大部分是矿工。我们在14岁的时候就不上学了，我们仅有的关于经济或者政治的知识是在我们自己举办的学习班上学到的。当我们开始阅读来自共产国际的文件的时候，我们是在学习一种新的语言。这些文件都是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流氓无产者、核心、小组等术语来写的。这就像是又重新开始上学了。

玛格丽特·麦卡锡表达了这种新鲜事的另一面——某种兴奋感。她所碰到的教师好像大部分是曼彻斯特的年轻的犹太人<sup>②</sup>。

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跟我以前认识的年轻人都不一样……果敢的小伙子，同时也是为像我这样处在挣扎中的青年而奋斗的战士，是作家和组织者。他们学得很深，从经济学和政治理论到最新的小说，他们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他们甚至能引用诗句——我第一次碰到能这样做的年轻工人。他们说的话偶尔也会是过分的和水平不那么高的，不过通常总是超出我所认识的人们的知识水平，并且里面充满了令人惊奇的、含义丰

---

① *Militant Miners*, p. 138.

② McCarthy, op. cit., pp. 78 - 79.

富的新词，还有党所采用的大量的、复杂的首字母的和简略的词语速记，以及像“辩证的”、“经验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和“唯物主义观念”这样重要的词语。跟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的交谈总是让我充满了敬仰之情。

这样，在英国，无疑也在其他的工业国家中，共产党员就成了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工厂里的幕后集团或者“克里姆林”，在同事中他们以思想深刻著称。他们相信知识的力量，并且宣称他们对所学的东西的力量有不一般的理解。党的组织者们来自相似的环境，通常都带有“博学”的特征。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学者，热爱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尤其是列宁的。从他们在地区大会上的报告或者他们在共产主义媒体上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没有什么比援引大段的文字更幸福。他们留下的通信、他们的课程大纲以及讲课笔记，尤其是他们的回忆，都证实了在本土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自学成才者的才智。在英国民族文化的特点之内，这些人有资格被看做“有机的”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在今天的那些标有设计者姓名的社会主义者（Designer Socialists）看来，是无法容忍的，尽管他们不停地说起葛兰西<sup>①</sup>。

---

① 在那些最近被开除出党的人当中，有曼彻斯特工人运动图书室的创始人埃迪·弗劳，它是一个有名的藏书家和历史学家。他在1923年入了党，那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工程师。在20世纪60年代，他成了工程业混合工会的曼彻斯特区委书记。

## 第十二章 工人主义

无论是依照其当代的虚伪的形式，还是依照其比较真实的工团主义原型，都不能说共产党是“工人主义的”（workerist）。在劳资冲突中，马克思主义也许起到了意识形态的作用<sup>①</sup>，但是那些在1920~1921年间建立了共产党的人有意识地与他们的工团主义的过去决裂了。“直接行动”的缺陷正构成了新组织的基础，也就是承认自治的工人运动在国家权力面前是徒劳无益的。谢菲尔德工会的发言人领袖 J. T. 墨菲是改变信仰者其中的一个主要人物，用他的话来说，政权这个“中心问题”被“忽视”了<sup>②</sup>。英国共产党早期的培训手册教导说，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革命的政党。“只有政党能够成为把人们团结起来并指引方向的中心……”<sup>③</sup> 杜德在1922年10月号的《劳工月刊》中所说的道理是权威性的：“能够把工人们团结起来的共同议题，在经济斗争中是不会找到的。经济斗争总是分离主义的；它只是在不同时期对工人中不同的小集体产生直接的影响……指向共同运动的最直接的动力就是雇主们在过去两年里对工人们的欺压，不过，即使那样还是会使得各个小集体明显不同。经济斗争永远不能把工人们团结起来……同等地影响着每一个工人并且能用共同利益把他们团结起来的唯一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争取权力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只有政治问题才能够把

---

① Walter Kendall,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Britain, 1900 - 1921*, London 1969.

② J. T. Murphy, *Preparing for Power*, London 1934, p. 159; J. R. Campbell, *Red Politics in the Trade Unions*, CPGB 1928, p. 6.

③ *A Six-Lesson Outline for Local Party Training Groups*, CPGB 192?, p. 44.

所有的工人团结起来……因为只有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政治斗争才能把工人团结起来，工人运动中唯一团结的力量只能来自工人阶级的政党。”<sup>①</sup>

没有哪里比在工厂工作本身中需要共产党员更加全力以赴地坚持政治活动的首要地位。劳资斗争的要点是教育，是使工人达到“政治上的自觉”，是让他们追求更高的目标，“看到……暂时的困难与不足之外的东西”<sup>②</sup>。共产主义的领导者把经济斗争转变成为政治斗争，这使得当下的需要成了垫脚石，成了“实现我们目的的手段，而它们本身并不是目的”<sup>③</sup>；罢工也成了学习斗争的地方。就像社会有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一样，组织和斗争“在性质上”也有更高级的阶段<sup>④</sup>。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为人们所熟悉的为工资而进行的斗争，在党的工厂工作中几乎没有提到。在党存在的头20年里，在一种失业和削减工资的压抑的气氛中，这本质上与对工会的承认以及对工会权利的维护有关。在战时，开始以联合和劳方管理范围的扩大为主要议题。像在1930年针对时间与动作（time-and-motion）的管理制度的罢工中，反对提速（speed-up）与抵制去技术化（de-skilling），就成了工程业中的共产主义抗议活动的基调。

## 一 争取权力的斗争

共产主义教导说，争取权力的斗争远比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重要。联合以及工人的组织化本身就是件有益的事，需要留意提防雇主对此的破坏，假如必要的话，还要防备工会的官僚，就像在公共汽车普通职工运动中或者伦敦码头上未经工会同意的罢工中一样。

---

① R. Palme Dutt, “Notes of the Month”, *Labour Monthly*, October 1922, pp. 203 - 204.

② “Our Programme Explained”, *Workers’ Weekly*, 10 March 1923.

③ *Elementary Course of Communist Party Training*, CPGB 1926, p. 8.

④ Campbell, op. cit., p. 10.



对不满的表达本身就是一种解放的、有教育意义的行动。可是，斗争所反对的是“制度”；它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是更大整体中的部分。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一斗争最终证明的是党的力量。1935年的第13次全国大会说：“除非共产党员领导……经济斗争的日常工作，否则他们在支部和工作中的政治影响绝不会提高……只有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工会支部中党的同志才能赢得人们对党有关联合阵线、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方面的路线的支持……通过工厂和工会中的不断的活动来证明，为了把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联合成反对雇主和政府的阶级斗争的机构，共产党员需要站在斗争的最前沿……”<sup>①</sup>

总之，共产党员从事工会工作是为了政治的目的，是把工会工作作为改变社会的武器。像年轻的亚瑟·斯卡奇尔或者年轻的哈利·波利特与年轻的亚瑟·霍纳尔<sup>②</sup>，他们常常是从政治工作开始，再过渡到工会工作，把工会工作当做党的首要的责任。他们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车间里的圣哲，也就是宣传家、教师以及鼓动家和组织者、图书管理员和书商，可以借出小册子和书籍，在食堂或者浴室举行讨论活动，尤其是尝试发展新入（在学徒制下，年纪大些的人常常要带着年轻人）。同样是这些人——按照现代的说法他们是“劳资斗争中的优秀战士”——也积极参与租房者的工作，并在本地的公寓和大楼周围积极推销《工人日报》。他们在党的集会和示威活动中帮助召集群众；他们会作为代表被派往各个下属组织并在各个委员会中任职<sup>③</sup>。

部分由于自己阵营中的分裂，主要由于外部的变化，工人主义

---

① Quoted in Zinkin, *op. cit.*

② 霍纳尔后来喜欢称自己首先是一个工会主义者，其次才是一个革命者，可是在他年轻的时候，1916年复活节的武装起义对他影响很深，并使他离开了麦阿迪（Maerdy）到都柏林去参加了爱尔兰市民军（Irish Citizen Army），进行非法推翻英国统治的活动。当他第一次被麦阿迪支部的成员选举担任职务的时候，他正在监狱服刑。参见 Arthur Horner, *Incorrigible Rebel*, London 1960, p. 28。

③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删去了几页内容。

(workerism)，尽管是那种非常保守的工人主义，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共产党内可能倒是晚来俏。“知识分子”当然要为 1956 年大批党员的退党负相当大的责任，但是，实际情况是，党的工会工作以及它在工人中的影响的基础大体上还是完好的，尽管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党失去了大量的产业干部）。根据谢菲尔德工程师们的情况可知，在 1956 年前工程师们与工党人士建立起来的联系还很牢固，直到最近几年出现工业崩溃之前，他们之间的关系还好得出乎意料。地区的网络还在。像汽车制造业里的那些工会发言人联合委员会仍然努力保持团结一致。由于丑闻和背叛，这个党失去了它对电力工会的控制；它还失去了对北伦敦工程师们这个古老堡垒的掌握，但愿这只是暂时的。可是自从 1956 年以后，党在某些方面实际上似乎加强了它在产业中的基础：在汽车制造业中发起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工资斗争；在运输工人联合会中，那儿的领导层有一个向左的转变。从英国劳资关系的角度来看，最有影响的是在约克郡的煤田。那儿在弗兰克·沃特斯（Frank Watters）和伯特·拉姆森（Bert Ramelson）的帮助下，奠定了那些普通工人运动的基础，这些运动在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将会使得矿工工会激进化<sup>①</sup>。党员总数的缓慢恢复（到 1963 年的时候，几乎已经补偿了 1956 年的损失）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产业领域中的这种工作，以工会发言人为基础的工会运动力量的增长似乎也应归功于此，尽管这一点还有待证明。

## 二 遁入工会主义

遁入工会主义，假如是这样的话，可以看做一种替代性表现，即由于赫鲁晓夫的“揭露”和苏维埃入侵匈牙利所产生的自尊心危

---

<sup>①</sup> 很高兴与弗兰克·沃特斯和伯特·拉姆森较详细地讨论了这件事。我希望能把他们的材料吸收到我即将写成的《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一书中。关于这些发展阶段的年代顺序，参见 Andrew Taylor, *The Politics of the Yorkshire Miners*, London 1984。

机、苏中分裂所带来的分化、党不再是群众运动的中心这种种变化，使得党从它对于自身的幻想中醒悟过来。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与“和平共处”，使党的工作失去了紧迫性；历史自信力的丧失使得共产党人有可能比较平等地与他人一起工作；反共活动的消退也减弱了人们被围困的心态。在政治争论中，党员们可以不必为了维护至上的真理而挺身而出。他们不用再去充当俄国人的对外政策的辩护人或者去保卫不存在的路线，就像在苏维埃战争新娘（war brides）这种悲惨的事情上或者是对波兰人安德斯<sup>①</sup>的污蔑中那样。他们不用被迫在工会会议上提出模式化的决议，或者在工厂辩论中努力摆脱自己的困境。一些没有放弃他们的共产主义信念的人也完全脱离了党，把精力集中在工会工作上——在他们中有一些人在20世纪70年代成了国家领导人，休·斯卡隆（Hugh Scanlon）就是个有名的例子。其他人尽管还留在党内，却更加专注于工厂问题。在任何情况下，由于忠诚的对象发生了转移，早些年用在政治目的上的精力就奉献给了工会。

党在新阶段对它的成员提的要求较少。就像在这一时期其他的政治组织中一样，纪律松弛了，对团体的忠诚也在减弱。不再要求每个党员都去理解“政治路线”了，也不要求在党的每个“机构”中贯彻执行“政治路线”了。负责劳资工作的同志不用被迫出现在集会和示威活动中以便显示他们的“政治积极性”，也不用上党校来证明自己“政治上受过教育”。工厂里的支部集中精力处理更为迫切的问题，例如，测算好的日工作量或者对生产率进行讨价还价，而不是那个渐渐隐去的天堂，不是“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党员重新登记运动停下来了。午餐宣传会没有了；《工人日报》的销量也日渐减少。工厂支部最好也不过是形成了像伦敦机场里的工会发言人——“克里姆林”

---

<sup>①</sup> 乌拉迪斯拉夫·安德斯（Wladyslaw Anders，1892~1970年），波兰将军，早年参加过沙皇军队，后在波兰军队任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在与苏军的作战中被俘，并被关押在卢平加（Lubianka），苏德战争爆发后他受命组建了“波兰第二军团”，参加了北非和意大利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第二军团”中多数人留在了西方，安德斯本人定居英国。——译者注

那样的军事化的小集团<sup>①</sup>，最差也就是充当工会的选举机器。在较为宽容的时期入党的、时间还不长的那些人，与他们的长辈比起来，就不太像是与众不同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实际上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治家”，肯·威勒记录了伦敦建筑业中的那些人，“他们是工会网络中的一部分，这个网络恰巧是共产党。”<sup>②</sup> 它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网络：在1971年，工会中的15个地区委员会成员中大约有11个据说曾经是党员。共产党只要还是共产党，就不可能不是国际主义的，可是它不再用两个阵营的政治观念来定义它的存在了（共产党人支持的越南团结运动是自1917年以来的第一个这样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党没能获得领导地位）。

劳资领域中的同志更加积极地参与到20世纪60年代的劳工运动中，这一运动在10年的时间里改变了英国工会运动的特征，并使劳资关系自1926年以来首次进入到国家政治事务的最前沿。在1958年开始了一轮长时间的工会发展，这使得在接下来的20年里，劳动力中工会会员的比例提高了大约56%。在工人中间刮起了一阵新的造反风，一种敢于表达自己诉求的新精神也在工会里出现了。工会发言人的人数和力量都提高了。在英国以及西欧的其他国家中，20世纪60年代的人们见证了工会运动和更为自发的劳工运动的巨大发展。罢工的发生率剧增；到1969~1972年的“薪水爆炸”（pay explosion）期间，罢工比1919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频繁，并且这些罢工在达到它们当下的目标方面也比1871~1873年的“罢工爆炸”（strike explosion）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成功<sup>③</sup>。这些变化的影响累积起来，就使工人得到在劳资关系中的诉

① 特里·托马斯那时是“红色”帕克罗耶尔的一个年轻的好斗分子。

② 1987年6月与马肯·威勒的口头交流。

③ 关于罢工浪潮，参见 J. W. Duncan, W. E. J. McCarthy and G. P. Redman, *Strik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1983。关于工会发言人力量的提高，参见 J. B. Goodman, T. G. Wittingham, *Shop Steward in British Industry*, London 1969; H. A. Turner, G. Clark and G. Roberts, *Labour Relations in the Motor Industry*, London 1967。1968年的德诺文（Donovan）调查团报告中的文件含有大量的关于这些发展的信息。

求以更多的权利，但损害了他们在政治领域中的要求。这些影响还诱导工人相信，他们可以单独去追求物质上的或者工会的利益（当然，威尔逊政府的记录有助于贬低政治上的要求）。

1966年，共产党在全国海员罢工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从那时起，它在劳资关系上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在1966~1967年整整一年的斯托克港（Stockport）的罗伯茨-阿朗戴尔罢工中，曼彻斯特共产党的工程师们组织的团结一致的行动预示和预演了那些“直接行动”的方法，它们将会成为20世纪70年代工会运动的特征——群众纠察队、表示同情的示威活动、动员外界支持<sup>①</sup>。在1969年的《取代冲突》白皮书发布之后成立的“保卫工会”的联络委员会，推动了一个针对1971年《劳资关系法案》的强大的并且最终取得胜利的反对派的形成。共产党领导的“上克莱德造船工人协会”（UCS）接管工厂活动似乎实现了党最初的梦想，一群工人战略性地控制了他们的劳动部门；当15万格拉斯哥人到场支持他们的时候，似乎就像哈利·波利特一直认为的那样，没有什么力量比“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更强大<sup>②</sup>。

劳资关系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分裂以及把前者置于后者之上的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时虽然共产主义工会的影响正如日中天，而共产党本身却遭遇困境：党员人数减少；在注重劳资关系和注重政治斗争的这两翼之间，以及在“战车派”（苏联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支持者）和自由派之间产生了最初的分化。一直作为共产主义运动在工人中的核心力量的工会发言人，与工会组织以及“共同协商”机构（专职的工会发言人的出现是这10年的特征）合为一体，从而在工厂中获得了一种新的合法性。共产

---

① Jim Arnison, *The Million Pound Strike*, London 1970.

② 关于“上克莱德造船工人协会”占领活动的杰出研究，参见 John Foster and Charles Wolfson, *The Politics of the UCS Work-In*, London 1986；同时代人对此活动的描述，参见 Willie Thompson and Finlay Hart, *The UCS Work-In*, London 1972。

党，至少也是个别共产党员，在工会机构中也获得了与此相当的合法地位。工会联盟废除了它关于共产党员不得在工会组织中担任职务的禁令；有两个党员被选进了工会联盟的常务委员会。共产党员没有像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那样偶尔也担任工会的领导职务，可是他们在相当于工会的中间管理层中有充分的代表性，也就是在刚刚出现的半职业、半专职的工会官员中，在工会的研究人员和资料中心中，在像那些指挥了1977年戈伦维克（Grunwick）罢工和那些发起了1981年“争取就业人民大进军”（由于共产党在工会联盟西北委员会中的影响，左翼的评论家认为这一运动是“由共产党组织的”）的地区委员会和区域工会联盟中。由共产党员发起的左翼工会联合组织“泛左派”（Broad Lefts）至少直到70年代中期为止，一直在工会选举中势如破竹，尽管它们是不是共产党施加影响的工具或者是不是以前的宣传家和鼓动者借此进入官员行列的桥梁，还是个悬而未决的事情。

对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许多新激进分子来说，工会不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且它本身还是一项事业。不是党或者阶级而是工会成了被忠诚的首要对象，并且还不是个别的工会而是整个工会运动。它有自己的英雄和殉道者，如（依据1971年的劳工关系法案被政府监禁的）本顿维尔监狱五英雄、希鲁斯伯里两英雄（根据防止“阴谋”的法律而被监禁的罢工流动宣传员）和沃灵顿的六英雄；它有自己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例如索特利门（Saltley Gates）的关闭<sup>①</sup>；有自己的划时代的使命。劳资纠纷，不管其表面的原因是什么，都对唯一的斗争作出了贡献。照这样的眼光看来，哪怕是最小的行动也会呈现史诗般的意义，在戈伦维克事件中就是这样：为争取工会被承认而在一个摄影器材店那儿举行的一次罢工，

---

<sup>①</sup> 伯明翰的索特利（Saltley）是当时英国主要的焦煤供应地，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罢工浪潮中，索特利的矿工们为了提高工资，在1972年2月举行了罢工，在其他地方工人们的支持下，最终取得了成功。——译者注

有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参加了这次罢工（在这次以及其他的许多罢工中，共产党人领导的、为期整整一年的罗伯茨 - 阿朗戴尔罢工是个好榜样）。在《取代冲突》中预示的、在 1971 年的《劳工关系法案》中立法通过的刑事制裁的威胁似乎使得工会运动本身成了可疑的东西，而媒体上大量的敌意宣传则证明了反工会情绪的高涨。根据希斯（Heath）<sup>①</sup> 的保守党政府的“暂停付薪”，以及随后的威尔逊 - 卡拉汉政府的“社会契约”等规定，“自由的集体谈判”——按照它在运动中的说法——被暂时取消了。法官们日渐增加的敌意使得罢工纠察队活动也受到了威胁。一个见证了工会人数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 10 年，一个见证了把工会发言人在工厂里的权力制度化的十年，因而也是——用激进分子的主观的眼光来看——使得工会权利逐渐削弱的 10 年。这就好像是他们已经察觉到或者预料到在撒切尔政府的统治下即将遭受的打击。

### 三 新信仰

20 世纪 70 年代的工会运动不只是一项事业。对于它的最热情的支持者，即由于时代中的劳资斗争而变得激进起来的年轻的劳动者，或者是在刚刚建立工会的公共服务部门中的那些人来说，在没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下，它也是近乎工人的信仰的东西，尽管它只局限于主张积极行动的少数人而非人口中的大多数。在其慷慨激昂的高调和看似有限的要求下，仍然可以辨识出一种类似于宗教的冲动在起作用：在一个有着大量失业的时代中的存在论意义上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对自我超越的追求、通过诉诸过去来伸张集体的尊严、由更广泛的归属感所带来的欢乐。罢工对于那些参与其

---

<sup>①</sup> 爱德华·希斯（Edward Heath），英国首相（1970～1974 年），保守党领袖（1965～1975 年），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1972 年）的倡导者，曾多次访华。——译者注

中的人来说，带有某种类似于“奋兴大会”（Revivals）的特征：就像过去席卷了各个煤田的那些罢工一样，在那种场合下，会有大批的人皈依新的信仰；在那样的时刻一切都会焕然一新。群众纠察队是力量的显示。与警方的冲突——不管双方是如何的不对等——是对强烈情感的宣泄。象征性的分裂制造了两大阵营政治观念的幻影，其中，主要的敌人被刻画成“工贼”——这个表示民间魔鬼的范畴把任何从风暴中退缩不前的人都当做贱民看待。捍卫工会运动的斗争像早年的社会主义斗争一样，是不可分割的。它有其极端保守的一面，试图通过召唤旧世界来纠正新世界，就像1972年的那场有多达25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反对劳资关系法案的示威活动一样——那场示威活动集中了以前的工会的盛大场面。1984~1985年的矿工罢工在精神上非常接近于此前的有着周密部署的斗争，它是为了捍卫矿工们世代相传的工作权利而进行的广泛动员，它是对工会的信仰，它在共同体面临灭绝的危险时发现或者重新发现了共同体。

20世纪70年代的“工人主义运动”——“欧洲共产主义者”以及工党中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背叛者所抱怨的“向内看的（inward-looking）、奇怪的无产阶级运动”<sup>①</sup>——跟早期的不同，它本质上具有自卫的性质。它没有把工人看做“大有前途的阶级”，而是看做历史遗产的继承人。它的经济背景——比如在1971年“上克莱德造船工人协会”的接管工厂运动和1984~1985年的矿工罢工中——是传统工业的凋敝，是劳动本身的贬值。它建立在一种正在收缩的社会基础和正在碎片化的政治文化上，其中，战斗精神正在向上转移而工人也在从他们自己的运动中疏离出来。像工团主义一样，它特别重视“劳资领域中的行动”，但不是把它看做实现目的的手段，而是作为目的本身。它所要实现的最终的目标不是革命性的

---

<sup>①</sup> 这一说法来自大卫·马昆德（David Marquand），他是工党中投向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者之一，这一说法出现在大约是1981年的某一期《冲突》（Encounter）中。



转变，而是与“工贼”在纠察线（picket-line）上的斗争。它恰好成形于这样的关头：到处都有人失去工作，制造业前景暗淡。它在工党内尤其与白领阶层的战斗精神联系在一起，在那里，它还牵涉到大量的不诚实行为。在历史地植根于传统工业的共产党内，它极其顽固地坚持已不再敢说出来的各种效忠义务。

如果我关于“工人主义运动”再次爆发的观点是正确的，目前在共产党内的分歧，不管是多么根本性的，都可以说是缘于双方的互不认可。“欧洲共产主义者”非但没有奋起反抗“斯大林主义”——公共媒体所给予他们的这种姿态，在他们自己的仁爱的自我形象中也是如此——反倒在某程度上以“四人帮”的方式对最近的一种现象施以反动，即工会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的增长以及工会发言人权威的急剧扩大。对工会运动的敌意，不管这种工会运动是“社团主义的”、“工人主义的”还是“经济主义的”，可以说是欧洲共产主义事业中的红线，是一种成了变色龙的政治运动中少数的几个不变的东西之一。它在1974~1975年劳工运动的“社会契约”期间就已经显露出来，现在的《今日马克思主义》的编辑那时还只是个研究生。在产业领域和工会中的同志把他们的信仰寄托在“自由的集体谈判”上的时候，其他人正在抨击“用较量实力（trial-of-strength）的方法来解决劳资间的收入分配问题”，并在争论着收入政策和政府强加的标准日工作量<sup>①</sup>。与“经济主义”的决裂，按照列宁的经典文本的提示，在1979~1980年间振作精神，并在反对“社团主义”的幌子下，扩大到刚刚制度化的工会权力的整个范围。《今日马克思主义》对据说是由此引起的种种堕落行为的抨击加快了这个党与《晨星》的分裂。在晚些时候，它又依据女权主义的说法，把“新的社会力量”与工会所代表的“史前的”

---

<sup>①</sup> Dave Purdy, “Some Thought on the Party’s Policy towards Price, Wages and Incomes”, *Marxism Today*, August 1974; 另见同一杂志在1973年12月, 1984年的1月、2月、3月、5月、7月和11月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

(pre-historic) 力量对立起来，并且还在它对 1984 ~ 1985 年矿工罢工的批评中——这个党事后认定它是“狭隘的劳资斗争”——把群众纠察队的行为看做一种“传统的、几乎老掉牙的”策略<sup>①</sup>。毫无疑问，许多这样的情绪并不只是反“工人主义的”，至少按照共产党的传统观点来看也是反对工人阶级的。工人，至少是男性工人，成了被鄙视的对象。他们是“种族主义者”和“男性至上主义者”，腆着个大肚子，大口大口地灌着啤酒，吹牛胡聊，并且——按照《今日马克思主义》的那些时尚作者的说法——穿着也不像样子<sup>②</sup>。它对“狭隘的工会意识”、“陈旧的”兄弟情谊观念以及“传统主义的”领导层的抨击，不仅标志着与党在产业领域中的各个分支组织之间的距离——这些分支组织正由于这一转变而大幅度地减少，也标志着它偏离了主流的劳工运动的观念。

《晨星》的拥护者们尽管在迷恋劳资斗争方面是真诚信仰共产主义的，但对于什么是他们所代表的不明确，他们的错误似乎也并不少。他们把“阶级政治”——他们俨然是它的捍卫者——等同于效忠工会的基本义务。他们似乎不了解 20 世纪 20 年代，甚至对它根本就没有兴趣。正是在 20 年代，“阶级政治”的观念形成了，并且可以说已经统治了全国的舞台。他们对 1945 年和战争刚刚过去的那些年代也是如此，那时政治上的同盟正趋于两极对立。甚至像“替代性经济战略”——英国共产党领导人因为放弃了它而受到指责——那种 70 年代的陈词滥调仍然受到保护，好像它们成了社会主义的约柜。可是，“阶级政治”对共产党人来说从来与任何简单意义上的工会主义不是一回事。60 年代以来，这个党在工会中的角色，首先是也最主要是反对派的角色。在劳资工作中，对专职官员的敌意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个党在 30 年代和 40 年代争取到工会中的领导位置，也没有实质性地改变这一状况。鲍勃·达克 (Bob Darke) 是哈克尼的

① *Marxism Today*, April 1985.

② “What the Left Is Wearing”, *Marxism Today*, November 1986.

公共汽车售票员，他在提到自己在党的劳资委员会的分会中工作时所说的话，即使把一个变节者的怨恨考虑进去，这件事情听起来仍然是可信的：“在想从工会那里得到支持的时候，总是会问：‘我们的实力是处在高潮还是低谷？’这不只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它的答案对党可能采取的行动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党喜欢牢牢地控制住工会的机构，可一旦它不能抓住普通群众，它也知道它可能会在投票中败下来。1952年的福特大罢工就是一个例子。党的工会发言人在非党员中鼓动大家的情绪，得到了他们所想要的罢工，可是在那些普通的工会会员们有时间去思考以后，他们就通过投票把工会发言人赶下台，然后又回去上班了。”<sup>①</sup>

不管是“阶级”的政治还是“广泛的民主联盟”，这场争论的双方在寻找他们的历史渊源的时候都忘记了，作为一个超越了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工会的或政党政治的各种类型的排他主义（particularism）的世界性运动，什么才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更为鼓舞人心的东西。这场争论立足其上的革命观念，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具体的社会结构之外。它把共产主义等同于它自己所理解的“一个世界主义的观点”（one worldism）。不论其具体的路线是什么，用来衡量政治活动的唯一尺度在于它是否促进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不管阶级政治具有怎样高昂的战斗热情，它永远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且它丝毫没有想到要摆脱阶级——这是我在随后的“关于个人的政治学”这一章中将会讨论的问题<sup>②</sup>。

---

① Bob Darke, *The Communist Technique in Britain*, Penguin 1952, p. 63.

② 由于篇幅的原因，本书的姊妹篇《两大阵营的政治观念：阶级敌人》，将被放到沃索版当中。

# 附录一 作者主要成果

## 一 出版物

年份	作者	标题	发表或出版情况	说明
1953	拉斐尔·塞缪尔	费边社的新成员	《牛津左派》，夏季学期，第17-21页	牛津大学勃利尔(Balliol)学院的本科生；1953年秋季学期、1954年春季学期任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秘书；氢弹抗议运动三人委员会的秘书；1953年夏、秋学期任《牛津左派》助理编辑；春、夏学期任合作编辑
1953	拉斐尔·塞缪尔	西方的那些事儿	《牛津左派》，秋季学期，第14-18页	
1954	拉斐尔·塞缪尔	社会主义运动与中产阶级	《牛津左派》，春季学期，第24-27页	
1954	拉斐尔·塞缪尔	英帝国主义的盘算	《牛津左派》，秋季学期，第40-48页	
1957	拉斐尔·塞缪尔	左派的笔记：市镇规划的政治	《大学与左派评论》，第2期	
1957	拉斐尔·塞缪尔、斯图亚特·豪尔、皮特·西季威克、查尔斯·泰勒	知情者：对统治着英国工业的那些人所做的研究	《大学与左派评论》，第3期	
1959	拉斐尔·塞缪尔	阶级与无阶级	《大学与左派评论》，第6期	回应麦克米伦的“丰裕社会”
1959	拉斐尔·塞缪尔	哪里有生活的质量？	《费边社手册》，第320期，11月	关于工党未来的5篇评论，还有休·贝林顿对选举结果的分析
1959	拉斐尔·塞缪尔	半神式的主人	《大学与左派评论》，第7期	

## 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

- |      |                       |                                 |                               |                                                |
|------|-----------------------|---------------------------------|-------------------------------|------------------------------------------------|
| 1960 | 拉斐尔·塞缪尔               | 顺从的投票人                          | 《新左翼评论》，第1期                   |                                                |
| 1960 | 拉斐尔·塞缪尔               | 选票与人民                           | 《论坛报》，9月30日                   | 这是一篇最初发表于《新左翼评论》上的文章的缩写版                       |
| 1960 | 拉斐尔·塞缪尔               | 亚伯拉姆博士与政治的终结                    | 《新左翼评论》，第5期                   |                                                |
| 1962 | 拉斐尔·塞缪尔               | 什么也没有发生：对政府拆除贫民窟工程所作的长期跟踪研究     | 《新左翼评论》，第13~14期               |                                                |
| 1969 | 拉斐尔·塞缪尔               | 无标题                             | “英国记录的声音协会大会”，12月13日          |                                                |
| 1970 | 拉斐尔·塞缪尔               | 19世纪的街头生活                       | 维多利亚协会，10月                    |                                                |
| 1971 | 拉斐尔·塞缪尔               | 文字记录中的风险                        | 《口述历史》，第1期，第19~22页            |                                                |
| 1972 | 拉斐尔·塞缪尔               | 海丁顿采石场：一个劳动社区的记录                | 《口述历史》，第1期，第107~122页          |                                                |
| 1972 | 拉斐尔·塞缪尔               | 矿井的支架                           | 《新社会》，12月，第22卷，第531期          | 关于雷蒙德·查利诺的《兰开夏和切尔西的矿工》（纽卡斯尔：弗兰克·格雷厄姆出版社）的书评    |
| 1973 | H. J. 迪厄斯、迈克尔·沃尔夫（合编） | 来者与去者                           | 《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        |                                                |
| 1975 | 拉斐尔·塞缪尔、格雷斯·斯塔德曼·琼斯   | 奇境中的马克思                         | 《历史讲习班杂志》                     | 关于巴里·亨德斯和保罗·赫斯特所著《资本主义的前资本主义模式》（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的书评 |
| 1975 | 拉斐尔·塞缪尔               | 20世纪20年代的共产党与工人的教育              | 历史讲习班第九次会议，牛津大学罗斯金学院，5月2日，星期五 |                                                |
| 1975 |                       | 采石场的粗汉：海丁顿采石场的生活与劳作（1820~1920年） | 《乡村的生活与劳作》，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         |                                                |
| 1976 | 拉斐尔·塞缪尔               | 地方史和口述史                         | 《历史讲习班杂志》，第1期                 |                                                |

- 1977 拉斐尔·塞缪尔、格雷斯·斯塔德曼·琼斯 社会学与历史 《历史讲习班杂志》，第1期
- 1977 拉斐尔·塞缪尔（编）《矿工、采石工和制盐工人》 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
- 1977 拉斐尔·塞缪尔 世界工场：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的蒸汽动力和手工技术 《历史讲习班杂志》，第3期
- 1978 拉斐尔·塞缪尔 主教门文化中心 (Bishopgate Institute)<sup>①</sup> 《历史讲习班杂志》，第5期，春季，第163~171页
- 1978 拉斐尔·塞缪尔 艺术、政治与意识形态 (编者导言) 《历史讲习班杂志》，第6期，秋季，第101~106页  
源自“资本主义与工业设计”，艺术与社会历史讲习班，1978年6月，伦敦市工艺专科学校
- 1979 拉斐尔·塞缪尔 造反者的理由 《今日马克思主义》，5月，第155~157页  
关于莫里斯·康福思所编《造反者的理由：A. L. 莫顿纪念文选》(伦敦：劳伦斯出版社)的书评
- 1980 拉斐尔·塞缪尔 历史讲习班的方法 《历史讲习班杂志》，第9期
- 1980 拉斐尔·塞缪尔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新左翼评论》，第120期，第21~96页  
原来是为1978年7月伦敦大学的共产主义小组准备的，后来应马克思学院的授课之需以及随后参加的罗斯金历史讲习班的第13次会议而进行了扩充
- 1980 拉斐尔·塞缪尔 1926~1936年的工人剧场 《大众戏剧中的表演与政治》(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 1981 拉斐尔·塞缪尔 给编者的信 《历史讲习班杂志》，第11期，春季，第199~201页
- 1981 拉斐尔·塞缪尔 伦敦东区的底层社会：亚瑟·哈丁一生中的几个片断 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
- 1981 拉斐尔·塞缪尔 砖巷<sup>®</sup>的恐惧 《卫报》，5月2日，星期六  
《伦敦东区的底层社会：亚瑟·哈丁一生中的几个片断》中的选段

## 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

- |      |                      |                             |                             |                                                 |
|------|----------------------|-----------------------------|-----------------------------|-------------------------------------------------|
| 1981 | 拉斐尔·塞缪尔              | 巨人,一个关于阶级的寓言                | 《新社会》,11月19日                |                                                 |
| 1981 | 拉斐尔·塞缪尔(编)           | 人民的历史                       | 《人民的历史与社会主义理论》,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   |                                                 |
| 1981 | 苏珊·巴洛克劳<br>美、拉斐尔·塞缪尔 | 历史与电视                       | 《历史讲习班杂志》,第12期,秋季,第172~182页 |                                                 |
| 1982 | 格雷·斯塔德曼·琼斯、拉斐尔·塞缪尔   | 《文化、意识形态与政治》                | 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                  |                                                 |
| 1982 | 拉斐尔·塞缪尔              | 社会主义与唯美主义                   | 《新政治家》                      | 关于伊恩·不列颠所著《费边主义与文化:英国的社会主义与艺术研究》(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书评 |
| 1982 | 拉斐尔·塞缪尔              | 社会民主党和新的政治等级制度              | 《新社会》,4月22日                 |                                                 |
| 1982 | 拉斐尔·塞缪尔              | 托尼 <sup>®</sup> 与社会民主党      | 《卫报》,4月5日,星期二               |                                                 |
| 1983 | 拉斐尔·塞缪尔              |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产阶级               | 《新社会主义者》,1~2月               |                                                 |
| 1983 | 拉斐尔·塞缪尔              | 不要再提保守主义和传统                 | 《新政治家》,1月21日                | 关于保守主义的系列文章                                     |
| 1983 | 拉斐尔·塞缪尔              | 恐惧与幻想                       | 《新政治家》,3月4日                 | 关于保守主义的系列文章                                     |
| 1983 | 拉斐尔·塞缪尔              | 男人就是男人                      | 《新政治家》,3月18日                | 关于保守主义的系列文章                                     |
| 1983 | 拉斐尔·塞缪尔              | 男人就是男人(第二部分)                | 《新政治家》,3月25日                | 关于保守主义的系列文章                                     |
| 1983 | 拉斐尔·塞缪尔              | “模糊的怀旧病”与“为了麦吉、英格兰和圣乔治,求上帝” | 《新政治家》,5月27日                | 论爱国主义的随笔                                        |
| 1983 | 拉斐尔·塞缪尔              | 无良商贩成就了英国                   | 《牛津之星》,6月                   | 论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的随笔                                  |
| 1983 | 拉斐尔·塞缪尔              | 上层与底层                       | 英国广播公司第四套节目                 | 就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与布莱克勋爵的辩论,由皮特·柏克主持                   |

- |      |                          |                 |                                |                                            |
|------|--------------------------|-----------------|--------------------------------|--------------------------------------------|
| 1984 | 拉斐尔·塞缪尔                  | 口述历史            | 《讨论》,第10期                      |                                            |
| 1984 | 拉斐尔·塞缪尔                  | 什么是历史?          | 《当代历史》,第34期,5月                 |                                            |
| 1984 | 拉斐尔·塞缪尔                  | 黑人区的劳工史         | 《卫报》,8月6日,星期二                  |                                            |
| 1984 | 拉斐尔·塞缪尔                  | 本过去与现在          | 《新政治家》,9月28日                   |                                            |
| 1984 | 拉斐尔·塞缪尔                  | 本先生求教了几个家喻户晓的神  | 《卫报》,10月4日,星期四                 | 关于托尼·本编的《墙上的书写:激进社会主义者选集》和悉尼·希金斯的《本的传承》的书评 |
| 1985 | 拉斐尔·塞缪尔                  | 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第一部分) | 《新左翼评论》,第154期,第3~53页           |                                            |
| 1985 | 罗吉尔·斯威夫特、谢利丹·吉利(编)       | 罗马天主教与爱尔兰穷人     | 《维多利亚时代城市中的爱尔兰人》,伦敦:克鲁姆·赫尔姆出版社 |                                            |
| 1985 | 伊万·麦考、斯图亚特·考斯格罗夫、拉斐尔·塞缪尔 |                 | 《左派剧场 1880~1935年》,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   |                                            |
| 1985 | 拉斐尔·塞缪尔                  | 一个灾难性的计划        | 《新社会》,第71卷,第1157号,3月7日         | 在斯卡奇尔 <sup>④</sup> 领导的罢工中也提到过前面的一些内容       |
| 1985 | 拉斐尔·塞缪尔                  | 什么是社会史?         | 《当代历史》,第35期,3月                 |                                            |
| 1985 | 拉斐尔·塞缪尔                  | 底层的历史           | 《劳工周刊》,第12期,4月                 |                                            |
| 1985 | 拉斐尔·塞缪尔                  | 美妙的幻象           | 《新社会主义者》,第27期,5月               | 关于早期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运动前景的随笔                      |
| 1985 | 拉斐尔·塞缪尔                  | 工党为自己挖的坑        | 《卫报》,6月10日,星期一                 |                                            |
| 1985 | 拉斐尔·塞缪尔                  | “英国广播公司的工作伦理”   | 《卫报》,7月22日,星期一                 |                                            |
| 1985 | 拉斐尔·塞缪尔                  | 到无产阶级巨人中去       | 《新社会主义者》,第29期,7~8月             | 关于世纪之交的工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随笔(第二部分)                  |
| 1985 | 拉斐尔·塞缪尔                  | 决裂就那么难吗?        | 《卫报》,12月,星期一                   |                                            |



## 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

- 芭芭拉·布罗姆  
 1986 菲尔 德·盖伊·博纳斯·拉斐尔·塞缪尔 内部的敌人:1984~1985 年的矿区与工人的罢工 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
- 1986 拉斐尔·塞缪尔 对计划的盲目崇拜 《新社会主义者》
- 1986 拉斐尔·塞缪尔 那时候,一则讣告在历史上显得太短了 《卫报》,5月22日 给编辑的信
- 1986 拉斐尔·塞缪尔 由陌生人组成的家庭 《新社会》,第6期,6月 关于卡罗琳·斯蒂德曼的《善良女性面面观》的书评
- 1986 拉斐尔·塞缪尔 关于爱国精神的幻想 《新政治家》,7月18日 关于王室罗曼史的专题
- 1986 拉斐尔·塞缪尔 对矿工的恶意中伤 《新社会主义者》,第42期,10月
- 1986 拉斐尔·塞缪尔 罗斯金学院的学生为什么显得非常特别 《卫报》,10月23日 就塞尔布恩事件致编辑的信
- 1986 拉斐尔·塞缪尔 处于战争状态的家庭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10月24日 关于大卫·塞尔布恩事件的文章
- 1986 拉斐尔·塞缪尔、艾莉森·莱特 等级制度的童话剧 《新社会》,12月 兰贝斯慢步舞与音乐剧《我和我的姑娘》
- 1986 拉斐尔·塞缪尔 持久力: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第二部分) 《新左翼评论》,第156期,第63~113页
- 1987 拉斐尔·塞缪尔 阶级政治学: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第三部分) 《新左翼评论》,第165期,第52~92页
- 1987 拉斐尔·塞缪尔 在英格兰最黑暗的地方 《新政治家》,3月6日 关于大卫·塞尔布恩的《被遗忘的:深入英国政治之旅》的书评,伦敦:乔纳森·凯普出版社
- 1987 拉斐尔·塞缪尔 工党中的新马基雅维里 《卫报》,4月20日,星期一 关于金诺克先生的政党的竞选目标的讨论
- 1987 拉斐尔·塞缪尔 新政治家与全国矿工联盟 《晨星》,4月30日,星期四
- 1987 拉斐尔·塞缪尔 工党活下去的机会 《论坛报》,5月 这是与“社会主义者协会”合出的《论坛报》特别增刊。与它相关的评论则投给了第四频道的广播节目,5月1日星期五的“一周政治”。

- 1987 拉斐尔·塞缪尔 抓革命运之所赐 《卫报》，6月5日 关于利奥诺·达维多夫和凯瑟琳·豪尔所著《家庭的时运,1780~1850年英国中产阶级的男人和女人》(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书评。
- 1987 拉斐尔·塞缪尔 工党的复兴 《卫报》，6月8日
- 1987 拉斐尔·塞缪尔 乌托邦式的社会学 《新社会》，10月2日 关于柯林·沃德所编《无政府主义的十年(1961~1970年)》的书评
- 1987 拉斐尔·塞缪尔 结束了的历史 《卫报》，10月9日，星期五 关于罗伯特·休伊森《传统产业》的书评
- 1987 拉斐尔·塞缪尔 落在所有人头上的灾难 《卫报》，10月17日，星期六 关于斯佩特费尔茨<sup>⑤</sup>与传统的随笔
- 1987 拉斐尔·塞缪尔 A. L. 莫顿的讣告 《独立报》，11月5日，星期四
- 1987 拉斐尔·塞缪尔、詹姆斯·奥博科维奇、琳达·罗普尔 信仰的磨炼:宗教、政治与父权制研究 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
- 1988 拉斐尔·塞缪尔 小狄更斯 《卫报》，2月19日
- 1988 拉斐尔·塞缪尔 芬纳·布洛克威的讣告 《独立报》，5月
- 1988 拉斐尔·塞缪尔 当代可鄙的英格兰主义 《新政治家与社会》，10月21日 选自《出去,做一个英国人》中关于爱国精神那一卷中的一章
- 1988 沃尔夫·苏斯奇斯基(编) 导言 “查灵路口”<sup>⑥</sup>伦敦,尼斯欲图片社
- 1988 拉斐尔·塞缪尔 犹太人与社会主义运动:一种美好友谊的终结 《犹太人季刊》，第35卷,第2期,第7~20页 提交给了“第三届纪念雅各·森塔基专题讨论会”。讨论会与1987年12月6日在伦敦的希勒尔学校(Hillel House)举行
- 1989 拉斐尔·塞缪尔 社会主义的重生 罗宾·亚奇编辑:《走出冷漠:新左翼30年来的呼声》,伦敦:沃索出版社

## 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

- 1989 拉斐尔·塞缪尔 为争取新的过去而进行的历史斗争 《卫报》，1月21日
- 1989 拉斐尔·塞缪尔 (编) “导言，那些小团体”、“出去，做一个英国人”、“爱尔兰的宗教”以及与格雷·斯塔德曼合写的“珍珠似的国王和王后们”、与艾莉森·莱特合写的“我和我的姑娘” 《爱国精神：英国民族特性的形成与改变》第3卷，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 在牛津罗斯金学院召开的一次会议的成果
- 1989 弗朗西斯·卡恩沃斯 (编) 令人悲伤的交谈 《斯佩特费尔茨的拯救》(指“斯佩特费尔茨历史建筑基金”)，第133~170页
- 1989 拉斐尔·塞缪尔 用实例来进行哲学教学：雷蒙德·威廉姆斯的过去与现在 《历史讲习班杂志》，第27期，春季，第141~153期
- 1989 拉斐尔·塞缪尔 英国社会思想中有关贫民窟的观念(1880~1960年) 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法国)，5月2日
- 1989 拉斐尔·塞缪尔 令人遗憾的斯佩特费尔茨 《旁观者》，5月20日
- 1989 拉斐尔·塞缪尔 寻找不列颠 《新政治家与社会》，8月25日 关于历史与学校的随笔
- 1989 拉斐尔·塞缪尔 湮没于历史中的英雄 《独立报》，8月31日，星期四
- 1989 拉斐尔·塞缪尔 伊万·麦考的讣告 《独立报》，10月30日，星期一
- 1989 拉斐尔·塞缪尔 斯蒂芬·尤，或者罗斯金选举 《历史讲习班杂志》，第28期，秋季，第208~209页
- 1989 拉斐尔·塞缪尔 舞台和银幕上的狄更斯 《当代历史》，第39卷，12月
- 1990 拉斐尔·塞缪尔 宏大叙事 《历史讲习班杂志》，第29期，春季

- |      |         |                                |                                     |                                   |
|------|---------|--------------------------------|-------------------------------------|-----------------------------------|
| 1990 | 拉斐尔·塞缪尔 | 伊万·麦考(1915~1989年)              | 《历史讲习班杂志》第29期,春季,第216~222页          | 这则讣告当时经过了修改,它最初刊登在《独立报》上          |
| 1990 | 拉斐尔·塞缪尔 | 一点点冲突正是历史之所需                   | 《独立报》,3月27日,星期二                     |                                   |
| 1990 | 拉斐尔·塞缪尔 | 让劳工接受教育                        | 《新政治家与社会》,4月6日                      | 它是关于学校历史课的辩论中的一部分                 |
| 1990 | 拉斐尔·塞缪尔 | 令人失望的“1066年来那些事儿” <sup>①</sup> | 《泰晤士报教育副刊》,5月                       | 它是关于学校历史课的辩论中的一部分                 |
| 1990 | 拉斐尔·塞缪尔 | 你说你想要一场革命                      | 《新政治家与社会》,6月8日                      | 这篇随笔写的是社会民主党、工党与社会等级。可能是在1980年开始的 |
| 1990 | 拉斐尔·塞缪尔 | 历史的回响                          | 《伦敦书评》,6月14日                        | 它是关于学校历史课的辩论中的一部分                 |
| 1990 | 拉斐尔·塞缪尔 | 布里克的哲学                         | 《空间的主题——文化、理论与政治杂志》,第11期,夏季,第45~46页 |                                   |
| 1990 | 拉斐尔·塞缪尔 | 纪念蒂姆·梅森                        | 《历史讲习班杂志》,第30期,秋季                   | 包括一篇最初刊登在《独立报》上的讣告                |
| 1990 | 拉斐尔·塞缪尔 | 马格特·海涅曼、威廉·汤普森(编)              | 《历史与想象:A.L.莫顿选集》                    | 最初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的一则讣告的转载              |
| 1990 | 拉斐尔·塞缪尔 | 历史、民族与学派                       | 《历史讲习班杂志》第30期                       |                                   |
| 1990 | 拉斐尔·塞缪尔 | 保罗·汤普森、拉斐尔·塞缪尔                 | 《我们离不开的那些神话》                        |                                   |
| 1990 | 拉斐尔·塞缪尔 |                                | 《地方的精神》                             | 提交给了西班牙的一次会议                      |
| 1991 | 拉斐尔·塞缪尔 | 历史讲习班文集(1967~1971年)            | 牛津,历史讲习班                            |                                   |
| 1991 | 拉斐尔·塞缪尔 | 可以载入史册的女人                      | 《泰晤士报》,7月4日                         | 对撒切尔夫人的历史地位的评价                    |

## 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

- |               |                  |                            |                                      |                                                        |
|---------------|------------------|----------------------------|--------------------------------------|--------------------------------------------------------|
| 1991          | 拉斐尔·塞缪尔          | 当代的种种迹象                    | 《新政治家与社会》,5月10日                      | 关于帕特里克·莱特的《穿越废墟之旅:伦敦最后的时光》(伦敦:弗拉明戈出版社)的书评              |
| 1991          | 拉斐尔·塞缪尔          | 社会主义与对美的狂热;马克思主义、历史与民族问题   | 历史讲习班                                | “民众的历史——国家的历史”,牛津罗斯金学院,11月8~10日                        |
| 1991~<br>1992 | 拉斐尔·塞缪尔          | 各种迹象的解读                    | 《历史讲习班杂志》第32~33期                     |                                                        |
| 1992          | T. C. 斯蒙特<br>(编) | 回归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的撒切尔夫人          | 《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
| 1992          | 拉斐尔·塞缪尔          | 不存在神秘的黄金时代                 | 《新政治家与社会》,3月6日                       |                                                        |
| 1992          | 拉斐尔·塞缪尔          | 为了保护那些粗制滥造的作品              | 《泰晤士报》,3月7日                          | 这篇随笔是公共图书馆运动的一部分                                       |
| 1992          | 拉斐尔·塞缪尔          | 回到左派的未来                    | 《卫报》,4月18日                           | 这是一篇关于工党的根源与传统的随笔                                      |
| 1992          | 拉斐尔·塞缪尔          | 过去与现在:历史有什么用?              | 《关于城镇》,5月7日,星期四                      | 这是博贝克(Birkbeck)学院经济学系建筑学部的“住房研究计划”组织的、就伦敦及其前景所作的系列公开辩论 |
| 1992          | 拉斐尔·塞缪尔          | 我们不要忘记:当今的图书馆              | 《图书馆发起人》,第4期,春季至秋季                   |                                                        |
| 1992          | 拉斐尔·塞缪尔          | 谈话:“20世纪40年代以来有关国民身份的政治活动” | 《文化、个性与政治:英国的少数民族》,5月9日,星期六          |                                                        |
| 1992          | 拉斐尔·塞缪尔          | 工党中的璞玉                     | 《卫报》,6月2日                            | 对以前的学生约翰·普利斯科特的支持,他是工党在争取领导地位中的领袖                      |
| 1993          | 简·加内特、柯林·马修(编)   | 发现清教主义(1820~1914年)         | 《宗教及其在1700年以来的复兴:约翰·沃西随笔》,伦敦:汉布尔登出版社 |                                                        |

- 1993 拉斐尔·塞缪尔 回应  
《历史讲习班杂志》,第35期,春季  
回应 E. P. 汤普森的“理论与证据:对‘各种迹象的解读’的抨击”
- 1993 约瑟巴·阿基利兹温-阿伽 地方的精神  
《英国的地方史》(毕尔巴鄂)  
“地方史,大众史”。关于地方史与社会的国际研讨会。11月8日,巴伦西亚省议会历史研究中心
- 1994 拉斐尔·塞缪尔 记忆的剧场  
《当代文化中的过去与现在》第1卷,伦敦:沃索出版社
- 1994 拉斐尔·塞缪尔 寻找过去的好东西  
《卫报》,5月21日  
关于苏珊·彼德森和皮特·曼德尔所编《追寻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现代英国中的私人良心与公共责任》(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的书评
- 1994 拉斐尔·塞缪尔 血缘与归属  
《独立报》,6月26日,星期天  
关于大卫·菲尔德曼的《英国人与犹太人:社会关系与政治文化(1840~1914年)》(纽黑文和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书评
- 1994 拉斐尔·塞缪尔 拉尔夫·米利班(1924-1994年)  
《历史讲习班杂志》,第38期
- 1995 拉斐尔·塞缪尔 英国的维度:四个国家的历史  
《历史讲习班杂志》,第41期
- 1995 拉斐尔·塞缪尔 北方与南方:矿区的一年  
《伦敦书评》,6月22日  
关于马克·哈森的《回到布罗肯斯:矿区的一年》(伦敦:维京出版社)的书评
- 1995 拉斐尔·塞缪尔 不再心存幻想的左派  
《新政治家与社会》,1月  
关于拉尔夫·米利班的《怀疑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剑桥:政体出版社)的书评,同时也是给约翰·萨维利的回信(1月20日)

## 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

- |      |                |                        |                                            |                                            |
|------|----------------|------------------------|--------------------------------------------|--------------------------------------------|
| 1995 | 拉斐尔·塞缪尔        | 宏大叙事                   | 《人和社会》,第115期,1~3月                          | 重印自1990年第29期《历史讲习班杂志》                      |
| 1995 | 拉斐尔·塞缪尔、艾莉森·莱特 | 艺术与权力                  | 《历史讲习班杂志》,第39期,春季                          |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蓝图——建筑与设计杂志》                     |
| 1995 | 拉斐尔·塞缪尔        | 地方的精神                  | 《L' avenc 历史杂志》第191期,4月                    |                                            |
| 1995 | 拉斐尔·塞缪尔        | 凝视星空的人们:英国需要英雄吗?       | 《卫报》,9月23日                                 | 关于历史上英雄人物的随笔                               |
| 1995 | 拉斐尔·塞缪尔        | 一个向大自然敞开的城里人的心灵        | 《观察者》,4月30日,星期天                            | 关于西蒙·沙玛的《景色与回忆》(伦敦:维京出版社)的书评               |
| 1995 | 拉斐尔·塞缪尔、艾莉森·莱特 | 马靴在哪儿?                 | 《蓝图——建筑与设计杂志》,12月                          | 关于艾莉森·莱特在海沃德美术馆举办的“艺术与权力”的评论               |
| 1995 | 拉斐尔·塞缪尔        | 满足的起因                  | 《新政治家与社会》,12月15日                           | 关于赫利甘的“失落的花园”的随笔,参见《小岛故事》                  |
| 1996 | 拉斐尔·塞缪尔        | 伦敦的召唤:从索沃伊西尔到西普斯布什的BBC |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3月8日                            | 关于埃萨·布利格斯的《联合王国的广播史》(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书评        |
| 1996 | 拉斐尔·塞缪尔        | 编造                     | 《伦敦书评》,7月4日                                | 关于弗雷德·英格里斯的《雷蒙德·威廉姆斯》的评论。在8月份就同一主题写了一系列的书信 |
| 1996 | 拉斐尔·塞缪尔        | 课程、文化与社会               | 提交给了2月7~9日由学校课程评估机构在希尔顿的肯星顿召开的“课程、文化与社会”会议 | 它后来成了《儿童故事》(尚未出版)。传统与学校的课程                 |
| 1996 | 拉斐尔·塞缪尔        | 红砖头:要保护工人阶级的建筑吗?       | “劳工史与保护运动”牛津大学罗斯金学院劳工史研究协会会议,3月23日,星期六     |                                            |

## 《小岛故事》第 1

卷,伦敦:沃索出版

社

1997

松散的不列颠

①主教门文化中心 (Bishopsgate Institute), 位于伦敦的 Bishopsgate, 创建于 1895 年, 是一个公共文化中心, 提供多种成人教育、舞蹈、语言等课程。——译者注

②Brick Lane, 伦敦东区的一个街道名。——译者注

③理查德·亨利·托尼 (Richard Henry Tawney, 1880 ~ 1962 年), 英国经济史学家, 以研究 1540 ~ 1640 年英国经济史著称, 主要著作有《贪得无厌的社会》、《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国的土地和劳工》等。——译者注

④亚瑟·斯卡奇尔 (Arthur Scargill, 1938 年 ~), 1981 年当选为英国矿工联合会 (NUM) 主席, 在 1984 年 3 月 12 日组织领导了持续一年的大罢工, 并与包括自己的妻子在内的数百人一起被捕。尽管由于这次罢工的失败和强烈的暴力色彩而饱受争议, 但他仍然受到大多数矿工的支持, 并在 1985 年被推选为矿工联合会的终身主席。随着劳工运动的战场从街头转移到媒体, 斯卡奇尔也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议会政治, 并在 1996 年成立了社会主义工党 (SLD)。

⑤Spitalfields, 位于伦敦东区, 该地区有许多市场, 包括始建于 17 世纪的 Old Spitalfields Market。——译者注

⑥Charing Cross Road, 伦敦市中心的一条街道。

⑦《令人失望的“1066 年来的那些事儿”》 (*1066 and All That: A Memorable History of England*), 作者是塞勒 (W. C. Sellar) 和耶特曼 (R. J. Yeatman), 1930 年出版。这本书以诙谐的方式重写了从罗马时期、1066 年的诺曼底征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国史。它的写作风格风靡一时, 引得人们竞相模仿, 并在 20 世纪 30 ~ 40 年代被改编成同名的音乐喜剧。——译者注

没有注明日期或者引用不全面的有:

● 《各种迹象的解读》, 《当代历史》, 第 7 期, 第 51 ~ 74 页。

● 《新专制主义与新左派》, 《大学与左派评论》。

● 《社会主义能够生存下去吗?》, 牛津大学工党俱乐部, 10 月 10 日, 星期一。

● 《在兰开斯特就传统以及“记忆的剧场”与帕特里克·莱特的辩论或交谈》, 6 月 7 日; 关于爱德华七世时代教科书的论文, 它被收藏在伦敦大学教育研究所。

● 《地方史》, 历史讲习班, 10 月 17 日, 星期二, 翰威尔社区中心。

● 《郊区, 历史的、文化的和社会的透视》, 历史讲习班, 6 月 13 日, 牛津罗斯金学院。

● 艾莉森·莱特与拉斐尔·塞缪尔的《伦敦郊区》, 约翰·贝奇蒙 (John Betjeman) 的田园风格的作品。

● 《这些学科的特殊贡献》, 为《往昔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召开的



为期一天的讨论会，12月24日，皇家人类学研究所，伦敦安妮女王大街56号。

●《自然与民族》，这篇文章提交给了关于“地貌、传统与民族特性”的大会，1989年9月7~9日。

●《英国的历史，英国的特性》，讨论会，1990年6月8日。

●《马克思主义、历史和民族问题》，关于民族问题的大会，11月10日，星期天（未注明日期）。

●《“黄祸”，世纪末与地球的毁灭：19世纪末的恐惧与幻想》，沃维奇大学欧洲人学研究中心，7月8日，星期天（未注明日期）。

## 二 讲话

年代	作者	标题	场所与时间	说明
1972	稿件	19个徒步旅行者的节 目：人人都是旅行者	“所有人的长征。英 国民众史中的主题及 其变化”	给第四频道广播节目 的投稿，4月2~5日
1973	拉斐尔·塞缪尔	附加的评论	“所有人的长征。英 国民众史中的主题及 其变化”	给广播节目的投稿，2 月3日，星期六
1975	拉斐尔·塞缪尔	未知	历史讲习班社会学小 组	
1975	拉斐尔·塞缪尔	口述历史	西萨里郡边疆家族史 协会，5月21日，星 期三	
1976	拉斐尔·塞缪尔	资本主义发展的若干阶 段：关于马克思的几个 问题	劳动过程，历史学家 小组，10月	
1978	拉斐尔·塞缪尔	资本主义与工业设计	艺术与社会历史讲习 班，6月，伦敦市工艺 学校	在塔山（Tower Hill）的 米诺里斯街航海学校 举办
1980	拉斐尔·塞缪尔	标题未知	国际口述史大会，10 月24~26日，阿姆斯 特丹大学	
1981	拉斐尔·塞缪尔	用实例来进行哲学教 学：雷蒙德·威廉姆斯 与历史	关于雷蒙德·威廉姆 斯希望之旅的会议。 维奇伍德纪念学会， 斯托克的巴拉斯顿村	

- |      |            |                              |                                            |                                  |
|------|------------|------------------------------|--------------------------------------------|----------------------------------|
| 1982 | 拉斐尔·塞缪尔    | 从狄更斯到布里茨关于伦敦东区的历史与虚构         | 班克罗夫特, 中心图书馆, 11月25日                       |                                  |
| 1983 | 拉斐尔·塞缪尔    | 提交给莱斯利·莫顿的纪念大会               | 伦敦中心工艺专科学校报告厅, 3月20日                       |                                  |
| 1983 | 拉斐尔·塞缪尔    | 维多利亚时代的种族主义                  | 罗斯金学院, 5月22日, 星期天                          | 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的大会                |
| 1984 | 拉斐尔·塞缪尔    | 工党的形象                        | 牛津大学附设课程, 5月3日, 星期四                        |                                  |
| 1984 | 拉斐尔·塞缪尔    | 伦敦的地方自治; 20世纪80-90年代的市民意识    | 伦敦郡议会百年纪念团体, 12月12日, 星期三                   |                                  |
| 1985 | 拉斐尔·塞缪尔    | 神圣的选举? 罗伯特·特蕾莎与早期的社会主义者      | 3月16日, 黑斯廷斯的法赖斯礼堂                          |                                  |
| 1987 | 拉斐尔·塞缪尔    | 社会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                  | 谢特兰郡的勒韦奇, 7月9日, 星期四                        | 由当地的工党组织的公共集会                    |
| 1987 | 拉斐尔·塞缪尔    | 走出冷漠                         | 牛津的会议, 11月14日                              | 提交给“走出冷漠: 新左派的三十年”大会上的“过去与现在”的稿件 |
| 1988 | 拉斐尔·塞缪尔    | 英国特色                         | 专题讨论会, 泰特美术馆, 10月22日, 星期六                  |                                  |
| 1988 | 拉斐尔·塞缪尔    | 城市贫民窟中城市生活方式与田园生活方式的唯美主义     | 布拉顿历史讲习班, 11月1日                            |                                  |
| 1988 | 拉斐尔·塞缪尔(编) | 神圣的选举? 罗伯特·特蕾莎与早期社会主义者       | 《罗伯特·特蕾莎讲座(1981~1988年)》, 罗切斯特: 工人教育工会(WEA) | 源自在3月16日在黑斯廷斯的法赖斯礼堂举行的会议         |
| 1988 | 拉斐尔·塞缪尔    | 无标题                          | 伦敦中心工艺专科学校报告厅, 3月20日                       | 提交给莱斯利·莫顿纪念大会                    |
| 1989 | 拉斐尔·塞缪尔    | 20世纪30年代英国、俄国、德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民族主义 | 在圣皮特学院六年级“历史周末”上的讲话, 牛津, 4月14~16日          |                                  |

## 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

- |      |         |                                   |                                                 |                                          |
|------|---------|-----------------------------------|-------------------------------------------------|------------------------------------------|
| 1989 | 拉斐尔·塞缪尔 | 伦敦东区的贫民窟；查尔斯·布斯的“伦敦人的生活与劳动”       | 会议与展览,4月15日,星期六                                 | 由米尔顿·凯恩斯开放大学的查尔斯·布斯中心组织                  |
| 1989 | 拉斐尔·塞缪尔 | 传统城市命中注定要衰落吗?                     | 晚宴,7月12日                                        |                                          |
| 1989 | 拉斐尔·塞缪尔 | 英国的个人主义观念。企业文化中的价值观               | 跨学科会议,9月27~29日                                  |                                          |
| 1989 | 拉斐尔·塞缪尔 | 大不列颠的观念                           | 《伦敦历史地理学家团体》,11月28日                             |                                          |
| 1990 | 拉斐尔·塞缪尔 | 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和社会的底层                  | 由爱丁堡皇家学会和英国科学院举办的专题研讨会,12月12日,星期三,爱丁堡乔治大街22~24号 |                                          |
| 1991 | 拉斐尔·塞缪尔 | 工业社会和它的博物馆:社会抱负与文化政治学(1890~1990年) | 学术报告会,3月14~15日                                  |                                          |
| 1992 | 拉斐尔·塞缪尔 | 什么是左派?                            | 第四频道,5月17日                                      | 提交给由大卫·沃克尔主持的录音纪实节目                      |
| 1992 | 拉斐尔·塞缪尔 | 码头区的犯罪活动(1750~1950年)              | 泰晤士河上的岁月,工人教育协会夏季学校                             | 伦敦大学校外部和历史讲习中心,7月8日,星期四                  |
| 1992 | 拉斐尔·塞缪尔 | 撒切尔夫人回归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                 | 《英国科学院公报》,第78期,第9~29页                           | 源自在爱丁堡皇家学会和英国科学院共同主办的研讨会上的发言,1990年12月12日 |
| 1993 | 拉斐尔·塞缪尔 | 标题未知                              | 阿伯丁大学                                           |                                          |
| 1993 | 拉斐尔·塞缪尔 | 现实主义、理性、历史和记忆                     | 耶鲁大学的报纸(2月28日);历史的地位:文化景观与城市(3月1日)              |                                          |
| 1996 | 拉斐尔·塞缪尔 | 被质疑的现代性:艺术、建筑和日常生活                | “现代性的若干转折点?重建不列颠(1945~1964年)”会议,7月9~10日,朴次茅斯市政厅 |                                          |
| 1996 | 拉斐尔·塞缪尔 | 看得出来的嫌疑人                          | 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台                                      |                                          |

- |      |                    |             |                  |       |
|------|--------------------|-------------|------------------|-------|
| 1996 | 拉斐尔·塞缪尔            | 具有英国特色的种种观念 | 东伦敦大学,10月22日,星期二 | 演讲与讨论 |
|      | 宁·德·科内             |             |                  |       |
| 1997 | 克-史密斯、默恩·吕迪格、莫顿·西恩 | 密涅瓦的猫头鹰何时起飞 | 哥本哈根大学           |       |

补充说明：皮特·克劳斯把拉斐尔·塞缪尔的出版物与讲话初步编成了这份附加的文件。如果读者知道并告知遗漏掉的，出版社和拉斐尔·塞缪尔档案馆将不胜感激。所有与此有关的信件请寄到以下地址：

Editorial Department, Verso, 6 Meard Street, London W1F 0EG, UK.

## 附录二 作者生平

拉斐尔·艾肯·塞缪尔（Raphael Elkan Samuel, 1934 ~ 1996年），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称他为“同时代人中最杰出的具有原创性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在去世之前仍担任东伦敦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从1962年起在鲁斯金学院任教，直至逝世。

他出生于伦敦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巴尼特·塞缪尔（Barnett Samuel）是一名律师，他的母亲明娜·尼伦斯坦（Minna Nierenstein）是一位作曲家，也是犹太出版商瓦伦丁·夏皮罗（Valentine Shapiro）的合作人。塞缪尔年轻时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并于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后退党。

他曾获得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奖学金，在那里，塞缪尔成为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一员，小组中的成员还有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和 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等人。1952年他与别人共同创立了《过去和现在》杂志，并开创了工人阶级历史的研究。1956年，他在伦敦的索霍（Soho）区创立了作为英国新左派聚会地点的党派咖啡屋。

他在牛津大学鲁斯金学院的工会开创了历史研讨会（History Workshop）运动，从事底层历史的研究。

塞缪尔的档案被保存在毕晓普斯盖特图书馆。

他1996年去世后，东伦敦大学的东伦敦历史中心更名为拉斐尔·塞缪尔历史中心，以纪念他的开创之功。该中心的成立是为了调查和记录18世纪以来的伦敦历史。为了秉承塞缪尔的“历史研究

应该走出象牙塔”的信念，该中心鼓励人们在社区中开展研究，并出版了从学者专著到学生论文以及当地出版社特别编辑的《备忘和查询》(Notes and Queries)刊物等一系列资料。自2009年9月以来，拉斐尔·塞缪尔中心与东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和毕晓普斯盖特协会之间保持着合作关系。

凯洛琳·斯迪曼在《激进哲学》杂志发表的讣告中这样描述塞缪尔的工作：像威廉姆斯和汤普森一样，他在与重返成人教育课堂的工人阶级的互动之中开展了他的历史研究工作……塞缪尔对历史学所定下的标准，是狂热的经验主义，也是把历史学家们的议题和他们纷繁的叙述相结合的浪漫主义，他的历史研究里包含了每个人工作生涯中难得的却备受后代人漠视的一桩桩细节……

拉斐尔·塞缪尔被安葬在海格特公墓。

## 译 后 记

本书的“序”和第一部分第一章“衰落中的集体”由陈志刚翻译，其余部分由李晓江翻译。然后，互相校对了译文。全书由陈志刚统稿。

原著中出现的一些专有名词、缩略词，翻译如下：

AEU (Amalgamated Engineering Union), 混合机械工程工会

AUEW (Amalgamated Union of Engineering Workers), 工程业混合工会

CPGB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英国共产党

GMC (General Management Council), 综合经营管理委员会

ILP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独立工党

MPS (Member of Parliaments), 下院议员

NCLC (National Council of Labour College), 劳工学院全国理事会

NEC (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全国执委会

NLR (*New Left Review*), 《新左翼评论》

NUX (National Union of Ex-Servicemen), 全国退伍军人协会

PCE (Partida Comunista de España), 西班牙共产党

PCF (Parti Communistes Français), 法国共产党

PCI (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 意大利共产党

PCP (Partido Comunista Português), 葡萄牙共产党

SDP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社会民主党

TUC (Trade Union Congress), 工会联盟

UCS (Upper Clyde Shipbuilders), 上克莱德造船工人协会

ULU (University of London Union), 伦敦大学联合会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研究不深，翻译错谬、不准确之处，请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译 者